

ZHOUENLAI  
ZHOUENLAISHENGPING

# 周恩来生平

南山 南哲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后记

自从周恩来辞世以来，大量回忆、记述和研究周恩来生平业绩的文章、书籍面世，表达了人们对生前从来不愿宣传自己的周恩来的深深怀念。我们从近年来发表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的有关周恩来一生的文章中精选出许多精彩、感人的内容，加上新近撰写的一些段落，编成这本 100 余万字的书，为的是进一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并使人们对周恩来的一生有一个较为完整、清晰和生动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向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献上的一份心意。

本书所选的内容，涵盖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各个历史时期，有的是老同志的回忆，有的是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记述，有的是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的纪实佳作。为统一体例、避免重复，并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包容最大的信息量，我们在遵从原意的基础上对原稿作了一些删节和编辑加工，并努力对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作了订正，还为大部分文章重新拟了标题。

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的大力帮助、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研究员、李海文研究员、安建设副研究员审阅了全部书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廖心文、熊华源、纪晓华等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很大地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编辑一本百万余言的书，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程，尤其它反映的又是周恩来这样一位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世纪伟人，因此，书中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并谅解。

编者

## 周恩来生平

## 十六、第一任外交部长

### 组建外交部

周恩来亲自点将，组建外交部。毛泽东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周恩来安排“将军大使”躲在屏风后“窗下学礼”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了政务院，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卓有成效地亲自领导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1949年9月30日，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正和同志们忙着准备开国大典后的外交工作，中央外事组主任周恩来兴冲冲赶来。周总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既精神抖擞，潇洒英俊，又文雅谦逊，风度翩翩。大家不约而同围了过来，一起亲热地与总理打招呼。

周恩来兴奋地告诉大家，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将要正式设立外交部。周恩来又告诉王炳南说：

“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立即送发留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使情或领事何。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件打印好。这将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驻华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开国大典之后，外交工作更加繁忙，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挑选了德才兼备的干部，大大加快了组建外交部的进程。

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周恩来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外交部的任务：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周总理满怀深憎地回忆中国的外交史说：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朗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

周恩来越说越激动，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自豪感斩钉截铁地指出：

“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弱，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他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他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后宣布中国外交部领导名单：

外交部长周恩来（兼）

副外长 王稼祥（兼任驻苏大使）、李克农、章汉夫

办公厅主任 王炳南

苏联东欧司司长 伍修权

亚洲司司长 沈端先 乔冠华代理

西欧非洲司司长 宦乡

美洲澳洲司司长 柯柏年

国际司司长 董越千

情报司司长 龚澎

条约委员会主任 章汉夫（兼）

外交委员会主任 周恩来（兼）

交际处处长王悼如外交部组建起来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从何而来？

周恩来亲自点将。

几乎在同时，还远在南方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与敌撕杀的黄镇、耿彪、王幼平、姬鹏飞、袁仲贤等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都接到中央要他们迅速进京的电报。

这一批人大多是经过战火长期洗礼的解放军兵团级干部。他们都具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谙我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略思想，组织纪律性强。用毛泽东的话说，选这些人当驻外大使，我们放心，因为他们跑不了。

当然，周恩来之所以选这批将军，是因为这些将军在建国前都或多或少地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有过与外国人接触的经验。如黄镇、耿彪、韩念龙等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过，与美国人打过交道；袁仲贤曾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与英国人就“紫石英”号军舰事件进行过谈判。

周恩来曾形象地比喻，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好像是一支“文装解放军”。

这批将军来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参加外交业务知识培训班，并亲自给他们作报告，阐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周恩来说：你们这一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去，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

台下的将军开心地笑了。……

周恩来最后交待说：“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多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开展调查研究。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当好新中国的代表和友谊的使者。”

尽管这样，这些将军们对即将担负的外交工作还是有点挠头，周恩来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边干边学。

驻外大使首先遇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驻在国首脑递交国书。这项工作对于这批将军大使来说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为此，周恩来趁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机会，亲自安排将军大使们躲在屏风后面现场观摩了一回。这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窗下学礼”的故事。

就这样，经过一段短暂的学习，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将军大使带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带着周恩来对他们的期望，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批将军大使较好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并在后来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 首次出访苏联

毛泽东点将周恩来：“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周恩来不负重托，新中国首脑第一次出访圆满成功。米高扬从周恩来身上明白了中共取得胜利的原因

## 毛泽东点将周恩来

1950年1月10日凌晨1时许，一辆苹果红的小轿车从中南海西北门驶出，途经府右街南口，向东转入长安街，到天安门后向南，驶进前门火车站。车刚停稳，在警卫人员的照顾下，车内走出一个人来。他风度翩翩，身青藏青色中山装，外罩黑皮大衣，头戴黑皮帽子，微笑着，会同等候在车站的同行者，神采奕奕地径直向早已停靠在站台旁的专列走去。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同行者有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中财委计划局局长沈鸿、周恩来秘书何谦、贸易部机要秘书苏农官。

2时整，长鸣气笛划破万籁俱寂的夜空，火车缓缓启动，随即向东北方向飞驰而去。

周恩来此行，是要前往莫斯科辅佐头一年12月首次访苏的毛泽东，同苏联领导人就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谈判，主要是商谈取消国民党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以新的友好条约来代替，同时努力争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援助事宜。

周恩来此行，是善于用人之长的毛泽东点的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由周恩来出面主持与苏方的谈判、签约，更为合适。他曾多次赞许道：“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早在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曾怀着喜悦心情致电中共中央：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这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致电中共中央，交代准备工作的注意事项。其中，在1月3日凌晨4时电报中称：

昨日下午11时电报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麻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1月3日夜，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参与商议毛泽东2日和3日的来电内容。会议一致决议：“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行动果断利落的周恩来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

作。1月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作关于中苏谈判问题的报告，并宣布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1月11日傍晚，专车抵达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沈阳。在东北地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其随行人员在这里上车。代表团成员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陞、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处长罗维、东北俄文学校副校长赵询。

专列抵达哈尔滨后，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出访工作的指示，并介绍对这次中苏谈判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这次出访，要把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往前推进一步，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气象一新，而且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来对付帝国主义。

13日，专列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继续风驰电掣般地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由西向东行进。呈现在周恩来眼前的是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世界，令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

途中，周恩来抽空翻阅了名噪一时，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苏联国内一些人还把它奉为军事历史小说的范本。他对苏联作家竭力美化、宣扬沙俄侵华战争十分反感，在10个月后的1950年11月，周恩来在同军事秘书雷英夫聊天时，谈到了在出访途中看这部小说的感想，他说：这部小说，我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接着，周恩来用敏锐的眼光、犀利的言辞，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他说：

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

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1月20日下午5时，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车站悬挂着中苏两国国旗，车站的大自鸣钟敲打了五下。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人民政府首脑的身份出访，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中等的热烈欢迎。

这是10年后周恩来对苏联的再次访问。上一次是1939年，那年7月，他在延安不幸坠马，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8月底赴苏联治疗，次年3月返抵延安。

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同苏联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度的举止，幽默含蓄的言谈，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

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充分肯定中苏友谊与团结重要性的简短演说。他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

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 周恩来不负重托

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伍修权等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斯大林举行的酒会。

在交谈中，从体现主权的立场出发，周恩来提出苏联归还中国长春铁路应该有个年限，并且指出：（一）铁路在未归还之前，应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经营的股额，中方占51%，苏方占49%；（二）铁路局局长可否由中方担任正局长，苏方任副局长。苏方答复：中苏股额比例按51%和49%确定不平等，将影响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因为苏联与它们间的股额都各为一半。再就是铁路的正副局长任职，可采取定期轮换制。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中长铁路既已确定定期归还，便同意了苏方的意见。

关于旅顺口问题，有意以新协定取代旧的不太平等的协定的斯大林，指出可以不必顾虑《雅尔塔协定》的约束，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保持1945年协定的形式而实际撤兵；二是实际上暂时维持现状，而采用一个新的形式。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苏联将放弃《雅尔塔协定》所赋予苏联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组建，不如让驻旅顺口的苏军推后一些时间撤退，但应在形式上规定撤兵期限，使中国今后收回旅顺口有法可依。如果协定形式不受，苏军撤退后还可以随时进驻，于中国不利。因此，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二方案。1月22日晚9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磋商着手起草新的友好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

在同斯大林握手致意时，周恩来看到10年不见，经历卫国战争洗礼的斯大林，已经须发皆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苍老多了。但是，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斯大林，仍如过去那样踌躇满志，稳重端庄，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神韵，讲话一板一眼，用词简洁准确，态度友善谦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在新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且申明对《雅尔塔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对大连、旅顺港所享有的特殊权益可以下去管它。还指出：现在有两类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类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与旅大问题、贸易与贸易协定问题，第二类为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

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就第一类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会谈开始后，双方分别增加李富春、王稼祥、葛罗米柯、罗申参加），起草条约和有关的协定。同时决定，由刘亚楼同布尔加宁就第二类问题进行谈判。

从1月23日开始，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进行具体谈判，并着手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40年后，据当年参加该《条约》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回忆与怀念》一书中写道：



他（指周恩来）将条约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开动脑筋，贡献力量。他自己更是格外认真和精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周总理说，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条约全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字，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总理，都为它付出了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看来只有几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1月24日，周恩来将中方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随后，苏方提出修正稿。修正稿接受了原草案的基本内容，只是对文字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对结构进行了一定调整。其中，将第二条由被动式行文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尽速缔结和约；在第三条中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2月1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称：“现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电告如下，全文共880字，请令乔木校正有无错误。此案大体已定，如有个别文字修改，当再电告。”8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胡乔木：昨日又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后付印稿发给你们，“此次标点符号仍不计算，亦无草案及全文字样，共计898个字，请校正是否无讹。”“现已争取派飞机送文件到北京。”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拟成并送交苏方后。周恩来从1月24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为苏方提出，中方原则同意，只是对年利率为1%的优惠条件的解释提出了修改意见，但苏方坚持原有提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认识苏联何以减少一倍的利息优待中国”。对此，中国表示谅解。

在中苏双方对有关条约和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后，2月5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电文告以：现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6个文件发回。有关文件，可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在签字前一天，由你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传阅6个文件，同时由你作解释性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

2月8日，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谈判进展的简要情况，从这天到2月14日，他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和国内就此事的宣传报道等事宜起草数电发回国内。周恩来在12日致刘少奇转杨尚昆、李克农和胡乔木的电报中说：

一、7种文件及新华社社论已于11号上午10时由赖亚力、石乔乘飞机住北京，如无阻碍13号至迟14号上午可到。

二、为防万一飞机误事，今日将新华社社论电告你们，文件经电告有错误者，当于今日再电告一次，以便作最后校止。

三、签字日期，时间大致定为14日下午6时至7时（即18时至19时），计北京时间已为14日23时至24时，我们准备在签字后，即于莫斯科时间

19 时至 20 时将签字情况，分别以有线电明码及无线电话发新闻稿给你们，以便 15 日与各项文件见报。

## 圆满成功访问

2 月 14 日，是象征中苏两国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加强的日子。这天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中苏友好条约和协定的签字仪式。两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斯大林亲自出席，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为签字仪式增添了隆重而欢快的气氛。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正中间。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端坐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旁，分别全权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条约》明确指出：中苏两国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中苏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两个协定分别规定：（一）苏联放弃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在 1952 年末以前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中国政府负责偿付苏联自 1945 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的行政由中国政府管辖。（二）苏联政府在 1950 年到 1954 年 5 年内，以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 3 亿美元（年利 1 %），作为中国偿付苏联所交予的机器和器材之用。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问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满怀喜悦心情在签字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说：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是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热情地款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苏两国官员其乐融融，互致问候。

斯大林兴致勃勃地举杯，向毛泽东祝酒：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

毛泽东欣然干杯后，回敬一杯：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真心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在给毛泽东敬酒之后，特地来到周恩来面前敬酒，他们在受斯大林指派后，在同周恩来的谈判交往中，对周恩来那东方的儒雅与魅力，严谨精细、虑事周密的工作作风和话锋敏锐、超群绝伦的外交才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为此，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幽默他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

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2月14日晚，为了庆祝中苏两国谈判获得圆满成功，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斯大林满怀欣喜之情破例率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出席酒会。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驻苏联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和各国记者也出席了酒会。各方宾客济济一堂，共有500余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二巨头的毛泽东和斯大林，自然成为酒会注目的中心人物。

兴奋中的周恩来临场不拿讲稿致祝酒词，把他无出其右的讲演才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据师哲回忆当时情景说：“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受周恩来祝词的感染，经过一轮祝酒之后，斯大林起立，以轻松愉快的语气致词。他说：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

2月17日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别莫斯科，踏上归途。

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苏学生。周恩来对留学生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年轻的一代来继承，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好业务知识，以便将来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随后，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安抵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彭真、林伯渠、聂荣臻等的热烈欢迎。他们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获得圆满成功。

考虑到新中国外交工作如何更好地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苏联后的新形势和迎接新任务，3月20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了主题为中苏缔约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任务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中苏签订新约的历史意义，说：

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的日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

最后，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老实说，我们的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外交战线上有许多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经验比较少，人才也比较缺乏。但是，我们要下决心去完成任务。”

总而言之，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出访苏联，为50年代中苏关系的全面

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对于保障世界和平，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 叱咤风云日内瓦

第一次登上国际大舞台，周恩来折冲樽俎日内瓦，让世界刮目相看新中国。外国人感叹：周恩来使外交变成艺术

## 不打无准备之仗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退军队，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的进一步开展，打得法国侵略军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迫使美国和法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开展，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充分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和很好解决的。正如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在—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外长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在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有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从2月底到3月，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文件，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人选等问题，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同时，他还主持拟定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了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在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地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4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

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他说：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 初登国际大舞台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四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

随即，周恩来致电胡志明主席和越劳中央，告诉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并强调说：

目前国际形势下越南的军事情况，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越好，北纬16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

周恩来在电文中还请胡志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一同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4月1日，周恩来偕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莫斯科。随即，他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四国范围内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4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3架苏联伊尔—18飞机，由北京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

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

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4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队伍整齐威武，以致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以后，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拭目以待，冷眼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这名人荟萃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湖山环绕，山青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充满了诗情画意。不但如此，它还是一座具有“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之称的国际城市。在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舞台，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后，面对久经磨练、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显示出了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镇定沉着地在机场散发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日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了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简历有1800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个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起草的，并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批准。为什么要在简历中使用这种评价很高的话呢？据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熊向晖透露：“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 初显身手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除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五个大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外，

还有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会议一致推举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那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4月27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外务相在发言中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确定：（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依仗自己“金元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伙同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明确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无理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显而易见，联合国在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接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荒谬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郑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南日的发言，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

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会上，莫洛托夫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与五点建议。

由于美国 and 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仍未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但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的戮力配合和他们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的发言，逼使论战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的处境之中。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在会上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 使外交成为艺术

6月5日以后，美国代表加快了决心使朝鲜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的步伐，因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其他西方国家代表惟美国政府旨意是从，同时在会外到处散布将在15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据艾登1960年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透露：

比德耳·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

针对以上情况，力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做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样，6月15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全体会议在旧国联大厦开会。会上，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发言，发起了又一场和平攻势。

南日提出《关于保卫朝鲜的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

周恩来附议南日的新建议，强调这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各国没有理由不在“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同时建议：“本会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以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莫洛托夫提议与会十九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

在朝、中、苏三国代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屏息倾听。三国代表所提的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起了美国等国代表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在美国代表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40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和统一口径后，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的三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南朝鲜代表发言附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注视着主席台上的代表，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受宠若惊的泰国代表开始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被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称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临危不惊，沉着镇定他说：“《十六国共同宣言》不是有助于朝鲜的统一的，也不是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的。”我们相信，朝、中、苏三国代表的建议，“将使朝鲜人民感到巨大的兴趣”。“我们将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奋斗。我们将为朝鲜人民的利益，为统一这个国家的利益，最后为全世界和平的利益而继续奋斗”。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国共同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接着，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下述决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以坚定语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了，那么我们不能不对这一事实表示最大的遗憾。

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令人陶醉，周恩来的一席话，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感受。

顷刻之间，会场震动了，泛起短暂的骚动和窃窃私语，迅即又恢复肃静。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显然，大家被周恩来铿锵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讲话所感动。都感到他的讲话的分量。

虽然对方在本次会议上宣布了《十六国共同宣言》，但是它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深受感动、受良知驱使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起而响应，解释说：“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共同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的其他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既定方针，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如果《十六国共同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末，《十六国共同宣言》只是一方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面对斯巴克“胳膊向外拐”的发言，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对周恩来的建议点头默认的文登，这时拉长声调说：

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

会场又一次出现短暂的寂静。心猿意马的史密斯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卿杜勒斯使会议破裂的指令；如果表示反对，无疑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史密斯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地仓皇发言：“我不懂得中国建议的范围与实质。因此，在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说完，史密斯更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

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大度的气质、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作出总结：

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6月15日，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啊！由于美国代表蛮横无理的阻挠，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次会议将美国代表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究竟谁赢得了胜利，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散会后，莫洛托夫跑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

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事后，美国前国务卿狄恩，艾奇逊也称周恩来为“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 提出六点原则又灵活的建议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5月8日开始的。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参加。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5月7日，即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歼灭1.6万余名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大捷的喜讯，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8日，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但是，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这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还因为，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而且有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

在进行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仍然平心静气他说：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

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接着，他根据印度支那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本着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的照顾到敌对双方利益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

周恩来逐项解释了建议的内容，强调：印度支那三国不分哪一个国家，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双方军事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由于三国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六点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程，经过会外的秘密交谈和九国代表团的准备会议，5月29日，9国代表团通过了关于越法双方军事代表会晤的协议。这项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承认了印度支那三国都存在着停火问题，停火必须在三国同时实现。

从5月31日开始，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际性讨论。

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半个月中未能获得重大进展。

随着法国国内矛盾的尖锐化，6月12日，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17日，法国国民议会授权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内阁。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新政府如果不能在4个星期内谋求到印度支那停火，就准备辞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有诚意。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所表示的鲜明态度，无疑使会议出现转机有了新的可能。

善于洞察新形势并顺应和推动形势向前发展的周恩来，在会议进程中同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成为促使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的关键人物。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六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六点建议。这个新的六点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欢迎，像和煦的春风，使陷于僵局的会议恢复了生机。

经过周恩来、莫洛托夫同法国、英国等国代表的广泛而深入的接触，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我方代表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 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而奔波

从6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全力以赴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忙碌和奔波。

6月22日，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瑞典大使让·肖维尔，就同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为了让法国新总理兼外交部长了解中国代表团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对肖维尔说：中国代表已介绍老挝、

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接触。“我们希望（印度支那）三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

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谈。他询问了法国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时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申明：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的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条件。如果美国阻挠达成协议的企图得以实现，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政府和人民。

周恩来的以上两次谈话，高屋建瓴，言辞恳切，着眼于和平，既照顾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赢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好感。反过来，孟戴斯——弗朗斯也以心交心，再次表示：“我决心以1个月为期限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在对对方主要国家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从7月初到7月中旬初，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专程赶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

据师哲 1991 年回忆：

7月3日，周总理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总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因为法方已经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

经过周恩来远距离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三国一致认为：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12日，远行几千公里、风尘仆仆返抵日内瓦的周恩来，立即投入到争分夺秒的斡旋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7月20日，日内瓦会议双方代表终于在会外协商中取得七点共识：

（一）在全境同时全部停火的原则下，越南具体执行停火日期已协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北部7天、中部10天、南部20天。

（二）越南军事分界线确定在17度略南、9号公路以北。

（三）撤军日期，准备从对方地区撤退到集结区以9至10个月为期限。

（四）越南选举期限确定为2年，1955年7月由双方协商确定选举日期和方法。

（五）老挝划区问题，已同意寮国抗战部队集合区先在11个点集结，最后集合在老挝东北的丰沙里与桑怒两省。

（六）柬埔寨问题，采取就地停战、政治解决办法。

（七）国际监察，已确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担任，以印度为主席。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交战双方代表分别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中午，交战双方代表在《柬埔寨

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随即，法国政府发表关于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尊重3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老挝和柬埔寨政府分别发表关于使全体人民参加共同生活以及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的声明。

这天下午3时，周恩来同与会国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怀着欢快喜悦的心情，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说：“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75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在这次会议讨论的两大问题中，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现在，本会议对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仅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关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

接着，周恩来提到了对达成协议作出重大努力的几个国家的代表。他说：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本次会议两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和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

美国代表眼睁睁地看着会议马上就要通过宣言而无可奈何，但又顽固到底，最后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字，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

在美国代表不参加签字的情况下，会议仍然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获得协议而胜利闭幕。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出乎人们意料。尤为令人意外的是，为会议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是初出茅庐、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周恩来。难怪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

7月2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在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郊机场盛情欢迎凯旋的和平使者周恩来及其一行。少先队员向周恩来等献上一束束鲜花，表示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日内瓦会议后，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成为平坦大道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踵而至，如北面大国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南亚大国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西欧大国英国工党艾德礼等相继来华访问。东亚大国日本的有识之士也纷至沓来，与中国开展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亚非人民的历史盛会——亚非会议已经在酝酿之中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关系展现在新中国人民面前。

### 用艺术架起友谊的金桥

《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闹”日内瓦，卓别林谈笑论中国。  
艺术在周恩来手中成了架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金桥。周

## 恩来“演”出了几幕日内瓦会议的戏外戏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从各个方面施展开他的外交才能和外交艺术。在他手中，艺术成了一座架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金桥。于是，好戏连台的日内瓦大舞台又有了几幕精彩的戏外戏。

### 《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闹”日内瓦

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家代表团和新闻记者，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周恩来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时还带去了《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会议召开不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所展示的精神风采已为各国代表团和各国记者所注目。

有人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指示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纪录片《1952年国庆》，用影片所展示的已经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来回击这些记者的诽谤。周恩来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以便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国解说词，用英语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5月13日晚，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在圣彼得广场剧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时，能容纳250人的剧院座无虚席，还有一些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同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祝贺。有的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还真有不少美国记者来看，也不知他们作何感想。

事后，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心有偏见的人，总是要发议论的。这时，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针对以上情况，周恩来再次指示熊向晖说：“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不过，“这好对付，我们有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看。”这部片子是由电影艺术家桑弧导演，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

外国人对中国越剧片感不感兴趣呢，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心中没有把握。

20年代在欧洲生活过、对欧洲人的文化素养有较多了解、并且喜欢看中国

国各种民族歌舞与戏剧尤其是越剧的周恩来，认为只要给这部影片取个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别的名字，外国人看它的兴趣是一定会有的。他凝神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16世纪末创作的一部悲剧。剧本题材源于意大利古老的民间传说。剧情反映了青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两情相爱，但因生活在这个有世仇的贵族家庭而不能结合，终于酿成先后自杀的悲剧发生。事后，两个贵族家庭大梦初醒，握手言和。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西方国家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

为了招待各国记者，5月20日晚，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受到了众多外国记者的喜爱。放映前10分钟，能容纳200多人的旅馆大餐厅的位子已经坐满了人，和上次放映《1952年国庆节》不同，这次在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个个入戏，全都看懂了。

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愤，从“楼台会”的哀怨位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旋律随着美丽动情的画面，在观众心中起伏回荡。当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时，只听见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

电灯复明，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大美了，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电影的色彩这么绚丽，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尽兴地谈论着，不肯离去。

当周恩来听取熊向晖汇报得知影片放映获得巨大成功时，深情他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比喻多么贴切，多么打动人心。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蕴含着多么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

汇报结束，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请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亲手送给了熊向晖，以庆贺演出成功，并嘱咐服务员将酒款记在自己的帐上。

这以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在其他场合放映了几次，6月8日，周恩来宴请并招待以艾登外交大臣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后，艾登满意他说：“影片的色彩鲜艳，服装美丽，女主角表演优异。”他还建议中国向外国出口这部片子。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社会名流，看了后赞许道：“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鉴于这部影片在西方国家记者和社会名流中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又将其拿到中、苏、朝、越四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会上放映，并在现场配备了第一

流水平的俄语介绍，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苏联留学的一位烈士的后代欧阳菲（女）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当剧情发展到梁山伯到祝家求亲，发现小妹就是祝英台，他仍像少年时的同学关系一样，彬彬有礼，不苟言笑时，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惊讶了，说：“中国的伦理道德太独特了，与欧洲根本不同——看见自己恩慕的情人，竟不亲吻，不拥抱，甚至手都不握。”言谈中流露出对东方传统美德的敬意。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 会见卓别林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广交世界朋友。

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见了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及其夫人。

下午4时许，周恩来迎候在大门口，当卓别林偕夫人下汽车时，周恩来热情地迎过去，亲切他说：“我是你的忠实观众，30多年的观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两位老朋友亲热地挽着手向大厅走去。卓别林先生满头银发，一脸慈祥，面带笑容的长者风度，没有哪一点能引发我们联想到影片中那留着小胡子，戴着小圆帽，手中耍着一根拐棍，用八字脚走路的滑稽形象来。可是他所演的这些角色，都是替被压在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许多中国观众都是流着泪看完这些影片的。现在，直接目睹这位银发长者——伟大艺术家的风采，中国代表团成员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进入大厅，和与会者见面之后，周恩来祝贺卓别林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时说：“你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向你致敬！”“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创造的众多角色上。都深深感受到了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呼声……”卓别林激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望着他。周恩来接着说：“从你演的无声片到最近拍的新片《杀人的喜剧》和《舞台生涯》，我们都看过了，非常赞赏！发人深思，回味无穷！”卓别林夫人也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握着身边范瑞娟的手。

周恩来兴奋地继续说：“在影片《大独裁者》中，你把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表演得非常精彩，叫人信服，又令人佩服！他幻想成为统治全世界的独裁者，妄想把地球当做任他玩耍的气球，摆在脚上玩……这当然也是你非凡的艺术想象所制造出来的精彩处理……”周恩来说着笑起来。

卓别林也笑起来说：“可地球不是他摆弄的玩具，气球的爆炸惊醒了他的独裁梦，哈……总想征服别人，侵略别国的战争狂人，最后总是被战火把他吞噬掉，拿破仑征服了半个欧洲，他自封为统治全世界的英雄，可是最后被打死在异国土地上，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野鬼……”他们两位越说越兴奋，旁边的人听得入神，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前两天看过影片中的情节和人物。又听周恩来说：“在观看你的一系列影片时，大家一直笑声不断，可有许多地方，人们是流着泪在笑啊！你拍的影片和所演的角色，都引起人们许多深思。”

卓别林情绪激动地说：“影片《淘金记》中很多情节都是生活中的真事。



你们看我吃皮鞋吃得多香啊！在当时真是许多工人被资本家骗到矿山去，饿得把什么都吃光了，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只有吃自己的皮鞋，……资本家工厂中的工人都成了会说话的机器，常是做单调的一件事，嗯，应该说每时每刻都只做同样的一个动作，不知道自己做活为什么？没有目标，生活没有目的，《摩登时代》中的那个工人，一天到晚总是在拧螺丝，这成了他的习惯动作，还控制不住地老要做那个动作，所以当他发现女人大衣上的钮扣，就条件反射地追着去拧，看着可笑，实则可悲！可怜！那样的社会造就出了许多精神病患者啊！那些可笑的事情又是令人痛心的……悲剧和喜剧就是界限不大的。”他用手比划着：“一线二隔吧！”

周恩来说：“从这儿部作品中完全体会了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压榨大残酷了。”

用餐时，卓别林看着满桌中国特色的美味佳肴，他放下刀叉，兴致勃勃地请翻译同志教他用筷子吃菜，经过一小会儿的学习，他最终用筷子夹起了一只虾，大家为他助兴鼓掌。他兴奋他说：“1932年我发现了东方，1936年去过上海，看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令我钦佩！还看过马连良先生的戏，真是好极了！”他说着拿起餐巾当马鞭一挥，一踮腿，真像我们戏曲中上马的动作，即席的同志们又一次为他兴奋地鼓了掌。他接着说：“你们的艺术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艺术本该是有特点，有个性的。越是民族特色浓郁的艺术，也正是人类艺术宝库璀璨的瑰宝。”

卓别林越说越兴奋：“你们的国家是新生的，有前途的，你们的人民很热爱生活，你们的艺术也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因为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西方则不同，笼罩着没落的气氛，他们自己也在恐惧，他们的艺术也表现了这一点。除了色情，就是凶杀、暴力，充塞着邪恶的东西，都染上了时代病，摩登病，一片绝望情绪。我不与好莱坞合作，他们很恼火，从各方面给我施加压力，想要我听从他们的指挥棒，资本主义不仅搞经济上的垄断，文化艺术上也要搞垄断，可是艺术品不能像工业品一样，搞统一化，标准化，我的祖父是皮鞋匠，他每做一双鞋都是新花样，做完总是要欣赏半天，因为那是他的艺术品……”

周恩来微笑着赞同地点头说：“我们国家在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繁荣文化艺术事业。”

卓别林听周恩来讲“双百”方针很感兴趣，他沉思着，琢磨一下，微笑着恳请翻译同志再给他细致的解释了“双百”方针的内涵。

周恩来接着说：“看了你演的《舞台生涯》，我们都为那位老艺人流下了同情之泪，一位深受众多观众热爱的艺术家，他一生带给群众无限欢乐的老艺人，到了晚年竟流浪街头，最后在群众的哀悼中倒在了舞台上……而在我们国家里老一辈的艺术家们生活得很幸福。国家不仅安排条件保证他们安度晚年，还为他们的传艺、培育新人创造条件，也保证他们各自流派的继承，发展和流传下去。”

卓别林用很欣慰的目光，看着在场的受过良好培育的中国朋友，当他看到范瑞娟时说：“中国的戏曲艺术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各个民族，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极富特色的剧种，她们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戏吧？！”（指越剧）范瑞娟微笑地点头向他致意。周恩来热情地握了一下卓别林的手说：“你对我们了解得很多，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好朋友！是‘知音’。”这时大家都积极热情地要求范瑞娟唱一段越剧，她爽快地答应了，唱了《梁

祝哀史》中“楼台会”的一段，作为这个会见活动的收场节目。

告别时，卓别林夫妇依依不舍地说：“感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多么美好、难忘的黄昏，充满友情和欢愉的夜晚，还有这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晚宴，这一切都将深藏在心灵深处的重要位置。”周恩来诚恳热情地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再访中国时说：“热情欢迎你们再访中国！看一看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面貌！”卓别林非常激动地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中国代表团成员又跟随周恩来身后，目送他们两位登车归去。

## 求同存异万隆城

万隆会议，乱云飞渡，周恩来排难解纷平风波；求同存异，五项原则，创造出世界外交的经典。“脱颖而出的会议明星”周恩来让世界再次刮目相看新中国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名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这次会议所反映的团结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和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经过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却仍；日光彩夺目，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 接受邀请

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最早是在1954年初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这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正式提出召开亚非会议，并一致同意也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热情地邀请中国参力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为什么要召开亚非会议？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第一，亚非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取得民族独立，许多国家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但是，“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亚非人民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深入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第二，亚非地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因“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为了“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并使“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合作，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整个国际形势虽然趋于和缓，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在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这使亚非人民“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并急切地盼望召开一个增强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会议。

周恩来极其敏感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

接受邀请。他在复电中高兴地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贡献”。中国政府对于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荣幸”。

## 会前准备

包括中国在内的 29 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将共聚一堂，讨论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响。但是，亚非会议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

西方殖民主义最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对外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它必然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圣路易邮报》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同时，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会议的 29 国中，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锡兰同中国只有贸易关系；其余 22 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

在阻止亚非会议召开的阴谋破产后，美国便企图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的谎言。极力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使这次会议失败。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其国家野心的做法”的共产党政权。

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是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挫败美国企图、开好会议的前提。为此，从 2 月开始，周恩来立即着手抓了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主持研究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并在 4 月切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文件。

《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在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问题上，“我们的主张是：保障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

4 月 5 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充分讨论并批准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等有关文件，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4 月 6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和代表团成员名单。13 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宣布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

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为顾问，王倬如为秘书长。

这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同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 踏上征途

4月7日，周恩来带着刚动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离开北京经重庆前往昆明。

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趁这次会议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他们派特务炸毁了中国代表团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致使机上的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幸免于难。

面对这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面无惧色，依然如期前往参加会议。

4月14日，周恩来飞抵仰光。15日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这时，飞机爆炸事件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中引起思想混乱：有的国家担心亚非会议开不成了；有的国家认为即使开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有的国家领导人则担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也可能遭到暗算；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想劝说周恩来避避风险，不要去参加会议了。

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周恩来冷静分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和悦地指出，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建议在座的各位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没有结果。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被迫暂时降落到与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的新加坡的机场上，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可急坏了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不安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随后，苏加诺总统陪同周恩来乘车驶离机场。一路上，街道两旁、楼台房顶，处处挤满了欢呼致敬的人群。

4月17日，周恩来飞抵万隆，他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同时，他预见性地指出：“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 and 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以后发生的事实证实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 一平风波

4月18日上午，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隆重开幕。

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色贝芝帽的苏加诺总统，在五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独立大厦会场，然后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引起各国代表的共鸣。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场上充满着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的发言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了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声称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渗入和颠覆活动”，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同情和焦虑，有的幸灾乐祸。这时，周恩来镇定自若、不急不躁，静静地听着、思考着。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不一会儿，一篇内容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准备好了。

下午4点多钟，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顷刻间，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相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

周恩来在作了简要的说明之后转入正题，他首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会场一片肃静，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接着，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所谓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等，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第二，“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30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所受苦难“数也数不尽”的中国人民“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

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在会上不提“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讲话结束时，周恩来诚恳而亲切他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但是，“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们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发言，只有 18 分钟，却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使与会各国代表认识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看清了新中国确实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周恩来的话音刚一停住，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国代表纷纷离座，去同周恩来握手，甚至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十分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

## 再平风波

4 月 20 日，亚非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同已于 19 日开会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会议。政治委员会讨论以下三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三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但是，在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要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 20 日傍晚开始，会议上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要求所谓“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凭借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这时，在万隆的一些自封的美国“观察家”幸灾乐祸地声称：会议有“破裂的倾向”。

4 月 23 日上午，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与会 29 个亚非国家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这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证明和平愿望是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支持的，也证明战争是可以推迟甚至制止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国家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

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的这几句话，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最关键的几句话。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3）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4）承认种族平等；（5）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6）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7）互不损害。同时，他采纳日本代表团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论，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写进《亚非会议联合公报》中，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 广交朋友

亚非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周恩来都想方设法地与之接触，探讨相互间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和疑惧。频频的会外接触与交往，使周恩来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并且收到了显著效果。其中有很多团长包括最初有对立情绪的，都同周恩来建立起了友谊。

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同行工作人员，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代表是谁？当这位工作人员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与之攀谈起来。他俩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并交上朋友的。当年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中，有两件是在会外取得的。

其一，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共 14 条，其中规定：凡属同时具有缔约国双方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在条约生效时，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成年人，“应在本条约生效后两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凡属具有两种国籍的人，在条约生效时尚未成年，“应在他们成年后一年的期限内选择他们的国籍”。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说，现在，中国和印尼“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获得了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将坚决执行今天签订的条约”。“我希望，由于过去的历史所造成的持有双重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了他们的国籍之后，将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内容和精神，并加重他们对其所选择的国家的责任感”，并将为促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共同努力”。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旧时代遗留给新中国的繁难问题的解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新中国同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树立了典范。会后，缅甸总理吴努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地说，我深信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求得和平。相反，中国却受到了美国赤裸裸的公开进行的颠覆之害。

其二，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国家代表团深入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针对有人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的话，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巴基斯坦总理问道，和平解放台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答：“完全可以。”

4 月 23 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顷刻之间，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到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做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 胜利闭幕

4 月 24 日，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说：“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论纷纷认为，会议获得



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的参与分不开的。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一位美国记者也报道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的伟大政治家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他所倡导并在他的身上所体现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将永远为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赞许和传诵。

## 不避艰险万隆行

周恩来的万隆之行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凌空爆炸，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敢死队、“铁血团”聚集万隆。周恩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955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的万隆之行真可谓陷阱遍布，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亚非会议，先是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暗害周恩来不成，随后又派出大批的杀手混进万隆行刺周恩来。而周恩来却不避艰险，处之泰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为世界人民和平事业的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对此，当年作为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周恩来随身警卫的成元功从另一个角度撰文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披露。以下是该文的摘录：

## 两次重要警报

1955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开会地址设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故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

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

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去，固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决定会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的问题。先是周总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

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启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我国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离开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4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

我们正要离开机场候机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同志们都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

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同志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我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我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

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失事前，曾两次发出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嫉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我们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于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的一切，无一不说明周总理此次万隆之行是充满风险的。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总理去仰光之前和到仰光之后，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是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突然病倒；一是参加缅甸的泼水节。

周总理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我两个人。姚力同志已经打前站去了。人手本来就紧张，不料这时何谦同志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真是行船又遇顶头风！我正着急的时候，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不然，我真担心我一个人顾东顾不了西。此外，空军也派了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总理的安全，邓大姐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总理却

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大姐，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谏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作者），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总理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总理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总理又找留在昆明的同志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告诉邓大姐：“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作者）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总理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总理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时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时30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我和李福坤同志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迎进客厅，我和李福坤同志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钟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我和李福坤同志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我们。我们一看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浦寿昌同志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我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我们说什么服务员不懂，服务员说什么我们也不懂。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我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同志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同志把情况一说，我们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浦寿昌同志他们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我们到达缅甸那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过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我和李福坤同志惟恐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我们一共参加了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我们是贵宾，群

众还比较文明，他们只是用小碗向我们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我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我们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我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我们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五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我和李福坤同志，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我和李福坤同志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所去的五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我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 飞机迫降新加坡机场

因为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中、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我们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总理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总理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我们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总理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代表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总理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我和李福坤同志，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

两个人微笑着直向我们招手。我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我们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们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同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我和李福坤同志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同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我们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我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我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我们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总理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我们失去了 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廖承志等同志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我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我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同志守在外边，我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同志也才回到接待室来。我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 2 点 45 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 5 点 30 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甚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我们不由又想起了那 11 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我们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我们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总理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总理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十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我们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我们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我们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他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我们在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副总理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总理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二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这是康矛召同志对我讲的）。

同时，我们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总理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我们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我们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



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我们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 2000 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总理，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 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总理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 8 名宪兵和 8 名机动警察、3 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总理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 50 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同志说，听说给周总理开车，当时有 4 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银光瓦亮，纤尘不染。

## 最后的胜利

尽管印度尼西亚当局、我代表团内部，以及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和李福坤同志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总理的身后，情况复杂时，我们则干脆把周总理包在中间。这次大使馆给我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我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我们的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总理也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总理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 8 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总理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 8 点一直争到下午 6 点半（中午仅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达成协议后，于下午 6 时 35 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 9 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

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周总理略略休息了一会， 11 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 30 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 5 点，周总理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 8 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 10 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 11 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

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七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在这七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总理，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七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 16 次，会客约谈 10 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 15 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总理，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我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七天他共睡 13 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总理的嘱托在我心底埋了 22 年，直到 1977 年春天我才告诉邓大姐。

###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

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 月 15 日，周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 5 月 9 日和 5 月 15 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同志，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 18 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 5 月 18 日到 6 月 1 日，他们先后传讯了 88 人，其中拘留了 19 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 8 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

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 12 时 15 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 6 时 30 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 100 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 5 月 18 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 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的较量

面对“金元帝国”的敌视、封锁、包围，周恩来说：敌视不人为先。中美大使级会谈，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一次次地较量。周恩来妙棋迭出，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封锁、包围的政策。周恩来本着“如果谁敌视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态度进行抵抗，但敌视不人为先”的原则，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顽固反共头子进行了不懈地斗争。

## 杜勒斯“镭管”未响

日内瓦会议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他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正是他创立和发表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的理论。

杜勒斯中等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总是苍白疲倦，表情严峻冷酷，会议期间从未露出过一丝笑容。据悉，这次他来日内瓦之前，刚刚做过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在他胃里专门放置了一支“镭管”，用作放射性治疗以控制病灶的扩散。因此，在他与会期间，人们都叫他“雷管”，“镭管”与“雷管”谐音，这绰号不仅仅反映出他是个危险人物，威胁着别人，而且也喻示他自己已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了。“雷管”这绰号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蒙上了一层阴森森的色彩。他手术后先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到朝鲜“三八线”上去视察，然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日内瓦。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美国和美国人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根据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数为 147 万多人，其中美军为 14 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二次大战。最终美国不得不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破天荒地、屈辱地在自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战败协议书上签了字。这次战争使得美国因二次大战的胜利而被激起的高昂士气和自信心跌得一落千丈，也正

因此，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达到了极点。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报复中国，以日本为其在东方的主要军事战略基地，通过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亚洲其他国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圈，同时极力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制造一系列的困难。

4月26日，在世界各国的期盼和注目中，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所在地）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当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朝鲜以及参加“联合国军”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腊、泰国、卢森堡、新西兰、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的代表。

根据日内瓦会议拟定的日程，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为了使所有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撤退并帮助朝鲜举行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携手并肩，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在4月27日的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根据预先商定的方案，提出了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包括三项内容：六个月撤退外国军队，全国举行自由选举，恢复朝鲜的和平统一。

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发言，强辞夺理地指责朝、中、苏三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他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其实质是想使美国无限期地占领南朝鲜。

听了杜勒斯目中无人、出言不逊的发言，周恩来总理即席在原来的讲话稿中增加了一大段话，义正辞严地批驳杜勒斯的发言。

周总理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三项建议，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为。我们呼吁亚洲国家彼此之间进行协商，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呼吁所有欧洲国家在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呼吁停止扩军、普遍裁军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周恩来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未能出席日内瓦大会表示了遗憾。

周恩来的讲话，铿锵有力，有理有节，充分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的立场以及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获得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称赞和好评。

但是美国、南朝鲜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尤其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

美国人自以为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无论对他们扶持庇护的国家或是盟国都要挥舞指挥棒，发号施令。开会时竟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将两只脚高高地跷在会议桌上，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发言时因多少想解决一些问题，讲了一句不符合美国口味的話，美国代表马上暴跳如雷，站起来当着所有代表的面呵斥他，如同主子对待奴才一样。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

还有一次，加拿大代表在会下休息时，悄悄对中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恩来先生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人员便将此情况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听后也很高兴，以为他会在会上讲几句公道话。谁知这位老兄在

休息后的发言中，却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我国的攻击和污蔑，诬陷中国“挑起了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这使中国代表很感意外。但散会后，他又主动与我方人员联系，又是握手，又是请求原谅，说他会上的发言是言不由衷，因必须服从美国的指令，照美国的意思办，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东、西方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立。双方在看不见硝烟炮火的特殊战场上进行着殊死的搏杀。苏、中、朗、越作为一方，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会上紧密配合，在很多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齐心协力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下则频繁接触，四国代表团领导经常聚会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住处，讨论研究会议上出现的问题，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偶尔也来到我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找周总理谈话，但由于考虑到代表团住的别墅是临时租的，担心被安装了窃听器，所以，每当谈到重要问题时，都需要开大收音机音量。

在中、朝、苏三国团结联合的斗争下，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屡遭失败。5月3日，杜勒斯提前灰溜溜地离开日内瓦回国了。

提起日内瓦会议，人们不由会联想到一件引人争论的事，即会议期间杜勒斯究竟有没有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当时正值中美关系处于冰封雪冻时期。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杜勒斯确实曾亲自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的任何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长期以来，国际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断然拒绝了。当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在他后来所著的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对此事做了澄清。他写道：“有人说，在日内瓦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说：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在整个会议期间，他都是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每次开会时都是由他引路，陪着总理进入会场的。会场的座位是按每个国家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排列的。中国是 CHINA，排在前面，而美国是 USA，排在后面，两者相距甚远。每次开会和散会时，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从来都是从不同的门进出会场，因此两人会场上并不曾相遇。其次，杜勒斯是个坚决反共的人，他坚定的信念是决不容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在当时中美仇视的情况下，他更不会想与共产党人打什么交道，第三，杜勒斯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平时，他往往是一下汽车便低着头径直进入会场，一散会则立即退场，低着头钻进汽车，从不理睬记者，也不向任何人打招呼或寒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没有机会、也根本不会主动伸出手去和杜勒斯握手的。另外，由于杜勒斯提前回国，他在日内瓦仅呆了一个星期，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拒绝与总理握手”的故事。此外，周总理也是不会主动去握杜勒斯的手的，因为我国代表团当时早有规定：我国外交人员在公共场合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当然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时，要礼尚往来，不要拒绝。

### 并非铁板一块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两国配合得非常默契。当杜勒斯回美、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美国代表团团长后，莫洛托夫专程拜见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转告了有关史密斯的情况。他说，“史密斯是第二次大战中美国在欧洲作战的

将军，在美国国内很有地位。在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我曾请美国代表团吃了一次饭。在私下谈话时，史密斯曾对我流露了对美国目前实行的敌视中国的政策的不满。史密斯认为美国敌视中国是不明智的，缺乏长远眼光。”

周恩来听了这个情况后高兴地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6月16日，当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作了一个即席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

第二天开会仍讨论此问题时，史密斯却借故离开了，说是到伯尔尼拜会联邦政府去了，留下了他的副手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会议一开始，他就批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且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

周恩来一下子火了，很严厉地质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继续说：“罗伯逊先生，你在北平呆过，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是能够应战的。”周恩来的话使罗伯逊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尴尬万分。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对中美关系特别关注，尤其注意观察这两个代表团是如何相处的。

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

史密斯的回答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滚筒擦手巾。”

有一天，中国代表团正聚在酒吧喝饮料，史密斯端着一杯白兰地酒主动走过来，同当时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攀谈，“你的英语讲得很好，是地道的美国音，是在哪学的，……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我非常喜爱中国古老的文化……”

这是两个敌对的代表之间从未有过的事，浦寿昌回去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

周恩来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找他谈谈，”

第二天会议休息期间，王炳南就密切注意史密斯的行踪。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吧台喝咖啡时，忙把总理引过去。总理微笑着走向史密斯，这是史密斯始料未及的，周恩来的举动立刻引起了各国外交官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急中生智，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避免了与总理握手。他竭力放松面部表情，笑容可掬地同总理打了个招呼：“周恩来先生，来杯咖啡吧？”

周恩来微笑着摆摆手说：“史密斯先生，不想尝尝中国的龙井茶吗？”

“谢谢。”史密斯喝了一口咖啡，借题发挥起来，从茶叶谈到长城，从龙门石窟谈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客气地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和美丽的大好河山，并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在我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的瓷器。”

“非常感谢史密斯先生对中国怀有的美好感情。”周恩来继续意味深长地说：“史密斯先生作为美国的一名将军，在二次大战中曾在欧洲战场创立

了赫赫战功。为了维护今天和将来的世界和平，我真诚地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够继续做出努力。”

尽管史密斯内心里希望能如此，但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因当国家利益与私人感情发生冲突时，外交官只能服从国家利益。

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主动来找周恩来攀谈。他微笑着对周总理说：“会议即将结束，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复和平。”说罢，他抓住总理的胳膊使劲摇了摇，然后笑咪咪地走开了。

史密斯虽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没有与周恩来握手，但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与握手同样的愿望。史密斯曾私下对中国工作人员说，他回国后就辞去这倒霉的职务，因为，他既无法按自己的心愿办事，也无法按事实的真相来解决问题。

后来，在时间流逝了 18 年之后的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率团来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总理还特意对尼克松谈起史密斯拉他胳膊的往事。

### 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日内瓦会议期间的 5 月 19 日，周恩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会议文件和有关资料，这时代表团成员宦乡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

“总理，向您汇报一个重要情况。”

“噢，是宦乡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

“总理，是这样的。今天，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对我说，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一个中、美之间的中介人。”

“哦，这倒是是一个新情况。”周恩来听宦乡讲完，立即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地宝贵呀。

“美国方面是想要回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俘虏的美军和一批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宦乡的话打断了周恩来的思考。

周恩来说：“我们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一边思考一边对宦乡说：“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这个问题你需留心一下，看美国方面下一步怎么走。如果美方再试探，可以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另外，可根据美方的态度，确定在什么地方举行谈判。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5 月 27 日，我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扣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宦乡根据总理指示，继续与杜威廉联系。经过 6 月 1 日和 4 日两次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美国代表团指定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约翰逊为代表、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马丁为助手与中方接触；中方由王炳南为代表、柯柏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根据美方的建议，中方同意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由于英国外相艾登指示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因此，总理也

让宦乡参加了首次接触。

6月5日上午10点，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约翰逊为避免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有意选择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以会客的感觉，可谓是用尽心良苦。

第一次的会谈只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由于是初次接触，双方不免都有些拘谨。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谈时双方不作记录，以使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少一些拘束。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人共有83人，分为四类：在华被监禁的美侨，在华被软禁的美侨，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和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军人包括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以及1953年1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希望中方能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中方代表王炳南表示，美国方面提出来要商谈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可由双方直接接触。美方今天提出的问题，希望美方提交一份具体名单。关于在美国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中方将在以后的商谈中提出。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谈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关各自侨民回国事，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然而，在前后共举行的17次领事级会谈中，美方仍然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也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却是此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上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 周恩来抢了主动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由紧张趋向缓和。由于朝鲜停战和印支和平的恢复，远东的局势也开始缓和，但是美国不甘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败。作为报复，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后，开始积极筹划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搞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一是美国企图使其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二是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对抗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样一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就变得格外突出和醒目。

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形势，认为打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中央意识到，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朱德总司令也在建军节上发表讲话，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也突出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到底！”9月，在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重申“一定要解放台湾”，并指出，任何要使台湾“中立化”和制造“台湾独立”的主张，都是企图分裂中国领土，使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的企图，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12月2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8日，周恩来又一次发表声明，深刻揭露了这个条约的本质，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中国绝不承认。

1955年1月，为了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为了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8日发动攻势，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要求联合国尽速“斡旋”，并提出在“必要时”将派美军赴台以“保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同时美国极力反对中苏联合倡议的召开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十国会议。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一再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以坚定和强硬的立场反对美国支持蒋帮，在美国的军事讹诈面前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1954年底，中国政府又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面对形势的发展，美国意识到拒绝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失误和失败的，它必须面对新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屹立在世界政坛这样一个铁的事实。1955年1月，美国授意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的中介以他个人的名义访华，实际上是想来试探我国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案以及其他情况。我国政府同意了他的来访，在会谈中，周恩来向他指出，联合国在我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重申，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

1955年4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入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

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外交部为了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谈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我方代表是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王炳南回忆说：“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总理为创造会谈的良好开端，为使我们在会谈中先夺得主动而走出的第一步，当时我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还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我们。”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36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36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

接着王炳南发言说：“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针对约翰逊信誓旦旦的保证和声明，王炳南在8月4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突出地提出了钱学森被阻挠回国的事例。

钱学森博士是1934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的。他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后来先后在这两个学院任教。早在1950年春，他和他的家属就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曾经几次警告他们不许回国，并派人监视他们的行踪。从1950年起，美国政府以各种借口和种种手段将钱学森博士扣留长达5年之久。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他的夫人蒋英借外出用餐的机会，按事先拟定好的计划，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人员，蒋英则借口上洗手间趁机给她在欧洲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妹妹转寄给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信写在一张便条上，信上说：“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信上还说，“除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表达了钱学森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陈叔通接到信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外交部和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国进行严正交涉。

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次会议上，王炳南针对约翰逊所说的“美国绝对没有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谎言，郑重指出：“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1954年5月29日声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国学生护照的留美学生共计5242人。因为从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1日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学生自由回国，违者课以5000美元罚金和五年监禁，许多想回国的留学生都不敢申请。今年6月15日，钱学森仍然来信给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帮助他回国。”他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恢复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权利。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约翰逊再也无法辩解，美国也不能再阻挠钱学森等人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了准许他和家人可以离开美国的通知。他们立即动身乘船返回他们日思夜念的祖国。与他们夫妇一同归国的还有22位科学家和6个孩子，其中有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10月1日，这些漂流在外的中国学子在船上兴高采烈地欢度了新中国的国庆节。10月8日，船抵香港，同日即入境回到国内。

50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 “一着很妙的棋”：周恩来让美国 新闻界反对美国国务院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中央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杜勒斯举行会谈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等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贸易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但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继续纠缠不休，以致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会谈中，王炳南和约翰逊经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中方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双方交锋几句，然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面对这样的僵局，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积极思考如何对美进行新的斗争。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轰动了，国务院被震撼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谁知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攻击国务院的这种愚昧和顽固的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成功地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一看。70年代末，这些年已半百的人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旧地重游，再访中国，反映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终于沉不住气了。1957年8月，杜勒斯被迫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并作出了一些妥协，准许美国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全面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走的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周恩来的这步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

在杜勒斯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后，在9月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了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方的拒绝。杜勒斯坚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

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中国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作了讲话。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是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导致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他继续说，“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

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

周恩来最后说，“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的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周恩来的讲话获得了人大代表们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着。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到1957年12月，各种会谈已进行了73次，各种文本已堆积成山，但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

12月12日，约翰逊突然对王炳南宣布，他已被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其副手埃德·马了参赞将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耍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对此，王炳南当场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王炳南进一步指出，“约翰逊大使，你这样的做法是不严肃的。”

当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 创造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

**边界问题，错综复杂，帝国主义乘机挑拨。周恩来高瞻远瞩，平等协商，创造了解决中国边界问题的典范。帝国主义企图使中国四邻不安的阴谋破产**

秋天，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

1956年的秋天，周恩来在北京迎来了中国西南邻邦的友好使者、缅甸联邦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吴努访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中国领导人商谈，如何尽快解决中缅两国的边界问题。

周恩来非常坦率。他对这位老朋友说：“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作为典范。”

这掷地有声的承诺，扫除了吴努心中的疑虑。

### 吴努的印象

吴努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周恩来了。在以往的接触中，他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什么人只要见了周恩来，谈了问题就放心，愿意和他做朋友，他从来是说话算数的。”

吴努的印象一点不错。

1954年夏季，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国前，先到了缅甸。

这个国家是中国通向南亚的大门，和中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周恩来一直十分重视同缅甸的交往，也一直向往到这个美丽的邻国做客。

在中缅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边界问题。这个问题是 1885 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后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究竟会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一直为两国人民和全世界所关注。

因此，周恩来这次访缅受到缅甸方面隆重的欢迎，他们希望在谈论边界问题时能有所收获。

会谈中，吴努直接了当地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够早些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

这是周恩来预料到的话题。

他也直接了当地对吴努说：“希望缅甸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把情况弄清后再正式商谈。”他还说：“我们两国要以友好的精神，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好吗？”

翻译的话音刚落，吴努立即点头表示赞成。他对周恩来充满了信任。

这年 12 月，吴努应邀访问北京。

他与周恩来谈话的主题还是中缅边界问题，不同的是，双方会谈的结果以公报形式正式公布出来。公报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承诺，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缅甸人民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然而，正当中缅两国领导人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积极努力的时候，1955 年底，中缅边境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响起了枪声。

那天清晨，边界线上雾气浓浓，几步开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像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开始了一天的巡逻。他们没有想到，会在黄果园附近与缅甸军队相遇。由于雾太大，辨不清情况，双方开了枪。一时间，帝国主义大作文章，缅甸国内也出现了不利于中缅友好的言论。

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起来。

那些日子是缅甸领导人焦虑不安的日子，中国会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

正像吴努所说，周恩来“说话是算数的”。他没有因为此次冲突而动摇公报的精神，相反，他适应形势，把中缅边界问题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 1956 年春天开始，周恩来主动同缅甸领导人频繁地接触，拨开了蒙在两国之间的那片阴云。

### 既公平合理又照顾 双方利益的建议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她的四至边界从来不那么明确。中缅边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缅甸同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接壤，蜿蜒曲折的边界线呈南北走向，有 2700 多公里长。边界两边常常可以看到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边民，从他们的祖辈开始的世代代的交往，奠定了两国之间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存在着未决的问题。

第一段是南段，即佤山区的一段。这里一直居住着勤劳的佤族人，他们长期过着部落生活。1885 年，英国占领缅甸后，也占领了这个地方，但是其军队没有到达这个地方。那时候，中国曾经到达这个地区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两个地方。因班老有银矿，中国政府曾动员民工开采过。1894 年和

1897年，中英两国先后签订了两个中缅边界条约，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934年初，英国派军队进攻班洪和班老，但是没有得逞，他们遭到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抗击。1941年，英国乘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机，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强迫中国政府在佤区划定了一条边界线，这条线被称作“1941年线”。不久由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双方在这条线上没有树立桩界。

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人们又称它为南畹三角地。这片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一个中缅边界条约前，英国不经中国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了一条从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

第三段是北段，即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是1911年，英国武装侵占片马。“片马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中华大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英国政府迫于无奈，只好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然而，事实上却继续侵占这个地方。

对中缅边界的现状，缅甸政府却不是这么认识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北段存在未定界问题，而南段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与中国在认识上有很大的距离。究竟怎样缩短两国在认识上的差距呢？有着丰富谈判经验和对缅甸人民充满友好诚意的周恩来提出，可以暂时避开具体问题，从确立原则谈起。

为了寻找一条公平合理地解决中缅边界的途径，周恩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对中缅边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在那些日子里，西花厅的灯光常常是笑迎启明星。

这年秋天，吴努到达北京，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十月的中南海更是景色宜人。10月25日下午，吴努乘坐的汽车驶进中南海，在西花厅的台阶前停下。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会谈的主题十分明确——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直入主题，说：“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因为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两国是倡导五项原则的国家，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短短几句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周恩来高兴地告诉吴努，他和吴巴瑞总理在通信中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政府也保证缅军不进入中国军队曾经驻扎的地区。中国政府仍可以对1941年线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缅甸政府取消了对1941年线的要求。同时，在北段缅甸政府为了友好起见，也同意把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中国政府也保证中国军队将不进入这些地区，以待最后的划界。中国政府认为，这可以作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一个公正的途径。”

谈话中，周恩来进一步向吴努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几个原则，形成了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周恩来在建议中除了重申上述处理南、北段的原则意见外，对勐卯三角

地的问题，提出：“中国人民认为，这块土地最好由中国收回。但是，因为缅甸有公路通过，我们愿意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究竟应该如何收回。”他强调：“以上三点联系起来解决，才能改变我在前边所说过的情况，这个方式比较好，缅甸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也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便于我们进行解释。”

周恩来入情入理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吴努。他体会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缅甸人民的朋友，周恩来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是充满诚意的。

吴努这次北京之行是同周恩来谈话最多，谈的问题也最多的一次。当时，中缅之间一个较大的分歧是怎样认识 1941 年线的问题。缅方坚持认为以这条线划界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这条线又是英国在中国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中国人民不愿意接受这条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周恩来认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要照顾到，偏到任何一方都会伤害人民的感情。因此，他在第二次会谈中对吴努说：“不按 1941 年线定下来，缅甸就没有其他办法，这种困难，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我们并不要求修改这条线，也不反对缅甸坚持这条线的立场。我们的要求只是缅甸军队不忙进去，等到这条线最后确定和打下界桩时为止。”

这的确是一个“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用吴努的话来评价：“中国的建议是公平的”。这个建议被写入 1956 年 11 月 5 日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

经过这次接触，中缅两国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的意见。在友好的气氛中，周恩来表示：“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作为典范”。很明显，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中缅边界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希望通过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来推动我们同所有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国获得一个和平建设的良好环境。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吴努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郑重宣布：中缅两国取得谅解，从 1956 年 11 月底到 1956 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 1941 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

## 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

中缅边界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1956 年 11 月 5 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50 次会议报告了与吴努会谈的情况。会议批准了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纷纷写信给周恩来，坦率他说明自己的看法。他们总的意见是认为“失地大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现状。这些意见启发周恩来作进一步思考。1957 年 2 月，周恩来访问亚欧十一国归来后，立即抓紧时间研究边界问题，他听说云南代表尹明德对中缅边界问题很有研究，并在 20 年代曾化装到北段江心坡一带调查过，立即请他到北京当面对教。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许多书籍和地图，这对周恩来研究边界问题很有帮助。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周恩来除了同北京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外，还特别邀请了云南省负责人及各界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座谈，认真听



取他们的意见，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

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3月16日，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周恩来就中缅边界问题作了专题性报告，正面回答了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

周恩来依据讲台前挂的示意图，详细分析了清末以来几个时期绘制的几张比较像样的地图上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情况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1894——1948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一本正式地图。人们通常使用的是1953年由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的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经过政府审定。这本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申报馆出版的那本地图而发展的。周恩来在会上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那么，对未定界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争”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力争未定界，大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因此新中国仍旧应该采取这个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周恩来说：“当时与帝国主义争地方，就是说参加到中国大家庭里来总是比被帝国主义压迫要好。所以争地方多一些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后的缅甸。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一个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好关系。”他还说：“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与历史上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当然不是毫无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割断，但也不能完全相同。”他的讲话，使许多人改变了只从历史上地图上空谈领土版图，要求愈多愈好的错误看法，明确了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和和平外交政策来解决边界问题的道理。

对具体方案，人们十分关心1941年线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条不公平的界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把它占定了，重新定一个新的，当然是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重订。这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这一个条约为止，那的确四邻不安。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慎重考虑。1941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已经是签订的边界条约，而这个地方（佤）两边都不是直接统治的，划得不很公（正）。但是，我们如果照这样解决比较否定了然后重新划问题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1941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了我国同缅甸的谈判原则是同我们的国策紧密相联的。我们的国策首先是要争取世界局势的缓和，好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第二是要争取亚非国家，要跟他们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常警惕，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不使人家感觉我们要向外收复多少东西，但应该得到的我们要争取。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由于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地方的利益，因此，3月底，周恩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同云南省各界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座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曾经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意见的尹明德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4月18日致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信中写道：“我过去对于北界很重视历史事实，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有所认识、了解，对于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尹明德的切身体会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7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向人大代表正式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7月15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此后，中缅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进入具体协商阶段。

### 好事多磨

具体协商阶段是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1957年2月4日，周恩来还在锡兰访问的时候，缅甸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写给他的一封信已经寄到了北京。这位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1948年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线。这就是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给缅甸；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古浪、岗房在内的50平方英里土地交还中国。

这个“希望”，中国人民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不久周恩来回到北京。中国国内开始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舆论普遍要求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边界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缅方来信没有马上给予答复。

3月底，周恩来到昆明，同正在那里访问的吴努会晤，对2月4日来信中的划界建议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对案：

在北段，根据地形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并且根据过去英国在致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中承认中国在小江流域的管辖范围，要求把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地的面积划得比缅方所建议的要大；在中段，中国政府不准备收回勐卯三角地，但要求对1941年线作调整，即换回该线以西的班洪、班老等地区。

这个对案，缅甸方面没有接受。吴努表示：既然双方意见有出入，就不发表公报为好。

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周恩来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后，周恩来立即致信吴努。信中重申：

一、关于尖高山以北地区：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一段，可以按照双方共同谈定的习惯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向南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界。至于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各寨地区的面积，中国政府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等因素，提出如随信所附图二所示的具体建议，希望缅政府能够予以同情和考虑接受。

二、关于佤地区和勐卯三角地区：1941年6月18日由当时中英两国政府经过换文在佤地区划定的界限，是英国强加于中国而为中国人民所不满的，但是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佤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甸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而在1897年水租给英国管辖的勐卯三角地永久地移交给缅甸。

三、中缅边界公平合理解决后，建议两国签订一个新的边界条约，以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

一方要求维持边界现状，一方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双方思想上的差距一时难于接近。但是，周恩来一点不灰心，在后来的日子里，缅甸朋友多次到北京来协商，协商中有时难免出现争论，周恩来始终平静自若，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摆事实、讲道理，进行疏导，耐心协调双方思路，促使对方进一步考虑，从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因此，边界问题虽然一时达不成一致意见，但缅甸朋友对周恩来始终充满敬意。正如一位缅甸朋友所说：“同周总理共事是最愉快的，尽管他的意见总是占了上风，但使人心悦诚服。”

### 中缅边界条约的最后签订

由于种种原因，中缅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已经到了1960年。这年初，年轻的奈温将军来到北京。1月28日，周恩来和奈温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和《中国和缅甸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

接下来，双方加紧对边界的勘察工作。周恩来指示，要同缅方勘界人员友好协作，互相传授技术，共同总结经验，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通过联合勘察搞联欢、搞友好。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姚仲明后来回忆：“由于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双方勘界人员始终在和谐的气氛中互相帮助、合作，勘界、划界、树桩等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

在勘界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意教育参与工作的同志要尊重边境居民的民族感情。

由于中缅边界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双方的部落关系、家族关系、亲戚关系，盘根错节，所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处理好这个问题。周恩来指出，有的民族被边界线多年分割，这是历史所造成的，想加以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但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照顾其合理的愿望，设法作一定的调整，也是必要的。如佤族班洪、班老辖区的收回就是一例。

在“1941年线”上，还有不少骑线寨。所谓骑线寨即是指一个村寨同一家族的人，由于住宅的位置不同，被划属两个国家，不仅日常生活下方便，也给双方的行政管理造成了不少困难，这是帝国主义埋下的纠纷祸根。1960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开会前，周恩来对姚仲明说：对骑线寨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整，保持每个村寨的完整，分别划归给中方或缅方，力求平衡，主要看大家方便，搞友谊。8月7日，他在北戴河又向姚仲明提出：可采取交换或补贴的办法，注意切不可伤害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关系。

由于双方的努力，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1960年10月1日，喜气洋洋的北京又添一喜。周恩来同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吴努总理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上签字，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61年1月4日，是缅甸独立节，周恩来和陈毅率领代表团赴缅甸参加庆祝活动。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即兴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表达了中国人民同缅甸人民之间深厚的“胞波”情谊。

在缅甸期间，周恩来出席了中缅互换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缅甸总统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

伴随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又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等国经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

### 曲折行进华夏辉煌（1958—1965）

## 十七、高歌猛进慎反思

###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面对“大跃进”的局面，周恩来表现沉默，冷静观察；庐山会议，周恩来心情复杂

#### “大跃进”风起

在批评反冒进中孕育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推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4月，毛泽东又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跃进”这个词原是周恩来发明的。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批评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从此开始。毛泽东当即写了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多天。26日，彭真把周恩来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恩来在当夜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10月25日，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要求5年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年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了。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兴修水利，1亿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从1尺5寸达到几尺。最突出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最早放出的是河南遂平县放出的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接着江西贵溪县放出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于是“卫星”几乎天天放，而且越来越大，最大的小麦“卫星”是青海囊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最大的水稻“卫星”是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亩产130434斤。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使许多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离奇的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假造出来的，把许多块即将成熟的庄稼全并到一块田里，计算出它的产量。甚至那个数字压根儿就是假造的。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这些夸大的宣传，当时就有许多人不相信，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帽子不敢公开说罢了。当时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提法层出不穷，什么“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人甚至说，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高产卫星”起了鼓励与迷惑的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为8000—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是9000—10000万担。而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棉花只有3938万担。要它们分别增加1倍至1.5倍，根本达不到。

刚刚被批判“右倾保守”的周恩来，面对农业的“大跃进”局面，虽然表现沉默，但他仍以冷静的头脑观察这个问题。1958年7月，他坐飞机到郑州视察黄河水灾时，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馆，馆内陈列了几个“亩产3000斤”、“亩产4000斤”小麦的“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确实？弄得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农业的“大跃进”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是从钢铁开始的，最具典型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苏联提出，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提出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赶上英国。于是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和农业一样，钢铁产量离谱的指标出现了。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其中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70—115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两个报告非常欣赏，称它是“一首抒情诗”。据此，4月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时，还写了一封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5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开会，钢铁产量指标又被提高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铁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底子90万吨（1943年），到1962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他还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都热起来。

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除毛泽东外，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上估计1958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以上，1959年指标应为2000万吨或者更高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中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959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钢，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的讲话、批示都只在内部进行，公布出去的是1958年产钢1070万吨。

当时实际生产能力怎样呢？1到7月份，累计只生产钢380万吨，和指标相比还差700万吨。8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感

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决定土法上马，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主要是发动农民就地大炼钢铁。于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6000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年年底，钢产量完成1108万吨，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煤产量由1.31亿吨增加到2.7亿吨。

但是这个指标的完成是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甚至是虚假的。首先是产品质量低，许多地方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是含硫量很高的“烧结铁”，不能炼钢。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不能加工，成了一堆废物。经以后核实1958年钢产量为800万吨。而国家的矿产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量砍伐，连群众做饭的锅也被砸光。群众反映，“这是吃祖宗的饭，遗祸子孙”。其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积累率平均为24.2%，1958年却一下增加到33.9%，过高的积累，严重挤掉了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重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也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10月以后，毛泽东也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在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他开始降温了，承认包括他自己，犯了“冒失”的错误，认识了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但他仍然认为批评反冒进是正确的。

在反冒进中被批评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这种现象是忧心忡忡的，但他不可能再来一下反冒进，只能不去添柴加火，使这股热焰烧得更旺，而是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尽量避免国家遭到损失。在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的指标降下来了，为1800万吨。周恩来、邓小平要计委交换一下情况，陈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恐怕有问题。周恩来心中是有数的。3月25日至4月5日，党中央先后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薄一波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就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26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评了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门的工作是大少爷办工业，现在要出“秦始皇”，老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提出1000多个基建项目中要削减500项或600项。这时周恩来机智而又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1500万吨钢材也可能完不成，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毛泽东、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周恩来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这反映了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的思想。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是钢铁产量，钢铁生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决心深入了解钢铁生产的情况，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6日中央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

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

周恩来——河北；

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谭震林——山东（主要是注意农业，并研究生铁生产）；

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

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

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

陆定一——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

聂荣臻——安徽；

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中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总理和副总理们分别出发了。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陆定一在山东枣庄调查时，了解到去年大炼钢铁中，“小土群”问题很多。大批农民上山炼铁，在地里挖个坑，睡在里面，棉被都是湿的，这怎么能持久呢？炼出来的铁含硫量很高，大都是不能用的废品。1958年是丰收年景，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成熟了却没人收，农民编了顺口溜说：高粱站了哨（成熟后无人收割），棉花吊了孝（棉絮从棉桃中垂下来），大豆放了炮（豆荚成熟后在地里爆开）。农民粮食缺乏，大都吃不饱。他们到了上海，柯庆施和分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都没来见他们，只派一个干部来说大话，说上海要达到年产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陆定一问，生产1000万吨钢，矿石、电力、运输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干部不能作具体的回答。陆定一和陪同他来视察的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一计算，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他们回到北京后，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情极其严肃，一言下发。他已经看到完成任务不容易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种种弊端。

罗瑞卿从5月23日到6月24日1个月时间，视察了湖南的十几个县，既看了涟沅、湘钢等大中型钢铁厂，也看了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洋群”炼铁厂，还看了煤矿、铁矿基地。最后在长沙作了总结并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周恩来。总的印象是，像涟沅、湘钢等大中钢铁厂，因为有铁矿、煤矿、石灰矿等原料的来源，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设备，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问题虽然不少，但经过一些整顿和加强领导，是有发展前途的。但靠运动轰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除个别的生产了一些含硫高的生铁外，大多数都不能维持生产，不得不停产，但已浪费了许多煤炭和木材（“小土群”主要是用大木头去烧的）。至于人才和粮食的浪费，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建议国务院要迅速研究并解决钢铁计划和生产问题。其他副总理也向周恩来马上作书面报告，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在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后，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和钢材的生产指标。

由于“大跃进”，钢铁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方面给它让路，轻工业被挤掉，农业丰产没有丰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匮乏，工作被动，人民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张降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中央书记处决定，1959年产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失调的现象进行调整。周恩来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了。

## 庐山“神仙会”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为了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一些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在7月初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俗称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6月24日，毛泽东由武汉乘专列到达长沙，当天畅游湘江，在橘子洲“中流击水”。

25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人从长沙乘汽车来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下午，约了一些老人座谈、照像，同他们吃家乡菜。晚上就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27日毛泽东在韶山，曾到毛家祠堂谒祖，参观了韶山学校，在水库游泳，又接见了许多乡亲。28日返长沙乘专列到武汉，改乘轮船到九江，于7月1日上庐山。当晚他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今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刘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来带秘书顾明、李岩等于7月1日由北京乘专机到武汉，然后经九江上山的。

陈云本来上了庐山，因庐山海拔高（五老峰1400米，会场和住地1200米），他身体不适应，中央决定他下山休养，没有参加会议。

邓小平因会前打台球滑倒伤了腿骨，在北京治疗，没有上山。所以书记处由彭真负责，但许多事情他找周恩来商量。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和彭真、杨尚昆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都住在庐山交际处的一幢大楼里。周恩来除了要童小鹏、顾明、李岩分别参加大区的小组会，将小组会的重要意见向他汇报外，还要童小鹏帮助办公厅编会议简报。小组的简报由各组长签字后交会议科印发。

会前，已传出毛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听了认为这次会议要好好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讨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等18个问题。周恩来提出增加国际问题。共是19个问题。7月2日中央开了常委会，把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确定下来。7月3日，会议分6个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

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轻松愉快，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周恩来也谈到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时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庐山会议是本着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争取1959年继续“跃进”而召开的，起初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

在庐山，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除了参加常委会外，在7月23日以前，他多次找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有时刘少奇也参加。7月12日，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他认为：1958年是一次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认识将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赤字，是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同志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的货币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帐，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亿元。商业透支了50亿，用于赊销和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工业有30亿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生产任务多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冶金部今年24亿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亿。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做好，特别是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太不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国家一定要把帐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入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瞒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诿。

李富春、李先念也都发了言。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7日和18日的小组会，组长传达了16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帐，虽然大炼钢铁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帐要算，但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既要算现在的盈亏帐；也要算将来的盈亏帐。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的说法有说服力。周恩来的讲话是持平之论，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信中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并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以后，庐山气氛逐渐紧张，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这时，周恩来还在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有一天晚上举行舞会时，李锐正在周恩来旁边，有意地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已经议论纷纷，有直截了当表示赞同的，也有提出种种非难的。

7月19日，周恩来参加小组会发言时，没有提到彭德怀信的事情，只是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还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当时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7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论定记录》，写了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周恩来讲了同意其中讲的三条缺点，并补充了以下几条：1.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2.比例失调；3.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的信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 风云突变

7月23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30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意如下：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 岢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囁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妥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词的严厉，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主要是针

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7月26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仲云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会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7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的讲话大意是：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线，在政治方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年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1956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不能单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帐，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

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帐，是否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帐，落实 1959 年、1960 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 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 850 万吨钢材，最后算帐只 700 万吨。也不要被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心焦如焚，置身其中。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划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线。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帐，把帐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辽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6 月 13 日分配了 850 万吨钢材，加进口 52 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 700 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 8 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 32%，共 250 万吨。生产用材减 52 万吨，减 9.2%。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

这篇讲话的言词之间，也显出了周恩来内心的矛盾。周恩来是大管家，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呵！

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也包括张闻天。彭德怀的罪状多得很，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小组简报每天几期，立即印发到全体人员。这里也有张闻天的罪状。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更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师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7月26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她们挂上了“纲”和“线”。7月29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六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了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

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

一、叫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8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7月30日，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7月31日和8月1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大常委会，约

14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31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斯大林同他讲过什么话。周恩来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滑，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8月1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8月2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8月2日上午9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

八届中委共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



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 1959 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 年时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 10 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的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向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判斗争后，8 月 11 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帐。说彭德怀三十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13 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14 日上午黄克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 13 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

8月16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议程是：

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8月17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就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减少了6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让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3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

“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多么沉重的灾难呀！

历史是公正的。经过22年后的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是多么沉重的教训啊！

### 特赦战犯促“月圆”

1959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建议”使许多特殊家庭有了

“月圆”的希望。溥仪等特赦战犯成了西花厅的客人

### 一个特赦战犯的建议

1959年9月14日，一个特殊而伟大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酝酿出台：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10周年特赦问题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建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张报纸立即在全国各地战犯管理所内引起轰动，一双双盼望的眼睛盯住了《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的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

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用巨人的大手，拨动了月圆的时针。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大会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隆重召开。此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它对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犯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审判，而是分别关押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究竟如何处理，党中央一直持慎重态度，研究过各种方案。最初，中央曾考虑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采取慎重态度，对他们不判下杀，暂时放在那里。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6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确定后，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者，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3月14日，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那么，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呢？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主张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然后再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

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允许言论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地充分酝酿与讨论，对战争罪犯实行特赦的方针终于确定下来。

### 西花厅的特殊客人

1956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在北京参观后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1959年9月14日，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10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33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

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10个人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批人刚刚迈出监狱的大铁门，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恩来深知，走出功德林的大门，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将更为复杂。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吗？他们能抵御住复杂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吗？他们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显然，周恩来关心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

不久，周恩来收到曾扩情以学生身份请求“赐教”的来信。他认为这正是开展工作的很好机会，无论从旧情还是新谊来讲，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立刻通知有关部门安排会见。

12月14日，周恩来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批特殊的客人。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惊喜万分。后来，杨伯涛回忆说：“当时，能够见到周总理感到很幸福。但是，想起自己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同客人一一握手，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学习、家庭、身体健康情况以及出狱后的感想。

当他走到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面前，叫一声“曾扩情”时，这位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恩来共过事的汉子不禁泪盈眼眶。他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周恩来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曾扩情连忙说：“我那时已经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转过身，周恩来看到了坐在一旁的溥仪。这是他第一次同溥仪见面，所以叙谈的时间较长。他同溥仪说起满族人的习俗礼节。陪同前来的陈毅在一旁风趣地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出来时，我们还要看看你这个皇帝呢！”引起了一片笑声。

周恩来的目光又转向社聿明。杜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要见他，他态度顽固拒不见面，因此在今天的场合深感不安。他面带愧色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一席话感动了在座的所有人。

周恩来又走到郑庭笈面前。郑庭笈是黄埔五期学生。解放战争期间，他任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辽西战役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陪同前来的张治中在一旁介绍，“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详细问了郑的家庭情况。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关心他的家庭问题呢？原来，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在郑被俘后原准备去台湾。临行前，她听到郑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广播讲话稿后，决定留下来，1954

年，她回到北京。因作为战犯的妻子难以安排工作，她提出和郑庭笈离婚。郑庭笈如实地把家庭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脸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这件事，郑庭笈以为周恩来顺便问问就过去了。设想到当他后来再次遇见周恩来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复婚了吗？”郑庭笈激动得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后，郑庭笈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我至今还无法判断，周总理这样待我，究竟是由于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还是有超人的情感。”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在周恩来关照下，有关部门将他妻子调到他身边当打字员，促进了这对夫妻感情的再度结合，郑庭笈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

一一询问情况后，周恩来招呼大家坐下，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出来几天了，有些问题先谈一谈好。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话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谈话中，周恩来要求他们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他激动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一百二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接着，周恩来阐述了民族立场的重要性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等政策性问题。他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反对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1958年夏，美国政府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想以退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侵占台湾合法化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氏父子与陈诚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他说，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周恩来充分肯定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也指出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不要把十年改造所得抛于一边。

谈到工作、生活安排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作出妥善安置。对准备与台湾方面联系的人，周恩来叮嘱：“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对今后的去向，周恩来挽留他们在首都工作。后来，他们之中一些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其他凡留在北京的除溥仪之外，都安排到京郊中朝友好公社劳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又陆续分配到政协文史馆等单位工作。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使大家如沐春风。杨伯涛把这份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

“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 19 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 20 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多少年来，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或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了解台湾及陈诚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争取方针很有帮助。

## 末代皇帝的新生

至于溥仪，为了这位清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周恩来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付出了心血。周恩来接见的第二天，溥仪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是这样记述这次会见的：

“这是在 12 月 14 日，我坐着国务院派来的汽车，从前井胡同 6 号到了国务院西花厅。我的七叔载涛也在那里等我。我一进屋门就看见周总理了。总理起来和我握手，我心里是何等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不知不觉地说：‘呀，周总理！’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总理又为我介绍了陈毅和习仲勋副总理，见了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各首长，以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等。

“在座还有最近释放的蒋介石集团战犯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卢俊泉等 10 人，也一一和我握了手。

“我们坐下后，周总理对我们 11 个人，一一恳切地询问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并对我们勉励，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

为安排溥仪工作，周恩来费了一番思量。1960 年 1 月 26 日，周恩来再次接见溥仪及其家族成员，便有了下面一段谈话：

周恩来：……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改造，第一是客观环境，第二是主观努力，现在环境变了，那时，你不那样做不许可，现在环境变了，可做可不做。而且，现在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你当成平民看待，可能有的人还会向你下跪打躬。

溥仪：这次回来后还有两个老头，拿着用清朝官名写的信来见我，当时我说要出门，没空儿，没见他。我想，没法说服他们，没办法。

周恩来：在现在的环境下，一定要起变化，一定要认识这个环境，要战胜这个环境。

溥仪：自己的立场坚定，就可以帮助落后；自己如不坚定，就会受到影响。

周恩来：这一点不容易，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有的还犯错误。

周恩来：今天和你谈谈，给你安排一下。你愿意在工业部门吗？想搞哪一种工业呢？

溥仪：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都可以。

周恩来：你看，究竟哪一种更适宜？

溥仪：反正都是学习，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哪种适宜。

周恩来：你多大年岁？几月生日？



溥仪：正月生日，快满 54 岁了。

周恩来：按选举年龄，你已经 54 岁，还要学工业，比我先进了。学工业倒不难，车床活儿主要看你的眼睛怎么样。

溥仪：眼睛——700 度近视。

周恩来：操作精密仪器恐怕不成了，我看可以找找各部的研究所，找一个合适的工作。你过去喜欢化学还是物理？

溥仪：我什么也没学过，物理、化学完全不会。过去只学孔家店这一套。

周恩来：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嘛！

溥仪：那是我说，由我兄弟执笔写的。另外，阮振铎帮忙。

周恩来：那么，你的文学能力也不行吗？

溥仪：这恰恰能说明封建时代的特点。我小的时候贪玩不念书，老师也不敢管，后来长大了，简直就成了老师听学生的话。学《四书》、《五经》时，只念不讲，即使讲了，也不往心里去。虽然我从 6 岁一直念到 17 岁，但念得不行，英文学了 3 年也忘了，简单的话还能说。至于物理、化学，都没学。

周恩来：日文会不会？

溥仪：不会。溥杰会。

周恩来：轻工业活儿很细，可能更累。你再想想，主要看能否研究点什么？

溥仪：现在，党认为怎样适当，我就怎样做。

周恩来：你的身体怎样？要照顾你的身体。

溥仪：现在没什么病，在抚顺时检查过，仅有痔疮。

（这时，周恩来转身对陪见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委员会主任马正信等三人说：给他找个医院，做一次全身检查。多活几年总好嘛！）

溥仪：那当然！我现在新生了，希望多活几年，多给国家做事。

周恩来：你自己再想想，看在哪里工作合适？我看还是找找各部的研究所，一半学习，一半做工，既照顾你的身体，也学一点儿自然科学。可以让研究员教你，他们都很年轻，你受教不受教呀？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要互相帮助，你可以教给他们历史知识，现在的青年多数不知道历史。到研究所去有政治生活，可以参加学习、讨论。住在集体宿舍里好，星期天再回到家里。先学几年，你愿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基础更巩固一些，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溥仪：可以。

周恩来，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溥仪：其实也没读过太多的医书，主要是那时自己的身体不好，如果还照过去那样生活下去，我的生命也保不住了。

周恩来：你先检查身体，然后再联系几个研究所，看在哪里合适？订个三年计划，把自然科学学会一点儿。

溥仪：我对算术一点儿也不行，连加减乘除也不大会。

周恩来：你在抚顺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看得懂吗？生产知识大概更差了。

溥仪：旧社会把我造成一个大废物，只知道坐享其成。

周恩来：在抚顺时搞过农业没有？

溥仪：只浇浇水，抬抬东西，还剥过蒜。

周恩来：搞过农业生产没有？

溥仪：农业生产归国民党战犯，不归伪满战犯。电机，原来由伪满战犯管理，后来也交给国民党战犯了。忙时曾帮助养猪，或到伙房帮厨。

周恩来：那你可以炒菜啦？

溥仪：做菜也不会。

周恩来：那你只好洗碗了。

溥仪：那会。

周恩来，我不晓得你的底子，最好找容易学的，可以先学点儿物理、化学、数学。

参加陪见的童小鹏在旁插嘴说：可以到农业研究所搞搞农业机械。

周恩来，农业机械是比较简单，但也不一定。……如果你觉得农业劳动在室外好，也可以。主要是学点儿科学，也可以在试验农场。

溥仪：最好搞简单的，由无到有，由浅到深。

周恩来：准备订个三年计划。……能学点儿本事最好，能不能改造，环境是客观存在，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要结合起来。《毛泽东选集》你看过几遍？

溥仪：没整遍看过，只是挑着看。

周恩来：我回去查查看，家里可能还有两部《毛泽东选集》，那就送给你一部。你要学嘛，当然要送给你一部。

溥仪：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我要尽一切力量做好工作，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一定不辜负。

……

面商结束，周恩来立即与平杰三、童小鹏等人逐个分析国务院各部研究所的情况，最后决定把溥仪放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属的北京植物园。位于首都西郊的这个绿色王国，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安排既定，周恩来亲自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打了招呼，同时，又让平杰三把他的有关意见转达给北京植物园，当时已确定，溥仪在北京植物园的劳动期限为一年，原则上半日劳动，半日学习，要照顾他的身体，劳动时间也可以缩短。周日休息，活动自由，最好能隔一个星期安排他进城看看，探亲或购物。他的生活遇到困难，要及时给予补助。

1960年2月10日，也就是农历庚子年正月十四日——溥仪的54周岁生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约见溥仪等5人，宣布了新的工作安排。2月24日，溥仪给金源写信，记述了这个隆重的时刻：

市委统战部廖部长（还有几位统战部与民政局的首长），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约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和我谈话，对我们的工作、学习、劳动进行了安排。我是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香山）去工作，研究热带植物。杜聿明等4人是到红星人民公社去工作。我们每天是一半学习，一半劳动，有时到京听首长们的报告。政府仍照常给我们生活补助费。廖部长对我们作了最恳切的叮咛和勉励。

从此，这位退位的满清皇帝，开始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新中国公民的生活。

溥仪在另一封信中还谈到了其他战犯的工作去向：

“统战部首长关怀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并根据个人的志愿，给每个人适当的安排，我们11人中，有曾扩情、卢浚泉、邱行湘、陈长捷回到自

己家乡，各在本地找工作；杨伯涛、周振强回家后仍愿回北京，政府发给每人来往的路费；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和我则留在北京，将来政府给适当安排。”

这些安排，也都是周恩来亲自决定的。

## 从化读书

1960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召集了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前后二十天，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倡的读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的活动，对党的领导者深层次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很好的理论储备，人们已经披露和探讨过毛泽东、刘少奇的读书活动及其理论思考。但对周恩来和他主持的读书小组的读书活动及其理论思考，却极少涉及，尤其对周恩来1960年二三月间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的情况，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份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档案。

### 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政务尤其是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坐下来集中读书，这是由“日理万机”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对理论指导实践的渴望和对新知的渴求，却是始终如一的。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时，周恩来要求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读点理论著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正在这时，毛泽东于1958年11月9日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一建议，周恩来非常赞同和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恩来早就急切地希望全党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这一希望，也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当郑州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周恩来于11月17日抽空给邓颖超写信说：“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对于社会过渡、所有制、社会阶段以及商品生产等重大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早已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注意研究、探讨的重点。

11月下旬，在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简称《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毛泽东立即提议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阅读，并指示给每人发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详细阅看这本书的。武昌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常深夜抽出一定时间读书。1959年1月，《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是年六七月间，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了关于庐山会议所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第一个议题就是“读

书”。毛泽东提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1年。”“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根据这一要求，周恩来又对《教科书》进行了一些研读。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于当年秋冬重新强调学习《教科书》，刘少奇在海南岛，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分别组织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周恩来受到启发。1960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议。1月31日和2月11日，周恩来先后两次到广州见毛泽东，2月11日还见了邓小平，向他们谈了组织《教科书》读书小组的事。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铸、宋任穷、吴芝圃、许涤新、薛暮桥、王鹤寿、吕正操、陈正人等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同志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个小组，前后用了20天时间，把《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研讨了一遍。其间，曾邀请《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到组内作辅导。胡绳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并整理了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边读边议的谈话记录。这一以笔记形式整理的谈话记录，胡绳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内作了宣读，后来又留在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3月6日，周恩来回京，次日把胡绳留下的两本笔记送给毛泽东看，并说：“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

从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来在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共作过三次系统发言。每次发言之前，他都先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发言之后，由参加学习的同志作了记录。周恩来的发言记录，在4月份他出访时，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对这些部委的领导干部学习《教科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周恩来三次发言的内容来看，第一次（即2月23日）着重讲了“过渡问题”，阐述我国过渡时期的五条基本方针；第二次（即2月25日）主要阐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其前者的先导作用；第三次（即3月2日）主要讲学习《教科书》的方法，并对整个学习作了总结。

### 周恩来读《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问题，周恩来在读书过程中反复地作过强调。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在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读书小组中，同样如此。毛泽东在1960年1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法。”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在学术问题上，“批判”一意，是与不进行分析、盲目接受的教条主义做法相反的。“批判”的态度，是周恩来历来坚持的学习态度和思考风格。早在他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具备“审慎求真”的批判性态度，从不盲从。周恩来与中国其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革命时期就饱尝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道路。但是，进入建设新中国的时期，由于主观上的“左”倾思想和客观上的苏联模式及其老子党做法，致使教条主义的东西始终在时隐时现地干扰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清理教条主义的客观要求。这一要求是符合周恩来反对“洋”冒进、瞎指挥和共产风的思想的。因此，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从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重新思考建设问题，这是读书小组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周恩来在2月23日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月25日的发言中，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又引发了对苏联《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我们中央负责同志都到北大、清华去作报告，就是没有去人大，吴（玉章）老说过好几次。我们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和教员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本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大学使用《教科书》的问题，侧重点是在担心部分教员和学生缺乏批判态度上面，而不是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教科书》。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也才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3月2日下午，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会”，周恩来对这次学习作了总结，他在开场白中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20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20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就马上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这一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其次表明，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前进的角度，都是有益的；再次强调，理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要学会运用批判的武器，真正把正确的

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这次发言，进一步概述了周恩来对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待这次学习、对待理论思考的态度和方法。

### 对过渡问题的思考

“过渡”问题，是周恩来读书小组学习、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阐发的一个主要问题。《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开篇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引自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周恩来赞同《教科书》关于存在过渡时期的说法，并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和实现这一过渡？周恩来认为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特定条件而定。为此，他提出：“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周恩来讲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第一句话的涵义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二句话的内容就是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两句话实现了，自然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过渡时期的任务也就得以完成。这就是他所说的：“革命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周恩来看来，鉴于中国的特定条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是搞好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对提高生产力有着决定性的反作用。他指出：“一般地说，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主导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够起决定的作用。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特定条件。”这一认识，无疑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思想。

从周恩来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革命”的涵义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各种变革。因此，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是指实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所以，在提出了过渡时期的任务以后，周恩来阐述了中国为了保证实现这一任务所必须采取的五条方针：

1. “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他在解释总路线时，一方面，揭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蕴涵的主客观关系，认为“上游是客观存在，上游是无止境的。如何争，要鼓足干劲，发挥最大限度的主观能动性”。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无止境”地力争上游这一意思来看，表明了周恩来心目中对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充分认识。另一方面，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处理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问题上。从发言中

看，他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只是作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述。

2. “两条腿走路”。这一方针，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提出的对立统一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周恩来在1959年5月3日曾对文艺界人士作过解释，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背离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尤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走极端、狂热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极力提醒人们注意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在读苏联《教科书》时，他进一步发挥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他发现《教科书》并没有注意到对立统一的矛盾内涵，指出：在这一点上，“教科书就是片面性”。对立统一，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在他指导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

3. “五大革命”。周恩来所说的“革命”，是指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经济方面的三大改造，政治思想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所有制等方面。这五大变革，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关于这些“革命”的内容上的提法，有很多欠妥当的地方，例如，在所有制革命方面，周恩来提出：“从集体所有制进到社会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也还要革命。”当然，这一提法，也是苏联《教科书》的提法，明显地受到了苏联所有制模式的影响。

4. “四个现代化”。读《教科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对周恩来完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他在发言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阶段要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他还对今后十年到十三年的社会发展指标提出了设想。这一提法，显然比1954年9月一届人大时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前进了一步。在次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决定”中，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去。到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最终把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完善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5. “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教科书》主要讲了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差别，并认为这些差别会自然消失。周恩来明确地提出，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方针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同时他指出《教科书》中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差别自然消失”的说法是模糊的，“究竟怎样才能自然消失，没有说清楚”。他认为：“我们总要在过渡时期使这三个本质差别逐步消灭。”这就强调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总之，周恩来认为这五个方针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关键。这五个方针的内容，按照今天的认识来看，不一定完全正确，提法上也有许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走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胆识。

### 对思想意识先导作用的思考

在读书小组中阐述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同时，周恩来自然地提出了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周恩来历来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物质的或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性，不是一种机械的决定。人类社会的生动性，往往表现在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上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物质的本原的决定作用，和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是并行不悖的，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恩格斯在晚年曾说过：“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还说：“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同上书，第484页）列宁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等方式来表达这种“反作用”，并把这一“革命的理论”变成“革命的运动”，在苏联第一次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把理论的辩证法变成为革命的辩证法。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页）继列宁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把这一理论在中国变成现实。毛泽东把这一理论进一步地表述在《矛盾论》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周恩来正是亲自参与导演把这一理论变为现实的中共核心人物之一。

历史进入6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人冷静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学习苏联《教科书》时，如何发挥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先导作用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周恩来在2月25日的讲话中指出：

“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主席又说，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先驱者的作用，就是在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在胚胎之中就能认识它，并推动人们去认识它，实现它。马克思、列宁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认识的居先和落后两个侧面。有时思想就是认识了，但事物在不断发展，一时认识了，一时又不认识，这个问题认识了，那个问题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苏联的经验也丰富，只是后来它没有总结。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理解，是非常深刻和透彻的。他认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来指导实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马列主义的作用所在。他把思想变革的



重要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对人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避免盲从，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应该说，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意识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补充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当然，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思想意识革命的先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之上，周恩来历来就注意这一点。早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1952年，周恩来又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显而易见，周恩来运用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长河中经济因素与上层建筑各因素交互作用的思想。

### 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进入又一个高潮。一方面，人们在反思十年建设以来的经验时，迫切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更特殊的一方面，中共与苏共在理论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看法的加深、加剧，自然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注意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在分析、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思想，并要求人们正确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既是理论发展的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周恩来阐述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变革之后，单独提出了如何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内容：

其一，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周恩来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是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展了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但是，周恩来还讲到毛泽东使马列主义学说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形成了体系，并找到了建设共产主义的途径。他既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但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尤其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又过早地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

其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周恩来指出：“《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的学说，并把它用之于各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理论高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根基，这一点周恩来堪称独创者。它也反映出周恩来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50年代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实践论》、《矛盾论》重新发表以后，国内、国际对这两篇伟大著作的理论意义都作了较高的评价，但像周恩来这样从这两篇著作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所处的哲学基础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伟人，却为数不多。

其三，点明毛泽东思想在形成方式上的特点。周恩来指出，马克思几乎一生、列宁一半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而毛泽东则一直是处在革命的风暴中，没有多少时间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只能在很忙的情况下进行写作，“主席的学说，是在革命的风暴中生长的”。因此，周恩来提出：“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要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此外，在这次发言中，周恩来还提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党的学说等。

在3月2日的发言中，周恩来由如何理解、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发，引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三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周恩来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说：“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都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承认，苏联《教科书》也多次提到了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发展。

（二）周恩来指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这种根有两方面：一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二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两者的结合即产生了中国的马列主义。周恩来提醒人们，既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的智慧；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解决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

（三）周恩来果断地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群众中、理论界，还是党内，都有些欲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想法。这种趋势和要求，当然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威信、威望有关。但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发展史的惯例，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把毛泽东思想说过头了反倒会损害这一思想，也会使兄弟党产生误会。他告诫大家：“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这不仅仅是个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周恩来在1960年初提出的这一意见，无疑在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以后的宣传中，“毛泽东主义”的确未曾正式提出来，但是，人们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夸大，却越来越盛，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文革”中更严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都是与周恩来的想法背道而驰的。

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思考，对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 and 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恩来读书小组成立于1960年2月中旬，当时离庐山会议闭幕只不过半年时间，人们对庐山会议的阴影还心有余悸，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自然避而不谈。但是，周恩来在2月25日读书小组会议上发表了“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

“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这样一番反对“左”倾盲动思想的讲话。这一思想，既反映出周恩来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全面发展和事物辩证运动的观点，也反映出周恩来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勇气和高度责任感。

## 十八、多事之秋大调整

### 邯郸调查

在邯郸农村调查以后，周恩来果断地向毛泽东反映：社员都愿意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他们迫切要求包产到生产队。在伯延公社，他结识了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

### 总理日历

进入 1961 年，中国共产党内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

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除了正式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外，毛泽东在会上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会后，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起了表率作用；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调查；朱德也对四川、陕西等地农村的情况作了调查……

周恩来率领的工作组，则深入到了河北省邯郸地区的农村。周恩来第一次赴邯郸的时间是 4 月 28 日午夜，最后一次离开邯郸的时间是 5 月 14 日上午。前后半个月，中途为解决中国代表团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问题，周恩来曾两次回京，每次返回邯郸的时间都是午夜。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忙上加忙。

邯郸调查期间周恩来的工作日历，后来在毛主席纪念堂展出，被一位叫邹爱国的记者记述了下来：

1981 年 1 月 20 日，邓颖超同志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同志留下的二十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批珍贵的工作日历，记载着周恩来同志从 1950 年 1 月 1 日到 1976 年 1 月 8 日 26 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最初是由周恩来同志亲笔所记，后来大部分是由他的秘书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为党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这二十多本工作日历，正是周恩来同志为革命日夜操劳的翔实记录。

在 1983 年 12 月 26 日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陈列着这二十多本工作日历中的两份日历；一份是周恩来同志 1961 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的部分工作日历；一份是他在 1974 年 3 月 26 日这天连续工作 23 小时的工作日历。望着这历史的记录，仿佛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国事操劳日夜不懈的革命精神和昂扬斗志，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961 年，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周恩来同志在繁忙的国务工作中，挤出时间，于 4 月 28 日至 5 月 14 日，带着工作组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他于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抵达邯郸，立即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情况汇报，然后到武安县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谈话、开座谈会，还到一个农村食堂进行蹲点调查。

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同志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

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现在看来，这些真知灼见，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5月7日凌晨3时，他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下面是那一次电话的记录。周恩来同志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8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20天。”

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份记录，当天就写了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周恩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情况后，又在邯郸继续工作了八天。在这八天中，他白天进行调查，晚上处理公文。在此期间，他还抽身返回北京，帮助陈毅同志解决有关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一些问题。下面是他5月7日这天在邯郸调查的工作日历：

晨2时	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3时	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10时	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12时	出发往涉县下午
3时	到涉县县委谈话
3时40分	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6时	参观食堂
7时50分	始返

像这样满满的工作日程，在周恩来同志的日历记录中不知有多少！

……

## 难忘的春天

邯郸调查，周恩来蹲点的农村是武安县伯延公社。多少年后，伯延人民一直怀念1961年的春天。（以下摘自1977年1月16日《河北日报》《伯延的春天》）

在武安县伯延村的北头，有一片株壮枝繁的杏树园。这片杏园寄托着全村6000多名社员、干部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深情。自从周总理访问伯延，

春风吹满了杏园，这片杏树越长越叫人喜爱。夏秋郁郁葱葱，仲春杏满枝头。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此刻，虽是数九隆冬，但人们一看见这片杏园，心头便溢满了盈盈的春意，追忆愈深，思念愈切，总想起那个永难忘怀的春天……

那是1961年5月3日，灿烂的朝阳升起在东山，温煦的春风吹拂着伯延，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了伯延公社。周总理来时，没有兴师动众，没有虚张声势，只带了几名工作人员，一到伯延，就抓紧一切时间工作。进门还没坐下就和公社干部交谈办社情况，询问庄稼长势和群众生活。认真听取了公社干部汇报。

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关心周总理，他们见总理风尘仆仆，跨进门坎就开始工作，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就对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午留总理在公社吃饭。周总理听说公社准备饭菜招待他，便叮嘱不要另外做饭招待，叫把准备的东西送给病号。

周总理在公社座谈完已经12点多了。可他老人家还坚持要去视察群众食堂。当总理走进先锋街第六食堂时，群众已吃过饭。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等人见总理进来了，忙迎上去，周总理一一同他们握手，问他们食堂有多少人吃饭，有几个炊事员，工作忙不忙。周总理亲切的问话，像春潮一样扑进了他们每个人的心房，大家都感到心窝里热乎乎的。他们激动地回答了周总理的问话。这时，周总理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王三贵一听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总理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总理真要吃，就拿起碗准备给总理盛饭，这时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掏出手绢准备要给总理擦碗，总理说：“这没关系。”又把碗接过来递给了炊事员。在场的群众看到周总理的一举一动，都深深感动了。周总理喝完糊糊，笑着对司务长说：“这饭不错。”

周总理就是这样艰苦朴素，在伯延视察的四天时间，坚持和群众同吃一锅饭，从不搞特殊。

5月4日中午，风和日丽，伯延村的原野里一派蓬勃生机。敬爱的周总理又来到群众中间。

“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到来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伯延村的大街小巷，近千名群众云集在街道两旁，一张张挂满泪花的笑脸，仰望着周总理。周总理穿一身半旧藏蓝衣服，脚上穿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神采奕奕，健步来到群众中，一面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一面和身边的群众亲切握手。

女社员郭仙娥见周总理从公社出来，乐得心里像开了花。她走近周总理热切地向总理问候，随行人员把她介绍给总理后，总理握着她的手，亲切地问道：“你家在哪住？去你家看看行吗？”郭仙娥激动地说：“好，好。”说罢便引着周总理往她家走。

周总理走进郭仙娥家，她们刚吃过午饭，剩下的饭菜都还在炉台和桌子上放着。周总理见炕上躺着一个人，郭仙娥向周总理介绍说：“那是俺小孩他爹，有点病，耳朵还有点聋。”说话声惊动了郭仙娥爱人王连生，他睁开眼一看，见屋里站满了人，他还没弄清咋回事，他的大女儿贴近他耳朵说：“周总理来了。”王连生一听周总理来了，兴奋地连连说：“总理快坐！快坐！”他一边说一边到炕沿上穿鞋。他伸手去地上拣起一只鞋就穿，那只鞋还没穿好，周总理已弯腰从地上拣起另一只鞋，送到了他手边。王连生眼泪

夺眶而出，一时不知说啥好。他这个旧社会的穷孩子，从懂事就拖着露脚趾的鞋沿街拾煤核，五岁起就在资本家的店里忍受着残酷的压榨。解放前他父亲和他两代人没有穿过一双新鞋，今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他家，亲自给他这个普普通通的贫农社员拿鞋，他哪能不激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握着周总理那双温暖的大手，半晌才说：“总理您辛苦了，我们贫下中农欢迎您。”周总理怕他听不清自己的话，便提高声音，问他身体情况，找医生看了没有，吃的什么药。一再安慰王连生要安心养病。

16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对一个贫农社员无比关切的满腔深情，还像五月的春阳一样，暖着伯延人民的心。

在那个难忘的春天里，伯延人民的心坎上镌下了多少一回想起来就叫人热泪挥洒的忆念啊！他们交口传颂着，向后辈讲述着敬爱的周总理和普通社员张二廷之间的动人情谊。

那是在视察伯延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周总理认识了一位年近五旬、衣着俭朴、谈话直爽、性格开朗的贫农社员张二廷。座谈会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来到张二廷家访问。一进门，总理就十分亲切地招呼：“二廷，二廷，在哪屋住？”二廷急忙迎到院子当中，激动地说：“周总理，快到屋里坐。”总理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一边说，一边热情地拉着二廷的手，一同走进屋内，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起了家常。第二天上午，总理一个人又步行走到了二廷家中，进了门就招呼：“二廷，二廷……”声调又亲热又熟悉。可是没人应声。总理见门开着，就走进屋内，发现张二廷因劳累在炕上和衣睡着了。总理轻轻地用手拍拍他的腿，说：“二廷，二廷，累了吧，今天下午咱还开会，你准备参加。”当二廷急忙起身，要挽留总理再坐会儿时，总理已轻脚走出屋门，还关切地回身说：“我不多打搅你了，休息吧。”

总理多次到二廷家访问，了解到二廷头年失去了妻子，一个人带四个孩子，要料理家务，又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活确实有许多难处。总理就跟二廷商量：四个孩子你照管有困难，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抚养两个，长大了再让他们回来，你看行不行？二廷打心眼里高兴，但想到总理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不忍心再给总理增添麻烦。

当总理将要离开伯延，最后一次跟二廷交谈时，二廷依依惜别地请求总理抽空再回伯延看看。总理微笑着说：“有机会一定来，如果我不来，也一定派人来看你。”一年、二年、三年，一连五年，敬爱的周总理都派人来看望张二廷。

总理的担子有多重，总理的事情有多少。可是总理和一个普通社员交了朋友，还老把他放在心上，敬爱的周总理那种关心人民疾苦，深知人民寒暖，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伯延人民心中。

敬爱的周总理在伯延村视察了六天，那六天，是激动人心的六天，是人民群众欢腾喜悦的六天。六天里，周总理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问寒问暖，问今问昔，把党的关怀达到人民的心窝。

周总理召集公社、大队的干部开了调查会，深入细致地了解了当时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群众对党在农村政策的反映，指示干部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生活。

周总理到了生产队集体食堂，耐心细致地一样一样地查看了社员的伙食。

周总理到了公杜百货商店，和售货员同志亲切交谈，问了商品的价格又问销售情况；问了社员的购买力又问工作人员的家庭状况。

周总理到了武安县办在伯延村的农机站，用手抚摸着院内的几台铁牛，指示说：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拖拉机。六天里，周总理矫健有力的步履踏遍了整个伯延村，周总理和蔼亲切的声音回响在每个角落。多少人夜不能寐，多少人干劲倍增，回想着周总理对自己的接见和教诲，决心用革命和生产的新成绩报答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

六天过去了，周总理就要离开伯延村，上千名社员群众前去欢送。管理着国家大事的总理在一个山村视察了六天，按说时间不算短了，可是伯延人民却只嫌光阴过得太快，盼望着周总理再多住几天。周总理跟群众亲切交谈着走到村北的杏树园，伸手拉住一枝挂满新杏的树枝，高兴地说，“果园要种好，几年之后，伯延村一定会建设得更好，到时候我再来看你们。”接着，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一起合影留念。

上车后，周总理还从车窗频频挥手告别。汽车驰远了，人们仍久久目送着总理，多少未来得及说的话在人们胸中翻滚：敬爱的周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永远刻印在伯延村人的心坎；您那魁梧健壮的身姿永远和伯延村人站在一起；您那宏亮有力的声音永远激励着伯延村人民奋勇向前！敬爱的周总理呵，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欢迎您再到伯延来。

如今，周总理走过的村北平地，基本实现了水利化，布下了纵横交错的地下管道，几百个水阀一开，犹如青龙吐水、玉带飞瀑；周总理视察过的农机站已经扩大，全村有了大小拖拉机数十台，遍地马达轰鸣；周总理足迹印遍的家家户户都点上了明亮的电灯，入夜，繁灯千盏，一片光明；周总理同群众合影的杏树园每年硕果累累，一年一度红杏缀满枝头的时节，周总理仿佛又来到伯延人民中间，周总理的话语仿佛又响在伯延人民耳畔……

## 阜成门遇险

为接范文同，周恩来让司机走了一条捷径，没想到遇上飞来  
的车险。有险无惊。周恩来狠批肇事者：“荒唐！”

邯郸调研结束后不久，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中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周恩来在会上多次提出要实事求是，要多进行调查研究，要尊重客观规律。这次会议对党内进一步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会议结束的当天，即6月12日，周恩来便着手接待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工作。这期间，越南南方的局势日益严重，美国正在那里进行战争冒险。

1961年6月12日，周恩来在欢迎范文同的国宴上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日益严重的局势，不能漠不关心。”尽管内政、外交极为繁忙，周恩来仍在尽力为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而奔波。

6月15日下午3点半，首都人民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集会，欢迎范



文同总理。为此，周恩来决定提前1个小时去钓鱼台接范文同。这是历来的外交礼仪，处处替客人着想。

然而，路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险憎。当时随同前往的卫士长成元功是这样回忆的：

险情就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们从中南海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

我是周总理的卫士长。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的台历，看上面记了些什么活动。周恩来总理一向有这么个习惯，就是把一天的日程安排头一天写在台历上。我一看上面写着：“下午2：30到钓鱼台”，立刻便明白了，他两点半要到钓鱼台，然后陪着住在那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各界万人欢迎大会。于是，我便去找值班秘书了解全过程的情况。

为了事先有个精神准备，不致临时慌乱，我和值班警卫员张树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这次活动的全部情况。

随手我用电话通知了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他们早已得知这次大会的安排情况。我又通知总理的汽车司机杨金明，要他在两点把汽车开到西花厅。张树迎在准备必需的东西。

杨金明准时把汽车开到了西花厅前院。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停在树荫下避开烈日的炙烤（那时车里没有冷气设备），而是把车身贴近前屋的大门。因为正下小雨，为的是让周总理从后院办公室走到这里能少淋点。他习惯地到我们值班室露了一下面，一则表示他已按时到位，二则看我们还有什么对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谈了这次活动的有关过程，他便擦车去了。这也是他的老习惯，每逢下雨或是车上有灰尘，他总要擦干净，保持车身的清洁。

这是一辆50年代从苏联购置的吉斯车，即吉斯3NC—115型防弹车。总理日常活动一般都是乘坐苏制吉姆—3NM。因这次是欢迎越南总理的重大国事活动，所以调用这辆吉斯车。这种车是按莫斯科气候寒冷条件设计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难适应，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杨手里从来没出过一点小问题。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则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比如他没有剃须而又没有时间剃，我们就得把热水瓶、毛巾、剃须刀带上，以便他在行车途中剃须；二则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动又不能迟到，想催他提前出发。

我走进办公室时，总理正伏在桌上批阅文件。听到我去，他的眼睛从老花镜框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闹钟，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没有到点呢，你们就来催我。你们总是把富裕时间留给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见他不动，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厅前院总要停很多车，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排着队来找总理谈话和汇报工作。今天下午却只有一辆车，这就是准备乘坐去钓鱼台的吉斯3NC—115。院里很清静，从与西花厅一墙之隔的府右街，传来的自行车铃声、汽车的汽笛声、交通民警的呼叫声，比往日显得更加清楚和嘈杂。

不多一会儿，总理从办公室出来了。他走得很急很快，我忙连走带跑地赶到他前面，去开车门。这辆车的车门重量非常大，总理右手又有残疾，很难把它拉开、关闭。总理上了车，他的习惯是坐在汽车后排左侧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侧的吊带——因为车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侧，把车门落

锁。张树迎则坐在司机杨金明一旁。我向门卫哨点点头，他会意是要向钓鱼台通知一声，免得在那里的外交部人员心中无数。

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外出活动从不让警卫部门派警卫车在前面给他开道。这次去钓鱼台，也没有沿着警卫部门为保障国宾活动专门布设了交通民警的那条路线，即沿人民大会堂——西长安街——复兴门一线，而是沿着去钓鱼台的最短路线，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门一线，快速行驶。总理对自己走过的街道都能熟记，如果不走最佳路线便立刻指出。这时，雨不大不小地下个不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来刮去。往常，遇到汽车自行车便自动让路，让汽车先过去，今天，因为下雨，自行车都不大情愿相让，行人也只顾自己脚下的泥水。坐在司机座上的杨金明，既要注意前面的道路情况，又要留心不使车轮溅起的泥浆溅到自行车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驳转方向盘躲来闪去地走着并且不时鸣笛。我和张树迎，则按照警卫人员的职责，分别注意前方和两侧。尽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远就能识别出总理的座车，而提前给予放行的信号，保障畅行，但我们仍旧提心吊胆，生怕出事。

吉斯 3NC—115 穿过了交通秩序混乱的西四牌楼地段，前面不远就是高耸的阜城门城楼，出了阜城门城墙豁口，不但道路宽阔，车辆少，行人也少，视野开阔，可称安全行车的最佳地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我们都知道，越是环境好，人们越容易麻痹，特别是急着赶路，搞不好就会出麻烦。

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来总理的座车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就见前面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卡车。它本来是右拐向东行驶的，没有想到将要和周恩来总理的座车交会时，它忽然逆行而驶，接着又突然横到了马路中间。我们一看情况不妙，忙喊：“卡车！”“危险！”

杨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辆卡车。他是司机，对沿途路口、路况很熟，知道要经过哪些道口、机关、工厂，当然也知道那辆卡车是从北京市电车一厂的车场出来的。因那卡车出门后向右拐，所以交会时并没有鸣笛。各行其道。互相并不妨碍。当看到那辆卡车忽然驶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灯，又不鸣笛，不打手势，估计它可能横在马路中间，自己车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重大事故。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种重大的责任感促使杨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鸣笛、点煞、换一档，向右避让。车正往右偏，忽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车挤到电线杆上，杨金明连忙又改为逆向避让，并把方向盘向左打死。就在这时，那辆卡车的车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杨金明暗暗喊了一声：“不好！”随即脚下猛地一踏，吉斯 3NC—115 立即来了个 180 度大调头，嘎地一声停住！

人们在形容遇险情景时，常常是用“又惊又险”，或是“有惊无险”。我们这次可说是“有险无惊”。我们之所以称它“有险无惊”，是因为“险”确实是“险”，“险”到了一旦撞上，就会车毁人亡；“无惊”，则是在这紧要关头，我们谁也没有张皇失措，像人们遇到险情的时候，通常要吓出一身冷汗，而是沉着地只想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是我们预先有精神准备的缘故。因此，当吉斯车眼看要与卡车撞上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张树迎立即回过身来托护总理。无奈这本是三排座，中间隔着一排，够不着总理。我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用左手和身躯使劲架着总理，右手则用力支撑着中间那排座椅的靠背。总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虽然几个人在吉斯急调头的过

程中，身体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边，几乎摔到座位下面，但谁也没有受伤。这不能不归功于杨金明驾车技术高超，和他的高度责任感。如果他技术不精，责任心不强，不能在一刹那之间脑、眼、手、脚并用，准确无误地完成调车、煞车这一系列高难动作，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几乎两车相撞，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辆卡车的驾车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灯，也不鸣笛，在马路中间又莫名其妙地来了个大迂回，然后驶回电车公司一厂的大门里边去了！我们真是气得要冒出火来！

想到周总理去钓鱼台要紧，不能耽误，杨金明手把方向盘，打了倒车，调转头，继续向西行进，好像刚才的一切未曾发生似的。小雨依然落着。

我跟随周总理多年，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车险。总理也只是在苏联遇到过一次。那次，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一道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总理的座车沿着马路中间只准苏联主要领导人车辆通过的“中央线”行驶，突然从右方横着驶来一辆汽车，周恩来总理的座车刚过去，没有撞上，却撞了陈云、李富春同志的车，弄了个车损人伤。万没有想到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这一次。

我们很生气，周总理也很生气。一个司机怎么可以不鸣笛、不打指示灯，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无法无天！总理对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马上把情况告诉北京市公安局，要他们查清楚，是什么人不按交通规则行车？是有意还是无意？查明后要严肃处理。”我巴不得狠狠去处理一下那个卡车司机，恰好周总理又作了这样的指示，于是回答说：“我马上就办。”总理接着又表扬了老杨：“都是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场大车祸。”我和张树迎也问：老杨，现在心里慌不慌，并告诉他可以开慢一点。杨金明嘴里低声咕噜了句什么，又照旧全神贯注地开他的车。

到了钓鱼台，我立即从五号楼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局报告了情况和卡车的牌照号码。我把周总理的指示原话传达之后，并说，我理解总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辆卡车是否企图撞他的车，而是司机为什么打大迂回不鸣笛、不打指示灯违犯行车规则。因我们警卫人员有一种职业病，遇到问题，往往会先入为主觉得对方是冲着总理撞来的。北京市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带有关工作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电车公司一厂厂长张维仁、党总支书记冯彬，听传达室的人电话上讲，厂里的卡车几乎撞了周总理的座车，公安局的领导、交通管理处的领导都来到大门口了，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当下就打电话报告了电车公司经理许步宁，自己则跑到大门口来了解情况。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那个驾驶卡车的是电车一厂的维修工，叫张兴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练驾驶，常常开着车在厂子里转。特别是将会不会瘾头更大，不玩一玩手就发痒。这天下午他手头没活，就借口给卡车加油，和班长要钥匙，班长也知道他给车加油是假，想开着玩玩是真，又不好当面给顶回去，就把钥匙交给了张兴辰。张兴辰拿到钥匙，非常高兴。他还从来没有开着车上过街，他决定试试，于是就把车开出了厂门，想转一个大圆圈就回厂，对面有车无车全然没有瞧见。

负责交通管理的阎荣久，经过询问和勘查现场认定，张兴辰是非司机驾车，违章行驶。他说：幸亏主车司机处理及时、得当，才没有酿成大祸。要是总理的车出了大祸，我也得背上铺盖卷自动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们没

有管好啊！又说：这次也太险了，吉斯车车身长，约6米，车身重，约5吨，方向盘很不灵便，又遇上下雨，地面有水，车速又快，没出事真是万幸。最后向我们强调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设的专勤路线走，不能老图快。

公安局的同志弄清情况后，和电车公司许步宁经理很快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公安部的负责人和我接待了他们。

欢迎越南总理范文同万人大会一散，周总理送客人上车后，坐车回中南海西花厅。我就利用行车的空档时间，把许经理的汇报和公安局对这次事故性质的认定，向总理作了汇报。

张兴辰知道周总理的车几乎在他的错误中出了事，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祸，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单等处理。那位借给他车钥匙的班长，也很气恼，埋怨自己不该碍于情面，不该把钥匙交给他。厂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认为闯了通天大祸，会有好戏瞧！厂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议论这事的。

从警卫工作角度看，这次幸免于难，首先是司机发现对方早，及时采取了调头、煞车的措施。周恩来总理和我们发现也早，及时做好了准备撞击的预备反应。如果是未发现或发现较迟，我们都将会处于毫无防备或措手不及的状态，即使不被撞死撞伤，也会在车厢里翻滚致伤。其次是吉斯车车身长而重，比较稳，所以虽然来了个原地猛调头、急煞车，而没有失去重心，在马路上翻倒。这次要是一般车是非翻倒不可，那后果就严重了。

“荒唐！（“荒唐”是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语言）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周总理很严肃地说。接着又向我交代：通过市公安局转告电车厂领导，要他们结合这次事故对全厂职工进行教育，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厂里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那位私自开卡车出厂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是遇上我的车而加重处分。最后叮嘱我说：“厂里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你以后去了解清楚，再告诉我。”他从来不让我们直接插手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什么事总是通过组织系统，这次是一个例外。也许是电车公司许经理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和我们谈过的缘故，不然，他是决不会让我们再到电车公司去了解对这件事的处理和落实情况的。据我所知他自己向来也不直接处理各单位的事务。

随后，周总理又要我们注意安全，并说：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开快车，是我叫开的，这怨不得你们。但遇到红灯时绝对不能闯。我是总理，应该带头遵守交通规则。又说：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总理对乘车曾经作过许多规定，比如雨天行车车轮子不能把路面上的泥水溅到行人身上；进会场不能枪人家的车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不能先于老人退场；不要停车场的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的照顾，等等。他这些要求，不仅仅体现了他严以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说明了他对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比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曾到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在那里他曾注意观察过人家的交通管理。回来后，他告诉当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要仿效外国人在马路中间划上分界线，把上行车和下行车分开。同时提出，交通民警的现行制服颜色不明显，不易辨别，不利于指挥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发现在东、西长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当即告诉公安部门，指挥交通是一项精神紧张而且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女同志的生理和体力均不适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制。

我们回到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客厅，恰好邓大姐也在。周总理告诉她：

“我今天差点出了大车祸！多亏老杨开车技术高，处理得当，这才避免了车祸。这是我坐汽车第三次遇险。”邓大姐一听吃了一惊。我连忙把事情经过向邓大姐作了汇报，邓大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周总理又向我们讲了前两次坐汽车遇险的经过。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恺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当时他担任“廖案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坐汽车回司令部时，因临时改变了口令，回答不对，被门卫哨兵用机枪扫射打死了他的司机和护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车从延安去西安，在陕北劳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卫和司机大部分伤亡。

几天后，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电车公司有关那次事故的处理和落实情况，公安局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制度和措施的落实，张兴辰给了警告处分。并说，厂里有些人反映，张兴辰幸亏遇到的是周总理，要不然，降级、开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

虽然周恩来路上遇上了重大的险情，差点酿成大祸，但是，见到范文同总理时，周恩来面带笑容，从容自如，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人民大会堂的欢迎集会结束后，周恩来和范文同根据会谈的结果，签署了联合公报。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美国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双方重申，一切国际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求得解决。

当联合公报发表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越两国总理的会谈成果。但谁也不曾想到，由于一个非司机违章驾车，差一点影响了这一重要公报的发表，造成世界性的轰动新闻。

## 新侨会议人的争论

“新侨会议”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为了不打乱会议的安排，周恩来给会议代表来了个“突然袭击”。几天以后，他的一次重要讲话引来了赵丹的不同意见

## 夜访新侨饭店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侨会议”。

6月16日这天晚上，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就来到新侨饭店，走到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早已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去看看。”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得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正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下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来人一多，房间显小，再加上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桔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发笑。就连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也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1959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用她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她还请着病假，但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病来京参加会议。

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一些，甚至愿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黄宗英便说：“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大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为言之有据，她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

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周恩来此次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

对会上放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与会者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1957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情，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1958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舞台剧等均予以反映。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高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导演王家乙和高缨顾虑重重，总觉得搞这部电影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为此，高缨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作品的议论仍然不断。

电影拍成后，恰逢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让与会者用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赵丹和黄宗英等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恩来离开新侨饭店，已经很晚了。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周恩来刚走，看电影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串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还有人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

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繁忙。仅6月17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士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外各种重大事情……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日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达吉和她的父亲》这篇小说看完了。当天（6月17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又直奔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研究

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月18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

### 给艺术家们“树个活靶子”

代表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也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

6月19日下午3时半，周恩来如期到大会会场，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这篇讲话，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根据前两大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既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中，他讲：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在“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中，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



面有关系的。……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11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最后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里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

## 香山“争论”

赵丹坐在台下仔细地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倍受鼓舞，感觉太过瘾了，尤其是国家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赵丹非常感动，他忘却了台上的周恩来是总理，只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话。对整个讲话，赵丹心服口服，只是有一点，他有不同意见，这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究竟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尽管赵丹“看电影时流了泪”，他仍认为小说比电影强；尽管周恩来看电影“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并且对小说和电影作了各有所长的评价，但他还是讲“小说比较粗犷”，“电影加工较小说好”。赵丹认定了他的看法，想找周恩来论论理。周恩来也准备着艺术家们提出意见，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从自己开始，树个“的”让大家来射射，树个活靶子，让艺术家们毫无顾虑地来攻一攻。

6月19日讲话以后，周恩来又在22日约请各电影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交流心中的感想。

7月1日之前，周恩来通知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时和大家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

党的生日这天，周恩来兴致勃勃地来到香山，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举行登山活动。烈日炎炎，翠谷青青，花鸟欢笑。周恩来与大家拾级而上，谈笑风生。赵丹此时心中的想法，就像离弦之箭，他拽着周恩来讨论起《达吉和她的父亲》来。

“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赵丹的“箭”开始攻周恩来树的“的”。

“你有什么意见？”周恩来感兴趣地问。

赵丹大胆直言：“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比较广阔……”

赵丹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却坚持他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微笑，用人们熟悉的那种神情、目光和姿势，冲赵丹提高声音以既亲切又不示弱的语气说：

“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也被他们逗笑了。看到这一场景，香山的游人早已认不出谁是国家领导人，谁是普通的艺术工作者。更让大家感到不一样的是，在山上照合影相时，周恩来几乎都是站在后排的角落上，有时他甚至像小孩似地歪坐在栏杆上，自然、随便，平易近人。

后来赵丹回忆游香山之事时，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原来，赵丹在新侨会议刚开始时不敢讲话，一直在寻求“免斗牌”。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上海市委某负责人曾告诫他们，去北京开会不要发言，上海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检查的。因此，赵丹在刚开会的头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为此，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很纳闷，就问他：“阿丹，你为什么不发言？”赵丹心中有气，便信口回了一句：“除非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人说话不算数’，我才敢言。”

赵丹的话后来让周恩来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参加会议时，亲自点名叫赵丹发言说：

“听说你不敢讲话了？你说吧，在我面前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总理的鼓励下，赵丹等人才解除了心中的顾虑，尽情地倾吐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就自然地发生了香山的争论。事后有人和赵丹开玩笑说：总理承认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使你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一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好像年轻了许多。他与大家边探讨问题边游览，最后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讲觉得不方便，以后可以写信给我。他还指指身边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补充说道：“你们把信写给他，我就可以收到了。”

游香山的第二天，新侨会议闭幕了。会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根据会上讨论情况和周恩来讲的精神，制订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三十二条》，以期促进“双百”方针的贯彻，使党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沿着更健康的道路发展。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这两个文件也未能真正实施。但是周恩来的讲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文艺界人士的脑海中，他身体力行，从我做起的民主作风，深远地影响着党的文艺工作。难怪文艺界参加过新侨会议甚至所有接触过周恩来的人都这样认为：周总理

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把他当成朋友，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

### 三次到大庆

60年代，周恩来三次到大庆，为丢掉“贫油国”的帽子，他鼓励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60年代，周恩来三次亲临大庆视察，给开发、建设大庆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大庆人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对人民总理周恩来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康世恩的回忆和宋振明的日记，代表了这种感情……

### 康世恩的回忆

—

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庆视察，正是大庆艰苦创业、进行会战的1962年。当时，大庆全体干部群众住牛棚、干打垒，以5两粮加野菜保三餐，进行着艰苦的油田开发建设。6月20日余秋里同志和我专程赶到齐齐哈尔迎接周总理，晚上，在开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和同来的邓大姐听取了关于大庆会战情况的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1点多钟，陪同总理的同志见时间太晚了，劝总理休息。总理笑笑说：“年纪大了，更应该多做工作啊！”

6月21日，千里油田，碧空如洗，芳草萋萋。10点30分，总理乘坐的客车缓缓开进萨尔图车站。周总理敏捷地走下列车，与在站台上迎接的会战指挥部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紧紧握手，并深情地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请总理先休息一下，总理说：“时间不多，要抓紧在大庆多看几眼。”

周总理和邓大姐首先来到正在打井的1202、1203钻井队。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当总理听说国产钻机性能还不错时，非常高兴，一再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多打井，打好井。这时，总理看到一位柴油机司机坚守岗位不能站到近前，他马上从司钻操作处很窄的地方挤过去，一把握住司机那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那位司机激动得久久不肯松手。快要离开井队时，总理听说钻井工人想和他合影留念，便伸出两个胳膊，搭在身边的两位老工人的肩上，留下了难忘的镜头。接着我们陪同周总理来到大庆首先创立岗位责任制的试点单位北二注水站。总理详细地看了贴在墙上的各项岗位责任制度，边看边点头说：“好，你们这样做很好。”总理发现泵站流程图没有填写绘图时间，就嘱咐：“要把时间标上。”邓大姐也补充说：“记上日期，别人看着明显。”总理还对化验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啊！”这个站的职工时时把总理的话记在心里，坚守岗位，一丝不苟，20多年没发生过任何事故。

从泵房出来，陪同人员示意总理时间不短了。总理说：“来一次不容易，

多看看高兴啊！”总理又来到附近的职工宿舍，食堂。在食堂，总理边和炊事员握手、问候，边拿起锅盖，用勺子搅了搅正在煮着的红高粱米粥，又亲口尝了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深情而又体贴地对炊事员陈玉珍说：“你们很辛苦啊！”陈玉珍回答说，不辛苦。周总理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说：“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从食堂出来，总理一回身发现 200 米外一位家属从地窝子里出来倒垃圾，就朝地窝子走过去。我们劝总理不要下去了。总理却一个劲地向前走。家属杨德群又激动又担心。她对总理说，里面又黑又暗，首长就别进去了。总理说：“你们能注，我就能进。”周总理弯腰走进地窝子。在地窝子里总理深情地端详着躺在土炕上削刚满月的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得确实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这时，照相机留下了总理走进地窝子的难忘镜头。

总理来到大庆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油田上传开。但国事繁忙的总理，当晚就要离开大庆了。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萨尔图车站，秩序井然地为总理送行。在余秋里同志陪同下，总理上了火车后，又再次下来，频频向群众挥手告别。

这次视察，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大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了大庆注意取全取准资料，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对大庆结合实际情况，分散建设居民点、工农村也很赞扬。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大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可以做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以后总理又把它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形成了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 二

1963 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 430 多万吨。为实现我国石油基本自给做出了贡献。就在这一年，周总理第二次来到了大庆。

同上次一样，在由哈尔滨驶往大庆的列车上，周总理就向前来迎接的会战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志详细询问了大庆一年来的变化情况。

6 月 19 日上午 11 点，总理一下火车，立即改乘大客车直奔 1203 钻井队的井场。抵达后，他第一个下车，热情地与钻井工人们握手。在人群中，总理一眼认出一年前见过面的小李，便大步走过去，紧紧握着小李的手说：“你是李……”，“我叫李清明”，小李回答说。总理高兴地大声说：“李清明同志你好！”总理惊人的记忆，使在场的人们激动不已。然后总理义健步登上高高的钻台，把手伸向每一个当班的工人。当班的柴油机司机见总理向他走来，正要找东西擦手。总理赶忙制止说：“不用擦，你们很辛苦，整天和油、泥打交道，这是你们的光荣啊！”总理还询问钻井进尺多少，指标多少。当工人们回答说要用 3 年的时间打 10 万米时，总理高兴地鼓励说：“好！要有雄心壮志，要敢于创指标！”

当总理来列大庆最大的油库——西油库时，他环顾四周的油罐群，遥望远处的装油栈桥和长长的油龙，语重心长地说：“这地方很重要，一定要搞

好安全生产。”总理要上装油栈桥看一看。栈桥很高，大家劝总理别上去了，可总理还是踏着扶梯，登上了四米多高的装油栈桥。值班工人给总理做了罐车装油的表演。总理见栈桥上没有一点油污，满意地点点头，并关切地问当班工人：“冬天和雨天怎么办？”工人回答说，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总理听了赞叹说：“这是你们大庆人自己创造的严细作风，四个一样好，我要向全国宣传！”

登高远望，总理见远处站着很多群众，就一面热情地招呼让大家站过来，一面快步走下扶梯迎上去，全场顿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当总理听说身边的一位工人是湖南人时，亲切地问：“湖南人都吃大米，在东北要吃粗粮，你能习惯吗？”那位工人回答说：“总理，粗粮细粮我都能吃，只要为国家多产油，吃什么都行！”总理听了带头为他鼓掌。

总理所到之处，与工人们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交谈，详细地询问他们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总理问得最多最细。

总理这次视察后不久，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受总理的鼓励，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讴歌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劳动。作家孙维世等同志在大庆创作了反映家属劳动生活、精神风貌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个话剧于1965年冬在北京国务院小礼堂汇报演出时，总理不但看完全剧，还上台热烈祝贺，并在台上亲自打拍子指挥全场观众高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等歌曲。

### 三

1966年春天，周总理第三次来到大庆。5月3日中午12点半，我陪同总理乘坐直升飞机降落在绿草如茵的临时停机场上。总理挥动双臂，向前来迎接的油田的领导同志徐今强、宋振明、陈烈民等致意。

这次总理来大庆，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子粥和大庆自产的萝卜、土豆、白菜加粉条做的大盆烩菜。因为总理有言在先：顿顿要有粗粮，餐餐不上酒，菜要吃大庆自产的。

午饭后，总理执意不休息，和我们大家一起坐上国产大轿车，看了南二区6排32井。对全部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表示满意。

当总理到1202、1205钻井队时，对这两个队力争在当年分别打井5万米，给予热情鼓励，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并上5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看了钻井大队长铁人工进喜同志亲自做的操作表演。总理关心钻井工人，钻井工人也没有辜负总理的热切期望，到年底，1202和1205钻井队双双登上10万米高峰。铁人王进喜带队进京，向总理报了喜，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在炼油厂，总理对他们实行岗位责任制和搞技术革新的情况很赞赏。

这一天，总理从钻台到油井，从工厂到车间，虽然一刻也没休息，但毫无倦意，谈笑风生。晚饭时，总理还谈了自己的成长经过，并提示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5月3日的夜晚，是周总理和大庆的干部群众共同度过的一个不眠之夜。晚上9点30分，总理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庆全面工作汇报。对家属来矿的安置、农副业生产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他也很关心。临结束时，他一再告诫我们：“不能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座谈会结束后，

总理又邀我和徐今强同志谈了建设新型矿区、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总理强调要办好半工半读学校，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并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汇报结束时，已是5月4日凌晨1点30分了，可总理又到生产会议室看了生产模型、技术革新和油田建设图表。当我们一再请总理休息时，总理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休息呀，我快70的人了，让我多做点工作不好吗？”我们听了既感动，又心疼。这一夜，周总理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5月4日上午，总理到油田建设工地视察，对工地黑板报上工人的一首诗过目不忘，在场的人们，无一不惊叹总理的记忆力、感佩总理对工人的感情。总理走到一块较高的地方，瞪望广阔的油田，边看边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

接着，总理又视察了丰收村，并深入到食品作坊、理发室、卫生所、工人家庭，考察了解工人的生活、福利、医疗情况。总理与大庆家属们亲切和蔼地交谈、共唱革命歌曲的动人情景，至今传为佳话。

11点多，总理不顾劳累来到大庆缝补厂。总理对一件用160多块旧布拼成里子的棉工作服很感兴趣，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高兴地说：“好、好，你们要永远保持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一天的午饭后，总理在出席欢迎外宾的大会上，看到13000多人的会场秩序井然，无人走动，高兴地说：“工人也要有严格的纪律。”

周总理第三次来大庆视察，一共在大庆度过了28个小时，临回京前，他对我们说：“大庆是成功的，你们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要分手了，我们说欢迎总理下一次再来大庆检查工作，总理点点头说：“有机会一定来。”

……

## 宋振明的日记

（题记：周总理曾三次亲莅大庆参观、视察指导。1966年5月，他第三次来到大庆。这一次，总理是陪外宾到大庆参观的，所到之处，允许群众欢迎。为了满足总理想多见群众，群众渴望亲眼看看自己的总理的共同心愿，我们利用这次机会，作了周密的安排，使总理这次在大庆停留的28个小时里，先后在各种场合，与10万余大庆人相见。这里，我根据当年的日记，整理成总理和大庆人在一起的28小时记。）

1966年5月3日

清晨5时。

总理陪同外宾一大早就从北京乘飞机到哈尔滨。

中午12时30分。

总理和外宾在哈尔滨转乘直升飞机，在大庆临时机场降落，接着即乘敞篷车到住地。沿途受到16000余人的热情欢迎，总理高兴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到住地后，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总理事先的要求，安排总理和外宾，以及陪同前来的中央、东北局、黑龙江省、石油部领导同志一律住“干打垒”式的办公室。室内没有沙发、地毯、卫生间，只有原来的硬木板凳、单人木板床，茶壶、茶碗等用具也是原来旧的，总理还明确要求在大庆每顿饭都要

有粗粮，主副食品基本上要大庆自产的，不用白酒、色酒、啤酒和汽水。

中午 1 时 30 分。

我们请客人在党委会议室里用餐，房子小人多，显得很拥挤。这一餐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饭、玉米粥，给外宾加一盘面包；副食是白菜、萝卜、土豆、丸子、粉条等烩在一起的大锅菜，盛在搪瓷脸盆里，随吃随加，另外还有一荤一素。

总理说：“今天吃的是大庆饭，他们前两年就是吃的这种饭，可能还没有这么好。”

宋任穷同志说：“是没有这么好，我前几次来的时候，菜盆比这个还要大。”

总理说：“桌子也小了，今天还讲究了一下。”

康世恩同志说：“我们这两天吃的东西都是大庆产的。”

外宾说：“吃的是自力更生饭。”

总理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饭又把碗递给服务员说：“我最爱吃你们的高粱米饭，再给来一碗。”

我怕总理吃坏肚子，暗示服务员少盛一点。总理很快吃完了，又喝了一碗小苞米子稀饭。

下午 2 时 30 分，散步。

总理来到院子里问：“房子好像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小了？”

答：“和原来一样。”

李富春、宋任穷同志都讲要多种树。

我讲：“第三个五年计划，要种 6000 多万棵树。”

总理说：“6000 万棵能活 5000 万棵吧？”

答：“可能。”

总理说：“要包种保活。”

下午 3 时 30 分。

总理和外宾以及中央、省、部领导同志都乘坐国产大客车前往油田工地视察。看了南 2 区 6 排 32 井；南 2 区 11 号油库，1202 钻井队，炼油厂，来回约 70 余公里。在油井井场，当采油指挥孙燕文同志汇报全油田油井生产旺盛、保持自喷时，总理说：“你们没有自己夸自己吧？”答：“实事求是。”总理说：“实事求是好。”

在 1202 钻井队，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钻井情况和 1202、1205 两个钻井队决心要每个队一年打井 5 万米，超过苏联功勋队时，总理详细询问了两个队的情况，他说：“他们两个队，每个队如果一年打 5 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然后总理又登上了高高的钻井台，详细了解钻井情况。铁人王进喜同志手扶刹把给总理表演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从钻井台上下来，总理第二次又郑重地对我说：“今年这两个队要打上 5 万米，国务院要鼓励他们，你要给职工讲。”

当总理看到一次从近千米的井下取出 64 米长、比茶杯还粗的岩心时，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给外宾详细介绍一下。”

当总理看到半工半读学生李柏波时间：“你愿意来大庆吗？”

答：“愿意。”

又问：“是半工半读好，还是全日制不劳动好？”

答：“半工半读好。”

总理笑了。

在离开井场前，总理又握着 1202 钻井队老队长张云清和 1205 钻井队者队长王进喜的手说：“你们这两个队，今年每个队如果打上 5 万米，要告诉我。”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这两个队当年真的都超过 5 万米了，双双打出了 10 万米的当时的全国记录。这两个队由铁人王进喜带队到北京向总理作了汇报。

在炼油厂，总理看到墙上挂的岗位责任制度和巡回检查路线图，很感兴趣，认真询问了岗位责任制度的情况，并说：“这一下责任明确了，检查路线也清楚多了，”总理向该厂党委书记姬永兴同志询问了每个车间多少人，全厂多少人，设备仪表是哪里制造的等，姬永兴都一一作了回答。总理说：“你们厂管理得不错，你们先进！”总理又问了康世恩同志全国铂重整装置情况，听了回答后总理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的人员在国内比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过的炼油厂，他们的人很少，当然那也是别国搞的。”

晚上 7 时 30 分，晚饭。

这一餐主食是玉米窝窝头、玉米面煎饼、萝卜饼、大米饭、豆腐脑。副食是拌菠菜、炒白菜、烤羊肉串、清炖鸡和鱼。

虽然劳累了一天，总理仍是谈笑风生。在吃饭时，他吃了一个窝窝头，又拿了一张煎饼说：“煎饼卷大葱加面酱才好吃。”他还讲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小时候开始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学孔子那一套，当时头上还留了小辫子，这有六七年时间。后来离开家，在沈阳受资本主义教育，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脑子里多多少少都有旧的东西，要经常保持警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晚上 9 时 30 分至 11 时 20 分，座谈会。

总理和外宾以及各方面负责同志 85 人参加，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党委书记和指挥徐今强同志汇报大庆全面工作，共一个多小时。然后是外宾讲话和插话、议论。

在汇报过程中，总理详细询问了职工家属情况后说：“这里有工人 58000 人，来队家属 24000 户，还有 34000 户没有来，职工每年放假回家，也会造成很大矛盾，你们组织家属参加劳动，自力更生好。粮食少，少来，粮食多了，家属可以多来。”“同时要抓节制生育，有时女同志思想通了，男同志思想不通，反正都有矛盾。”“你们家属演出队在北京演的《初升的太阳》教育意义很大，但你们同样也有思想问题，也会有落后的人。”总理还详细询问了半工半读的情况和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大庆的情况并说：“好！理论联系实际好。”在了解大庆领导机构后说：“大庆相当于一个联合公司”，“是一个‘康采恩’。”

午夜 12 时，谈话。

总理劳累了一天，到半夜 12 点还没休息，又找康世恩、徐今强同志谈话。他根据大庆所处地区的实际情况，谈了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新型矿区的精神；还谈了要试验改革教育制度、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创业的好传统等。

总理说：“北京石油学院搬来大庆，我同主席讲过，主席讲得很好。”并说：“大庆的工作是成功的，但不能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这样眼睛就会亮。”

1966 年 5 月 4 日



凌晨 1 时 30 分，参观、听汇报。

与两位领导谈话后，总理到油田指挥部生产会议室看生产模型、技术革新产品和油田建设图表，听取油田建设规划汇报。

凌晨 2 时 10 分，离会议室。

在离开会议室时，总理说：“明天开大会，要唱大庆的歌子。我给孙维世说了，叫她给我抄几首大庆歌。”其时，此时已是“明天”了。康世恩说：“总理该休息了。”总理说：“现在还早！”

凌晨 3 时，总理房间熄灯了。

晨 5 时，办公。

总理起床阅看外交部和中央发来的电报。

6 时，散步。

作家孙维世同志和我一起送去总理要的大庆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和《大庆家属闹革命》，总理高兴地唱起来：

“锦绣河山美如画，  
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

总理唱到这里，突然停下来并指着歌谱对孙维世说：“这是你抄的吗？”孙维世答：“是。”总理又说：“怎么少了半拍？”孙维世一看不好意思地说：“嗷哟！这里多画了一点。”总理说：“你呀，从小我就说你马大哈，现在几十岁了还是马大哈。”接着总理又唱了一遍《大庆家属闹革命》。然后，总理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说，“他们（指外宾）要石油部派一个代表团去，谁带队？”康世恩同志答：“让唐克同志去吧。”总理说：“要带大庆的人去，代表团里要包括搞地质的、钻井的和搞机械的，懂得造钻头的人，还要有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你们可以给他们讲一下。”

晨 7 时，早饭。

这一餐有油条、豆浆、馒头、稀饭、咸菜、鸡蛋。

上午 9 时去工地。

总理和外宾首先到了油田北区输油管道施工工地，受到工地 4000 多人的欢迎。每到一地，总理都是健步走到群众中和工人握手，一一询问是哪里人，愿不愿在大庆工作等。

在一块板报上总理看到一首工人的诗，便对身边的新闻记者说：“你们这些记者，这些工人的诗歌不快记，记什么？”随后背过身对康世恩和我说，“你们记住这首诗了吗？我背给你们听：

没有经验靠实践，  
遇到困难学‘毛选’。  
专家大家是一家，  
排山倒海力量大。”

“对不对？”周总理问。答：“一字不差。”大家热烈鼓掌。

总理指着大拖拉机说：“为什么没有女同志开？是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答：“是。”

总理站在高地上挥手指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大油田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

上午 10 时，参观新建的工农“丰收村”。

在村里，总理看望了家属拖拉机手，参观了机播玉米，半工半读学校，以及食堂、作坊、卫生所、家属宿舍等。在“丰收村”各参观点上，总理同全油田家属先进人物代表和本村家属共 5000 多欢迎的群众见了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总理先到正在播种的地里，详细问了家属李春云等同志的籍贯、种多少地及生活上一些情况。又看了耕地和苞米地、麦子地，还蹲下来用手扒开土，看耕的有多深。

总理对客人说：“他们这里土地属全民所有制，分配是多劳多得，包括服务行业、小学教员、修路家属，还有家属干部，一律评工记分，不劳动不得分。”

到了村里，总理看了家属住房和生活设施；在作坊，看到摊煎饼机正在摊煎饼，总理拿了一大块煎饼吃了起来，边吃边说：“你们搞得真好，开动了脑筋，比昨天晚上吃的煎饼好。”他还风趣地说：“我可没有带苞米面来，吃了煎饼可没有兑换的呀！”随后，总理和外宾走进了家属李春云的家，问了“干打垒”房子的结构后说：“这样来得快，将来可以逐步改善。”又和外宾一同曲膝坐在炕上。因房子太小，除李春云和我等几个人外，其他人只好站在门外。总理和李春云拉开了家常，谈了很长时间。

总理问：“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答：“部队转业，现在在生活办公室。”

问：“你们一年收入多少？”

答：“我去年劳动 2200 多工分，分得 220 多元，加上丈夫的收入，共有 1000 多元。”

总理对外宾说：“在一般情况下，她丈夫是个干部，收入那么多钱，她当家属就可以不参加劳动了，可是他们这里的家属都参加劳动。”

此外，还讨论了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工资制度应该进行改革的问题。

总理从李春云家出来，看到有上千家属正在热烈鼓掌，有的激动得热泪直流。总理很高兴，又亲自指挥和大家一起唱《大庆家属闹革命》等歌曲。他还说：“我再唱一遍就记住了。来大庆，不学会几首大庆歌曲还行吗？”因为下午还要开大会，因此途经红卫星村和西油库时，只是在车上看了居民点和油库库容，沿途有 4000 多人欢迎。每到有人群的地方，总理都叫车子开慢一点，打开车窗向群众招手。

11 时 30 分，参观家属缝补厂。

总理陪外宾来到缝补厂，在门外受到 5000 余人的热烈欢迎。总理和客人先后看了展览室、收回的破烂工装工鞋堆、拆洗房、修鞋组、被服加工车间、弹棉花房等。工厂赠给外宾一套缝制一新的工装。

总理每到一处都和家属握手，问寒问暖。

总理问家属王美花：“你们是不是也评工记分？”

答：“记工分。”

问：“每天记多少分？”

答：“出满工记八分。”

总理说：“你们是搞专业了，不搞农业了。”

中午 12 时，回到住地。

上午活动往返行程约 70 公里。12 时 30 分，午饭。

这一餐主食是小米面煎饼、玉米绿豆饭、酿皮子、馒头、花卷。副食是清炖萝卜、炒菠菜、酸菜氽白肉、手抓羊肉等。

下午 14 时，照相。

总理等和全油田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 144 人照相。

下午 14 时 20 分至 15 时 40 分，欢迎外宾大会。

大会会场设在露天广场，到会职工 13000 人，另有 90 个分会场，参加收听的有 25700 多人。

总理看到会场上的 13000 多职工像解放军一样，一声号令叫起立便整齐地起立，喊坐下也是一样整齐地席地而坐。一个半小时，无人走动，在场的各单位互相拉歌，歌声洪亮，总理高兴地连连点头说：“解放军转业的不少吧？”

答：“是。”

又说：“工人也要有严格的纪律。”

15 时 40 分大会结束。

总理等乘车到临时直升机场，沿途有 3000 多人热情欢送。

16 时，到机场。

总理和大庆送行的同志一一握手，说：“谢谢你们！大庆又有进步，大庆是成功的。你们可不要忘了一分为二呀！”我们说：“欢迎总理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6 时 30 分。

总理乘直升机离开大庆。

……

## 浸透在大庆油田的心血

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后不久，十年内乱便开始了，大庆与我国其他工矿企业一样，未能避免“文革”的冲击。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就把矛头对准大庆，诬蔑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唆使北师大一个造反团去批判。陈伯达还亲自写信派这个造反团到大庆煽风点火，鼓吹“打倒一切”。一时间大庆领导班子 17 名成员中，16 名被揪斗，12 名被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铁人王进喜也惨遭揪斗、毒打、游街，被诬为“假典型，是地主、国民党”。钻井、采油、油田建设等二级公司、厂的 300 多名领导干部、技术专家都被戴上各种帽子统统打倒靠边。到 1966 年底，全油田共有 6000 多名干部被揪斗。数以万计的一线生产单位的班组长、劳模、技术骨干甚至家属标兵受到批判。大庆油田的生产失去了正常的指挥，受到严重的破坏。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忧心如焚。1967 年 1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期间，针对林彪、“四人帮”搞垮大庆的阴谋，七次刻意地强调：“大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树立的典型”，“大庆出了问题，没法向毛主席交代”。1 月 8

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铁人工进喜和全国石油系统的群众代表时说：“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他们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讲到这里，他扳着指头，一一阐述了大庆石油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说：大庆靠什么打了胜仗？首先，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其次，靠大庆广大职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再其次，就是靠全国各方，可以说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单有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组织这次石油会战的领导人，没有这个会战的领导班子，等于说打了一个胜仗没有指挥员，行不行啊？不可能嘛！我曾三次到大庆，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那时候，没有任何厂矿像大庆取得那样伟大的成就。

1967年2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各部群众代表时又说：大庆最近很乱，甚至还有人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我一提起这件事就很激动，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3月23日，周恩来接见大庆代表时又讲：大庆会战是党中央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对我们是个考验。大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5年功夫石油年产量由97万吨跳到去年的1060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讲自力更生，1962年我去大庆，那真称得上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

针对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情况，为了保护大庆油田；1967年1月，周恩来提出继鞍钢之后，对大庆实行军管，并征得了毛泽东等人的同意。实行军管的决定起草后，周恩来亲自作了修改，在决定的开头，加上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典型”一意。另一处周恩来加上了大庆军管会由石油部、沈阳军区共同领导。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1970年大庆油田出现了压力下降、油层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重情况。致使大庆月月欠产，完不成国家原油生产任务。广大干部、职工忧心如焚。

听到大庆油田受到破坏的情况，周恩来万分焦急。1970年3月11日，他把铁人王进喜请到北京，听了铁人的汇报，沉重而关切地说，大庆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3月18日，周恩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大庆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精神，根据“两降一升”的实际情况，从开发方案到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整工作。迅速扭转了“两降一升”的严重局面，使油田恢复了正常生产。

……

康世恩曾动情地说过：“从1960至1988年，大庆为国家生产原油9亿多吨，财政上缴800多亿元，出口原油1.05亿吨，换取外汇242亿美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浸透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

### 接到班禅“七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196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班禅向周恩来写了一个“七万言书”，周恩来评价：“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

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1962年，藏传佛教的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舆论的焦点。

5月18日，第十世班禅向国家总理周恩来递送了一份后来被人们称作“七万言书”的报告。此后，人们谈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总要与他1962年写的，以至后来20多年间一直背了黑锅的“七万言书”相联系。而班禅谈及自己的这段历史，又总要与他的“敬爱的周总理”密不可分。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它留给后人的是众多的遗憾和深深的沉恩……

“我从幼年起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又称贡布才旦，1938年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系第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当1949年6月李宗仁代总统代表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批准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并派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于8月10日在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时，第十世班禅便面临着是留在大陆还是随国民党一起去台湾的重大抉择。在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和谈”阴谋破产以后，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展现在人民的面前。此时的班禅，不满12岁，回答“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班禅毅然率领堪布会议厅全体成员留在大陆，9月5日，迎来了西宁解放，并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取得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立即指定在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已詹东·计晋美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爱国统一的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

班禅后来说：我从10岁开始参加政务活动，十一二岁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更不会任人摆布。这话指的就是上述之事。

尔后，班禅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宾。38年后的1987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建国初期他在毛泽东眼中和中央的地位，他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泽东主席的宠爱，可以说是他的宠儿，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前提，是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秉笔直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1年初，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达赖，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来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1951年4月27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领堪布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实现了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愿望。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13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班禅一行，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周总理。在这之前，班禅曾听

长期在内地生活、并担任班禅驻重庆（后又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办事处处长的詹东·计晋美介绍过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的情况，对周恩来的杰出才能和高尚人品有所了解。初次见面，周恩来虽然已经年过半百，双方年龄和经历、信仰悬殊极大，但周恩来以他那让世人为之倾倒的特有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懂得礼仪，因此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最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会见之后，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主要成员的意见。因此，不久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凝聚了班禅等人的智慧。

首次进京，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基础。从这时起，班禅暗下决心：为了听懂同总理的讲话，我也要好好学习汉语。随后，中央护送第十世班禅返藏的重大事宜，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11年以后，班禅把“七万言书”直接通过周恩来转交中央，是与这种个人友谊有密切关系的。与周恩来的交往、倾谈，对班禅一生的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1954年9月，无论是对于全国人民，还是对于西藏地方的政治生活，都是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岁月。此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又同赴北京开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和朱德偕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全国妇联、北京市党政军等各级负责人以及民族界、宗教界人士共800多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两位西藏地方领袖。次日，朱德、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宴会，欢迎达赖和班禅。席间，班禅在祝酒词中说：“承蒙中央各位首长对我们热烈欢迎与设宴招待，这是我们深为感激的。现在我以最兴奋愉快的心情，向各位首长致以恳切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为各民族大团结而干杯！为朱副主席、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健康干杯！”对班禅等人在京期间的一切活动，包括饮、食、住、行各方面，周恩来都亲自作出周到的安排。会上，班禅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又在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内部，班禅与周恩来主席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更直接的关怀。

1955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决定》（任命达赖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两份文件，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又规划了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蓝图，成为又一次联接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达赖、班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团结的纽带。为此，周恩来曾经做过众多的、细致的工作。文件通过的次日，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再次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此时，周恩来与班禅之间已建立了既是友好合作的同事，又是情谊深厚的朋友的密切关系。正因如此，当1956年11月至1957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

加佛事活动时，班禅能够以祖国统一和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摆脱叛国分子的纠缠，其间，周恩来正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作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决不会受外界影响。对于刚刚成年（时年 19 岁）的班禅来说，第一次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就能不为当时的复杂环境所左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周恩来的谈话和信任，对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由于有了班禅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友好合作、亲密交往的关系，所以，他才坚持直接给他信任的周恩来和党中央写出书面意见。这一原因，班禅在重新出来工作后提及过。他在 1982 年 7 月 17 日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是在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等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这种“特殊深厚的感情”，最突出地体现在他与周恩来之间。这就是“七万言书”的标题上唯独出现周恩来个人名字的原因。

### “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人们的设想进行的。在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指导下，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一开始，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一些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红汉人”的侵犯。各地不断出现武装叛乱。1956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召集在京的民族界、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周恩来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从来没有人主张不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任何事情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周恩来还提出：对于目前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解决的办法是“停战”。

然而，由于地方各级干部中间“左”的思想作祟和一些地区少数叛乱分子煽动、破坏，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叛乱尚未彻底平息，而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不断地指示、责成有关方面去迅速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1957 年 6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 52 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个别少数民族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指出：“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国家的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都是不容许的。”他特别强调：“我们对人民负责。”

但是，中央的精神并没有被完全贯彻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一些地区的

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达赖逃离拉萨。3月20日，周恩来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讨伐叛国集团，叛乱被迅速平息。3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的同时，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这份文件中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决定西藏采取“边打边改”的方针，逐步推行民主改革运动。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周恩来发布命令的次日，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4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参与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文件，大大地推动了西藏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0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周恩来、朱德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迎，祝贺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但是，在庆贺成绩的同时，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也逐渐在藏区滋生出来。班禅参加完庆典后，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左”的、过头的做法。从此，在他心中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识深浅的不同，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因此与一些地方干部发生争执，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在班禅参观结束回京后，周恩来于1960年1月25日接见了。周恩来听取了班禅的意见，认为：班禅大师“出发点好的”。并指出，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周恩来历来认为，在同志、朋友和合作共事者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这样才能较好地合作相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说：“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应该说，这一“协定”、“诺言”，两年以后鼓励了班禅直接上书周恩来。

以后，班禅在参加完建国11周年、12周年庆典活动之后，都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陪同，到各地去参观访问。足迹遍及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福建，以及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市。走时，周恩来设宴为他送行；回时，周恩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是，这期间班禅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之间的看法出入越来越大。在藏区，他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而在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方面，以及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对这种失误程度的大小、范围宽窄的估计，对成绩



和错误的估计，班禅与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着重大的分歧，甚至与藏区的党政领导发生意见冲突，闹得很不愉快。例如，在视察四川时，四川省委和西南局的领导向班禅介绍了甘孜和阿坝两个西藏自治区的情况，介绍中充分肯定了平叛和民主改革以来，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班禅对此估计很不满意，不以为然。他说：“甘孜、阿坝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平了五六年，到现在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国家干部打成‘叛匪’。群众的生活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生产下降了，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迫还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他还质问四川省的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他觉得，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藏区的情况不敢讲“真话”，自己与他们交换意见，很难像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样坦诚相见。他极反对一些干部只看成绩，不看错误、缺点的思想方法。

在西藏，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班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曾向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过，但由于看法不一致，班禅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导因。

早在1960年10月至12月，班禅在李维汉等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13次长谈。这些谈话，多少增进了些双方的了解。用班禅回京后对周恩来讲的话来说，他与李维汉“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这一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书，但是，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这一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与班禅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领导上来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和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可见，毛泽东、周恩来充分理解班禅的出发点，对藏区发生的问题的看法是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的，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是辩证、稳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鼓励班禅纠“左”的。周恩来强调了我党对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历来采取的“慎重缓进”的方针。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但是，班禅觉得中央领导虽然能够理解他，却不一定完全了解下面“左”倾错误的详细情况。他认为自己了解到的很多情况尚未完全吐出来，且光口头谈谈，也不会引来多大的重视。鉴于此，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但这一打算遭到堪厅主要负责人、经师和身边人员的反对。从性格上讲，班禅认准了的事，就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因此，他尽量说服了身边持反对意见的人，于1961年底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当1989年1月，班禅再次看到归还回来的“七万言书”手稿时，感慨地说：“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并说：“我要把它好好保存，作为永久的纪念。”

## “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班禅在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还于1962年三四月间，与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的各藏区代表进行了交谈，了解近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这些接触，使班禅更加感觉到藏区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

在写书面报告时，班禅的汉语仍然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1962年5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写完，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耳闻，也很关心此事。当班禅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于1962年5月18日下午，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佯谈，并通知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平杰三、刘春、董小鹏、张经武、张国华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为的是取得广泛的协商意见。这是周恩来就书面报告事与班禅等人的第一次会谈。

在周恩来约见前，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是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但是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5月18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标明的日期，仍为“1962年5月18日”，由此可以看出班禅对周恩来的尊敬、信赖。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书面报告的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看法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用他那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指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分析了双方意见的实质，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11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在具体工作上，尤其在平叛以来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多少，和事实符不符，范围广不广，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看法有出入则是思想问题。”周恩来的话，首先找出了双方分歧的主要点，在于对具体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看法上，并指出这种分歧仅仅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经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对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视察，等班禅报告的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一如往常地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设宴款待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双方气氛极其融洽。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后期工作。汉文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终于在6月初定稿付印。正如班禅多次对翻译们说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我的意见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个题目，是班禅经过反复斟酌后选定的。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书面报告，就必须讲究形式，选择理想的送达途径。在他心目中，周恩来总理是中央领导人中，最了解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人，也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周恩来心胸宽广，从来都是民主作风的楷模，能听取党内外任何一种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周恩来善解人意，以诚待人，是非分明。这份报告的形成，体现出他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7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为8个部分：

- (一) 关于平叛斗争；
- (二) 关于民主改革；
- (三) 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 (四)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
- (五) 关于民主集中制；
-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 (七) 关于宗教；
- (八) 关于民族工作。

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涉及其他藏族地区的问题，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周恩来后来看到报告，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和自己的基本看法：“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8个部分中提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传佛教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的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包括西藏在内的一些地方党政干部，民主作风不够，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民主改革中，有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采取了投机的做法。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八个问题”和“五个宗教原则”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一是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是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是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是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是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是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是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简而言之，班禅认为：自治区筹委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太多；中央和藏区的领导干部，很少真正过问藏族的疾苦和今后的发展，“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由于不重视藏语文、藏族风俗习惯，以及在平叛扩大化中，大部分青壮年男子被逮捕关押，

大有“消灭民族”之势；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衰败而濒于灭亡”，大有“消灭宗教”之势，我们藏人于心不忍；藏区错误的发生，既有地方干部工作上的问题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也有中央政策上失误方面的问题。在“七个认识”中，班禅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言辞尖锐、激烈，带有刺激性。甚至认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若不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危险，国家也将没有前途。在“七万言书”的酝酿、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班禅的情绪是非常激愤的，他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有关领导的矛盾日益明显，有时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5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 “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多次召开有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领导同志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夏辅仁、阿沛、帕巴拉以及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负责人平杰三、刘春等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7月19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

- 《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
- 《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
- 《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
- 《培养帮助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从总体上，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摆出来了，就必须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

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地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所有归你。”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周恩来的回答，贯穿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谈话，始终是亲切的、和蔼的、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班禅听完周恩来的一席话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消。8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话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8月13日至9月2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4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4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 “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

在对待班禅“七万言书”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认为，“班禅的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部。对班禅、阿沛，从基本立场上看，他们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他甚至对西藏工委的负责同志说：“活佛不能换。”可见，他对班禅具有基本的信任。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班禅思想认识中的错误一面。并指示中央和西藏工委的同志：对待班禅，“一要尊重职权，二遇事要取得同意，三要有等待。”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有主观的、有客观的，

有国内的、有国际的。班禅的事也同样如此，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驾驭了。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班禅的问题，也被当作夺无产阶级专政之权的“焦点”问题之一提了出来。虽然，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曾强调，对班禅“要有正确的政策”，也“要有必要的批评”。但是，一个月以后，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便被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冲击波覆盖了。由于后来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又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指明的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正确的政策”，得不到体现；他要求的“必要的批评”，也被升级到改变了性质。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一个党外，一个党内，共同反党似乎顺理成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与班禅等人较妥善地解决了“七万言书”问题的李维汉和习仲勋，也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被批判、撤职。西藏工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关于全面贯彻四个文件的精神，也由此被迫中断。班禅那刚刚平息下来的火气，再次升了起来；他与西藏工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又一次拉大了。

1962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国际上，印度军队在不断蚕食、推进方针的指导下，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大举向我国边境地区发动进攻。我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由于西藏在地理位置和宗教上，与印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不断地活动，使得班禅与西藏工委的矛盾自然地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国内方面，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也动荡不安。再加上台湾当局不断制造“反攻大陆”的沿海登陆事件，这样的客观情况，必然使人们强化敌情观念。加之当时“左”的思想作怪，人们心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越拉越紧。

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七万言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自然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漩涡中，由原来的“认识问题”、“思想问题”逐步升级，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班禅的本意、“本性”或出发点是好的，如他后来所说：“我这个人看到‘左’的错误，看到不合理现象，看到老百姓吃苦受难，从心底里感到气愤，根本坐不住。要我不讲话，或者讲好听的假话，或者闭上眼睛，我根本办不到。……看来我这个毛病改不了，我也不愿意改。这大概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尽管周恩来多次强调：班禅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他的基本立场是爱国的，对班禅应采取正确的政策。但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远远超出了班禅“七万言书”的本来性质，也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历史，使伟人也无能为力了。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批判，“七万言书”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证据。班禅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对班禅这样的宗教界、民族界的头面人物的处理，周恩来是知道的。但是，自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很难左右中国政坛上阶级斗争的动向和发展了。尤其是1964年我党作出“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领导权已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后，周恩来对“从资产阶级手中”（在西藏便是从农奴主手中）夺权的运动的方向是不很清楚和不理解的。这种真实心情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更是困扰着他。但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不得不带着忧虑的心境艰难地工作；有时也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特殊地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力图保护党内外一大批民族精华和杰出人物，对班禅，周恩来同样倍加关照。

就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会发生意外事情，特意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班禅。周恩来还特意交待有关部门，要照顾好班禅的生活。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中央有关部门对班禅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一直到“文革”初期，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危局也越来越难以支撑。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人，不顾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武斗行为。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监护。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得知：卫戍区必须向党中央负责，向周总理负责，不能让班禅出来。为此，班禅内心充满了感激。他很想见周总理，但却只能感受到总理的关怀、温暖，见不到自己尊敬的人。他在被监护期间，深深理解了周总理的困难处境。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修身养性、静心反省的生活。

1968年，班禅再次被带走，送去“隔离监护”。这次与上次不同，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就连周恩来的关怀，也几乎被“四人帮”一伙隔断了。在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班禅，林彪叛逃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一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相继解放。他也曾考虑了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因各种阻力，未能如愿。1974年3月，重病期间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促成班禅出来工作事宜。但是，不久以后“批林批孔”运动的狂潮，又使周恩来的愿望成为病榻上的遗愿。

直到1977年10月，第十世班禅才得以获释，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在狱中以至出狱后，班禅一直在反省自己“七万言书”的是是非非。他明白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总的看法：“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对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他是清楚的。同国家的灾难和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比较，他并不感到委屈。他恢复自由后曾说：“过去我确实犯了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今后

我准备好好好总结一下，再给中央写个检讨报告。”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周总理早已定论的人民内部问题，却被一些人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来处理。但是，班禅坚信，“七万言书”的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好的，周总理是理解自己的，党和国家是会对自己做出公正结论的。这种信念，使他熬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忌日（1月8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质地优良的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的灵魂祈祷。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还是自己最亲密、最崇敬的一个挚友。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这位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领袖，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复出后的班禅，也始终没有忘记周恩来的“恩情”。

1988年4月4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表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自己亲自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检查、布置工作。因为两天以后，他将离京赴西藏，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伦布寺南捷开光典礼，行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安排。在佛学院的事忙完后，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这是一位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的杰出领袖对自己祖国的总理最感人的怀念。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1月28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 十九、脚踏实地创辉煌

### 与戴高乐密使富尔商谈中法建交

戴高乐敢于傲视美国的指挥棒，派秘密特使富尔访华同周恩来商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恩来对戴高乐赞誉有嘉。建交谈判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 富尔的特殊使命

1963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10月22日下午，首都机场，一架大型专用客机徐徐降落。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迎上前去，同客人热烈握手。两个美丽的首都少女向富尔夫妇献上了芳香四溢的鲜花。

富尔这是第二次来到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度。1957年5月，他作为法国前总理曾来过中国。

富尔首次访华时，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富有外交经验的政治家，并与他作了多次交谈，富尔首次访华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所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

富尔还将他的上述看法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戴高乐决定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性行动时，他选派富尔作为他的秘密特使，来同中国领导人面谈。

8月间，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访问中国，并要求：为避开国际新闻界的视线，他这次访问对外公开宣称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

中国方面答应了富尔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对外交巨擘周恩来来说，他非常清楚富尔此次中国之行的使命和意图。

自从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法兰西共和国后，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日趋尖锐。法国作为北大西洋集团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按照“龙头大哥”美国的要求，应该和美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实际上就是依附关系。自认为是北大西洋集团首脑的美国，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对其他各成员国发号施令，并以北大西洋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借口把各成员国牢牢拴在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车轮上，要它们的一切行动惟美国之命是从。但是，随着各国的发展，以法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些西欧成员国同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关系中的利害矛盾不断增加，并同美国

发生了“谁是欧洲的主人”的争论和分歧。尤其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掌法国后，法国政府不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方针，不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了。这样，法、美之间的裂痕与争执不断扩大和增加，最终爆发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并导致形成了北大西洋集团中两种明争暗斗的对立势力较量。

美国千方百计地要推行其“在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欧洲”的计划，并拉拢英国结成特殊盟友关系，力图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绝对影响和控制之下。

而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欧一些国家，则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作为反对美国控制西欧斗争的纲领性口号。法国还把除英国外的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五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加强与美抗衡的力量。

面对法国这种桀骜不驯的挑战，美国又使出了以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杀手锏，向法国步步紧逼。它一方面抛出自己一手炮制的多边核力量计划，逼迫法国交出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又采取向欧洲共同市场“掺沙子”的办法，推着英国尽早挤入欧洲共同市场，牵制和削弱法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拉拢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联邦德国，破坏法、德一体化合作计划。

戴高乐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并不示弱。1963年春，他公然蔑视美国的权威，拒绝在美苏共同炮制、旨在加强美苏核垄断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并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美之间的矛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为了更好地与美国抗衡，戴高乐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新的调整。他把眼光从西欧局部投向了亚洲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无疑，正确处理好同在美国遏制下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对加强法国抗衡美国的力量，提高法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句话，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他派富尔出使中国的全部意义，周恩来对此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外交决策核心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从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对我国打破美国的封锁，反对苏联的控制，挫败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是有利的。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既表明了我国的一贯立场，又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

（四）如果法国以其他形式和手法搞“两个中国”，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揭露，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但这样做可引导中、法两国关系朝健康的道路发展，并为以后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政府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法建交。为此，中国政府给予了富尔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富尔，周恩来和陈毅单独或共同与富尔先后在北

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

### 谈判桌上，富尔步步为营，周恩来 稳扎稳打，灵活变通，中法达成默契

就富尔个人来说，他认为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奉行这一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然而，当富尔作为戴高乐的特使代表法国政府访华与我国进行建交问题的谈判时，他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含含糊糊的态度，实际上是企图以变相的“两个中国”方案为筹码，同中国讨价还价。

因此，在和平的谈判形式和轻松的谈判气氛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一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尖锐斗争。

10月23日，富尔抵京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张奚若、谢黎在一旁陪见。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又问：“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短暂的寒暄后，谈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富尔此举，是想让中国方面把信的原件拿回去翻拍下来，作个证明，同时，也是表示一种诚意。

周恩来明白富尔的意思。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

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他说：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富尔很注意地听着并揣摩周恩来的每一句话。他明白自己这次所担负的使命重大，而戴高乐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内要使相互隔绝了十几年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达成正式建交协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好在富尔面对的是一个注重诚意的大国和一个闻名世界的

外交巨擘。

在一番法国很重视独立政策的表白后，富尔迫不及待但又是姿态高悬地提出中法建交议题。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提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恩来充分地理解法兰西民族的“自尊”。他接过富尔的话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实际上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指挥棒。

对此，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这有可能要受到苏、美的指责。

但富尔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周恩来也明确了我方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 13 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对周恩来表明的这两点，富尔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但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采取含糊的态度，他一方面说，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说，台湾则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这就困难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 14 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

“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周恩来缓了缓语气。接着，又借对方引喻：“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

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最后，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听了周恩来这番坚定明确而又入情入理的话，富尔的口气不得不软下来。他连忙表示：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这些问题可以研究，可以研究各种方案。

富尔还说：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这不可能。”周恩来一句话顶了回去，“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惟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英国在台湾有领事，有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13年。”富尔一脸苦相，“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说的法国在13年前犯了一次错误是指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会谈到这个程度，双方都了解了各自的想法、立场。周恩来也基本摸清了法方的意图，他提议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

10月25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富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一开始，富尔就以先入为主的办法，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解释，并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他将是不愉快的。

第一方案的实质在于：它试图避开法国公开正式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

显然，富尔是想以“含糊战术”来达其一箭四雕之目的。

但是，富尔也知道，中国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作出让步的，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至于第三方案，富尔只是提提而已，根本无意采取。

周恩来的一生与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过交往与谈判。长期的谈判生涯使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杰出谈判专家，富尔的意图，周恩来岂能不明白！

为了不给富尔更多的含糊余地，周恩来采取一点一点明确的方法。他说：为了使双方的愿望有更明确的基础，我提出三个问题向阁下解释。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富尔的最后一句话，含有把台湾划出中国版图之外单独成为一个国家的伏笔。

周恩来听话听音，他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指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推托说：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

“你的看法如何？”

“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明确表示意见，因为我没得到指示，但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戴高乐不管这一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关键问题上，富尔又施展起含糊战术来了。

周恩来毫不放松：“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下一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周恩来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如果戴高乐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还幻想有朝一日搞台湾共和国，这比搞“两个中国”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中法建交断不可能。

富尔不得不放弃台湾地位未定的想法回到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上，他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说就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周恩来紧接着说。

“戴高乐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了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富尔似乎在为他以前的“模糊”作解释，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也打上了一个“活结”。

“了解你的立场”，周恩来说，“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富尔连连点头。

“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想些办法如何摆脱，这可以研究。”在明确了法国政府承诺不搞“两个中国”和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两点后，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退了一步。

谈判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中。

富尔又露了一点口风：戴高乐说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

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

不知不觉中，会谈已进行了近4个小时，中南海里，早已是灯光一片。

周恩来站起来，邀富尔共进晚餐。

席间，周恩来对富尔说：“我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第二两点是肯定下来了，第三点是接近了。这点如果解决得好，可使第二点更加肯定。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第二点。”

周恩来还谈到了柬埔寨承认新中国时的情况，说：“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因此，要事先达成默契，确实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办法。”

说罢，周恩来和富尔同时举杯。

为了使双方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商量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5日会谈后，双方好几天没有接触。趁此空隙，周恩来安排富尔参观了山西大同等地，并指示各地热情接待。

周恩来也在积极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

经过前几次与富尔的会谈，法国政府的态度已基本明确了。法国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也无意于搞“台湾共和国”，从法国政府以往的态度来看，这应当还是可信的。法国政府虽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国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仅维持代办级规格。

1959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这与英、美的立场截然不同。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法国与美、英态度也不同，没有公开攻击中国。况且，这次法国是真心想同我国建交，以打击美国。那么，现在中法双方剩下的分歧就是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承认中国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戴高乐认为他承认新中国不能有附加条件。如果戴高乐无意搞“两个中国”，那这个附加条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戴高乐照顾法国政府的面子问题，没有多少实质意义。这样，我方就可以灵活变通一下，即不再要求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两个中国”的立场，而由我单方面在照会中予以申明，法方以实际行动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就可以。

第二个分歧就是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法方一再要求先同中国建交而后再同台湾断交，并声明这不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仅仅是出于礼遇问题，即戴高乐不好主动驱逐蒋介石驻法代表。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要法国政府主动驱逐台湾的驻法代表，的确有些困难。只能寄希望于自动断交比较现实，即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后，台湾驻法代表自动撤离，法国也相应召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

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周恩来决定在手续程序的问题上作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他酝酿了一个新的方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作为一个成熟的外交家，周恩来不仅表现在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还表现在勇于和善于进行退让和妥协，尤其表现在能够准确地把握退让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只讲斗争不讲妥协，其结果往往是使谈判陷于僵局甚

至破裂；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周恩来恰恰在这些具有决策性意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雍容大度和超群的外交才智。

10月31日下午5时，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周恩来与富尔的又一次会谈开始了。

会谈一开始就直入正题。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周恩来对这个方案作了解释。他说，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代表看到照会后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应相应撤回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员看待，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立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用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关于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略为变通了一下，即没有要求法方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方默认的方式代替。但在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上，还留有余地。

让步也要有步骤。周恩来不会一下迈出两步，他先迈出一步，然后要看看富尔的反应。

果然，富尔对周恩来在附加条件上的变通表示了愿意靠近的兴趣。他说：经过研究，法方把有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了解中国对承认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富尔也让了一步。

但是，对方案中要求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这一点，富尔仍面有难色。

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而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蒋不走，戴高乐也不采取驱逐措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事实上，法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



办仍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表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富尔的这种设想，周恩来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法国政府坚持不承认台湾驻法代表的外交身份，不承认他代表“中华民国”，在断交的程序和方式上采取模糊的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一去，台湾的驻法代表会因得不到外交身份的承认而感到难堪，最终导致自动断交。

周恩来问：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承诺：当然。

“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外交部请客，台湾的代表请不请？”周恩来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我也在想，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富尔笑了笑，“有可能有好多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有人会请他吃饭。”

“只要原则定了，那方法上完全可以灵活。”周恩来心中暗自想道，但他对富尔表示：“还得与党和政府说一说，到上海再回答你。”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富尔也将去上海见毛泽东。

11月1日晚9时，上海和平饭店。周恩来与富尔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了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1. 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2. 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3. 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公开行动，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与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1. 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2. 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3. 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宣读完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对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既合情又合理的方案，富尔觉得难以提出任何异议了。他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利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接下来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周恩来说：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我完全同意，要中国作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说

到这里，富尔耸肩扬手笑了笑，继续说道：

“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此时，富尔已沉迷于品评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周恩来笑了笑：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将尽力而为。”富尔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大厅内的时针已指向 22 点。

“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元帅，一位是现任市长。”周恩来告知富尔。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富尔这句法国式的幽默把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11月2日凌晨，中方将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交给富尔。上午 11 时，周恩来与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的敲定。除文字上的几处修改外，富尔还提出把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去掉。他认为前一句已说清楚了。

周恩来坚持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但答应在措辞上可以变换一下。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大的方案定下来了，剩下建交的具体事宜双方将派代表在瑞士洽谈。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28日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立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我国来说，这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本身的范围，这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国讨论建交问题。一直摇摆不定的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

## 历史的遗憾

中法建交，把中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

毛泽东、周恩来对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戴高乐也十分赞赏。

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外宾时，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周恩来说：松村先生刚才称赞戴高乐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想在日本像松村先生这样称赞戴高乐的人多了，

日本就会产生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人物是时代造成的。法国受了三次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代表了法国的独立要求。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很是崇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1964年7月，法国驻缅甸大使奉戴高乐之命向中国驻缅大使耿飏表示：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互访。

8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中国驻印尼代办透露：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也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10月，和戴高乐关系密切的西哈努克亲王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这当然不仅仅是西哈努克的意思。

12月，富尔又向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提出：希望中国邀请戴高乐访华。

短短的几个月中，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华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自尊心极强的戴高乐怕给世人留下屈尊就驾，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在中国，当时根据国际形势也有一条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法国似乎也知道，为打破僵局，戴高乐先迈出了一小步。1965年，他派出了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马尔罗访问了中国。

1966年2月17日，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马纳克向中国有关方面人士表示：法国政府去年已派出了马尔罗访问中国，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法国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5月16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私宅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表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的愿望。

戴高乐此举，除想加强中法政治对话外，主要还是想争取周恩来先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访问中国。

然而，此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忙于内政，难以脱身出国访问。

6月22日，黄镇大使奉周恩来之命转告法国总理蓬皮杜说：周恩来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戴高乐总统的邀请，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下半年议会讨论预算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年4月22日，戴高乐召见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希望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戴高乐说：“至于派谁来，我也不知道。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并将受到我的很好接待。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这次，戴高乐没有说明邀请谁，可能是对他1966年邀请周恩来被婉言谢绝一事有点不快。

不料，6天之后，戴高乐因“建立区域”和“改革议院”两个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戴高乐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也许，戴高

乐认为他不在位比在位更能实现他访华的夙愿。

1970年3月2日，戴高乐非常器重的老部下、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没有忘记戴高乐下台前6天召见时交给他促成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的使命，致信戴高乐，建议戴高乐访华。

马纳克在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总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我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未来还是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来说，都会是一桩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把我国放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一桩同你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而且世界上只有你能够以一种既明智又自立的自由来完成：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4月10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信，他写道：“尽管我目前还不能明白答复，请你至少了解，我已经把这事记录在卷了。”

7月，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毛泽东都接见了他们。对毛泽东来说，接见一个法国政府的部长，这是一个特例。全是因为戴高乐的缘故。

在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题不断地停留在戴高乐身上。

参加陪见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7月30日给戴高乐的信中又特意向戴传递了这个信息。大使在信中写道：“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崇敬。”

将军感动了，也动心了。他决心要去中国了。

9月8日，戴高乐对即将前往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他还问到去中国哪一个季节为最好。不过，戴高乐又说：“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在这之前不久，刚果（布）驻法使馆武官对中国驻法使馆武官说，戴高乐拟于1970年底访华，并计划在其回忆录中最后一章写“与毛泽东的会见”。

就在戴高乐计划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也正准备着转达给戴高乐一份正式邀请书。但是，中国方面想要事先确知戴高乐是否会接受邀请。为此，周恩来派了一位秘密使者到巴黎，这就是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韩素音女士与世界一些政界要人有联系，她同中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1970年10月20日，韩素音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找到了戴高乐非常信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韩素音对雅克·吕夫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去访问中国，政府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中国等待着将军。”韩素音还说明：“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总理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以他的名义邀请将军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最钦佩的，就是戴高乐将军拒绝在强权面前屈服以及他维护国家独立的意志。但在直接向将军发出邀请以前，中国领导人想确知将

军能否接受。你能否把这个信息告诉将军，并把他的答复告诉我，我立即向北京转达。”

雅克·吕夫表示他立即准备完成托付他的使命。但是，吕夫想到当时法国总理德姆维尔应邀正在中国访问。他想等到德姆维尔访问回来后再向戴高乐报告。

然而，一切都晚了。

1970年11月9日晚上7点25分，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撒手尘寰。将军死前没有任何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要死。这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撰写他的回忆录。

戴高乐终究没有接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信息。然而，他知道这个信息必将到达。

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戴高乐的逝世，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并委派黄镇大使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中国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法国科龙贝戴高乐墓地上的两个写有中文的大花圈，寄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的哀思。戴高乐逝世后的很长时间内，周恩来与人谈话时常常提到戴高乐。1970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

## 首访非洲十国

首访非洲，中国代表团十万八千里探路。周恩来大度地致歉：“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 进入非洲第一站：阿联

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近现代青睐了欧美大陆，冷淡了亚非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这块土地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然而，非洲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正如周恩来所说：“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西方的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牺牲亚非国家取得的。”

60年代初期，“黑暗大陆”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继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拉开了非洲独立高潮的序幕；196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有15个获得独立，这年成为“非洲独立年”；1963年5月，30多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独立国家。新中国也在这个时候，进

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等陪同下，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我们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周恩来语），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也加深了周恩来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的了解。

非洲大陆及其非洲国家，无论是对于中国政府代表团还是对于周恩来本人，都是比较陌生的。为此，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例如他在阅看参考资料第25辑即《非洲概况》时，逐字逐句地划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这辑材料上留下了他的密密麻麻的笔迹，可见其认真关注的程度和为了了解非洲概况所下的工夫。为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

1963年12月13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中“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

由北京出发，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大使，向他们详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提出：

“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先由肯尼亚抵达开罗，同开罗机场叠叠重重、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受纳赛尔总统的委派，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他与周恩来是熟悉的，这年4月，他曾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决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纳赛尔总统缘何未到机场去迎接周恩来？对这点，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她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这样认为：

“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赛尔

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警告过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表现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赛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这种失礼行为显得毫不介意……”

韩素音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

其实，韩素音女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失之偏颇，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的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是这样说的：

“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阿联，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场面。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这次出访，周恩来给“老杜”取了一个雅号叫“杜山”，系“杜三”的谐音），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匝匝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地迎面而来”中，目不暇接地抢拍镜头的。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

“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两边人群像密集捆扎的篱笆墙，绵延数十里长，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欢迎的盛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知解其意的语言！”

是啊，这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无可挑剔。

与韩素音女士所说的“大约过了24小时以后才和周见面”相反的是，当天下午7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纳赛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并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赛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12月16日，纳赛尔总统在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英文报纸译为‘杰出领导人’），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些称赞，是少见的，也许是释译

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这确是当时孔原、黄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的记载。

当纳赛尔总统在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

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陪同下，来到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78米高的开罗塔。它们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50—前2500年）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游客。只见几名身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过去了，他们随着运动员的跑动，视线不断引向塔尖。不大一会，白衣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只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登塔表演，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

“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个来回。”

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记时。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方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也很相信中医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秒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

“哎，还真的是脸不变色心不跳！脉搏和正常人的一样，一分钟80多下，这就叫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哩。”

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赞赏他们。

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其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其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2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机智应答，妙语如珠。

他谈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是：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



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带着这种友好愿望，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非第二站——阿尔及利亚。

“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当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机舱时，感受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迈丁率领30万阿尔及尔人民正迎候在机场上。当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热烈地拥抱周恩来时，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有它深远的涵义。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年2月底，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6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他们对他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它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它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另外，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阿尔及尔的市民们都是荣幸的，因为在这里，他将成为他们中间特殊的一员。

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2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于5时30分到达总统官邸约丽别墅拜会了本·贝拉。从机场到住地，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统官邸拜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

12月22日，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联结起来。周恩来出席了命名典礼。另一件事，恐怕周恩来原先也没有想到，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所以周恩来欣然前往市府大厅参加授予仪式，接受了这一称号。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会谈外，主要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四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

西。”对阿尔及利亚，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周恩来）自认为了解得还太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我方知之甚少。因此，前两次政治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

相应地，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因此，从12月24日第三次政治会谈开始，本·贝拉便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

“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

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依靠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

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做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作了准备。当周恩来在台上给阿方的干部们作报告，介绍中国的建设经验时，本·贝拉总统和布迈丁副总理亲自在一旁认真地作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逊，竟是如此的相似！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年2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也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前，曾于10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及其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法国人对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

还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似乎觉得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尽，他又使出全身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12月26日晚11时40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礼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但是访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觉”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在40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后来回国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我才算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

次日上午，本·贝拉和布迈丁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

**摩洛哥烤全羊招待中国贵宾。  
周恩来戏称哈桑二世为“皇帝委员会委员长”**

摩洛哥王国，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东邻阿尔及利亚，1956年获得独立。它的面积只有45.9万平方公里，人口在1963年只有1200万。也许正是这种国情，使得摩洛哥独立后采用了欧洲式的“廉政国宴”——西式两菜一汤，奢华、复杂的宴请早已取消了。

中国客人远道而来，却受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破例款待。12月27日上午，当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时，王宫里将要出人意料国宴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当周恩来、陈毅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进入王宫拜会哈桑二世国王时，哈桑二世打破了西式两菜一汤的接待外国元首的惯例，改用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来盛情招待中国贵宾。这一席菜，就连1961年起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的杨琪良也未曾领受过。也使出席宴会作陪的一些外国使节感到异常的破例，惊喜万状！

摩洛哥的传统饭菜，是用手抓着吃的。哈桑国王依照本国的风俗，陪主宾周恩来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一只烤好的整羊已经放在了直径八九十公分的瓷盘中。哈桑国王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进行，以示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周恩来历来是入乡随俗的，他有流鼻血的毛病，“上火”的东西很少吃，在国内时也极少吃羊肉，但是，主人的盛情，他乐意客随主便。每次上菜后，周恩来也依样回敬主人哈桑国王。

另一边，哈桑国王的弟弟、年仅19岁的亲王与陈毅同桌。这位亲王不仅说话不拘小节，而且动作也稍有“出格”，他抓起一块烤肉，自己先用嘴舔一舔，然后再送给陈毅。陈毅见亲王如此“破例、热情”，也洒脱地接过肉大口地吃起来，一点也没见外。双方人员都极为感动。满场气氛亲切融洽，为这次访问创造了极好的氛围。

席间，周恩来、陈毅和其他代表团成员吃得都很尽兴，周、陈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很满意，他也回过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举世之冠。”

宴毕，哈桑国王把周恩来、陈毅和杨琪良大使请进他的会客室品茶。摩方所饮的茶，是中国供应的绿茶“喜珍眉”，加上一把鲜薄荷和一些“面包糖”（面包状，近似于冰糖，由白糖加工而成），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室内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合乎标准后，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随同周总理访问的细心的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哈桑国王手下的这位“茶博士”，在烧茶时，一会儿用小杯子尝一口，尝剩下的茶水，又倒回大茶壶里去。他就这样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做着这件事。成元功感叹：茶在摩洛哥是多么宝贵啊！此茶烧好以后，茶色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具风味。

周恩来喜欢饮茶，他的家乡也盛产茶叶，但摩洛哥特有的饮茶方法，他也是头一回看见。周恩来对此表示欣赏。这一效果，正合哈桑二世意，他连忙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1200万人民生活的三大必需品，须臾不可少。光绿茶就年需12000吨，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因此，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

周恩来客气的回答：“ 贵国喜欢的那种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不大的特定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我回国后一定请有关人员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哈桑国王的说法，这一问题的解决，等于解决了他的人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造反”问题。后来到索马里，索方也向周恩来提出在茶叶方面给予援助的请求。周恩来特意交待有关人员，对摩、索这样的国家，我们要派专家来作些调研，看能否种植他们所需的茶，若能，让我们的专机送些茶叶苗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人家。

摩洛哥从历史上就延续了王国制，这一体制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将如何发展？哈桑国王不无考虑。趁这位对世界局势有所影响的东方大国总理在此，哈桑国王突然巧妙地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 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后都笑了起来。周恩来风趣地回答：

“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陈毅接着说：“ 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

周恩来又说：“ 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

说罢，三个人哈哈大笑。这一巧妙的回答，既安慰了哈桑二世，又表明了中国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的态度。机智诙谐而又含有深意。

访问摩洛哥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向已故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陵墓敬献了花圈，以表明对摩洛哥独立革命运动的支持。摩洛哥革命以及哈桑二世的前辈的事迹，周恩来早在 40 年前留法时就知道。这次访问摩洛哥，他与哈桑二世谈及此事，说：“ 摩洛哥的革命，为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事迹，我们在青年时就知道。我在法国时，第一次大战后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从摩洛哥开始的。我们留法学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提到民族独立斗争时，以摩洛哥为例子。后来先王（注：哈桑国王的父亲）陛下被放逐，我们也知道。”

周恩来青年时期就对摩洛哥革命和哈桑国王的父亲如此关注和称赞，令哈桑二世甚为惊叹！

周恩来、陈毅在与摩洛哥方面会谈时，有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主要的话题；而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的谈判，也无可回避。虽然美国到处干涉别国内政，以“世界警察”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人散布“中国好战”的谎言。周恩来在会谈中这样告诉哈桑二世：

“ 尽管美国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遭到美国的敌视、包围、封锁、禁运等等），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有等待，同时继续谈下去，要谈多长就多长，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谈了八年多，可再谈八年多，甚至八十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是总要达成协议的。”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被非洲第三世界的兄弟们所认识、了解。

当中国代表团在 1963 年的最后一天离开摩洛哥时，新年即将来临。周恩

来带着哈桑二世国王赠送的剑鞘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的一把宝剑，率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惟一访问的欧洲国家。

### 突尼斯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 升级为正式访问。周恩来与布尔吉巴“有话直说”

按原定出访日程安排，阿尔巴尼亚之后，便要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加纳共和国。但是，一件预料之外的喜事却在这之前发生了。

由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的距离是一万余里，中途必须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但突尼斯当时并未与我国建交。有趣的是，1963年12月26日当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礼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也沉不住气了。突尼斯方面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信息正合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请示国内。第二天清晨7时，也就是代表团即将上飞机飞往摩洛哥之时，周恩来和陈毅联合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并邀请访突，“我们同团中同志作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报告》发往国内以后，代表团继续在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访问。其间，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很快同意了周、陈的报告。代表团接到答复后，立即决定由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一边正式访问，完成中突建交，一边给飞机加油。

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地拉那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宪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

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缺少交流，中国人进入的是陌生的突尼斯，而突尼斯领导人同样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政府。为此，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双方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布尔吉巴不赞成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

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

尽管布尔吉巴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然而，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精神与布尔吉巴会谈，他说：

“亚洲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找到共同点。”“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谢他，说：“这

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布尔吉巴终于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结了起来。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镇兴奋地说：

“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

### 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从容地 走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过程中。

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为决定即将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这件喜事而高兴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

1964年1月2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作为亲密战友和身经百战的元帅，陈毅是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和胆略的。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劝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问题还不仅是我们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识考虑；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并对他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

黄华，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称赞的具有“中国式的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当时他任中国驻加纳大使，正赶上恩克鲁玛遇刺的政变。他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并给周恩来等人发去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1月9日，黄镇坐另一架由荷兰租来的专机飞抵加纳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二黄与恩克鲁玛商量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他们向加纳总统

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感到，危难之中方见中国总理的真诚。

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发展，担忧代表团的安全。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

何种力量？周恩来说：

“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既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

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为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对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克鲁玛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作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鲁玛的那一刻，恩克鲁玛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这张照片，不知事发之时是哪位记者的杰作。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又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去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

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只见周围戒备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这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

周恩来和陈毅是见过世面的军事家，他们面对这一切，嘴角却挂着风趣、平稳的微笑，只当是在视察军事演习部队。他们从容镇静地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鲁玛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鲁玛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门内。

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鲁玛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高度戒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却是一套极为熟悉的中山服，这才想起，1961年8月中旬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鲁玛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鲁玛去杭州、上海参观、访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鲁玛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进得屋来，恩克鲁玛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下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

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里举行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恩克鲁玛还亲自带着周恩来等人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1471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运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城堡地下室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看了以后，被这些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深深震撼。周恩来后来在缅甸额不里海滩上与奈温主席谈起过参观这座城堡的深刻印象：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15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为了冲淡地下室的殖民主义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得楼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种人，孩子的皮肤呈棕色。恩克鲁玛把夫人介绍给周总理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克鲁玛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立即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球。他俩愉快地拿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作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俩人球技都不算高，但意味深长。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鲁玛处境维艰、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如此轻松愉快的建议，它的深远政治涵义，世人是不言而喻的；对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也是一个极好的调节。

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送来巨大的力量和慰藉，且处处体谅和照顾对方，恩克鲁玛甚为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世界政治、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鲁玛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1964年2月和1965年8月他曾分别对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说过：



“ 在我去访问加纳以前，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搞颠覆活动，其中有美国，它们收买警察，行刺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只能用军队来保护自己，现在正在改组警察。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去访问加纳的。加纳遇到如此重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前去访问。 ”

“ 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

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

遗憾的是，1966年初恩克鲁玛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月24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周恩来在这之前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又提出让他留在北京，但中国离非洲太远，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1972年4月27日，恩克鲁玛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9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加纳政府贸易和友好代表团时，对团长、工业部长阿格博少校回忆起老朋友恩克鲁玛：

“ 恩克鲁玛这位老朋友，他一定要去调解越南战争问题。我劝他不要来，但还是来了。结果，来了就回不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留在北京，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使他为难的。但他觉得离非洲太远心不安，去几内亚了。我在1964年1月访问加纳时，在城堡里会见恩克鲁玛，当时他没有出来，呆在城堡。当时我劝他不要出国，我离开加纳的时候没有要他送。1966年恩克鲁玛来调解越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解的嘛！所以他一来就出了事情。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1966年以后我们就见不着面了。 ”

周恩来最后补充了一句：

“ 不管怎样，他是你们非洲解放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 ”

### 由周恩来拟定的中国外援 八项原则在加纳、马里出台

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实事求是的讲，我国的财力有限，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这些数额的援助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真正用来扶助他们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相互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不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

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

天，是该适时地宣布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

“援外原则八项：1.平等互利；2.尊重主权、不附条件；3.无息或低息贷款；4.有利自力更生；5.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6.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7.技术出口；8.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但是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

第二天，即1月15日，周恩来与恩克鲁玛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与恩克鲁玛谈完，已是晚上7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问时，正式地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在这里正式出台了：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质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八项原则所包含的真诚、无私、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等中国精神，一目了然。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这八项原则的提出至少有三方面的国际意义：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以富压贫、干涉别国内政、攫取别国资源等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提出了挑战；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以自力更生为主、以外援为辅，以公正、合理为基础等等）提供了基本准则；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范例。

1月16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语）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1月21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在马里，凯塔总统等领导人试图让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马里共和国提些看法。周恩来明确地说出了中国对非洲国家道路选择的態度：

“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无论在马里人民还是在凯塔本人心中，中国客人的地位都很高。这不仅因为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诚与亚非各国合作，而且与中国派专家对马里进行援助有关。在周恩来访马之前，他曾派出我国水稻、茶叶等方面的专家援助马里。中国专家到达马里以后，正赶上凯塔总统星期一接见，他们立即提出要到工作的地方去。凯塔说，还不能去，因为暂时没有汽车，得等到星期三或星期四。中国专家问有多远的路。回答是二三十公里。中国专家干脆脱口而出地请求：那没关系，我们走路去。身材高大的凯塔总统惊呆了，这些中国专家，竟如此朴实、无私、吃苦耐劳、充满工作热情。他哪里知道，中国专家在来马里之前，周总理就教导他们学习雷锋精神，让他们以“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的态度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援助马里人民。中国专家到达工作地后，没有桌椅，就坐在床上办公，既不像他国专家那样要求住高级宾馆、坐高级轿车、吃好的，又从不提带家属问题。相反，他们耐心地传授技术，默默无闻地工作。这些，深深地打动了凯塔总统，也在马里人民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凯塔总统规定：中国专家可以随便出入总统府。这些事，周恩来到来后听说了，也很高兴、满意。与中国专家的威信相应，中国总理的谦逊、热忱，更进一步地打动了马里人民。

在马里期间，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对团长周恩来的两个行动感到意外：

一是在抵达巴马科的当天晚上，继凯塔总统带领倾城出动的人民欢迎中国贵宾后，凯塔又在市内为周恩来举行了一个有一千多人出席的盛大招待会。在洋溢着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周恩来深受马里人民的热情所感染，带头和马里总统一道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尽管随员们在国内见过总理优美的舞姿，但是这种在异国他乡溶合了中、非舞蹈各自特点的舞步，大家都是头一次见到。

二是周恩来在马里对动物发生了很大的兴趣。1月17日，他在巴马科第二副市长库利巴利和国民议会副议长西索科的陪同下，参观了巴马科市的动物园。这里，有许多生长在非洲的特有的动物，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件事的新鲜感还未过去，第二天周恩来又叫上陈毅等人，在凯塔总统的亲自陪同下，前往巴马科郊区的索图巴动物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原来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个企业，1960年9月由马里政府收归国有后，发展成为集生产和科研为一体，并在全马里六个经济地区设有附属研究站的大企业。原来的法国技术员、管理人员全部由非洲人接替。周恩来听了所长介绍其历史发展后，对他的经营管理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了养牛场、家禽饲养场、饲料仓库、实验室以及这个企业的其他部分。临走，为了表示感谢，还向所长赠送了礼物。

代表团成员深深地感到：周恩来所说的向非洲人民的学习，是多方位的、深入的。

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在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和富强起来”的一番讲话后，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

踏上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

## 周恩来进入了杜尔总统所说的“百宝箱”

首访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

几内亚共和国，西濒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当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

在科纳克里的欢迎人群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塞古·杜尔。这位几内亚总统当月刚过完42岁生日，但他早已是非洲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后，他便设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的9月30日，在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夕，他委托教育部长转告周恩来：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次年4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到任；9月，杜尔总统应刘少奇主席邀请率政府代表团远道而来，访问中国。周恩来参加了接待仕尔并与会谈的全过程，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国和几内亚友好条约上签字。那年，周恩来亲自陪同杜尔总统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他们一起下工厂参观，走大街观市容，进工人住宅慰问，到少年富联欢……沿途交谈，相互了解，建立了初步的友谊。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塞古·杜尔领导的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四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即中国政府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谴责任何外国的干涉。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亿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这些主张提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1月13日，周恩来致电塞古·杜尔总统，称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这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几内亚，与杜尔可以说是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

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这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的群众的欢迎方式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休息室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四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一辆；其余三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议会议长陪同陈毅、孔原、黄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一份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人群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房屋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培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

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车队行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两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几内亚出产的柯拉果……

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开到位于海滩旁边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作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离去。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他俩后来成为“老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

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大加称赞了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他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同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周恩来还表示：“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者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在这样美丽、富饶的国家，面对热情、好客的总统和人民，周恩来的心情也显得很舒畅、轻松，谈吐风趣、诙谐。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后正巧没安排外事活动，周恩来便提议大家，到临海的宾馆外面去散散步，松弛松弛。沿着海岸线，大家很惬意地跟着周恩来漫步林间道，欣赏着热带海滨的美，感受着赤道线海面的独特气息和随海风飘过来的热浪。

突然，周恩来招手把摄影师杜修贤和陈毅的秘书杜易叫了过来，让他们俩站在一起，望着他们笑而不语。二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怪地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过了一会，周恩来才扭头问陈毅：“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杜修贤整日扛着摄影机在阳光下跑，自然要比其他人黑一些。但他没料到总理以此开起了玩笑。

陈毅饶有兴趣地回答：

“可不是么！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喔。”

没想到周恩来更风趣地指着“二杜”说道：

“你叫杜易，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你老杜就叫杜山，一（易）二（尔）三（山），不是正好嘛。”

陈毅用他那元帅外交家的风度开怀大笑，一口四川腔渲染了气氛：

“哈哈——对头对头，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杜山”，这个在异国他乡从周恩来那里拾来的名字，后来居然比杜修贤的本名还叫得响！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民族传统赠送的柯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他乘汽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市，他还特意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最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几内亚的热带粮食作物——木薯。这种东西我们国内也有，但却是有毒的，不能生吃。几内亚的木薯则是无毒的。杜尔总统用手掰下来两块，当场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给周恩来品尝，的确无毒。几内亚方面向周恩来介绍了本薯的特点和栽种情况。热带植物，令中国客人们大开眼界。从金迪亚回科纳克里时，杜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恩来总理一起乘直升机回去。这件事是头一天晚上就酝酿好的，但考虑到几内亚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苏联制造的直升机是有一定危险的，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险情中舒缓了一口气，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国礼宾官就和卫士长等人商量，认为直升飞机坐人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不同意几内亚方面的这一安排，礼宾官报告了总统。杜尔却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由我自己去给周总理说。晚饭时，杜尔真的向周恩来谈了这项冒险而又有趣的安排。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开飞机送你和陈总，我们的议长、国防部长陪同，有一个翻译随行就可以了。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但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总理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恩来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第二天，果然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周总理和杜尔总统等上了直升机。成元功等人只好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等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杜尔总统驾驶的直升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随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从来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履险，每次都化险为夷。

几内亚民族，的确是一个勇敢和热烈的民族，他们对中国客人的热情，有时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恩来总理每次外出回到住地，担任警卫的士兵都要朝天鸣枪示意，表示热烈的欢迎。有几次，总理没回来，只有随员们先回来了，几内亚士兵看见中国客人的汽车驶回，同样朝天鸣枪欢呼。等中国总理回来时，他们再次鸣枪。这种奇特的欢迎方式，有时真叫随员们受宠若惊。

1月26日晚上，在即将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时，周恩来特意设宴招待杜尔总统；宴会之后，代表团又在大西洋畔的“美景别墅”宽敞的阳台上，举行告别招待会，与杜尔总统等人面海告别。随后，前往科纳克里机场。

午夜，周恩来在机场向几内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告别词。不同的是，这份告别词在发表的当天又经周恩来等人紧急做了修改。修改源起于几内亚独特的歌舞。

这天白天，将要离开几内亚的周恩来，脑海中又回荡起他称赞“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那天晚上所看过的几内亚歌舞，他在几内亚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歌舞所蕴藏的生命力。他觉得在告别词中应该表达这种感受。随即：他给乔冠华写了一个意见稿：

冠华：

请将告别词中加上下达一段意思（文句请你们改写），即：

几内工人民在民主党和总统领导下，大力推动和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反

帝反殖斗争。在几内亚的歌舞中，不仅强烈反映出几内亚人民的历次反帝斗争，而且广泛歌颂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卢蒙巴的名字在几内亚人民中同几内亚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一样受人尊敬，受人怀念。这一些充满着政治内容的

革命歌曲的传播，大大鼓舞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促进着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周恩来

1月26日

午夜零时30分，在周恩来发表完告别词后，代表团踏上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

### 周恩来与阿布德主席谈到了可恶的戈登。 塞拉西皇帝却驱不散美国的阴影

离开西非的几内亚，又折返到红海边的东北非的苏丹共和国访问。由于中途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代表团途中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作了短暂的停留。1月27日下午3时，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两天半的访问时间。

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高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行进，好让首都喀土穆的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明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负责安排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的计划。

进得城来，周恩来才知道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土穆人民直接、亲近地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他们顾虑太多，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人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土穆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

为何这样？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

再者，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有一次际遇，碰到一个共同的敌人。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884年，此人被派往苏丹任殖民总督。1885年1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土穆击毙了刽子手戈登，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

周恩来在喀土穆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时，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束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

1月30日上午，为满足喀土穆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

同日上午11时12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六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

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的阴影，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政府控制。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

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代表团里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当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欣然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作文章，噙噙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

中国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4时30分，双方举行会谈。

美国的阴影，干扰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论起来。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耐心地作了解释，说：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况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未建交；中国也并未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装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犯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们便感到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甚至给他们带来一丝的不悦。

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皇帝的“冬宫”。虽为皇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两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不便。周恩来住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很远的宾馆居住。但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成元功格外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个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没有把床弄来，成元功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亮着，他彻夜工作已成习惯，何况还要准备第二天进一步与塞拉西皇帝会谈。

正是由于美国的影响，在1月31日双方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



建交问题时，塞拉西皇帝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

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要宣读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阐明，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先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心领神会，自然地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

“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

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首任大使。

### 周恩来告诉舍马克总理：“非洲觉醒了！”

1964年2月份的第一天，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皇宫门口，目送着中国代表团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邻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访问。

中午12时10分，中国代表团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机场受到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是此次出访的最后一个非洲国家，中国人又一次感受到了非洲人民的热情。

晚上，在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追溯到9世纪和15世纪。他说：

“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9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15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经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

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拜会索马里总统欧斯曼，再次强调了“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

当中国人进入索马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所散布的“中国好战”和“中国主张有色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的谣言也传入了索马里。鉴于此，周恩来和陈毅与索方的会谈中驳斥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造的谣言。他们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是和平的使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的是中国”，“我们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一方面主张坚持反帝，如容许帝国主义侵略就没有和平共处。”周恩来有力地向着舍马克说明：“事实上，不是我们好战，是美国好战！”

索马里是东非独立较早的国家，1960年索马里从英国占领区和意大利托管区先后获得独立，组成了索马里共和国。次年6月，我国便向索马里派出了大使。他就是我方向东非派出的最早的大使张越。鉴于此，周恩来曾在

与欧斯曼总统的会谈中出现了一次口误，他说：“二次大战后，索马里成为东非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斯曼一听，赶忙更正：“是第三个。”周恩来也从另一个角度纠正了自己的说法：“我驻索使馆是东非最早的一个。”欧斯曼总统微笑地点点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所访非洲国家对此都很关心。在索马里，周恩来向舍马克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不容置疑的立场：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的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会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也就会赞成，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除外。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对这一点，舍马克也有些想不通，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呢，这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周恩来再次解释：

“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集团应该是不存在的。”

他还提醒索马里领导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哩！”

周恩来所阐述的立场在 1970 年 10 月 25 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第 26 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正是基于绝不承认“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访非期间周恩来亲自指导了中法双方在瑞士的建交谈判。他在来索马里的前几天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法国建交的声明。1 月 27 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 3 个月内任命大使。

2 月 3 日，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又追到了摩加迪沙，采访即将结束非洲十国之行的周恩来。周恩来肯定地告诉这位法国人：“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

遵照协议，几个月后，周恩来把这次随同访非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派到法兰西共和国当了首任大使。

和平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是中索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恩来告诉舍马克：

“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国家未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为此，周恩来在摩加迪沙提出了震撼世界的著名论断：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表明了中国人对非洲形势的看法：非洲已经不是 19 世纪末叶或者 20 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拦他们前进。”

后来非洲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的论断。今天的非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实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非洲人民和非洲国家前进的步伐。伟人的预言，令世人折服！

当然，周恩来这一论断的发生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 90 年代由于战乱几乎变成一片废墟；非洲其他一些地区也由于复杂的原因成为严重动乱的地区。但是，从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非洲也如此！从国际战略学的高度来看，周恩来的著名论断并没有过时。

1964 年 2 月 4 日，周恩来带着摩加迪沙市赠送的“自由钥匙”，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索马里回国。

按原计划，代表团回国后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过完春节将再访亚洲三国——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这就是后来所指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首访非洲十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

### 周恩来畅谈“非洲印象”。 荷兰机组人员却依依不舍

结束对非洲十国的访问后，对非洲大陆和非洲各国形势的感性、理性认识，都深深地刻在了代表团尤其是团长周恩来的脑海里。当春节以后代表团继续出访亚洲三国时，“非洲”，仍在他们脑海中萦回，以至于他们与这三国的朋友们不由自主地谈起非洲的观感。

1964 年 2 月 16 日，周恩来与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在额不里海滩上的一棵古老的大树下，进行了长达 6 个小时的谈话，“非洲印象”，是谈话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侃侃而谈：

“我们对非洲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以后，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阿联、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作了一首词（注：即访非期间所作的《满江红·黄金海岸》，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句），其中‘两洲’指的就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

“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 59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独立的有 34 个，未独立的 25 个，现在只能这样分。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象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然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的非洲。”

周恩来认为，非洲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解决“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他指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环节：第一，建立民族自卫武装；第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第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中国总理首访非洲，就得出如此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不得不令奈温将军惊叹和佩服。

3月1日，中国代表团再次回到昆明，结束了这次马拉松式访问。

中国人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算圆满完成了。机组人员为中国代表团访问非洲、了解非洲，留下深深的非洲印象，立下了汗马功劳。专机的飞行，有时整天整夜都在天上，正如黄镇在飞机上的一首即兴诗所说“一日飞行万里天”。机组人员都是尽心尽力的。周恩来也没有忘记他们，沿途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细致、亲切的关怀。这些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俗话说，“以心换心”，友谊都是互相的。正因为中国总理平等待他们，关心、尊重他们，他们反过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总理服务。奇怪的是，欧洲人对这架飞机反而评价不高。英国著名记者兼作家迪克·威尔逊就说过：“周恩来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欧洲人哪里知道，中国的总理却能与“波罗的海”号机组进行最好的合作。在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飞突尼斯的，但是他们机组的18个人联名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继续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机组人员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荷兰机组人员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恩来同意给他们以特殊礼遇。他与陈毅专门招待了机组人员。后来又派我们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派人带领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当荷兰机组人员回国时，他们依依不舍，临行还诚挚地表示：周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我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 独特的出访报告——周恩来给翻译最高地位

196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回到了离别3个月的北京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在首都机场与广大群众一道迎接代表团的到来。晚年的毛泽东，很少到机场去迎接出访归来的党政领

导，对周恩来来说，这是毛泽东难得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足见非洲之行的重大意义。

回国以后，首要任务是对此次出访作出总结，向中央作报告。此次首访非洲，非同寻常；要作报告，亦非易事。2月9日，在代表团中途回国休息期间，周恩来曾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电说明情况：

“归来已四日，本拟写系统报告送中央，因环境突由紧张而松弛，反而睡眠不好，连电话都未打给尚昆同志，报告也就未能着手。

“在国外时，本拟分国报告，但从阿尔巴尼亚后，硬分不出执笔起草报告提纲时间，致报告中断，心甚不安。幸好所遇问题，均未超出在出国前中央批准的外交部请示报告中所提的方针……”

“现离再度出国还有五天，拟先草一报告大纲并与陈毅等同志商定后即先电中央，全面报告待下次归国后再写。请中央予以批准。”

可见，访非之紧张和报告之不易。按周恩来意，访非报告大纲应在访亚洲三国之前写出报中央，但代表团在昆明稍事休息后，又赶往成都与各界群众欢度春节，因此直至出访缅甸的前一天，报告大纲仍未写出。周恩来和陈毅只好又电中央说明情况：

“访非报告大纲尚未写出。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报告提纲。”

报告“难产”，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写作。

3月1日，代表团由亚洲三国回来时，周恩来与陈毅商定：索性写成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一起报中央。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我部分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访问十四国，重点是访问非洲十国的情况。

回到北京以后，这份出访报告更是紧锣密鼓地赶写。周恩来还多次与陈毅及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讨论、修改。3月29日，《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终于拟就。

1964年3月30日、31日两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长达151页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

这是怎样一个报告？以至于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官员们一连听了两天仍不感到厌倦？

报告讲了五大部分，（一）访问的经过和收获；（二）阿尔巴尼亚之行；（三）非洲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四）南亚三国之行；（五）我们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和任务。题目本身并不吸引人，引起人们兴趣的是报告的内容。人们当时对非洲极其陌生，很想了解这块大陆，也想得知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非洲后那里的官方和人民的反应。更感兴趣的是，周恩来在这一报告当中，加进了访问中的许许多多情节、所发生的趣事奇闻、所引发的各种感慨等等，使得报告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令大家感到另有含义的是，周恩来把这次跟随出访的三位翻译请到了会场，坐在显眼的位置。他在全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全体委员面前，异乎寻常地称赞了翻译人员，给了他们最高的评价。他在报告词中这样提到：“我还要提到翻译人员，翻译人员不仅是翻译，还可以作政治工作。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了三位翻译来，特别是前两位，一位是齐宗华；一位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一个是法文翻译，一个是英文翻译。另外一位是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叫范承祚。我们要不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我们这些工

作，不经过他们三位，就根本做不成。而他们三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发展，就翻译不好。不仅文字上要好，还得政治强，才能把我们的话翻译出来。而中国的话，又是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个人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陈总一个说法，我们两个人的口音又不同，说话的方式也不一定都同，他都翻译出来，而且意思不走。所以，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是不行的。所以我说，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这些被周恩来称赞和举荐的，政治上和文字上都强的翻译人员，后来都成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其中，那位叫“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的人，后来成为中外闻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接着，周恩来又动情地历数了与自己共过事的五批翻译：“与我共事的翻译有五代：第一代是黄华，第二代是龚澎，第三代是章文晋，第四代是浦寿昌，第五代是冀朝铸。这是讲的英文翻译。他们都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应该培养广大的翻译；现在翻译太少了，跟我们的国家大不相称，七亿人口才这么几个翻译，我想起来就难过……”周恩来所点的这些翻译，都是世界熟知的中国外交家。在共和国总理眼中他们得到如此高的地位，他们倍受鼓舞。首访非洲十个国家以及其他亚欧四国，“前后共经历了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周恩来语），终于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尽管周恩来谦逊地说：“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

“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历史，印证着伟人的预言！

## 原子能事业的主帅

为了中国的“蘑菇云”，刘少奇提议：发展原子能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周恩来担任主帅，“先抓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极为特别的日子。这天下午15时整，中国在其西部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由于这一声巨响，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被中国打破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周恩来率领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科技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们进行了长期的艰辛努力。

……

当新中国在隆隆的炮声中诞生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一个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原子能时代。在这个时代来临之际，除少数科学家以外，一般中国人基本上对原子能无所知，只是对原子弹的威力有所耳闻；而对核战争应持的态度，中共领导人也有明确的认识。

1946年8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原子战争的态度。斯特朗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3年后，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

依靠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对原子弹、核战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的基本看法，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导思想之一。

### 决策之初：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创始于 50 年代初。

1949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代表团，出席将于 4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团长郭沫若，副团长马寅初、刘宁一，秘书长钱俊瑞，中国科协会员丁瓚，世界科协会员钱三强等 40 人。钱三强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苦于缺少必要的仪器和图书资料，他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外汇 20 万美元。中共中央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同意了钱三强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中南海约见钱三强。李维汉对钱三强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订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3 月 27 日，刚刚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才两天的周恩来，又在北京饭店亲切会见了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后来利用这次采购来的仪器、资料和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 20 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很薄弱。原子核科学，几乎是白手起家。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担任所长，专门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研究。1953 年底，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3 年春，周恩来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考察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商谈中苏两国间的科研合作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繁忙中，周恩来听取了中科院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与同来莫斯科的李富春共同与苏方交涉，使得中科院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保密性很强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专门院系。参观中，钱三强向苏方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苏方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极其重视，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磋商了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

1954 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这一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55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找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地质部负责人刘杰，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以及我国的铀矿资源等等。周恩来告知：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

题，你们作好汇报准备，届时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做些操作表演。

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根据周恩来会前的嘱咐，他们向中央领导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大多数中央领导人还是头一次接触到原子核反应原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帮助李四光等人补充情况，并提醒科学家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一问题讲清楚，以利中央作出决策。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人才的培养需要大力加强。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在中共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时候，美、苏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中国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美国继续用原子弹恐吓中国；苏联则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给中国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

对美国的恐吓，国际上有些人很担心。1955年1月28日，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在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过分夸大原子弹的作用，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周恩来当即表示：“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泽东坦然且风趣地回答：“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对苏联许诺帮助，中国政府迅速作出了反应。1955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声明。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中国政府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1月31日，周恩来向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作了《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问题的报告》，首次在国务院系统通报了情况，并作了动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他还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掌握原子能的意义和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最后，周恩来向国务院系统布置了几件需要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他提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又是一次生产革命。”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宏大气魄，鼓舞了干部群众的斗志；也激



励了尖端科技工作者加速利用原子能的信心和决心。

对于苏联的援助，党中央一开始就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我国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1959年7月提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也风趣他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毛泽东也早在头一年就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

### 加强领导：“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四光和吴有训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子能研究所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原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机构组成以后，加紧了规划工作。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景，它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引起的工业革命。他提出我国科学界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3个月内制订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订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原子能利用，就是我国科技事业最急需的门类之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57门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最为突出的地位。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后，我国尖端科技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更加发愤、努力地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62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就这一规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从更高的层次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此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组成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包括核工业建设、核试验工作、核武器研制、核能的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等等）的领导核心。

### 历史性突破：中国升起第一片蘑菇云

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共召开了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另外，还召开了若干次专委会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明确提出了国防尖端科技要“先抓原子弹”。这一战略重点的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明确了主攻方向。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的后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此后，中央专委会和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

在第一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专委会办公

室。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问题。周恩来提出，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长，要做无名英雄。”在这次专委会上，针对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即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他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并调配1100多台仪器设备，同时决定有些技术设备要由外国引进。

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第三次专委会，原则同意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四点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着重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要求：“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963年12月5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会议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在实验科研人员进行的上千次爆轰试验的基础上，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不久，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后，也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此后，核燃料的生产和核武器的研制进展更加顺利。到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技术问题已基本解决。

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会议讨论了燃料保存、点火控制、气象、地形、运输、组织等问题。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4、5月间进行爆炸试验，有不同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工办等单位要积极、充分地做好准备。他还提请大家注意：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要严格保密制度。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被大家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核试验。周恩来对专委们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随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带领二机部的刘西尧等人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后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作了传达，使大家深受教育。这对首次核试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的作用。周恩来在主持对与爆炸试验时间有关的气象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意见向毛泽东报告后，于1964年10月14日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日本东京方面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接着，又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

当晚22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名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个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我国第一片蘑菇云升起，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祝贺和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有力地打击了少数大国垄断核武器的阴谋，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 继续前进：发展核科技与和平利用原子能

在首次核试验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次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再次提出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和态度，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研制核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核战争，而正是为了反对核垄断和核战争，最终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争取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试验则别有用心地到处造谣中伤。对此，周恩来曾说：“中国现在才试了一次，就有人叫起来。真好笑！如果中国没有试验，也没有人来谈禁止核试验，但我们一试验，就有人要中国参加裁军会议，说中国参加了核俱乐部。”他指出，美国提出的美、苏、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是要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手足，束缚民族独立国家的手足，而允许美国试验和扩散。”周恩来还明确他说明：“我们愿意促进国际合作，没有任何理由责备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的安排。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提出：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

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分析论证，认为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飞跃。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经过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协作努力，终于在1965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三次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可以装载导弹头的空投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技术水平也超出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当然，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超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他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其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干扰破坏。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他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做出了重大贡献。

屠守锷，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年9月10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梁守槃，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的。当1984

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懂行的外国人十分惊诧！

“文革”中，林彪曾下令要把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尽力阻止这个毁灭性的破坏。当黄永胜、吴法宪紧跟林彪下令把发射基地迁到陕西西安、渭南、商洛一带，把正在建设的新疆反导弹靶场搬迁到云南时，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原子能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得这一领域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是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1970年2月、7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三次指示原子能工业部门：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根据他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我国的核电站工程被命名为“728工程”。周恩来还提出，建设核电站，要遵循“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病痛主持召开了 he 生前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3月31日的专委会会议上，审批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日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会上，周恩来要求，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等等。

十年动乱结束后，1983年6月，秦山核电站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了前期工程施工，1991年12月15日实现了并网发电。它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第一座核电站，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尖端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同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国又采取中外合资的形式，于1980年开始筹划位于广东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1984年4月动工兴建。1994年2月6日，李鹏总理在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的庆典上说：“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和建设的第一座中型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则是我国引进国外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核电站。这两座核电站的建设都对我国核电事业的起步、培养技术队伍、掌握核电技术，起了重要作用。”

###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

1964年，周恩来导演了“文革”前文艺界的最后一幕辉煌《东方红》。演员感叹：“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

1964年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周恩来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文革”前文艺界的最后一幕辉煌。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史诗融歌、舞、诗于一体，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提起《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

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 策划一部史诗性作品

1964年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他还说，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他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7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又提到搞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大歌舞。他说，现在很需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他还认为，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

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 月 1 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1964 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江青在文艺界到处煽风点火，“棍子”遍扫。1963 年 12 月和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 3000 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因为《东方红》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他还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又如，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对此，周恩来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 30 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 名副其实的总导演

《东方红》上演后，1964 年 10 月 15 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作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啊！”清水和松山泪光闪闪，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具有的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真是十分难得，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他强调，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他还说，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才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

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又如，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毛主席的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去要求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以上只是就作品主题、艺术表现手法、真实性把握等几个问题挂一漏万地叙述了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包括歌词、朗诵词的修改，都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周恩来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八场，周恩来完整地看了五场。每场结束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回顾历史，令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们难以忘怀的不仅仅是周恩来对《东方红》的辛勤指导以及他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还有他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民主的领导作风。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互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 “《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拍好”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上演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当时，在北京连演14场，观众场场爆满。许多外国朋友建议把《东

方红》拍成电影。

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他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6日晚，周恩来陪毛泽东观看了《东方红》演出。毛泽东很满意，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要周恩来把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会上，江青跳了出来，说对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信口开河，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个人私愤。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有些问题，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攻击周恩来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既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之流留下口实。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就在1964年12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周恩来接过江青的发言说，《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

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1965年9月18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完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1965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

## 最后一次访苏

**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肩负不寻常的使命，最后一次前往莫斯科。“发现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吐真言**

就在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天，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这天（1964年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这是震撼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对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周恩来在11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时是这样告诉全体国务委员的：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周恩来所讲的四种态度中，实际上就包含了中共中央的措施。措施之一，便是借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节之机，前往苏联，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新途径。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和贺龙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莫斯科。正如当时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所说：“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了完成一项不寻常的使命而进行的一次不平常的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访苏。”

余湛后来回忆了这次访苏的源起和经过：

**赫鲁晓夫下台为这次访问提供了机会**

赫鲁晓夫隆重庆祝他 70 寿辰后不久，即前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黑海度假胜地过起假期生活。但风云骤变，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事突然派专机将他接回莫斯科，并解除了他的一切党政职务，此事迅即成为国际瞩目事件。

1964 年 10 月 16 日凌晨，为赶在这项消息公布前通知中共中央，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1964 年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 月 16 日塔斯社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同一天，新华社公布了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完全是偶然的巧合。有人却说，我们选在这天进行核爆炸，意在向苏联显示实力。这当然纯属瞎猜。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总理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的政策和他会有什么差别，人们难免猜测纷坛。对赫鲁晓夫下台大体有三种说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新领导也有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据友人说，根据他们几个月前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人的接触，赫鲁晓夫对自己的政策表现“把握不定”，“想寻找出路”。苏斯洛夫等人对现行路线表现坚定不移，可能由于怕赫鲁晓夫动摇而将他撤职。要了解事件真相，惟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 赫鲁晓夫同我关系为何先好后坏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地位尚不稳固，需要我们的支持。那时，他对毛泽东和我们党比较尊重，对中苏关系也较重视。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斯大林来到车站迎送。赫鲁晓夫上台后第二年即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中国革命评价甚高，批评斯大林对我国有大国主义错误，说我们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遇到不同意见，也能友好协商。他按早先决定，撤退了驻旅顺的苏军，交还了旅顺基地；废除了原先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提供了新的贷款，增加了援建项目，扩大了原有援建项目的规模和双方的科技合作，等等。我们本来就十分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赫鲁晓夫以平等友好态度待我，自然更愿与之友好相处。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我党中央虽然对赫鲁晓夫的错误深感痛心和担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也充分估计其积极方面，希望他能纠正错误，加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增强中苏团结，反对共同敌人，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我们对他和苏联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

1957 年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毛泽东、邓小平同苏共领导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同各国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和平宣言。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能以平等协商的方法，取得克服分歧、增强团结的成果，深为满意。他对于双方的原则分歧，则采取内部协商，求得一

致的做法，对暂时不能取得一致的，则注意等待，或做必要的妥协。他十分乐观地把苏联卫星上天和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为标志，用“东风压倒西风”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不幸的是赫鲁晓夫一旦站稳脚跟，立即转过头来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我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7月，提出中苏两国军队直接协商制定专门计划以适应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同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建立共同舰队，使用中国港口。毛泽东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功大于过，但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为了顾全大局，长期隐忍不言。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会改变斯大林以往的错误，然而赫鲁晓夫却接二连三地提出上述“建议”，图谋控制中国。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严厉指出，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要苏联大使尤金把他的话如实报告赫鲁晓夫，不要替他粉饰，赫鲁晓夫听了越不高兴，他越高兴。对毛泽东这样强烈表示的严正立场，赫鲁晓夫表面敷衍，实则已下定决心，我行我素。

赫鲁晓夫还积极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并企图将我国也纳入这条轨道。1958年8月23日，我炮轰金门，旨在惩罚蒋军对我骚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苏联对我甚为不满，担心引起中美冲突，妨碍他们搞苏美合作。于是，立即派葛罗米柯访华，并带来核试验影片，请毛泽东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想吓唬我们。我党为照顾团结，派陈毅同志出席应付。同时在葛罗米柯来华前，周恩来总理就通过苏联驻华代办明确告诉苏方，中美双方都未准备打仗，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拖苏联下水。这样，他们才放下心来，做了支持中国的表态。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撤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不帮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参加中国国庆。10月2日中苏举行高级会谈，赫鲁晓夫替艾森豪威尔说情，要我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中国也可让那个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蒋介石暂时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事后，毛泽东说，他们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不得不反，受美压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理应支持。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就此止步，1962年8月23日，苏联通知我国，美向苏建议签订《防止核扩散协定》，苏已给予肯定的回答。这是苏联背着中国同美达成的协议，合谋束缚我手脚，由他们垄断核武器，合作主宰世界。中国当然不能同意。苏联说，他可结核保护。如果接受他的核保护，只能听其摆布，否则就会在你头上挥舞核武器。1963年7月25日，正当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时，苏联又一次背着我国，同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我国进行核试验，我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坚决表示反对。

赫鲁晓夫对中国胆敢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十分恼火，便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逼我国就范。政治压力无济于事，便转而施加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苏联一党不行，便召开国际会议，对我国进行围攻。一次不行，再开一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正是赫鲁晓夫这种无休止的蛮横行径，把中苏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弄到名存实亡的地步。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理应为改善中苏关系带来转

机。

### 抓住时机决定周总理访苏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10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我立即拟稿报批。毛主席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周总理对我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得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总理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对周总理的谈话和解释都表现很高兴。他们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倡议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苏联也很快给我们和其他兄弟国家发出了邀请。这表明我们的倡议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决定，我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王力等，我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也参加了代表团工作。

中央还决定，在北京扩大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11月5日，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发表了讲话。11月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招待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11月8日，《人民

日报》全文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7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不是逢五逢十的时候，这样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也是破格的。

### 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1964 年 11 月 5 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国高级代表团住过的一座不大的建筑，有个不大的花园。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但见庭园依旧，只是换了主人，不免有些感慨。有人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七言绝句《再游玄都观》：“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将诗中的“刘郎”改作“周郎”，奉赠周总理。回国后和毛主席谈及此事，有人认为称周总理为“周郎”有些不恭。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还是“周郎”好。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无心和大家一起散步，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每晚 10 点左右，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聚集在列宁山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交流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每到深夜 12 时，周总理便请健康欠佳的贺龙副总理先去休息，自己则领导大家继续忙到次日凌晨三四点。7 时许，他便起床，开始又一天的紧张活动。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述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的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我们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有的新朋友则就近同我们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迫使他们只好默默离开。我们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苏联新领导如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怎么能这样不顾礼貌呢？事情的发展，不幸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我们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利诺夫斯基（按：苏联国防部长）。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地，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副总理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决非偶然事件，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



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次日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总理。稍事寒暄后，周总理便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总理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应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总理指出，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8号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车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总理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勃列日涅夫说：“那当然，那当然！”

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号召推翻毛泽东的领导，这不仅对尚未正式开始的中苏会谈设置了极其严重的障碍，也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长期难以治愈的创伤。

周总理早就把我们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11月5日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至11月9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1963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却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能够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

在今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 1964 年 7 月 30 日信中通知召开的 12 月 15 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你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8 月 30 日我党给你们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 25 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 1964 年 2 月 12 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到了 7 月 30 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七个党决定不参加 12 月 15 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 7 月 30 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米高扬企图为自己辩解，说他讲的是思想上的分歧。但他们又强调是集体领导，党的决议和纲领都是集体作出的，没有什么赫鲁晓夫的一套。那么，他们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何区别，又说不出。

周总理这一招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盖子，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

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 11 月 11 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他们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的谈判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周总理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 7 月 30 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 月 12 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为了把球踢到中国一边，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也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总理表示将报告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11 月 13 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 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和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

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11月14日，当周总理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随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并和首都民兵照了像，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这次访苏，周恩来对苏共新领导的感受比预想的差之甚远，正像他在莫斯科期间对越南党政代表团所说的那样：“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矛盾、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些感受和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回国后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党作了介绍，既然苏联如此，我们怎么办？周恩来在会上最后对全党说：“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国内的工作基础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我们在世界上才更有力量。”

这以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忙了……

### 带领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

1965年6月1日是中国民航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中国民航专机在周恩来带领下首次国际远航，成为飞出去的雄鹰

#### “飞出去的雄鹰”

1965年6月1日，在中国民航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天上午，天气晴朗。一架维修一新的伊尔—18型专机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正等待着一位伟人的到来。上午8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以中国领导人特有的风度走进了机场，跟在他身后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柯华等人。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李先念、罗瑞卿、郭沫若等，邓颖超也怀着特殊的感情来到机场。人们清楚，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

这时，几个身着白衬衫、红裙子的少先队员，向即将登机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献上鲜花。欢乐、祥和的气氛，被摄入了镜头中。执行本次专机飞行任务的是原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208号专机机组。此时他们的心情也十分激动。

9点，这架中国民航专机稳健地昂起它的头，升上蓝天，开始了中国民航的首次国际远航。它的目标是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沿途将经过12个国家和地区，在数个国家的机场起降。机组人员在飞机腾空而起的时刻，耳边又响起周恩来总理的话：“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 共和国总理的感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很快开通了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多条国内航线。虽然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封锁的同时，也实行空中封锁。但是，中国仍然早在 50 年代就开通了南到越南河内、缅甸仰光东到朝鲜平壤，北到苏联某些城市的国际航线。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极为不易的。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国家人士仍讥讽中国民航是“没有翅膀的雄鹰”，不能飞远程国际航线。这些话重重地打在中国民航广大干部职工的心里。的确，建国以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国领导人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等人多次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国访问。最令他们痛心的是，1955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被台湾的特务放入了定时炸弹，起飞后不久便在南海上空爆炸，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幸好周总理临时去缅甸出席小型首脑会议，没有乘坐这架包机。但这一教训，深深地刻在中国民航工作人员的脑海中。

在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封锁的努力中，中共中央决定，要尽快培养我国自己的飞行队伍，发展中国民航，飞出国门。

进入 60 年代后，随着非洲国家的相继独立，并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新中国也进入了第二个建交高潮期。可民航的落后状况，制约着外交局面的打开。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前后 70 天，行程十万八千里，他们戏称：“正好是孙悟空一个筋斗！”然而，这个“筋斗”却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波罗的海”号飞机去“翻”的。尽管周总理与这些外国机组人员进行了最好的合作，可那毕竟是别国的飞机。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同感：老坐着别国的飞机出访，心里不是个滋味。

这次出访回国后，周恩来感叹地问中国民航总局的负责人：“什么时候我坐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他鼓励他们说：“要有雄心壮志，和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人员来往也增多，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多开辟国际航线。政治上要动员，提高大家的认识，人员要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要掌握国际通航知识。”他还提出了改革民航体制的要求。这些话，中国民航的同志们牢记在心中，他们下定决心，加紧了“飞出去”的准备工作。

1964 年底至 1965 年初，在中国民航机组人员为首次国际远航进行大量的、充分的、细致的准备的同时，周恩来总理多次乘专机离京，远距离来往于国内、国际航线：11 月 4 日，飞往上海，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11 月 5 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3 月 1 日，率中共代表团飞往河内，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3 月 7 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飞往杭州、上海等地访问；3 月 22 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又飞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等国访问；4 月 16 日，又和陈毅飞往雅加达，出席纪念万隆会议 10 周年庆典，后又飞往缅甸访问。……直到中国民航首次远航的前几天，还专程飞往广州欢迎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

**跨越天险，冲出国门**

从位于亚洲东部的北京出发，到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几乎跨越了从东到西的整个中国。巴基斯坦北部为喜马拉雅高山带，与中国新疆相邻。飞往巴基斯坦，必须通过被誉为飞行天险的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这一带平均海拔 4000 至 6000 米，气候严寒，山峰终年积雪，冰川广布。如此险要的地势和恶劣的气候，对中国民航专机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按事先安排，当天（6 月 1 日）下午，专机飞抵新疆和田机场。在这里，飞机需要保养；出访代表团需要休息；而周恩来本人，却有安排不完的工作。

到达和田以后，周恩来出席了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他风趣地对辛勤工作在祖国西北边疆的干部们说：“我今天过路从和田到国外去，新疆第一次来。既来了就要‘上税’，同大家见面，讲几句话……”他称赞“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还要求新疆的干部、群众进一步做巩固的工作，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

再往西，就要飞出国了，代表团成员和机组的同志们在和田安安稳稳地枕着国土睡了一觉。

6 月 2 日一大早，天公好像知道中国总理要从帕米尔高原经过似的，特意放晴。专机迎着朝阳飞向蓝天，飞向南亚。当飞机升到最高点时，俯首望去，脚下就是天险喀喇昆仑山，皑皑白雪，千仞冰峰，万里碧空。正在这时，从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发来清晰的导航信号。周恩来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山口导航站的官兵们发来的。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立即嘱咐机长张瑞霖，给导航站的全体指战员发一封嘉勉电：“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

国家总理发来的这封 27 个字的电报，对长年驻守在祖国最西端、海拔最高处的导航站的 18 位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鼓励。今天，随着飞机设备的先进，自身导航技术的高度发展，再也无须像红其拉甫这样的地面导航站导航。但是，对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来说，红其拉甫导航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专机顺利地跨越喀喇昆仑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冲出了国门。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减轻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起了个头，领着全机人员引吭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时间，穹宇中回荡着中国代表团和机组人员的歌声。再往西南飞，不久便可抵达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

上午 8 时，专机准时飞抵拉瓦尔品第机场。机组人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南亚第一站的飞行任务。当周恩来走出机舱时，数以万计的拉瓦尔品第市民在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率领下，在机场迎接中国贵宾。随同阿尤布·汗总统前来欢迎的还有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西巴基斯坦省督、东巴基斯坦省督、外交部长、中央内阁各部部长和省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国民议会议员和当地的知名人士。这样的欢迎阵式，对经常出访的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年轻的中国民航专机机组来说，却是第一次在停机坪上，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几个字，显得格外的耀眼，一种荣誉感，在机组人员心中油然而生。

在机场，周恩来发表了书面谈话，感谢阿尤布·汗总统、巴基斯坦政府及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显著的发展，

我们两国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的确，中巴友谊日益加深。仅周恩来与阿尤布·汗两人的会面，在上半年这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阿尤布·汗总统3月份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专程陪他游览长城，访问杭州、上海等地。第二次是4月2日周恩来访问卡拉奇，托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给霸道的美国政府转告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四）如果美国狂人滥施轰炸，中国决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从天上来，我们就要从地上行动，轰炸就是战争，战争就不可能有界限。

6月3日上午，周恩来等人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首都建设局局长法鲁基的陪同下，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这里距拉瓦尔品第11公里，196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曾来参观过，那次也是布托外长陪同。周恩来在乘车观光中发现，这座新首都的建设，比上次来时已有较大的进展。他兴致勃勃地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象征中巴友谊的树，还在一个留言簿上写道：“中巴友谊万岁。”一旁的布托外长很受感动，因为这种友谊既建立在两国人民之间，也建立在两国领导人的心中。

当日下午，周恩来在布托外长陪同下，再次登上中国民航专机，飞往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卡拉奇。中国客人将从这里出境，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中国民航的专机是在拉瓦尔品第机场上乐队奏响的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的。机上的服务员注意到，周总理在飞机飞离机场跑道后，还从机舱的窗口向下招手致意，但机场上数千名群众和阿尤布·汗总统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了。机上的人感佩周恩来总理谦逊的作风和周到的礼仪。

专机服务员准时为周总理端上茶水，可周恩来却把手一摆，微笑着示意服务员先给机上的女同志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上茶。机组人员早就听年长的服务员讲过，在周总理专机上服务，遵循的是先宾后主、先女后男的原则，总理从来没有领导人和大男子主义的架子，更没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架子。每次只要有外宾同机，周恩来都是让服务员先照顾外宾。他还经常把机组服务员介绍给同机的外国领导人，让大家感受到平等、和睦。只要有空隙，他便与服务员们拉家常。对机上人员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他都很了解。

不久，专机安全地在卡拉奇机场着陆。卡拉奇南濒阿拉伯海，1947年至1959年十几年间，曾为巴基斯坦首都，它不仅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而且是最大的港口城市。同时，卡拉奇机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航空港之一，在这样的机场起降，无论是飞行规程还是技术要求，都能反映出一个国家飞行水平的高低。中国民航专机人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必胜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把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安全降落在跑道上。陪同前来的布托外长露出赞赏的笑容。在卡拉奇机场，周恩来只作了短暂停留。他把布托外长送下飞机，感谢他专程陪同前来，在机场上，周恩来还与前来迎接的卡拉奇区专员以及军、政、议会等各界知名人士见了面，接受他们所献的花环。

由卡拉奇去坦桑尼亚，应沿西南方向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但考虑到伊尔—18型飞机必须在中途加油以及航线等原因，专机先向西北方向飞去。晚7点多钟，天色黄昏，专机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巴格达机场打开了灯光，专机也打开灯光准备降落。在机场上等待的，有伊拉克总理塔赫尔·叶海亚和外交部长纳吉·塔列布等人。就在飞机对准跑道放下起落架时，巴格达机场不知何故突然灯光熄灭，顿时一片昏暗，地面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

领队机长张瑞霭和另外两位机长刘崇福、徐柏龄感到事情紧急，有些紧张。张瑞霭马上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是降下去，还是拉起来？降下去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拉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周恩来镇静地安慰张瑞霭等人：“我相信你们有处置能力，会找到办法的。”机组进行了瞬间商量后，果断地决定降落。好在专机事先试航到过这里，机长们对该机场的地标记得比较清楚。在张瑞霭的指挥下，机长刘崇福和徐柏龄高度注视着昏暗中的机场跑道，抓住地标，靠平时的经验和过硬的技术，将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当五星红旗随着专机的安全降落在伊拉克总理叶海亚等人眼前时，伊方人员对中国民航的精彩着陆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飞机停稳时，周恩来抬腕一看手表，正好晚上7点40分。他走下专机，与叶海亚总理等伊拉克官员热情地握手。专机马上开始加油，等待再次起飞。周恩来则坐上了叶海亚的专车，前往总统府拜会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阿里夫。

在车上，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与叶海亚等人谈起了他们脚下这块土地，这块曾经也是世界文化摇篮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起孕育了这里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周恩来告诉叶海亚：“我在小时候念世界历史时，就念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见到阿里夫总统后，他除了谈一些国际问题外，又提起了对两河流域的文化的深刻印象：“我从小就在教科书上读到过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小学和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就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读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不仅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古老、灿烂的文化，而且深深地记住了在遥远的西亚还有一个古老的两河流域文化，东北部非洲还有一个古老的尼罗河流域文化。半个世纪后，周恩来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他向伊拉克领导人表示：“我很荣幸，第一次来到西亚古老文化的首都。”

从巴格达向西，专机飞往尼罗河流域的阿联（今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机场，周恩来受到了阿联总理阿里·萨布里的迎送。从开罗一直往南，便是茫茫的非洲沙漠，气候更是复杂多变。专机在沙漠上空飞行，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稍不留神就容易出危险，更何况是夜间飞行。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对机组人员说：“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怕。我很信任你们，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总理沉着冷静、泰然自若的态度，给机组人员无穷的力量，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沿途，专机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作短暂停留，受到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专机每飞经一个国家的上空，周恩来都要致电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并向这些国家的人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对专机作过停留的国家，周恩来还致电该国领导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些国家，虽然周恩来这次没有正式的访问，但是，通过专机的过境，仍把中国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连接起来。

**友好的坦桑尼亚人说：“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

专机经过一昼夜的飞行，6月4日，终于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在斯瓦希里语中，“达累斯萨拉姆”意为“平安之港”。它是坦桑尼亚



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当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等人赶走旅途的疲倦，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第一副总统卡鲁姆，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以及外长坎博纳等人，早已等候在机场上，宾主双方热烈拥抱，好像久别的亲朋。早在1963年底、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出访非洲时，就曾打算找机会到东非国家访问，但未能如愿。这次，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东非国家，许多感受都是新鲜的。

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来访，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机场上披上了节日的盛装，雷鸣般的欢呼声、鼓声和掌声响彻云霄。尼雷尔除了带来他的各部部长们、元老们及其夫人以外，还安排了许多民间舞蹈家、歌唱家、演奏家，在机场上尽情地歌舞、欢乐。他以国家元首的礼仪，给周恩来鸣礼炮21响。

周恩来在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早就存在着深厚的、战斗的友谊。我们两国相继取得独立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他称赞：“英勇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创造过光辉的业绩。勤劳的坦桑尼亚人民，在赢得独立以后，又在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讲完话，周恩来在尼雷尔总统的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沿着长达十英里的大道驶向“国家大厦”。在通往市内的道路上，到处悬挂着两国国旗和横幅，横幅上用斯瓦希利文和中文亲切地写着：“欢迎我们尊敬的兄弟周恩来，这里是你的家”，“你来坦桑尼亚访问将加强我们的友谊”，“中国和坦桑尼亚人民互相帮助”等等。热情友好的坦桑尼亚人民在宽阔的马路上做了一些彩牌楼，把周恩来的画像挂到了牌楼的顶上以及商店、住宅楼的墙上和树干上。达累斯萨拉姆城的十多万居民倾城出来欢迎。更感人的是，有许多人是前一天从远地的城镇和乡村乘火车、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特地赶来欢迎中国贵宾的。有些人还专门跑到机场去观看中国民航208号专机。中国人的友情和周恩来的魅力，已深深地打动了坦桑尼亚人民。

到了晚上，虽然专机安静地停在机场上，可是坦桑尼亚首都却是一派热闹的节日气氛。各主要街道上的许多建筑 and 牌楼都用五彩电灯装饰起来。周恩来将在这里访问五天，机组人员可以比较从容地欣赏非洲的夜景。

尼雷尔总统为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国宴，专机机组人员也应邀出席。进入宴会厅的大门，只见贵宾席上方悬挂着周恩来总理的巨幅画像，到处都体现出坦桑尼亚人民对中国客人的尊重。“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宴会就在这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中国名曲中开始，中国民航专机组的成员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我们走在大路上，道路是宽广的；我们飞在蓝天上，天空是广阔的。机组人员还记得，当他们没有飞出国门时，国际上就有人嘲笑中国民航“飞不出去”。当他们勇敢地飞出来时，有人预言“飞不出来也飞不回去”。周恩来说的一句话，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让他们笑话去吧，我们一定要飞出去，并且还要顺利地飞回来。”《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正好表达了专机机组人员翱翔蓝天的自信、自豪的精神。

从6月4日至7日，周恩来与尼雷尔总统共举行了五次正式会谈。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的交通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两国的空中航线，已经建立起来了，尼雷尔由达累斯萨拉姆乘专机去过北京；这次周恩来首次率中国民航专机远航，选择了东非的坦桑尼亚。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往来，以增进双方的了解，他表示：“我希望

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坦桑尼亚部长都能去访问。”他还风趣他说，“中国有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空中航行解决了，周恩来又关心起海上航行问题，他希望中国和坦桑尼亚海运公司很快建立起来，并充满信心他说：“大海航行必须先试行。我们都是独立国家，有权在公海上航行，我们的国旗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尼雷尔钦佩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眼光，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又谈起了铁路问题，周恩来再次表明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心和实施方案。他说：“我们将在8、9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做初步勘察，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察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等情况，因为采矿需要很大水量。同时，修铁路如不照顾到水文，即使修成了为了储水也要改造。”中国的援助是无私的，中国领导人早就明确过：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会你们技术。这些承诺，尼雷尔甚为感动。

坦桑尼亚共和国，是1964年4月由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组成的。组建一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客人在这里，到处都有“家”的感觉。6月6日，周恩来一行乘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起飞，越过桑给巴尔海峡，到桑给巴尔访问。飞机停稳后，坦桑尼亚第一副总统卡鲁姆早已迎候在专机旁。周恩来在美丽的桑给巴尔岛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下午，又乘专机返回达累斯萨拉姆。6月7日，尼雷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恩来访问了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在这里，热情好客的非洲联盟元老特地为周恩来挑选了一件红、蓝花相间，配有和平鸽图案的民族服装，在尼雷尔总统的协助下，穿在周恩来身上。这件服装，左边披在肩上，右边让手臂露出，下边一直到膝盖以下，色彩艳丽，与周恩来庄重的中山装相配，正好相得益彰。周围的人兴奋地拍手叫好，笑得合不拢嘴。从非洲民族联盟总部出来，周恩来一行又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等地参观，他与学校师生们一起挽起袖子，参加劳动，愉快交谈，主人和客人、黑皮肤和黄皮肤，融为了一体。

6月8日上午，周恩来和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国家大厦签署了中坦联合公报以后，圆满地结束了对这一东非友好国家的访问。他对尼雷尔说：“我每次访问友好国家，深厚的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感到我们的担子加重了。但我决不后悔，而是高兴地带回了这些担子。今后我们要负担更重的国际义务，这是不容推卸的。负担加重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和推动。”周恩来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尼雷尔。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客人将要登机回国时，尼雷尔又一次率第一、第二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更令人感动的是，尼雷尔把他的老母亲和夫人也带到机场来欢送中国客人，直到专机飞远了，他们才离开机场回家。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

208号专机沿正北方向又一次开始了远距离飞行。按原计划，专机回程时将在坦桑尼亚的北部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机场加油。肯尼亚共和国自1963年12月12日宣布独立后，第三天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原以为专机在内罗毕机场降落、加油不成问题，设想到在坦桑尼亚期间多次与肯尼亚有关方面交涉此事，却遭拒绝。周恩来只好决定改在更北一点的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加油。虽然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的压力

尚未与中国建交，但 1964 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时，埃方曾邀请他访问过，中埃两国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了解。

6 月 8 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专机飞抵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这是中国民航专机首次降落埃塞俄比亚首都。上次周恩来访埃时，是乘坐租来的荷兰航空公司的专机进入埃领空的，且只在埃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降落和起飞。虽然这次来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与上次相比有着不同的意义和特殊的感情，但专机只能作短暂停留，回国的路还很遥远。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中国客人受到埃塞俄比亚外交国务大臣伊弗鲁的迎送。专机在加油的时候，周恩来与伊弗鲁在机场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一方面感谢埃方给予方便，另一方面共叙旧情。

专机加满油，继续北飞，很快进入苏丹领空。正飞着，飞机突然强烈颠簸起来，机舱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情既紧张又沉重，不约而同地向周恩来望去，为总理的安全担忧。

只见周恩来泰然自若，微笑着对大家说，“没关系，这类事情我遇得多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系好安全带。”机组的人镇静下来，判断这是赤道负荷线上的气流急剧变化所致。幸而专机飞行员们有这样的飞行知识和娴熟的驾驶技术，终于闯过了强气流，脱离了险境。人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更加钦佩周恩来的胆识。

周恩来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坐飞机最多的一位，屡次遇险，但他都以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智慧、充分的信心鼓励同机的人员一道克服困难，化险为夷。

他曾跟机长张瑞霭半开玩笑他说：抗战期间，我经常坐老式的美国飞机奔走于重庆、西安、延安之间，有时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呢。张瑞霭也曾与周恩来开玩笑说：“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周恩来笑着回答：“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可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多为人民办事，周恩来已把危险置之度外。

专机战胜险情后，于当晚 10 点飞抵开罗机场，又一次来到尼罗河畔作短暂的停留。周恩来在候机室同前来迎送的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顾不得欣赏尼罗河畔的夜景，不久专机又出发了。几个小时后，专机于凌晨飞抵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这里将作 3 个小时停留。1 点 14 分，周恩来前往总统府拜会叙利亚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哈菲兹感到很高兴，虽然中国总理是过境性停留，但周恩来很尊重他，待人热情、友好、平等，富有感染力。

在回国途中，专机再一次降落卡拉奇机场。这是专机此次远行的是最后一站，也是在国外机场的第 12 次降落。到此为止，专机从达累斯萨拉姆回程飞行已连续了二十几个小时。在卡拉奇，周总理看望了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并接见了前来拜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阿齐兹·艾哈迈德等人。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又登上了 208 号专机。

从卡拉奇机场北飞，下一站就是祖国的领土了。随行人员轮番去劝周恩来在回国前还是先睡一会儿。在大家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同意了。飞行员特意把下滑率调得最小，设法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可是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周恩来又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飞机就要进入祖国领空，他睡不着。当天下午，专机终于飞抵祖国西北某地 14 号机场。在返回北京前，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在这里休整了一个晚上，这一觉，可以说是出国以来睡得最美的一觉。

6 月 10 日早晨，208 号专机载着周恩来、章汉夫、罗青长、柯华等人，

划破西北某地上空的宁静，飞向北京。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把整个机舱映得辉煌灿烂，下面的雪山也在万丈光芒下展示出壮丽的景色。周恩来激动地提议合唱《东方红》，大家簇拥在他身边纵情放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云霄里，九天外，回荡着这愉快的歌声，溢满了成功的喜悦。

中午，中国民航 208 号专机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周恩来总理远航出访的光荣任务，飞临北京机场上空。从机舱里往下看，已经可以看到北京那熟悉的景物了，还有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等候在机场上。这次航程 44361 公里、时间 80 多小时的远程飞行即将结束，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由于这次成功，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结束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租用外国专机的历史。周恩来对处在兴奋状态中的专机机组人员说：“你们这次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不仅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他还交待：“回去以后要与那些没有参加这次飞行的同志们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这些赞誉、鼓励、感谢、体谅、关心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民航的机组人员。他们暗下决心，尽快作好准备，8 天以后再次送周恩来、陈毅等人去开罗，让中国的雄鹰，从此翱翔在世界的每一片蓝天上。

## 动乱岁月 砥柱中流 二十、把住经济生死关

### 艰难之中抓生产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史，像有一条强硬的曲线在桎梏着。

1966年，国民经济刚从三年“大跃进”的危机中挣脱出来，好日子没过几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跌入灾难的深渊。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通过天下大乱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置人民要吃饭、生产要发展这一基本常识不顾，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共和国的每次经济劫难，最苦最累的都是周恩来。这一次却更是空前绝后。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坚持不懈地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作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吁一口气了。到1965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

先后到了 5 个县、6 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 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 月 4 日至 26 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 周恩来试图将“文化大革命” 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

1966 年 9 月 4 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省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 21 个公社已有 11 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8 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连运动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

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2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连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黑龙江省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丰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连，红卫兵不要

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8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说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下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



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 工交座谈会前后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他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他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

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涛、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

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准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准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

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注：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

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倘若是“反对”，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还对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们鼓励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他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种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 挽救交通大动脉

大串连、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断然决策，双管齐下，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 “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妒嫉、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年3月18日，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中。报告反映：局内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200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有

人强调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该拧闸的不拧闸，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那种毫无任何真正价值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自己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产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是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100亿斤，1965年达120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1966年8月份全国红卫兵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212.4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又找到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

1966年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万至170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当即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铁道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稍顿，周恩来又深为焦虑他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周恩来的这种忧虑不久就被证明并非多余。

11月10日，上海的造反派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操纵下，到北京向毛主席“告状”为名，置上海市委的命令不顾，到上海北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大动脉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凌晨3时，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毫无睡意，亲自拨通了上海陈丕显的电话：“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首先要整顿铁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

乱，南北铁路交通绝不能中断。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电话那边的陈丕显深受鼓舞。

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此时此刻，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上海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惊变，铁路交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也随之而来。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些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关押，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职工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各铁路枢纽站段，武斗、派性迭起。全国许多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亲自打电话到哪里去追问，并频频找造反派组织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月2日，上海、蚌埠发生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他严肃地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会上，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不政治挂帅？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希望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交通畅通。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运输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连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1月27日晚11点至次日凌晨7点，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严厉批评了他们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并责令说：“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2月1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谈话时，对

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武斗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权，夺‘私’字权。”……

### 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

然而，在铁路交通全面内乱的局面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犹如杯水车薪。

“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比，并从根本上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周恩来决心已定，便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局的报告及自己的意见报送毛泽东。

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19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

3月22日，中南海会议室。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也到会。周恩来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到会代表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1月底，我就提出民航局归军队管，现在是3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同志负责。”会上，有代表问周恩来：“有人说，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李富春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带他们来吗？”

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定的这个军管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他说，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干扰，对铁路、交通、邮电实行军管一拖再拖。

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

5月31日中午，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桌上。报告反映：因各地两派纠纷和武斗，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4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

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心头。

“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惊扰毛泽东的午休，带上铁道部的报告，急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报告，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非常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约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到国务院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 18 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又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了一封信，通报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具体细则。江青一伙虽然对周恩来的先斩后报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随后，对铁路、轮船、交通的军管立即付诸实施。

### 更为严厉的措施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然而，由于整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967 年 7、8、9 三个月间，“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进行各种努力。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七·二一”事件发生，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并借机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此，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8 月 10 日，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

1967 年 10 月 29 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代表，说：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量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如再上不去，对明年的发展会有影响。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要与业务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管你过去是不是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无论如何不许可。要从大局着想，顾全大局。目前铁路运输应首先要抓货运。

11 月，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站郑州因铁路系统两派武斗，致使郑州火车站交通中断，滞留车皮 3000 多节后，当即指示派飞机把郑州两派接到北京谈话，责令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说：郑州停车 3000 多辆，我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跑去。我的时间不够，抽不出身来，恨不能一天 24 小时变成 48 小时。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运输情况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一个造反派不识时务地提出：总理，我们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周恩来愤然指出：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



1967年底，全国18个铁路局和52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终于就实现大联合、保证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这些协议，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1968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年2月2日，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造反派”武装抢劫，乘警枪支被抢。此外，津浦线几处路段被毁，数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通讯调度中断，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了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将《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给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像另纸（注：指《情况反映》）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内部命令，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补充命令》指出：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2月6日命令办理。

在那无政府主义猖獗的喧嚣中，一些“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越来越猖狂。5、6、7三个月，在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物资专列被抢，大批枪支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经毛泽东批准，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月3日、7月24日，中央连续颁布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造反派”进行坚决打击。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一起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北京高校5个造反派头头。毛泽东向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迅速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全面贯彻和执行。

“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

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到 1969 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中，为了维护铁路交通，周恩来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艰苦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 托起中华民族航空梦

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大滑坡，空军战斗机连连出现机毁人亡的恶性事故，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航空梦危在旦夕。周恩来拍案而起，怒斥极左行径，一连写下几个措辞严厉的批示，托起中华民族的航空梦

## 奠基者的震怒

“文化大革命”，一幕中华民族流血、啼泣的悲剧。

1969 年，这幕悲剧已演到第四个年头。

4 月 12 日早晨，周恩来刚起床，秘书便送上一份国防工办的报告。

这是一份反映我国当前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被“砸烂”，军事工业生产部门的许多规章制度被取消，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成都、西安、南昌、沈阳等地的一些飞机零部件生产部门普遍存在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发动机等一些主要零部件质量不合格，一些生产出来的飞机不能上天。报告还特别点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连必要的产品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为此，空军指战员怨声载道，飞行员都不敢进座舱。

看罢报告，周恩来清瘦而布满倦容的脸上交织着忧虑和愤怒，心中泛起刀扎似的阵痛。

作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奠基者，周恩来想起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航空梦，想起了共和国建立以来为实现这个梦而付出的全部心血。

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风筝。西汉的张衡在一只装有两只翅膀的大木鸟的肚子中装上了能控制翅膀上下扇动的机械传动装置，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滑翔机。这些航空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对后来的飞机制造有着重要的启示。

然而，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制造者的桂冠并没有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是落在了美国人莱特兄弟的身上。那是 1903 年的事。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庄严的共和国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上空的飞机连运输机在内只有 17 架，而且还都是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残破飞机中拼凑，修补起来的。

1950 年 6 月，美国侵略者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凭借着它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派出了大批飞机肆无忌惮地入侵我国东北领空。为保卫新生共和国的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但却为没有空军的掩护而费尽了周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需要空军，需要能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否则，“钢铁长城”留着一个“缺口”，何以巩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

沉睡了二千年的中华民族的航空梦，在共和国开创者们的牵引下，从此开始了迈向现实的进程。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沈鸿、段子俊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时，周恩来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我们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们建设航空工业。

一锤定音。周恩来的这一结论，就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指导方针。

1951年1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代表团启程赴苏，就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问题进行谈判，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亲自筹划组建领导航空工业的航空工业局。1月2日，何长工一行赴苏联谈判的第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现在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该局现只有段子俊一人为局长，拟以大连建新公司的全部机构（工厂除外）来组建航空工业局。如同意，清通知陈一民来京接洽（陈系建新公司负责人）。”随后，建新公司大批干部开赴沈阳，开始筹建航空工业局。4月29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正式成立。

8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驻华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飞机修理逐渐转向飞机制造的计划和五个飞机制造厂生产规模的宏大方案送报中央。8月20日，周恩来认真地审阅了这一报告，并批示：拟予同意。并请富春同志会同何长工与苏联专家据此计划，将全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划后提送财委审核。8月21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照办。

1951年12月21日，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听取关于建立五个飞机制造厂以及这五个飞机厂要在三至五年内仿制成功苏联雅克-18活塞式教练机和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方案落实情况的汇报。到会的除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外，周恩来还特意找来了掌管钱财物资的李富春、谷牧，就在这个会上，周恩来作出了拿出60亿斤小米造飞机的决断。他在听完汇报后果断他说：“就按照你们提出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后，就可以生产×××架飞机了。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

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穷国来说，拿出60亿斤小米来造飞机，这是颇需要些胆略和眼光的。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60亿斤小米的方案。

由于方针对头，措施得力，再加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重点保证，经过10年奋斗，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到6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教练机、喷气式歼击机和运输机相继试制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交付使用。同时，开始了自己设计飞机的

尝试。

谁料，正当我国航空事业开始腾飞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更使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是，一向纪律严明的军事工业生产也乱成这个样子，产品质量竟下降到这等地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强调要把军工生产部门列为“要害单位”加以保护，要求“革命群众”不要上这些部门去“串连”。

更让周恩来忧虑的是，时下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苏联在我国东北边境陈兵百万，还在我黑龙江边境挑起事端，制造珍宝岛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在南国边境，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有扩大化趋势，中、印关系也趋紧张。一旦起战事，我国的空军怎能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歼灭来犯之敌的使命？

思前想后，心潮难平的周恩来怒火烧心：“军事工厂搞成这样，荒唐！”他在报告的空白处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随后，按响了办公桌上的电铃，叫秘书立即分头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火速到国务院开会。

### 会议桌上的较量

两个小时后，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王秉璋以及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七机部等部门的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陆续来到国务院会议室。

会上，周恩来首先询问了航空工业部410厂轴承质量事故的情况，并严厉批评军管会负责人：“轴承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你们都是从空军来的，怎么能这样对同志的生命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410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

在周恩来的严厉追问下，这位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此人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自恃有林彪、吴法宪作后盾，诡辩搪塞。他说：“工厂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时，把检验制度取消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已经发现了。”

周恩来：“发现了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一个军工厂哪能搞成这样！”

军管会主任：“目前有的工厂在逐步恢复。”

周恩来严厉指斥：“什么逐步恢复，怎么能这样说？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规章制度，只是改革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对的，就要马上恢复。”“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是‘五·一六’观点。要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

在周恩来的盛怒威慑下，这位军管会主任只好答应回去立即下令恢复飞机厂的检验制度。

周恩来又对王秉璋说：“回去跟吴法宪（空军司令员）说一下，你们空军那么多副司令，要抽出一个来抓三机部，抓飞机，不抓不行，下面的厂检验制度都取消了，你们都不敢管，这是不負責任。不要怕人反对嘛！不要怕

群众，不要怕负责任，怕群众是错误的，不负责任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420厂发生的保险锁键质量事故，西安庆安公司的油泵质量事故，132厂、430厂发生的歼教五质量事故。航空工业部那位军管会主任结结巴巴地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余怒未息：“这些质量问题，要发动群众，迅速解决。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合理的也要改掉？对取消检验制度，老工人是不会同意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20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因为反对刘少奇就把一切否定，要一分为二。不然，20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讲不通嘛！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辩证地看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抓那些叛徒特务，但往往容易扩大化。”

鉴于发动机轴承对飞机的至关重要性，而我国生产厂家又少，质量又不过关，周恩来当即指出：搞航空用的轴承厂要发展。上海为什么不能搞大的轴承厂？立即告诉上海的王洪文，要他们今年上半年就搞起来。要把轴承搞上去。现在生产的飞机不能用怎么行？周恩来又对余秋里说：“冶金部要直接搞轴承，不要通过一机部，要敢于打破旧框框。”余秋里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询问了援外飞机和发动机是否有轴承事故隐患，并告诫说：“如果援外飞机、发动机出了事故，我们国家的荣誉还要不要？援越的飞机处在前线，不能出乱子，不能把有质量事故的飞机、发动机弄出去，有问题的要赶快撤回来。”

最后，周恩来要求：“以三机部做个麻雀，解剖一下，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实行双重领导，又归空军领导，又与生产部门联系。既有生产部门，又有使用部门，又有科研部门。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

## 托起中华民族的航空梦

然而，“文化大革命”给航空工业种下的恶果积重难返。1971年底，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危机再次全面爆发。

此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已覆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1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6”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份报告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思绪又急速闪回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上。

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突然电告我国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6”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请我国速派有关技术人员帮助查找事故原因。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检查鉴定，事故原因是因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难道这次报告中所说的飞行事故也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吗？周恩来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6”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这两批飞机中，会不会又隐藏着质量隐患？如果再出现援外飞机事故，中国的国际信誉将跌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一向以严格著称的军工企业竟落到这样一种状况，全国民用工业产品质量可想而知……

想到这些，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提笔疾书，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两批分送援朝××架、巴基斯坦××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如下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等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质量检查。

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不祥预感。12月15日，一份写给空军五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40架“歼6”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7架有质量故障：1架起落架不合格，4架缓冲器漏油，1架防火开关有毛病，1架瞄准器计算器不工作。

周恩来拿着报告的手有点颤抖，呼吸变得急促。旋即，他提笔在报告的空白处迅速写下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指示：

“歼6”战斗机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

周恩来的批示在军委及空军高层领导手中快速传阅。紧接着，中央军委一道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6”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12月26日，军委三座门。中央军委会议室。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八天下午。虽然此时林彪已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舞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空气仍然相当凝重而沉闷。由于各自顾虑重重，空军和飞机制造部门在事故责任和原因上互相扯皮，尽管会期一再延长，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突然，凝听会议发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纷纷离开座位，匆匆走出会议室，这一举动使刚刚还很嘈杂的会场一下子沉寂得有点紧张而神秘。不一会，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顿时，雨点般的掌声夹杂着低沉而短促的“周总理”的惊喜声在会场骤然响起。

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最近连续几次对飞机质量问题的严厉批示的缘故，周恩来的到来，使会场在兴奋之余显得有点紧张，周恩来似乎感觉到了，他说：“大家不要紧张嘛，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会议继续进行。周恩来静静地听完汇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一再自责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直身子，哽咽着说：“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周恩来打量了一会眼前这位小个子军人，问道：“你是沈空副司令员？”

“不，他原是空军某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后调到沈阳发动机厂工作的。”叶剑英赶忙作了介绍。

周恩来对吴暇说：“不要紧张，坐下来，谈谈你的看法。”

面对谦和的总理，吴暇打消了顾虑，一股脑儿地倾诉自己的看法：“连印度都能造飞机，但他们不能造发动机。当前应当下大力气抓发动机，因为我国还没有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航空工业落后，表面上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也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被吴暇的发言所吸引，他接着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政治工作的。”

“你学得很好嘛，我要向你学习。”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他指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能行呢？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而是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1963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脱离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他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周恩来的这种民主作风，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与会人员交头接耳，纷纷倒出心中压抑已久的对极左一套的不满……

听着这些怨声，周恩来充满了同情与理解，不要说是下面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周恩来自己，不也被江青一伙指责为“只讲生产，不要革命”吗？然而，气绝不能馁，斗争也绝不能停止。否则，怎样向党、向人民交待？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个解决质量问题和改变航空工业落后面貌措施的文件。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国务院、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备件不足的局面。1972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产品质量整顿。

周恩来批极左、抓质量的言行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自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和阻挠。很快，他们便组织反击，把周恩来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回潮”、“右倾回潮抬头”。江青借机在《人民日报》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整顿军队、整顿国防工业。3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对成都飞机厂、航空发动机厂和航空仪表厂等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严厉批评。4月，叶剑英受周恩来之托，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会上，邓小平责令有些还是“坏人在专政”的航空工业部门“要限期解决”，从此，中国的航空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军事力量已成为一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航空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位创业者所回顾的：如果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中华民族二千年的航空梦以新生，那么，“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为挽救航空工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则是给了航空工业以第二次生命。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航空梦才变成了今天沉甸甸的现实。

## 动乱中抓核工业

动乱中的核工业频频告急。周恩来一连签发了 11 封特急电，在动乱中把核工业推向前进

## 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问二机部部长刘杰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像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氟化锂-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恩来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



倾向。他早在 1956 年 1 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还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 16 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都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二机部、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恩来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 1966 年 10 月 27 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 年 12 月 10 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同志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他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刘杰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周恩来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 1966 年 12 月 28 日 12 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恩来，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刘杰同志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大家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刘杰他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他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 1 次 300 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 1958 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 10 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 1968 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

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 抓紧“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恩来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恩来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做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恩来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恩来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恩来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专委会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恩来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恩来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选、梁守、肖、崔国良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重新做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6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恩来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有关负责人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会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

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十四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三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六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一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关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66年9月，周恩来还满怀信心地对刘柏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恩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十四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1966、1967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恩来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恩来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细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1967年9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 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十年动乱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刘杰同志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恩来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三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作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周恩来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专委会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1974年8月，周恩来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 二十一、大树参天护英华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江青向毛泽东状告“三老四帅”，周恩来迂回前进保过关。“造反派”围冲中南海，周恩来挺身护英华：“你们要冲中南海，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中南海成了“走资派”的避难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巧妙的斗争。他以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相当一批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以说，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恩来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许多人寄托希望与寻求慰藉的参天大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那么，周恩来又是怎样保护这“相当一批人”呢？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十分得逞，红得发紫的日子里，正面冲突，公开为这相当的一批人开“绿灯”，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为此费尽心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办法，以智斗取胜。

### 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理解，很不得力，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三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师、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师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把那封信销毁了。

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

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做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尔后采取其他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师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1967年2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师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2月16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粗暴地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六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

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师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前，毛主席变了，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惟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他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者四帅商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此后，当老师们受到冲击时，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师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师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师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师们。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达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

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当时任警卫局领导的李树槐回忆起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一段往事：

1967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和李先念的另一个细节：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么！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么，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么！我还在场么！”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还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全国财贸系统的造反派要开大会批李先念同志，总理不放心，也是亲自陪着去的。到场以后有的红卫兵很客气，跑来给总理和先念系上了红卫兵袖章。总理一看气氛还好，会场的秩序也不错，因为有点儿什么急事就离开了，留下了我们随行的保护先念。可总理离开会场以后，造反派就变脸了。先是不客气地把先念的红卫兵袖章给摘掉了，接着就动手动脚了，低头、弯腰那一套就都来了。所以，总理轻易不敢放这些人出去，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陪斗，如果他去不了，也要叮嘱我们加以保护，或事先与造反派达成协议：几时去，几时送回来；不许侮辱人格、变相体罚等等。但那时“造反派”往往不讲信义呀，可真是无法无天！

### 部长们的“避难所”

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由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有被冲击的危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师、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

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他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



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

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等人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三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周恩来对谷牧的保护，谷牧自己有一段回忆：

我于1966年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情况。1967年1月30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紧抓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

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喉咙于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耽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中南海国务院的宿舍楼，是国务院部长们的“避难所”。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常常以让他们“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当时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净、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肖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等都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做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61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61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1966年11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11月30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8月底，一天早晨起来，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6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刻作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

1967年元旦，薄一波被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60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你，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

### 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

发言。

9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10月18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

11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1967年1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1月6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

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海。7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三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乱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工作人员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他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50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作出错误的“开除”处理之前，那天晚上，周恩来一夜未眠，在屋里踱步焦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说：“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

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后来，1970年周恩来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仍称呼为“刘少奇同志”。斯诺说：“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怕要吃亏。12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三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12月27日下午4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老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张霖之的死就是这样。1966年底、1967年初，全国掀起了揪斗“走资派”的浪潮，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造反派”抓走，被打死了。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痛心，掉了泪。谷牧回忆说：“周总理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他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全部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在另外一次会上，周恩来十分激昂地说：我是总理，你们（指“造反派”）把一个部长抓去47天就没有给我报告一下。他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下届党代会上人家问我，张霖之候补委员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答呢？周恩来又问，还有哪个部长被抓，李先念讲了有关部长被抓的情况。周恩来说，赶快派联络员把他们接出来。接着就把吕东、陈正人、段君毅等几十位领导人接到国务院保护起来。

孙维世的死，也使周恩来十分伤心。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20年代初在德国时和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共产党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抗战初，1938年，孙维世和哥

哥孙泱在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惊喜地看到了他们。邓颖超说：“维世啊，你当我们的女儿吧。”孙维世亲热地叫了“爸爸”、“妈妈”。周恩来、邓颖超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她。后来，孙维世和孙泱都被送到延安学习。1939年周恩来坠马伤臂，去苏联治疗，孙维世随去苏联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在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1946年回延安。建国后，她和著名话剧艺术家金山结婚，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副院长，导演过《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江青一伙的迫害而死。周恩来深深地愤怒了，但怅望苍天，只好把怒火埋在心间。

正如段君毅所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夏衍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已经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被康生等在社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一次，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连说：“不敢，不敢。”后来，夏衍被调出文化部，安排到对外友协“闭门思过”。1966年初，在一次会见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时，周恩来安排夏衍参加了。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了接见时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夏衍及江青一起同外宾合影。江青看到后忿忿地说：“真不像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为了避免招来江青、康生等更大忌恨，周恩来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如身体许可，可到下边去看看，但是“南方不要去”。这是告诉他要避开上海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12月夏衍被江青、康生一伙秘密逮捕。周恩来叫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都说不知道。夏衍是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派”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受到酷刑拷打，腿被打断。他通过一位好心的医生带信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要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康生搞的，他管不了。一天，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说：“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给夏衍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关到秦城监狱，一关关了八年多。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要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都因江青、康生阻挠而未果。直到1975年冬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夏衍才被假释回家。廖承志来看夏衍，带来了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后来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夏衍的情况，周恩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好！只要人还在，就好……”

仔细体会这句话，周恩来是从长远着眼的。

### 对知识分子的关怀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处境中，周恩来苦心保护大批科学技术专家。1966年8月，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就力争要写上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多次亲自出面保护科学家。“文革”中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的杨国宇回忆说：

记得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

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我们拿着总理的“令箭”办事，保证了钱学森同志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我们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直接参与某工程的。我们把名单呈报总理，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设想到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我们的做法。他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受到冲击，他的数学手稿也被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有关负责人对华罗庚进行保护。华罗庚回忆说：

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国务院的两位同志奉命向我传达了周总理1970年3月4日的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的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5页）

我听了批示的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我只好以汇报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

正是由于周恩来、聂荣臻等的维护，尽管“文化大革命”搅得全社会动荡混乱万分，但是我国科技界和科学家们，仍然捷报频传，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协助周恩来管理经济工作的谷牧说：“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

### 舍身保陈毅

“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面对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周恩来舍身保陈毅

## 陈老总连连“放炮” 周恩来阻击“揪陈”

陈毅生性刚烈、豪爽，对一些看不惯或不理解的问题，一向敢于直言不讳。“文革”前，曾有人为此向周恩来反映，说陈毅讲话像“放炮”。周恩来回答说：“不要怕放炮嘛！”并称赞陈毅讲话“比我有气势”，就是有时难免“走火”。

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和陈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周恩来在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有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而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在公众场合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连连“放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中央文革”一伙试图搞乱军队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大好听，但还是要讲。如果我字当头，我就不讲了，不讲就不会犯错误。但我还是要勇敢他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陈毅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的嘻笑怒骂赢得了台下的阵阵笑声和掌声。陈毅“火力”越来越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又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非常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的这一发“重炮”把江青一伙给打槽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11月讲话及叶剑英等老师在这一时期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并很快在首都北京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红卫兵在江青一伙的指点下，喊着“要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的口号向外交部发起了冲击。此时，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开初，周恩来对他们耐心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红卫兵代表不听劝告，仍一味纠缠。周恩来不得不提高声调严肃他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

最后，周恩来告诫与会的红卫兵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不能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这次谈话一直到次日凌晨。谈到最后时，双方都有点情绪失控。红卫兵代表们咄咄逼人他说：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也发怒了。他大声说道：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指陈毅），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说到这里，周恩来略缓了缓口气，说：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急步退出会场。

然而，就在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红卫兵的同时，江青来到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红卫兵中间煽风点火，为“革命小将”们撑腰打气。她鼓动说，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你们不要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我们是心连心的，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与此同时，“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在不同场合煽风点火：“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革命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等等。他们甚至还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1967年1月5日，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周恩来得悉后，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找到大会筹备处负责人，加以劝阻。他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不赞成开这



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军内造反派听从了周恩来的劝阻。

在周恩来的多方奔走、劝导、周旋下，“揪陈”恶浪暂时日渐平息。然而，更艰巨、更险恶的斗争还在后头。

### 陈老总拍案而起 周恩来保陈“过关”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以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高度肯定了这一夺权行动。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公然叫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于是，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的狂潮。“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夺权”的问题，周恩来、陈毅等与“中央文革”一伙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对此，周恩来尽量不与“中央文革”一伙正面冲突，只是始终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各部门的业务权，造反派对各部门的业务权至多也只能是“监督”。而陈毅却难以压抑住内心的怒火，再次拍案而起。

1967年2月16日晚，中南海外事会议室。刚刚与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闹怀仁堂”的陈毅对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和刚刚在外交部“夺权”的外交部“革命联络总站”的代表们，向“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说到这里，陈毅拍案而起，几乎是怒吼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再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这样，我陈毅宁可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

陈毅缓缓了口气，又语调低沉他说：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陈毅的这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借毛泽东对陈毅“大闹怀仁堂”表现的不满，对陈毅大兴问罪之师。外事口的造反派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霎时间，“炮轰陈毅”、“打倒陈毅”、“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甚嚣尘上。面对这样的局势，周恩来心急如焚。

本来，在1月24日，周恩来亲自坐镇，精心布置，帮助陈毅闯过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万人大会“检查”关。那天，为了斗争需要，陈毅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暂时作点“应景”的“检查”。陈毅在大会上念的那份“检讨书”，也是周恩来再三修改定稿的。陈毅念完“检讨书”后，周恩来又为陈毅说了一些话，说陈毅同志为党工作40多年，

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主席走的同志。他还说，一切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17年来外事方面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样，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陈毅当外交部长的成绩，封住了造反派的嘴巴。

不料，“检讨”刚过半个来月，陈毅在2月16日又打出这么一排“重炮”。的确，陈毅的这排“重炮”使周恩来对他的保护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由于周恩来对陈毅等一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遏制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因此，“中央文革”一伙对周恩来越来越不满。当时街上甚至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身已陷入了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然而，关键时刻，周恩来没有退缩。

1967年5月11日上午，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相继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举行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标语。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事口的造反派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小时的谈话。会上，造反派对周恩来轮番围攻、起哄。

造反派：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自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我们要求陈毅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本来五一节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带头搞这样一个游行示威，还称要把陈毅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无法担这个风险。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请你说清楚些。

周恩来：你们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揪外交部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你们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你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批判错误可以，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造反派：什么条件？

周恩来：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

……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的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眼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周恩来又转向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的。不要在这里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

造反派继续给周恩来施加压力：我们下定决心，就是要打倒陈毅。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也用强硬的语气说：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主席思想也不同意这样做。不光是陈毅，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我现在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

谈话不欢而散。

两天之后，外语学院的造反派置周恩来的劝阻不顾，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组织代表，向他们发出最后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5月29日，毛泽东从一份材料中看到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抓住陈毅“问题”围攻周恩来，社会上也出现一股“炮打周恩来”的苗头，当即挥笔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领导小组同志们做说服工作。

周恩来的严正警告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做依托，造反派们的“揪陈”行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 陈老总几番遇险 周恩来舍身“陪斗”

1967年8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广大军民为反对以王力、谢富治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在武汉处理问题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而进行的群众性抗争（王力一度被群众扣留并被打伤）。然而，这一事件却被“中央文革”诬为“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而本来不起眼的王力因在这次事件中“光荣”负伤而名噪全国，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功臣”，也成为造反派们顶礼膜拜的“榜样”。

8月7日，王力瘸着一条“伤腿”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造反派汇报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王力用蔑视的口气反问：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的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造反派抱怨说：有人说外交部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

王力说：这话不对。革命、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干革命那么“文明”啊？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你们。

在王力讲话的煽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又一次向陈毅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他们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

武汉“七·二”事件后，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氛围中，周恩来试图阻止造反派揪陈毅去作“检查”已难以做到了。周恩来深知陈毅性情刚烈，如造反派借“批判会”之名搞什么“低头、弯腰、认罪”之类，势必引起冲突，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更使周恩来忧心的是，他怕造反派不守信用，把陈毅

揪走，转而秘密关押、迫害。1967年1月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就是被造反派长时间秘密关押、迫害致死的。周恩来曾为此痛哭流涕。出于上述考虑，从那时起，周恩来不得不亲自连续参加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以“陪斗”的方式来保护陈毅，这样既可随时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举动，又可确保陈毅不落人造反派手中。有时如果自己确实有事脱不开身，他就委派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前去参加，以随时掌握会场情况。他还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的口号、挂“打倒”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变相武斗、体罚等。

就在王力讲话的同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对陈毅的“批判会”。周恩来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赶往参加会议。当他来到会场门口时，先到一步的卫士长元功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当即止步，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了协议，为什么还这么干？并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才肯进入会场。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于是，周恩来就抱臂胸前，脸色严肃地站在裸露在烈日之下的台阶上不动。双方僵持着，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周恩来脸上、胳膊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滚落在烤得火热的水泥台阶上，造反派眼见这个阵势，被迫摘下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

又是一次对陈毅的“批判会”。周恩来因接见外宾不能前去参加，便派卫士长成元功和秘书钱嘉栋到会。造反派得知周恩来不能到会，认为时机到了，立即布置了几百人准备冲击会场，揪走陈毅。为防陈毅走脱，造反派把陈毅来时坐的汽车轮胎给扎破了。情急之中，成元功拉着陈毅临时藏入一卫生间内。钱嘉栋紧急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调来两个连的战士迅速开到现场。这样，陈毅在成元功等人的保护下，乘坐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并不甘心。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周恩来亲临会场，精心布置。他指示傅崇碧司令员将警卫部队布置在台下，以防不测。果不出所料，会议开始不久，突然从会场二楼垂下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会场秩序顿时出现混乱。周恩来“噌”地侧身站起，两道目光愤然直逼坐在一旁故作镇静的造反派头头。随即退场以示抗议，并命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事先布置在台下的警卫部队迅速形成了一道“屏障”，把造反派挡在了周恩来、陈毅一行的身后。造反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陈毅离去。

8月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悍然宣布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几位副部长被宣布停职“检讨”，我国外交陷入失控。8月22日，造反派和一些红卫兵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又一次就陈毅“问题”围攻周恩来，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医生紧急给以吸氧。造反派声称要组织“群众”冲击会场，要“拦截陈毅的汽车”。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你们谁要拦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会场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物极必反，这是任何事物无以逃脱的规律。就在王力等人狂妄嚣张至极之时，周恩来也在酝酿解决王力等人的方案，8月底，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材料报到毛泽东处，并提出要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毛泽东看完王力的“八七”讲话后，愤然指示：

“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乱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毛泽东批准了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的报告。此时，江青、康生虽是痛失两员“干将”，但也只好“丢卒保帅”。

8月31日，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夺权”后那个“代理部长”的造反派头头，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一度失控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回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手中。陈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又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

“我没能保住他啊！”

用情同手足来形容周恩来与贺龙的关系并不过分。然而，眼看着这样一位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活地迫害致死，周恩来内心情感痛苦谁人知晓

### 周恩来把遭难的元帅接到了西花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一伙就把黑手伸向了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大会议浙江厅召吴法宪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也召见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于1966年9月7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康生，这个专门经营诬陷勾当的坏人，也在贺龙同志背后插了一刀，制造了一个在北京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二月兵变”事件。

天下本无事，何来“兵变”之说？

1966年春，经军委批准，北京军区组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商借房子，不料到了7月上旬，北大有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康生马上抓住这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这是康生1966年夏天的信口雌黄。到了1968年4月27日，这位身居要职的造谣家还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头对准了贺龙，街上的宣传车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

对于贺龙，周恩来是非常了解的。从八一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到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贺龙几乎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论私交，周恩来与贺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周恩来也深知贺龙被林彪一伙打倒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对贺龙的保护更加细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当时还不太明白周恩来的用意，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安排在钓鱼台住下来。薛明回忆说：

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总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总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给贺总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由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惫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师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贺总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 中南海也不安全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起了两派。许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中南海四周墙外的“造反派”的广播宣传车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对贺龙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悉心关照他，已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殷殷难舍他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呆一会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此时，周恩来和贺龙这两位一同战斗了40年的战友谁也没料到这次分手竟是永诀。

1967年1月20日凌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贺龙和薛明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薛明两个人。薛明回忆说：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总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2月18日，总理嘱咐秘书告诉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咐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总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贺总非常感激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我没有保住他啊！”

1967年秋，失去保护的贺龙夫妇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薛明回忆说：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

更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花厅时，我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总被迫害致死。贺总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总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贺龙，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内心情感痛苦可想而知。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寻找贺龙的家属。据贺龙被害后被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的薛明回忆说：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他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总最后的日子，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看望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贺总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总平反前，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询问“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做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总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



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总理抱病去参加了。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阿！”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他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七个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他说：贺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

### 党、政、军负责人的避风港

动乱中的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是周恩来给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安排的避风港。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拍桌子追问这些人的下落。毛泽东称赞说：“总理做得好。”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想方设法对这些干部进行保护。多少年过去了，这些经历过无数劫难的老革命家们谈到周恩来时，他们仍然难以抑制激动的眼泪，有说不完的故事。……

### 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回忆

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就挺身而出，竭尽全力保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干部。东北地区许多同志也受到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坚决保护。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年8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总理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我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我说：“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

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我还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9月底，总理亲自点名让朱德海同志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让他的名字见了报。同年年底，总理又一次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可是，横行一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派他们的帮凶到延边，给德海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横加迫害。德海同志最终未能免遭劫难。1972年，当德海同志病重时，总理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快查清问题，恢复德海同志党的组织生活。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了朱德海同志等一批干部，但不久他自己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对于我本人，总理也是十分关怀和尽力保护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总理请示，总理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同志和陶铸同志负责同我们联系。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我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我，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我进行殴打，并把我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我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此时，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我才幸免于难。总理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很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1969年，我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90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我的几个孩子于1973年联名写信给总理，要求让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年的4月，我还没有被“解放”，总理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同志和夫人朱霖同志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问黄镇同志：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总理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我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我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总理虑事之精细，亦见其用心之良苦。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我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径返辽宁，我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动乱时期，总理要顶着他们这一伙的压力，继续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其处境之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总理让我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总理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20小时，实在大疲劳了，我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来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情景，真是使人心痛啊！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和分裂群众，制造种种事端，处处刁难和折磨总理，到1974年，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居然明目张胆地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批起总理来了。这时，总理已重病缠身，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排除干扰，以坚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工作，

在病房接见外宾，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我 1974 年被“解放”，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我思绪万千，忧心如焚。我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总理进行刁难的借口，只是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我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慰问，在总理不幸逝世之前，未能亲自去看望他，是我终生的一件憾事。

### 原山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1966 年 11 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一一·三”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 10 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 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 月 18 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 1967 年 2 月 3 日。2 月 7 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 10 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 7 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 7 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作人员负责与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我们

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

“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仁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8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5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二十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20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

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干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8341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今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总理的关怀。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1970年6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1）看文件；（2）检查身体；（3）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我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 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的倾诉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妄图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敬爱的周总理为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日夜操劳，彻夜不眠，采取种种措施，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命老干部，我就是周总理保护下来的老同志之一。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1966年秋，天空乌云翻滚。林彪、“四人帮”打着极左的旗号，推行反动的蒙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挑动受蒙蔽的群众，开始冲击各级党政机关，

围攻各级领导。当时江西省委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中央虽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字规定，但不久，中央文革那个“顾问”在回答江苏省委的电报请示中却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下跪等，既不算文斗，也不算武斗。”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支持和指使下，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越来越混乱。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轮番地受到围攻和冲击，我也多次被揪斗。他们逼我承认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还把我揪到北京天安门一带游斗。当时还有其他省的领导同志也被揪在那里游街。沿路群众对这种丑化和污辱革命老干部人格的非法行为非常反感。这些恶劣的做法，被周总理的联络员发现了，立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很气愤，当即派联络员，个别通知被游斗的中央部委和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第二天上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第二天，被揪到北京的20多位省委书记，加上中央部一级的领导同志，约有40多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总理来了，我们立即站起来和总理握手。此时此刻，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的好总理，大家都很激动。总理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向同志们问候，而后明确指出：中央没有叫各省、市的领导同志来北京，他们那样乱揪乱搞，在首都大街上游斗，是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错误的行为。总理转向几位联络员同志说：“你们马上分头到几个大学，找他们的头头说明白，乱揪各省领导同志到北京，这种搞法是不对的，要严肃地批评教育他们。”“对在北京的各部委领导同志，也不能满街游斗。还要按毛主席说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理说理嘛！告诉他们，各省的领导同志在三天之内回省，不能阻拦。”接着，总理还向我们询问各省的运动情况，着重问到了基层干部和当前的农业生产情况。我们反映：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谁也管不了。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站了起来，态度极其严肃他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联，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敬爱的周总理还一再嘱咐我们：要注意保重身体，力争在三天之内都回省。遵照总理的指示，我抱着对运动能够正常发展的希望回到了南昌。然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

1967年初，揪斗“走资派”的声势越来越大。2月17日，大街上到处张贴“海报”：“2月19日在八一广场批斗走资派刘俊秀。”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办公室来了紧急电话指示，要杨尚奎同志和我立即前往北京。但有的坏头头不肯，直接电告周总理：要批斗完刘俊秀后再去北京。周总理当即严厉地回答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一定在19日送到。

总理当机立断，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和爪牙们的鬼蛇伎俩，但他们仍不死心，竟派两名心腹，名为护送，实为监视，与我们同乘19日飞机到北京。总理的联络员在北京机场接到杨尚奎同志和我，一看另外还有两个人，既不是秘书，也不是警卫员，便对他们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然后，联络员把我们送到中央办公厅招待所住下，并对我们说：“在这里你们安心好了，总理希望你们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我们都同声回答：“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刚住下不久，招待所又不断受到冲击。为了安全，总理把一些同志转移

到中南海，我和另外几位同志被转移到京西宾馆。在京西宾馆期间，总理还经常派人来看望和慰问我们。在总理的关怀与保护下，我在京西宾馆住了一年零一百天，身体才逐渐有所好转。1967年国庆那一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光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国庆观礼。总理对我的关怀使我联想到在延安时期，我家里很困难，生活维持不下去，当时总理虽在重庆，但他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曾两次要组织上给我永新老家寄钱，1938年上半年寄了五十块大洋，第二年又寄了一百块，事后我才知道是周总理亲自关心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钱，不仅当时解决我家生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全家得到了党的温暖，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总理一贯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爱护同志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

1968年8月初，我从北京回到南昌。回想在北京这段难忘的日日夜夜，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敬爱的周总理作中流砥柱，把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从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法西斯专政下解救和保护下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要被迫害致死。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

### 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杨易辰如是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黑龙江省遭受严重破坏，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奋战多年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关押。我也遭到严重迫害，三进三出，几经反复。在这期间，总理对解决我的问题多次作过指示，支持我出来工作。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肯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迫害。

1966年9月，奉行极左路线的当时黑龙江省主要领导人，为了达到揽权的目的，制造事端，分裂省委，迫害同他持不同意见的其他省委领导同志。我被扣上“挑动工人斗学生”，“给文化大革命泼冷水，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压下去”等罪名，被造反派关押起来。在遭毒打、戴高帽、游斗12天后，一个造反派头头宣布我被解放了。我开始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总理了解到我的处境，保护了我。总理在一次有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三派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上说，杨易辰是干工作的，是顾全大局的，困难时期支持中央，应该让他出来抓生产。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10月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打通思想的会，要求各省来两名领导干部参加，一名是支持“文革”的，一名是对“文革”不理解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代表，也是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中最早戴高帽、游街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形势很乱，全国一片狂热，各式各样的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红卫兵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像我这样公开表示对“文革”不理解的干部更是在劫难逃。总理知道我心直口快，不说违心的话，对我尤为关切，关心我在这种混乱局势下的遭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一次大会散后，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门口递给我一张条子，上面是总理亲笔写的几个字：“易辰同志，散会后你留一下，我有事情和你谈。”一会儿，总理就来了，陶铸和李先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谈话。总理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才到黑龙江不久，你是老省委的人，要支持他的工作，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了，不能眼看着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



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革”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精力抓好生产。总理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为了稳定黑龙江省的局势，不使生产垮下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我，要我振奋精神，不悲观失望，学会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保住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从感情上说，我对总理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但也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是对总理要我支持执行极左路线的×××的工作有些想不通，觉得总理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对“文革”进行抵制。只是到了后来，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冷静思考和观察，我才真正理解到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我当时的想法可谓是感情深，认识浅。总理才真是想得深，看得远，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的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着想啊！十年动乱中，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打倒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周总理利用自己起作用的地位，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进行了特殊形式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尽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的损失。我当时对“文革”的复杂性和斗争的艰巨性，确实认识不足。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勇无谋。如果当时总理也像我那样，恐怕早就被打倒了，也就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稳定局势的作用了。小平同志在谈到总理时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全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十分正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总理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觉得在思想感情上同周总理贴得更近了。在我心目中，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我对总理的衷心拥戴从来没有动摇过。

196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当时的黑龙江主要领导人只得让我出来工作。但由于我对他奉行的极左路线极为不满，对“文革”也没有真正地“理解”，经常与他发生顶撞。他便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排挤、打击。1967年成立省“文革”核心组时，他将我甩在一旁，靠边站了。一次，他找我们几个省委的老同志谈话，将我们训了一通，话不投机，我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造反派就把我第二次关进“牛棚”。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总理对黑龙江省的形势和我的问题一直十分关注。1971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黑龙江省的问题，总理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那位领导人的错误做法，总理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杨易辰是支持你工作的，但是你把他甩开了，群众能服吗？杨易辰这个人比较爽快，有什么想法就公开讲出来，不背后搞鬼，争论起问题来，在我面前也敢吵，但中央定了以后，他是坚决照办的，这种干部你不喜欢，你就喜欢说你好话的人，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这次会议后不久，我第二次被“解放”，结束了“劳动改造”。但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的情况下，我仍然不能出来工作。不久，有人要我在一份犯了“走资派”错误的结论上签字。由于我坚持拒不签字，很快被发配到哈尔滨的一个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直到1976年，我才第三次被“解放”。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我

和家人悲痛欲绝，茶饭不恩，整天守着电视机，想多看一眼总理的遗容，且每看必哭。在家里挂上了总理的遗像。全家人一起动手，精心做了一个小花圈，摆在遗像前，全家人都换上素装，两岁的外孙女没有素装，老伴临时找来块蓝布赶做了一件给她穿上。28岁的儿子原定在1月份结婚，也因为总理逝世推迟了半年婚期。当时，“四人帮”一伙不让追悼总理，不许戴白花、黑纱。在总理追悼会那天，省委常委都集中到常委会议室，我和任仲夷同志提议。每人都应戴上白花，并给总理的遗像披上黑纱。但是，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满含泪水，有的失声痛哭。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任何人也禁锢不了的。在北京，十里长街泪落倾盆雨，纪念碑前白花成海洋。当时，哈尔滨市最繁华的第七百货商店门前也出现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总理遗像，遗像前摆着一个小白花圈，成为轰动一时的“小白花事件”。在追查这件事时，尽管搞这件事的人所在单位派性严重，情况比较复杂，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但没有一个人说出去，可见人心所向。正是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崇高品德，把当时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们联在一起，共同抗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家中，我和家人把白花缝在内衣上，黑纱带在内衣袖上。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全家只能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对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寄托对总理不尽的哀思。

.....

周恩来对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保护，招致了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对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受周恩来之命保护干部的傅崇碧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根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他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他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保护民主人士

毛泽东给了周恩来一把尚方宝剑，周恩来趁机开出了一份特殊保护名单。民主人士感慨地说：“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許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

## 一张特殊的保护名单

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其波及面之广，打击面之宽，斗争方式之残酷，时间之长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罕见的。“文革”初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蛊惑而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像汹涌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一大批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弃党的领导、党的政策于一旁，横行无忌地乱揪、乱斗、乱抄、乱抓。大批党外朋友被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漩涡。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围攻了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同志。徐冰开完会回到统战部，即成为部内造反派的众矢之的。接着中央统战部被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党的统战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其“造反行动”从学校里扩展到社会上。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煽动下，一些幼稚、无知的青少年向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对象发起了狂暴的冲击。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1966年8月12日夜，北京大学经济系红卫兵大约30人闯入原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主书”向章老全家宣读毛主席语录，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在查抄过程中，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情势才稍稍缓和。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30日，毛泽东收到这封信。阅后在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8月30日

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并对章士钊采取了三条保护措施：一、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二、派警卫部队的两位同志到章士钊家，劝阻再来抄家的红卫兵；三、将章士钊秘密送到三一医院给以保护。同时，周恩来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对这些同志也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就在30日这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张名单首先提到了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同时，也包括了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周恩来开列的这份名单很快就送到了中央统战部。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8月底的一天，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造反派在政协礼堂斗争徐冰同志。我那时尚未被揪斗，还能坐在台下看台上造反派们的表演。正当斗争大会进行的时候，我部干部处副处长程浩同志忽然来找我。

“你看，”程浩同志递给我一个文件，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公安部转来的，果真是总理的亲笔字，写的是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范围、原则和具体办法。我记得名单上已开列的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除此之外，总理又指出应该迅速给予保护者的原则，其范围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务院部长等。在这份名单的末尾，又添上了李宗仁先生的名字。我看过名单后，问程浩：“这张名单是谁送来的？”程浩回答说：“是公安部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他们要徐冰按照周总理划的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出来。可是徐冰还在台上挨斗，怎么办？”

我说：“这个名单开得太好了，真及时啊！这是件大好事，不要等徐冰了，你先和沙里同志回部里，按照总理划的范围把名单开出来，等徐冰回去让他签个字就是了。”

“好吧。”程浩答应了一声，就去找沙里了。

斗争徐冰同志的大会快要结束时，我提早退场，赶回部里，找到了程浩和沙里。他们已经按照总理划定的范围把名单拟好。我看了一遍，没有遗漏的，就同程浩、沙里一道，站在办公楼门口等徐冰回来。等了一会儿，统战部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最后，徐冰的车开进部里。我们立即迎了上去。徐冰一下车，我们就把总理亲笔写的名单和我们拟定的名单拿给他看。刚刚挨斗归来的徐冰，一见周总理的亲笔批示，眉宇间顿时浮现出欣慰的神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犹豫地拔出钢笔，在名单上签了字，并嘱咐我们说：“尽快送给公安部转报中央。”

总理最后批准的名单，使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领袖及高级干部得到了保护。有关部门按照名单，给每个保护对象每家派去两名解放军战士守卫。周总理还指示解放军三一医院，接纳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以便更加安全地把他们保护起来。

### 因人而宜的保护方式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绝不仅仅是这张名单。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他凭着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避暑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他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去，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批示下达后，周恩来就更有把握地办这些事了。他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照顾不到，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

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 一医院准备接收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做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

关于周恩来对张治中的保护，曾任张治中机要秘书的余湛邦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老在北戴河。周总理考虑到张老个性刚强，回北京碰上这种事情容易出问题，便马上通知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老等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这种做法实际是让张老这批人有思想准备。

我们8月底回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幸亏周总理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张老家附近，当时住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张家五次，第一次是来抄家，张老躺在沙发上不作声。第二次来抄家时，张老正好从医院回来，躺在靠椅上休息，红卫兵指着张老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老没有碰到过这种粗暴的事，因此狠生气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房间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做了准备，让警卫员、服务员保护性地围在张老身边，他们没敢动手。张老被抄家后，周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这实际是保张老过关。但是这些红卫兵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唆使，三番五次要揪张老。总理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必须采取措施，于是就让周荣鑫找了一位负责同志把张老送到三 一医院保护起来了。当时只允许我同他联系。

1967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在某场合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总理出面委托张老办的，硬要这样做，实际就是要利用这件事整总理。所以张老虽然被保护起来，他们仍不死心。他们知道我和张老的关系，就把矛头对准我，想从我这里找到整张老和总理的材料。那时我每天去三 一医院向张老汇报情况，送报纸。他们就派人跟踪我，找到我的家。抄了家之后又把我揪到学校，让我交代历史，最后又以所谓公安六条精神为理由坚持要赶我走。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只好给总理办公室值班室打电话，并请张老给总理写了信，总理立即派一名联络员给红卫兵做工作，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这样，我才被保下来。同时，总理在一次接见红卫兵讲话中驳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蔑之词，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

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总理不仅保护了革命干部，也保护了张老，保护了我。

张老的身体原来一直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体很快垮了。那时他心中满是问号，找不到答案，因此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大概是1968年国庆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时就对主席说：主席呀，你跑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打倒的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不久，张老病危，他十分思念亲人，我们就请示总理能否让张老女婿（当时张老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女儿都被隔离审查）出来见见面，总理马上派人与专案组交涉，使张老病逝前与家人团聚。1969年4月6日，张老去世，总理亲自主持了告别仪式并致了悼词。以后总理又从我手中将张老的许多机密文件索去妥善保存起来。

程潜的夫人郭翼青在回忆周恩来对程潜的保护时说：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程老从湖南回到北京。当时政协召开过一次会议，向大家打了招呼：如果红卫兵到家里来，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帮助你们“破四旧”。因此对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我们已有准备，把一些不合时宜的照片、资料全部都烧毁了。红卫兵来后觉得我们家没什么问题，破得很好，只是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大了些。秘书向他们解释：这房子不是程老私人的，是国家分给他们住的。程老年岁大，来往人多，所以住这样的房子，因此红卫兵很快就走了。不久以后国务院来了一位同志要接程老走，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让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司机常与程老外出活动，认识的人很多）。司机回来说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才稍放心。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来就用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将程老护达到三 一医院保护起来了。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都是他们派人来取的。后来在电视中我们看到他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知道他没有问题，才安下心来。程老在三 一医院住了三个月，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向主席提出要回家，主席同意了。程老回来后，总理还派了两名市公安局的同志住在家里，保护程老的安全。

程老逝世后，总理非常关心程老的安葬问题。程老生前一直想在死后用棺木安葬，在湖南老家已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木，“文化大革命”中棺木的一角被造反派劈坏了，但修一修还可以用。我劝程老不要迷信棺木，还是火葬为好，给他做了不少工作。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因此程老去世后，我家提出了人葬。但总理是了解程老心思的，他派人来与我们商量：听说程老生前一直想用棺木，这是可以的，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给湖南方面拍个电报让他们送来。我说，已和孩子们商量妥了，我们都同意火葬。总理一直不放心，四次派人来商量，最后一次才决定火葬。我们全家为此深受感动。

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胡子昂感慨他说：

周恩来在非常复杂、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他又在1969年5月4日发出关于保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

一封信，信中明确规定“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

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果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到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后果恐难想象。

### 决不能忘记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那些时间里，就曾亲身感受到那些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时所给予的无私的可贵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一个重感情、重信誉的人，他总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们的人、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

宋庆龄，这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助过共产党并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伟大人物，周恩来对她一直关怀备至、非常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也受到冲击。1966年8月，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被当地农民砸毁。宋庆龄得悉后泪痕满面，极度悲伤，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墓地很快修复了，还重立了墓碑，宋庆龄看到修复后的墓地照片时，很是感激，说她对周恩来永生不忘。周恩来遵照毛泽东8月30日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指示，当即开列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周恩来还请她住进中南海，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人，郑重地指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曾经对西藏和平解放有过贡献的阿沛·阿旺晋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受到冲击。周恩来得知后，对阿沛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对此，当时任西藏军区负责人的任荣回忆说：

1966年9月27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阿沛夫妇被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随即指示为阿沛儿女的安全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你们要

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们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他说：“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主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周恩来忧心忡忡。他担心这些人突然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处理不好，容易对执政党产生误解。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同民主党派领袖、高级民主人士谈谈心，向他们说明和解释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但总难以找到适当的机会。

1966年9月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国庆节即将来临。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没有变，也为了保护民主人士，周恩来邀请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国庆观礼，并让工作人员通知统战部，观礼结束后，准备分三批同这些民主人士谈谈心。但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突然有事，周恩来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对此事有详细的回忆：

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生日。上午9时左右，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靠西侧进观礼台的人口处，欢迎党外朋友们的到来，我按照总理的指示范围，通知他们：观礼仪式完毕，请暂留步，总理要和大家见面，开个座谈会。这些高级民主人士一听我传达的通知，立即喜上眉梢，有的人连声说：“好！好！”

记得当时被邀请的人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等；人大常委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政协的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等；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部长、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盛典开始前，民主人士们聚集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大家日思夜想的周总理走来了。总理绕着整个休息厅中间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并一一握手，微笑致意。总理走到李宗仁面前，握着他的手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李宗仁却执拗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总理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总理哈哈一笑，赞扬他说：“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周总理同胡子昂同志握手时，关切地问：“子昂，你怎么样啊？听说你们工商联和民建会有不少人挨斗啦。”胡子昂连忙说：“我没挨斗。”总理



说：“那就好。”

总理走后，我问胡子昂：“胡先生，你不是在两会被斗了吗？怎么对总理说没挨斗呢？”胡子昂叹了一口气，说：“总理太操劳了，我不忍心再让总理为我担心，所以说了谎啊！”

庆典进行了几个小时，游行结束后，党内高级干部都走了。民主人士们又聚到东休息厅休息，等候周总理来讲话。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总理来。大家知道总理是最尊重他人、最遵守时间、最讲究礼貌的领导人，他若不能按约定时间来，肯定是有意外的事情使他无法脱身。大家只好陆续离去。

为什么周总理说好要接见民主人士，而后来又不接见了呢？直到第二天打开《人民日报》才明白其中原因。10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跨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和群众亲切握手。可想而知，毛主席下了天安门城楼，总理必定会跟着下去，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这正是总理“失约”的原因之所在。

### 把温暖扩人民生人士的家庭

周恩来关心民主人士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安全保护上，而是从各方面关怀他们。他不仅邀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给以信任；在他们病时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在他们去世后妥善处理后续，并且在对他们的遗属关怀备至。这就使党的温暖浸透了他们每一个家庭。其中最感人的是对傅作义先生及夫人的关怀。

1973年，傅作义病情严重，周恩来亲自劝他住进医院。为让他心情愉快地配合治疗，周恩来请他以个人名义邀请商震回国；安排他会见美籍教授、专栏作家赵浩生等。通过这些，使他精神振奋起来，更加感到应该多吃一些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

1974年初，傅作义病情恶化，周恩来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小组抢救。他常常在深夜找大夫去，询问傅的病情，商量医疗方案。在决定为傅作腹部开刀插管术时，他叮嘱医生一定要仔细，不要引起感染。这一时期，正是周恩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江青、王洪文等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所指人人皆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病情日益加重，身体十分衰弱。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全然不顾自己。4月，傅病情转危，他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在病床前，他拉着傅的手亲切他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有功的。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在即将辞世的老人的心灵中，有什么比得到这样公正的评价更为宝贵呢？傅眼含泪花，点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傅去世后，周恩来拖着病体主持了追悼会。会后，邓大姐代表周恩来看望了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傅夫人——刘芸生。周恩来不仅安置了她的生活，解决了生活费和住房问题，并且在政治上关心她。1974年9月，周恩来在病卧在床的情况下，亲自给中央写信，提请傅作义等4位起义将领的夫人参加国庆招待会，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程潜的女儿程熙回忆说：

父亲死后，有关部门发给我家五百元钱就不管了。在我家感到最困难的时候，我收到了王海容寄来的一封信，让我到外交部去一趟。我应约而去。见面后她告诉我是总理让她找我的，首先问了我家经济情况，有什么困难。

我淡了湖南老家的东西问题。因工作关系，我们在湖南、北京两地都有家，父亲私人所有的东西都在湖南，而北京家中的用具都是公家的。这次搬家不能动公家的东西，又无钱购买，想从湖南要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湖南方面不但不给反而训了我们一顿。我们的家产全部“捐”公，只退给了母亲9元7角钱（东西都被造反派干部们瓜分了，最近落实政策才从这些人家中收回一些破损的家具）。另外，1948年国民党将我全家转迁到香港做人质，曾给我家一笔安置费，我母亲把这些钱都存在香港了。父亲起义后，我们回到父亲身边，一直未动此款。“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曾写信给毛主席请示能否拿回这笔钱（因孩子多，家庭生活感觉困难）。主席说：能取就取回来，取不回来我们共产党还养不起你吗？后来陶铸同志帮助取回这笔钱，但因银行冻结，一直未能取用。此外还谈到我的工作问题。王海容将这些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马上让国务院管理局解决我家的困难，批准发给我母亲和姨母每月各100元，无工作的两个孩子每月各20元。总理还说这笔生活费就固定下来，孩子有了工作后仍照发。但总理去世后，就只发给母亲每月100元了。至于我的工作，因当时社会太乱，总理让我暂在家中等候，以免出意外。1970年我结婚，爱人也无工作，总理就让卫生局给我爱人分配了工作。我的工作问题总理一直想着，过一个时期就了解一下情况。1971年总理通过国务院根据我的特长，将我分配到“图博口”系统的明清历史档案馆工作。总理心很细，他派王海容来我家联系，了解生活中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解决。王海容看到我母亲有心脏病，住七层楼上很不方便，就汇报给总理。我分配工作不久，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全家搬进红霞公寓。

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情并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党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覃振的女儿覃瑞因被造反派扣上“为亡父反动政客覃振翻案”的罪名批斗。周恩来知道后，就致电南京有关领导人说：“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这样才使覃振的女儿渡过了难关。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说：“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立即对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周总理的关怀拯救了我们一家。”

周恩来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疯狂岁月中，能排除各种阻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能在极度混乱中为民主人士排忧解难，是与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原则分不开的。周恩来认为：我们与党外朋友既然过去一道共事，现在进行建设，就应该继续团结下去，社会主义建设搞成以后，将来一同进入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这一认识，他在多次谈到要保护这些人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种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周恩来提出保护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周恩来认为，党外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联系或影响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通过同他们的合作，可以团结一大批人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解放后，他多次讲过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不能停下来，而且要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了“统一战线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所起的作用，正如胡耀邦所讲：使许多朋友理解和原谅了我们的许多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念。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受到保护的朋友和他们身后一大批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

和对台工作的舞台上时，心中不禁升起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 二十二、力挽狂澜稳大局

###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周恩来要把这股“洪水”纳入河道。  
一个绝妙的“骑手”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出现的以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并暗中操纵的红卫兵运动狂潮犹如一股的洪水，又像一头癫狂的怪兽，把偌大个中国大陆搅得天翻地覆、动荡不安。为了把这股“洪水”纳入河道，稳定局势，周恩来对那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进行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付出了很多心血。

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 把“洪水”纳入河道

1966年8月下旬，当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社会时，周恩来指示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为什么要成立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周恩来是想把红卫兵的“洪水”纳入河道。

8月24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月26日，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紧接着于9月1日和9月10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周恩来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不严密，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否则，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要学习、宣传党的政策。

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的3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恩来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9月5日的统计，到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1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

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童光苔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泽东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

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联络站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联络站的观点、立场不对。9月5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后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子？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

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去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恩来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恩来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周恩来好像都知道一样。

### 针锋相对，四处“救火”

1966年秋未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很显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唆使红卫兵四处“放火”。而周恩来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奋不顾身地去“救火”，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控制全国的混乱局面。为此，江青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人队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在9月10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有应该有的。周恩来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恩来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恩来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恩来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恩来提到有人间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他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还有一次，也是在接见各地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到讲话时，全场的每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他讲着话的周恩来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周恩来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少顷，周恩来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恩来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恩来最后更为严肃他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恩来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8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9月10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他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恩来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

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191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1962至1966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10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刘少奇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恩来和陶铸的坚决反对，并经毛泽东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恩来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9月10日，周恩来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痪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恩来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恩来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恩来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



神。

## 二月抗争中的特殊作用

怀仁堂中，两军对阵。周恩来以他特殊的斗争方式参与“二月抗争”，又以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掩护大闹怀仁堂的战友们

## 面对面地生死搏斗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2月中旬，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二月抗争达到了最高潮。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怒火喷涌，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阴谋家、野心家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像庄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阵，十分鲜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师，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涂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2月16日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

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他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四人帮”惯于打昔“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扫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须导，一大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是，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扫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1966年12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他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恶人先告状”，就在2月16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

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汇报。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他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他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师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 特殊的斗争方式

尽管在怀仁堂会议上，周恩来的话不多，但大量史实和研究表明，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周恩来都与二月抗争事件本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勿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等）所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问题上仍难免存在种种不尽一致的看法。为叙述方便，有必要将近几年来党史界关于二月抗争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说明。

通常讲的二月抗争，实际上是指从当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为止的整整1个月时间里，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在1月19日、20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等者帅两次“大闹京西宾馆”，由此揭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构成整个抗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问题开始的。从2月7日开始的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和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革命家再次主动出击，向中央文革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2月16日碰头会上双方斗争达到最高潮，这是整个抗争的第二阶段，即“大闹怀仁堂”。本阶段争论的问题已由要不要稳定军队进一步扩展到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2月16日晚至18日晚，是抗争的第三阶段，这时者同志们的斗争主要为：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周恩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在各种群众场合继续就“三原则”问题阐明看法。该阶段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广泛。下面，试从三个方面来着重考察、论述周恩来在长达1个月之久的抗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主要活动情况。首先，关于周恩来与“抗争三原则”。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同志们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对“三原则”的态度，实际也就成了辨别“站在哪一边”的一个标准。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在这样一些十分尖锐且又不容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如何认识的呢？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的狂飚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有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即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一位国务院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混乱中含冤去世。和“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形一样，面对“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局势，周恩来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仍努力地从正面、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许多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还是一些场合去耐心说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动抵触的老同志、老部下。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大量公开的言论中继续重申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并指名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

1月下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周恩来对整个形势的认识较前更进了一步，其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1月22日，国务院所属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造反派的凌逼下冤逝。对此，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百思不解，悲愤交集，他情绪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

不真是无法无天了？之后，在与财贸系统造反派座谈时他又强调：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

1月26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周恩来不无忧虑地指出：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想，全国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再一划，就划到“三反分子”去了。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1月27日，周恩来对新疆某造反派提出：你们应该对解放军有起码的信任，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同日，他严厉批评天津市造反派绑架几位市委领导人的行径，指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学美国“三K党”的行为！

1月31日，周恩来在向军队系统有关单位宣讲军委“八条命令”时，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冲击和进驻军事领导机关，更不能随便揪斗、抓人。同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他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还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

2月中旬前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加具体、明确，从不同角度直接阐明、突出了“三原则”。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2月17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你们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财政部）党组织能由群众组织去解决吗？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

关于稳定军队问题，他在2月16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时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原则”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会场上，早就对混乱局势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的老同志们也正大声疾呼，痛切陈词。会上会下，彼此呼应，看得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是风雨同舟，心心相印。

第二，关于周恩来的斗争方式。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抗争三原则”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例如，在抗争的第一、第二阶

段，老同志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会议上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论争，即“两个大闹”。应该说，这是构成二月抗争的一种主要的斗争方式。从目前能接触到的史料看，周恩来似乎并没有准备采取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场合来表达对前述各种问题的看法。即便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拍案而起、尽吐衷肠之际，“两军”阵前的周恩来仍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也许正是今天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历史地看，经过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特别是经过一次次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周恩来逐渐磨砺、锻造了一种超出一般人的性格，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沉着、冷静，从容自若，处变不惊；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他所习惯运用的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方式。越是情况复杂、矛盾加剧、冲突尖锐，就越能显示出他这种特有的性格和斗争艺术。如前所述，在“全面夺权”、“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更多的是利用与广大领导干部和各种群众组织代表广泛接触的机会，来阐明对于各类问题的看法。这里，既有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也有苦口婆心的批评帮助，甚至不乏声色俱厉的批驳、责问。他总是试图寓大小道理于对各类人的谈话中。这样，他一方面是做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在用大量事实来抨击错误论点，揭露其危害。例如，他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建国后 17 年成绩是主流的观点，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论点，使之在事实上、逻辑上都难以成立，成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护干部的一条重要理论依据。再如，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坚持只能夺领导运动之“权”，而不能夺掌管业务之权，实际工作仍由原来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负责。这就使造反派所夺之“权”成了虚的，而实权仍掌握在许多老干部手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公开讲话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后来，周恩来更进一步认为党委、党组及政工部门的领导权也不能放弃，造反派连虚权也不能随便“夺”。1967 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对南方某省省委主动向造反派“让权”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错误”。当然，实际情况最终并没有朝着周恩来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但他为此所做的种种不懈努力，却是有目共睹，不应抹煞的。

再从现实角度看，在整个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老同志们的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他们的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 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

“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

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

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1967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最后，关于周恩来与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的关系。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周恩来与这些他所熟悉的老战友们之间的特殊感情。

1月24日，周恩来亲临主持有外事口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在陈毅念完“检查”（这个“检查”稿，曾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之后，他向造反派强调：陈毅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应以同志式的、阶级兄弟式的态度帮助他，而不能再加重他的负担，以便让他今后多出面，多做工作。

1月25日，在首都科技界夺权“誓师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夺权不是孤立的行动，要有上级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搞无政府状态；在你们夺权的一定时期，要请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过问。

1月26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他又指出：余秋里进行了6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未恢复。你们要有阶级感情么！他是从红小鬼上来的，经过长期的考验，我们需要他，党需要他。

1月底，获悉刚从三线回京的谷牧在机场遭建委机关造反派绑架，周恩来即派出联络员找造反派交涉，限令第二天必须将谷牧送回中南海。

2月8日至9日，批准同意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等人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批领导同志接来北京养病、休息。

2月11日，在接见农口造反派时，要求他们承认谭震林的领导，要让谭多抓工作。

2月16日晚，在接见内蒙古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造反派时，批评了北京的一些造反派冲击军事首脑机关，要求与徐向前辩论的行径。

2月17日晨，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时质问他们：李先念同志是（财政部）党组第一书记，你们怎么能夺他的权，你们这样搞是夺中央的权，夺毛主席的权！

自2月7日开始的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同志们接连主动“出击”，怒斥“中央文革”一伙，周恩来一直到会“坐镇”，并无“停战”、“休会”之意。

尤值一提的是：从2月16日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后至2月19日晨



毛泽东召集会议前，周恩来对老同志们“大闹”之事守口如瓶，始终未作“汇报”；直至江青一伙告状、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才连日约这些老同志们谈话，实际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做检讨“错误”的准备。

以上情况，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传记、纪念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提及、记叙，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就说明，在长达1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够理解的。

### 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中和”作用

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之后，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不得不“请假检讨”，其他老同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非难。至此，持续了1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处境困难而地位特殊的周恩来，却起到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周恩来利用他并未因所谓“二月逆流”失去发言权的条件，在某些重要场合继续就“抗争三原则”坚持其一贯观点，2月20日下午，就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受到指责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康生等人的面阐明对地方夺权问题的看法，指出：自从1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17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夺权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他提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他重申：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人人搞过关，人人是“顽固”，所以不增加质量，增加了数量，成为另外一个标准。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阻止已经泛滥成灾的“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和口号：2月18日，他将《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该社论强调指出：把当权派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提出：“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3月1日，该社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2月19日，周恩来又对某材料中提出的旨在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上揪下扫”的口号提出质疑，并为此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作为集战友、上级、师长于一身的周恩来，在竭力劝说参与“两个大闹”的老同志们偃旗息鼓的同时，却又处处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设法保护这些老同志。事实表明，在2月19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

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 1 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究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么，从这时候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是他陷于“难上难”的时期。由于二月抗争的失利，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协助他工作的老同志们几乎全部受到责难、“批判”，为此，周恩来只有孤军奋战。正是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乃至错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乃至错事。历史证明，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不能保住，更谈不上以他的名义来保住更多的人。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曾谈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情况，她写道：“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 24 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而“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1970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

韩女士在这里提到的周恩来与斯诺谈话中吐露内心情感的重要情况，现已无从证实。但书中分析的当时周恩来的苦境，确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正是在同一会议上，内心矛盾的周恩来也“批评”了“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周恩来在此前后的大量有关言论，便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周恩来从未否认自己同几位犯“错误”的老同志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对此，周恩来并不介意，批示同意将其在会上印发。之后，在几次谈到“保”这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更是一次次“联系”到自己：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就在社会上已有人提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的同时，他甚至当着造反派的面，公开讲：批判“二月逆流”，“也联系到我”；承认他自己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理解的，没有料到这种局面。周恩来的这些举动，再明显不过地表示出他内心的“意向”。

二是周恩来尽可能地将几位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一次，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1967年4月，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之事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讲到，不能把这些老同志的所作所为都一概否定，他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央政策讲的，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

三是周恩来不忘在关键时候“提醒”老同志们不要在思想上放松戒备，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1967年的五一节，是“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按当时惯例，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亮相”。能否上天安门，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经周恩来努力，毛泽东批准，所有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在五一节那天登上天安门。一时间这种表面上“团结”的气氛掩盖了几个月前党内的激烈较量，有的老同志因心情好转而思想上放松下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5月5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信中，周恩来一反过去平等、商量的口吻，语气强硬，措词严厉；然而，他正是想以这种极其罕见的方式，来“警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思想错觉，把“二月逆流”一事看得太轻了。果然，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上，中央文革一伙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对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定性”。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预先的判断。九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对老同志们的情況尤为关注。1968年底，当获悉一位老师遭到批判后，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党的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周恩来却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同年10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建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均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师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1972年1月，陈毅不幸病逝。经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12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再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综上所述，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重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都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抗争过程中，他的认识更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深化，他的感情亦随着斗争的跌宕而起伏，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方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亲自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才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地成为“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 在“七·二”事件前后

林彪、江青合谋，武汉三镇刀光剑影。周恩来急赴武汉稳大局，飞机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团官兵

### 受命处武汉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

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周恩来对警卫员高振普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我先去一趟。你们也准备一下。”

高振普意识到这是叫周恩来为毛泽东去武汉先行安排一下。

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系，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家庭分解，夫妻离异。

那时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安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

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再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泽东决定了的事也不会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说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恩来了。只有周恩来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泽东这次行动的安全。周恩来也想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解决武汉的问题。

14日凌晨两点钟左右，周恩来坐上了空军专机。4点以前飞机抵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前来迎接。周恩来一行乘车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时已是早晨5点多钟了。天虽已大亮，官兵们还没有起床。

周恩来到武汉，为何刘丰来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后来说：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刘丰，说夜里有一架一级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做接机准备。专机具体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空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吃早点时，周恩来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

时间尚早，路上行人不多，周恩来很快就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这栋楼周恩来过去住过，那是1961年和刘少奇、邓小平同住在这座楼里。

周恩来等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正在聊天，看到总理进来了，他们感到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周恩来主动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了。他们把周恩来请进了一个会议室，室内很热，高振普看看温度表是摄氏34度，似乎更加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看看手表，是早晨8点多钟，心想，早晨8点多钟就这么热，到了中午会热成什么样子啊！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的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召集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等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泽东来武汉的住地，以及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周恩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去，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周恩来一再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绝对保密，不能出问题。

下午5点钟，周恩来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泽东准备的房间。

他看到守卫在门外的哨兵已被汗水湿透了衣服，便握着哨兵的手说：“你辛苦了。”哨兵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关切他说：“你可以站在阴凉处有风的地方。”

哨兵急忙回答：“谢谢总理，我不热。”

周恩来走进房间。

房间内都是按毛泽东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泽东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毛泽东是晚上9点多钟到，如果房内温度太高，就不能住这里，只能住在火车上，周恩来当时也作了这个安排。周恩来对驻军的负责同志说：“你派人去电厂，了解一下停电的原因，告诉电厂，就说是我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

电厂负责人听说周总理来到武汉，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应晚8点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6点多钟，电厂提前送了电。

周恩来在武汉，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亲自到长江岸边察看地形，确定下水地点、游泳时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等，分析会出现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抢救措施等都做了很细致的安排。他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还用了很多时

间约地方省、市、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陈再道回忆说：

“7月15日开始至18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我们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18日下午，总理做了总结讲话，大意是：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总理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且为军区承担责任，说我们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这个总结讲话的提纲，据说是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主席审阅过，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告诉钟汉华同志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7日晚，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说完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7月18日上午，周恩来回到北京。

### 再赴武汉稳大局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钓鱼台16楼开会。16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址。

3点多钟，高振普在西花厅接到卫士长张树迎的电话：“你赶快准备行装，再陪周恩来去趟武汉，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邓大姐就走。你先报告大姐。详细情况回来再说。”

高振普报告了邓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她怪小高没在电话里问清楚。

不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邓大姐跟着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周恩来向大姐交待了几句，周恩来就带着工作人员乘车去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周恩来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周恩来去武汉执行保卫毛泽东任务的。

周恩来的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看到这种场面，高振普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高振普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泽东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周恩来去一趟，把毛泽东接出来。

飞行大约40多分钟，机长向周恩来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说：“到时看看再说。”

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周恩来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他没有进休息室，说是要先打个电话。机场负责人把他引进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机。他让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同时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

一位同志为周恩来送来了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

高振普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折，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周恩来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战士们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机场负责人立即派人去搞水。

十几分钟后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刘丰等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路途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机飞越上空了，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危及生命安全。

周恩来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渐渐落下山去，但天仍是亮的。周恩来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同志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在场的每个人都像洗过澡一样。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详细报告了7月20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7月20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

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对问题的表态倾向性地支持了“三钢”、“三新”派，压制了“百万雄师”派。这一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中明显的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作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主力。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是军队造反派抓走的。

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的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主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黑后台是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把矛头指向军区。这样做的结果，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武汉形势急剧发展，孕

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泽东在武汉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把毛泽东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恩来的肩上。当时，也只有周恩来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恩来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恩来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泽东。在场的同志认真地研究着周恩来怎么由机场去宾馆的事情。城里交通很乱，曾发生过一位军区负责同志乘坐吉普车时，被手持长矛的人捅了一下的事情。幸而长矛从这位同志腋下穿过，没有伤着。他们为周恩来进城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周恩来很果断他说：“天黑下来后，坐吉普车进城。”

为了缩小目标，周恩来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高振普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来来定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同志，以及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已等在那里。他们看到总理到了，都抢着向总理叙说7月20日的事情。

周恩来先招呼几位负责同志到了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泽东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毛泽东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去看毛泽东，当面报告了请毛泽东离开武汉的安排。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开武汉去上海。

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最后周恩来请军区的同志劝说抓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把王力放了。

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一心想把武汉的局势稳定下来。

## 卫士虚惊一场

毛泽东乘飞机离开了武汉，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周恩来上床休息。张树迎、高振普、乔金旺三个人守在房外警卫，很快就听到周恩来的鼾声。

突然，楼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张树迎他们忙向外张望，楼外的路灯较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他们三人原有的睡意，被这出乎意料的行动惊跑了。可能是职业的本能，他们误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

张树迎急切地对高振普说：“小高，下去看看。”

高振普警惕地来到楼下。看了看，不像是有人包围我们，就上前问个究竟。

原来是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保护周恩来的。他们在清



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一场虚惊过去了，周恩来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张树迎他们把他叫醒。

他们向周恩来坦白他说：“总理，我们晚叫了您10分钟。”周恩来笑了笑问他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

“回北京一块睡吧。”

周恩来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天还没有亮，周恩来等仍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恩来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天亮时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们正为他敷药。

王力看到周恩来来了，有些激动，起身与周恩来握手，向周恩来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

周恩来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

7月22日下午4时40分，周恩来离开了武汉，并先行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只见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恩来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周恩来。

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脚变成了王力这个“英雄”的资本。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

## 事情并未结束

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但“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狮”、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的问题。

在临回北京的那天下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明、孔庆德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

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待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政变”，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罪魁祸首”。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接下来的事，陈再道事后有详细的回忆：

林彪的决定，把总理处理“七·二”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

7月23日凌晨3点钟，我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我们进京“开会”的电报。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尽管如此，武汉军民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还是连绵不断。当二十九师师长率领两卡车战士护送我们去机场时，见战士们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振臂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一路上通行无阻，顺利地到达了机场。我们到了之后，牛怀龙、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一共是15人。刘丰这天进进出出，发号施令，已经俨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规定我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我们的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和我们划清界限，对我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7月24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总理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为了保护我们，总理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新的阴谋。我们一到，吴法宪就找到刘丰，对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我们刚住进京西宾馆，造反派就知道了，并且冲了进来，这显然是有预谋的行动，傅崇碧同志派人把我们藏进电梯，熄了灯，让电梯悬在半中腰。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问傅崇碧同志，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同志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总理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我们的安全。总理声色俱厉地对谢富治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谢富治一露面，造反派很快就撤走了。总理这天上午还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去做三军造反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戚本禹接到总理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根本不做工作。而吴法宪则告诉总理，说他接到电话后，找了三军造反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三军造反派不仅不同意总理的意见，反而要求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三军造反派批斗。

7月26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说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

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际上是斗争我们。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我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指定在第一排“就坐”，但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吴法宪发言。这天早上4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吴法宪受到指使，气势汹汹他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

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话完全是信口胡说，总理三次打断他的话，要他讲主要的，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并攻击徐帅说：徐向前早在2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帅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完，徐帅写了张条子递给总理，忿然离开了会场，据说陈毅和谭震林同志没有发言，也是中途离开会场的。

会上，我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过来，抓掉我们五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我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受到指使的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武斗。总理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同志报告，气愤他说：“真是荒唐！”并且跑着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但这时人已经溜掉了。总理后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中央常委的扩大会议搞武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由于林彪一伙对武汉“七·二”事件的阴谋诬陷，社会局势进一步剧烈动荡。中央文革又趁机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军队受到严重冲击。

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 敲掉江青的“车”“马”“炮”

周恩来决计打掉江青的“车”、“马”、“炮”，紧急召见杨成武。毛泽东说：王、关、戚不是好人。钓鱼台里风云突变，中央文革元气大伤

### 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名噪一时而又令一般人闻而生畏的特殊权力机构，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掌管、名义上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特殊小组，实际上掌握着对包括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初期，正是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对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肆无忌惮地污蔑和攻击。

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去做的。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如果要拿掉这三个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做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为江青一伙效劳。

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没能阻止周恩来安排老师们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很不甘心，便又掀起了矛头对准老师们及军队高层领导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这其中，又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充当“急先锋”。

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提出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月1日，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并说“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清样印出来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

此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王力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王力的“八七讲话”。在这个讲话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8月22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

8月23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影响到国务院其他各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军串通一气，揪斗刘、邓、陶和他们的夫人……

面对这混乱的局势，周恩来感到有点独木难支，他心急如焚。很明显，造反派的这些行动，都与中央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的。

怎么办？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周恩来决心抓住这一契机，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先给王力、关锋、成本禹一点颜色。

### 单独召见杨成武

周恩来叫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同时，把跟随毛泽东南巡刚从上海赶回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召来单独谈话。

在谈了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讲话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等情况后，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映。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从桌上拿起装有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的档案袋，郑重地交给杨成武，说：“你把这些材料交给主席，并把刚才所说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一下。”

杨成武赶回上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只说了句：知道了。

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他对王力的“八七讲话”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把杨成武找来，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

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很平静。而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处问是否还有别的指示。毛泽东补充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回北京后，直奔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的裁决。当杨成武兴冲冲地走进办公室，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做了个抓的手势后，周恩来略为沉思了一会，当即果断他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8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以后，又逮捕了戚本禹。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迫使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件绝密级的事。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对外宣布，在社会上也没引起什么大的震动，一般的人只知道王、关、戚一下子从报纸电台中消失了。但这件事在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中却不亚于10级地震。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更为可笑的是，此时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竞相“指责”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有学者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 二十三、忍辱负重撑危局

### 忍辱负重斗群贼

不分日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来自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周恩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忍辱负重作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煽风点火，篡夺权力。祖国大地顿时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严峻局面。在此关系到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周恩来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始终坚持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局势，消除动乱。他既要维持国家各方面工作继续运转，又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大忌恨，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周恩来与他们作了不懈的斗争。

### 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

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6月1日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并于6月3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所谓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大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名校、系领导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刘少奇于6月20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批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

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以“撂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泽东的“底”），又在7月13、19、22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三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24日，他在钓鱼台12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 江青迁怒于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嘟嘟不休他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周恩来8月30日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上来庆龄是第一位）。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挫败了江青一伙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险恶阴谋。

### 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宝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突然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于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在陈伯达讲话后，周恩来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谩骂，他关注他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疮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

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12月5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12月12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3日，康生恶狠狠他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14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的谩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周恩来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他说：“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同时，周恩来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惟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周恩来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口实，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绘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及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三个“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江青自恃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法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他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他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3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32名同学。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投进监狱。这次疯狂的搜捕，逼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举国哗然。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100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3个多

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都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周恩来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周恩来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翮在不在？”又问：“谁是孔丹？”他们都满眼热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翮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能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翮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丹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已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周恩来对孔丹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周恩来讲的话声音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周恩来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 “灭火”与“放火”的斗争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混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点钟召开，可是到8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师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

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师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革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可是，尽管有不同意见，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暗中背着有不同意见的人，兜售他们的私货，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这张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的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3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同年的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时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连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

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师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衷主义”。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主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 面对江青刺来的暗剑

江青公然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愤然反击。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周恩来临终前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随着大批老干部的被打倒，林彪、江青一伙在党内攫取的权力更大了。这时，江青一伙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更加迫不及待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的“绊脚石”。

江青公然叫嚣：“除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其他人都是可以打倒。”

### 江青扳倒陶铸之后 下一个目标是周恩来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此，全会期间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刚从广州调中央工作的陶铸协助他处理党和

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上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的后面、陈伯达的前面。这样，陶铸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央“第四号人物”。此后，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范围限制在文化教育和党政机关部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建设领域的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周恩来和陶铸的主持和坚持下，制定下达了一系列对“文化大革命”限制性的文件，颁发了许多规定。如9月份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0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11月《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企图格格不入，自然也就招致了这伙阴谋家的记恨。1967年1月4日，江青一伙突然以“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是叛徒”等罪名把陶铸打倒了。

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周恩来。他们对周恩来进行了轮番围攻和种种诽谤。

镜头一：对陶铸进行突然袭击的第五天，1967年1月10日，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说：“在毛主席旁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陈伯达的“把子”就是暗指周恩来。

镜头二：怀仁堂事件后，在对三位副总理、四位军委副主席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他被说成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复辟的总代表。为此，姚文元写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她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镜头三：192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来、叶剑英通过正面交涉，曾营救包括陶铸在内的近300名“政治犯”。陈伯达却授意北大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调查”，要把这300人打成“南方叛徒集团”，就像揪出薄一波、刘澜涛等北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那样。

镜头四：“中央文革”黑干将戚本禹向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指示：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出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总理为一条线，一件件查清，他是总后台。

镜头五：在张春桥的授意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题力《抗敌话剧九队的反动真面目》，攻击周恩来支持过的这个演出团体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并配发了一篇《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的社论。

镜头六：“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我的意见，是否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一触即跳：“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

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待？再逼死人，谁负责？”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派谭厚兰带 200 多人远征山东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在那里砸“周公”庙，向国务院发《抗议信》，那是“倒周”逆流的山雨欲来，那么，到此时此刻就已是“风满楼”了。

### 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 17 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 1966 年 9 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利用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 年夏，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 1932 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千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 5 月 12 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 30 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 年在延安整风会上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 5 月 17 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他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待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一把暗剑。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 年 10 月 31 日和 1963 年 12 月 27 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

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 毛泽东对“伍豪事件”的挑示

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转眼问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惟有他才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



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 江青“项庄舞剑”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8月，江青一伙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

1968年初，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等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显然，江青是在等待时机，可她又是一个“一触即跳”的人，耐性有限，时间一久，“倒周”祸心难免要露。1968年3月，江青以“项庄舞剑”之法，突然对周恩来发难，硬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诬为“特务”、“叛徒”。这一天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议。作为总理的卫士长兼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处长的成元功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来电话告诉成元功，说江青刚起床，要成元功在大会堂准备点吃的，先吃饭后开会。成元功依照吩咐，找有关同志准备好江青所要吃的，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里，并把此事报告了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时针指向4时，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都到了，就等江青一人。成元功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会议厅的门外迎候江青。4点15分，江青来了。汪东兴给她行了个军礼，成元功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会议在这个厅举行，你的饭准备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斜了成元功一眼，一字没说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

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

周恩来连忙作了解释。但江青不听，当着与会者与周恩来大吵大闹。会议开不成了，周恩来只好宣布休会，并同江青、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无理取闹，硬说是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她参加会议，是背着她在搞什么活动。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此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东兴同志，你把成元功叫来，当面说个清楚。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待成元功进来后，周恩来愤然道：“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

周恩来出去后，汪东兴要成元功把情况说一下。成元功把江青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胡说，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把孙占龙叫进小山东厅，孙占龙说：“是我打电话叫成元功准备饭的。”

江青更加恼羞成怒，拍桌子跳脚撒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江青把周恩来、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谈话。江青说：“成元功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周恩来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江青又武断他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就这样，由于江青的无理取闹，成元功被迫离开周恩来，进了“五七”干校。

## 天若有情天亦老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活。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72年6月，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在会上讲讲“伍豪启事”问题，并列入了会议议程。6月13日，陈云同志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等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苏区之后。”6月23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说明这纯是敌人造谣诬陷。

对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是：要把报告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记录稿及相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但是，会后江青一伙采取拖延的手段，故意把此事搁置了下来。也就是在这次会后，王洪文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7月17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同年冬天，上海有人证明 1932 年 2 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造谣伪造“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不足凭信。”但这一证明材料被张春桥等人扣压，不报中央。这一切都说明江青一伙陷害周恩来的贼心不死。

1975 年 7 月 1 日，医院。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和泰国总理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对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员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 x。”一句话，说得大家沉重得抬不起头来。

周恩来的这句话也表明：他自己不仅知道江青一伙陷害打倒他的贼心一直未死，而且也很清楚：江青一伙在他生前不能“打倒”他，在他死后也不会放过他。那伙阴谋家在他死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抛出“伍豪启事”这个“定时炸弹”，把“周恩来”三个字炸成无数个“x x”。

1975 年 9 月 20 日，病危中的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周恩来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次手术能否下得来手术台，很难说。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要来了 1972 年 6 月 23 日在批林整风会上所作的那个专题报告记录稿，这是他会后委托邓颖超根据录音亲手整理的。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时间和环境：“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 年 9 月 20 日”而后，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正义的声音冲出北京医院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上空，在亿万人民的心中久久回荡。这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一个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民公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邪恶势力的痛斥，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捍卫。

天若有情天亦老。

## 身边工作人员的遭遇

**忍字心上一把刀。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秘书隐姓改名，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汹涌如海**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革”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革”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革”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童小鹏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童小鹏：

“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童小鹏如实回答：“我不知道。”童小鹏还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人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的死去。

“文革”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他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他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革”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领导、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

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讨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漏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 17 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1. 到最基层去；2. 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3. 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是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贫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 24 小时，一个人得工作 12 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 二十四、开创外交新格局

###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

大军压境，中苏战势一触即发。两国总理机场紧急会晤，周恩来定调中苏边界谈判

#### 周恩来柯西金机场会晤

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心脏病在河内逝世。

中共中央决定派与胡志明私交很深的周恩来前去河内吊丧。

中央估计苏联将派二号人物柯西金赴河内吊丧。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的极端恶化状况，中央决定周恩来到河内要回避苏联领导人。

于是，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飞抵河内，与胡志明遗体告别后，当天就飞回北京。这样，当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已离开了。

周恩来此举，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联社华盛顿9月5日的电讯说：“美国一个不愿透露姓名、地位不低的官员对周恩来避免与柯西金打交道离开河内，感到非常高兴。周恩来避免会晤柯西金，不表明中苏冲突有任何新变化，而表明冲突糟到什么程度，说明整个中苏问题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

然而，就在外电纷纷对周恩来河内之行作各种猜测和评论之时，9月10日，我国驻河内使馆发来急电说：柯西金要在回莫斯科途中路过北京，要求跟周恩来总理会晤。还说要等回话。

霸权主义者的外交向来是欺软怕硬。5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1964年10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唤醒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在反华道路上的止步回头，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缓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在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迫使中国听任于他们的“指挥棒”后，他们进而诉诸军事压力。1965年以后，苏联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境，而且还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1968年3月，大批苏军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一场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了。

珍宝岛的枪炮声把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恶化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阵激烈的枪炮声中，勃列日涅夫等人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苏联武装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后，美国白宫的尼克松作出了调整对华政

策的大动作，向中国发出了若明若暗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心美国会利用中苏矛盾来对付苏联。珍宝岛事件后不久，美国驻苏联大使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了尼克松的一封信，并作了“美国无意看到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利用中苏分歧”的口头说明。这番表白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苏联内部困难也重重叠叠。对中国是否要用武力，苏联高层内部意见分歧也很大。

迫于上述压力，苏联要求与中国缓和一下。柯西金要求与周恩来会晤，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中共中央在接到柯西金的要求后，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让周恩来同柯西金会面。

在周恩来看来，柯西金在苏联政府内部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友好的，也是比较冷静现实的。据有关消息透露，国防部长安德列·格列奇科元帅积极主张使用几百万吨的原子弹，采取“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比较现实的柯西金等人不赞成这种计划，认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不仅仅只危害中国人，也会杀死远东的苏联公民和与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军方强硬派又提出用少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施行“外科手术式地打击”，但柯西金等人也认为不妥，弄不好会使苏联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其后果也许比美国在越南的结局更糟。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中国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局势。因此，周恩来认为，只要苏联人愿意坐下来谈判，并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但我们对苏联领导不抱幻想。

1969年9月11日10时50分至14时30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同柯西金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就中苏关系的紧迫性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当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嘛！五年前我送你到北京机场途中也说过嘛！”

柯西金说：“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

周恩来说：“目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点头称是。

谈到边界冲突问题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周恩来的话是肺腑之言。当时，那场“文化大革命”内乱就足以使中国忙不过来。

“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

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说到这里，周恩来不由得有点激动。他双目炯炯，浓眉直竖，语气掷地有声：“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最后，周恩来诚恳地提出：当务之急是在谈判解决问题以前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双方首先就此签订一个协议，进而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周恩来的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和中苏边界一触即发的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中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对此，柯西金也愉快地表示同意。

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仍力图继续对我国施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因而，柯西金与周恩来在9月11日达成的谅解遭到某些人的反对。

不久，柯西金在致周恩来的复信中回避了9月11日会晤时已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为此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并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如此，但周恩来与柯西金这三个半小时的会晤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下来。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与柯西金的这次会晤，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迫使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上迈出更大更积极的步



子，从而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 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1969年10月7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柴成文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草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周恩来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周恩来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1960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

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他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 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70岁的库兹涅佐夫。他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中国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柴成文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他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果然，10月20日谈判一开始，当我方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我方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恩来差不多三天两头找代表团成员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泽东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方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方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方代表团成员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柴成文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从9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 10 月 20 日谈判开始后不久，25 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 11 月 17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 1970 年 4 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11 月 24 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12 月 8 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 10 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 1970 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1964 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也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12 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方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 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

12 月 31 日的晚上 12 时周恩来召集代表团开会。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1968 年 1 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撞伤我边民 13 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 1969 年 3 月的流血冲突。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周恩来。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周恩来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在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 1970 年的凌晨。这是他 70 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

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恩来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方代表团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周恩来告诉中方人员，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中方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恩来一再向中方人员交代的方针。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周恩来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告诉我方代表团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奢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周恩来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看他们领导人的决心。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 瞩目世界的握手

面对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那一只手，周恩来表现出惊人的睿智和胆识，高傲的美国总统第一次甘愿为中国总理脱衣拂尘，尼克松、基辛格感叹面对的是一位外交巨擘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机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那震撼世界的历史性握手，使历史在一瞬间骤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关系乃至世界关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完整他说，长期互相关闭的中美关系大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这四双巨手的合力下缓缓开启的。

然而，在这四双巨手中，周恩来那双手的关键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在70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还说，要是周恩来拍着桌子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援，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否则就不同意同美国谈判，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将是怎样还很难料定。

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一个人物。

无疑，周恩来个人的风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谈判艺术给了尼克松、基辛格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尼克松、基辛格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外交巨擘

1969年2月17日，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

急电说：2月16日。在广东珠海附近的海面，抓到了乘游艇冲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陷入沉思。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我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来，中美对立近30年了。

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周恩来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从美国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调中看出了某些细微的变化。的确，自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确实有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图和举动。1月，尼克松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我们寻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他们的人们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2月，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尼克松这样做有他的考虑。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间搞点名垂青史的想法外，还有主动同中国和好以抗衡苏联的目的。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实力受损，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而处于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利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急剧向全球扩张，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苏联武装挑起中苏边境的流血冲突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如果中国失去了对苏联的威慑，那么美国对付苏联就更困难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尼克松真的有诚意和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也应作出相应的姿态。这不仅是出于中国一贯谋求与世界上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当前的利益来考虑。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已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苏联至少有一部分实权人物在考虑对中国进行轰炸，或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为了抗衡苏联，中国也需要改变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对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新动向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周恩来吩咐秘书，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我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后查清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这就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使尼克松受到震动。此事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时星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尼克松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要他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尼克松决心采取主动，加快与中国接触的步伐。

这样，就发生了1969年12月3日美国大使不顾斯文在华沙穷追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人员，吓得被迫工作人员匆匆躲避的奇特一幕。在那种动不动就会被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雷阳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绝对不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周恩来接到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给外交部关于斯托塞尔追着要与中方接触的电报后，忍不住笑了。他要外交部电告雷阳，可以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使馆做客。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对驻东欧使馆的人员与美国人接触应搞一个内部通报，以便使外事人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12月6日，周恩来在上报毛泽东后，又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名美国人。

周恩来也通过巴基斯坦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中断刚刚恢复不久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接触在沉寂了几个月后，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试探。

1970年6月，尼克松要美国驻法国大使去接触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官员，传达美国方面的意图：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方希望另外打开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感觉到华沙会谈容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辟渠道，同我国领导人对话。

7月，尼克松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采访时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他赞成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史密斯问：“在俄国同中国闹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从这种局

势中获得情报方面和外交上的最大好处呢？”尼克松坦率地回答：“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中国方面在美军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松再次发出愿意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后，提前释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国间谍詹姆士·华理柱，作了含蓄的回答。10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国庆节这一天，周恩来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周恩来还对《人民日报》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

遗憾的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号竟被尼克松和他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松又频频向中国发出更为明确具体的信号。他利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机会，托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要同中国和好，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的口信，并表示愿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

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对尼克松捎来的口信作了答复。周恩来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口头回答尼克松总统。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这就是我们的口信。”

1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时对勒受齐奥塞斯库委托转达的尼克松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去，为什么不可以到北京来啊。”

不久，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先后把周恩来的口信转给了尼克松。

正当尼克松在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的道路之时，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震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关系的沉重车轮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美两国都参加了。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周恩来周密部署，强调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全体成员。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代表团团长斯廷霍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

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弦外有音，既是讲给美国人民听的，也是讲给美国政府听的。

整个接见过程中，周恩来那潇洒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使在场包括有“嬉皮士”气的科恩在内的每一个美国队员无不感到由衷地的敬佩，并且对周恩来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消息传到白宫，尼克松、基辛格都惊呆了。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作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尼克松、基辛格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 基辛格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感叹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为此，他于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三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万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的中国“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



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拟出了各种对策。会议对党内部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捎给尼克松一个口信，并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报告（即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审批。可以说，这次政治局会议正式地、全面地确立了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送往巴基斯坦。口信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6月2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尼克松也眉开眼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

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

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下午4点半，周恩来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轿车悄然驶到了5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得弹簧一样。”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笑了笑：“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理查德·斯迈泽。”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48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来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

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月6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7月7日、8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7月6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

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这一些细小的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7月10日下午4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在这次会谈中，各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在这关节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问。

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

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1972年春天。

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

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48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7月11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给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让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同。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过别人。我同周见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

择。”

1971年7月15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有任何阐述。

这个公告的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 基辛格明白了周恩来方案的奥妙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和驾驭中美关系的进程，周恩来接见了有影响的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并与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恩来亲自审定了谈话记录，并同意在《纽约时报》发表。

周恩来详尽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要求，从而公开向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将了一军”。

谈到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时，周恩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愿意谈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当然，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

周恩来赞扬尼克松敢于冲破偏见、承担风险、首先访问中国的勇气。他说：尼克松这回决定要到中国来这一件事，别的党派也说别人是不敢的。从这一点上看，他还是有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的这篇谈话，起到了向美国总统施加某种压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当时，正当尼克松派基辛格为准备总统访华作第二次中国之行时，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国务卿罗杰斯坚决反对这项计划。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乐德看了周恩来的长篇谈话后评论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只能“提前实现，而不能推迟”。

尼克松、基辛格权衡再三，没有改变初衷。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9月13日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阴谋加害毛泽东败露，仓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中下旬，周恩来充分地估计到了林彪事件可能会给处于关键时刻的

中美关系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凭美国的情报网，尼克松一定知道中国国内发生了大的政治变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很具体。尼克松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放慢甚至后退迈向中国的脚步？这很难说。把林彪事件告诉尼克松，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让尼克松知道，中国在中美关系的态度上一如既往。

细心的周恩来几天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记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负责中美联系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开完会特意把将要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留了下来，郑重地对他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顿了一下，又说：“还有，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

周恩来还叮嘱说：“只告诉黄镇一个人。”

周恩来此举，意在向黄镇大使交个底。黄镇知道林彪叛逃，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姿态。这样，当美国驻法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与他联系时，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来所料。9月中旬以来，汇集到尼克松和基辛格面前的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中国所有的领导人没有公开露面，所有的机场都关闭了，军队也似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在担心会不会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震荡而影响中美关系，他们早就怀疑中共高层领导在对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尔特斯报告，说他和黄镇大使接触，黄镇的态度照样爽快，中国对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尼克松和基辛格悬着的心才算落下来。

10月16日，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坐上了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这次访华行动的代号为“波罗二号”，但这次行动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是秘密的，而是公开的、大摇大摆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访华的全部人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把人员分在四个等级。他和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细节；总统的特别助理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工作有关的问题；而对国务院的代表艾尔弗雷德·詹金斯，只是让他“有一种参与的感觉”，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政治讨论，尤其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虽说基辛格与周恩来已有过17个小时的会谈经历，中国对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与充满魅力的周恩来会晤，但是，当“空军一号”即将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基辛格内心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的预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飞抵上海。在机场迎接的只有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机场时，迎接他的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只增加了姬鹏飞代理外长。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这次访问已公开宣布，但欢迎场面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热烈。

基辛格坐上大红旗轿车，直驶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透过车窗，基辛格发现，沿途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还有几处写有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

尤其让基辛格不安的是，当他们进入国宾馆 5 号楼的住房时，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担心。他甚至怀疑起沃尔特斯从巴黎渠道传过来的消息是否准确。但基辛格毕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当即令人把所有房间的英文电讯稿收集起来，送交给中国方面的一位礼宾官员，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未作更多的反应。

其实，基辛格等人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直到见到周恩来才算结束。

周恩来听到摆放英文电讯稿一事，非常生气。他当即查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摆放这样的东西？”

礼宾司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

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告诉他们，那是‘放空炮’。”

这样，周恩来后来就给基辛格谈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开初还不太懂“放空炮”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有些宣传口号是“放空炮”，而没有实际行动。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当然，也不是什么事都放空炮，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基辛格对中国的这种奥妙的宣传辩证法还是似懂非懂。

一场虚惊过后，周恩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及其随员。他和蔼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后，请客人就座。接着，周恩来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就像老朋友似他说出基辛格的随员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并谈笑风生地赞扬他们的来访增进了两国友谊。轮到国务院那位詹金斯时，周恩来对他说：“你 22 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詹金斯听后非常感动。

随后双方顺利地就会谈议程和方式作了满意的商定。会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页。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先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很自然风趣地引出了基辛格上次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土”这句话，并赞扬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的“神秘的国土”，是件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笑着说：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听到这里，基辛格不好意思地笑了。同时也为周恩来的演说艺术叹服。

周恩来还说：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

周恩来这番祝酒词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言，完全是即兴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比正式的有稿子的发言更加贴近周恩来的风格。这些话非常诚恳、贴切，富有人情味，完全没有政治空谈和空洞的外交辞令。基辛格一行很为钦佩，



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快要结束时，周恩来潇洒地端着酒杯，特地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位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这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那特有的品格和魅力。

至此，基辛格等人刚下飞机时受到的冷遇感早已烟消云散。这也就奠定了这次整个访问期间热诚友好、礼貌周到的基调。这种基调对促进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以及双方信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怪乎有人说周恩来是一个高超的乐师，他总是善于在复杂的协奏中定下适当的基调。

在此次基辛格为期7天的访华期间，周恩来同基辛格举行了10次会谈，共23个小时40分。双方除了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谈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之外，还着重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总的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缓和的，进展也较顺利。

会谈一开始，为活跃气氛，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很别扭……”

未等基辛格说完，周恩来就摇了摇手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钦佩地说：“总理没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

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不见得，不要夸奖喽。”

接着，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均可。周恩来选定了2月21日。

在以后的几天中，双方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周恩来在谈到每一问题时，都是从历史谈到现在，全面阐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对此，基辛格十分佩服。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感叹道：“我很欣赏周恩来杰出的品格。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件，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会谈中，最富戏剧性的要算讨论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了。

基辛格来华之前，早已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这个草案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一套起草的，长约3000字。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公报草案是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搞出来的，他们自己非常得意自己的“杰作”。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他们提出了这一草案。

周恩来看了美方起草的草案后，很不满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指示章文晋另外起草对案，并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备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

点。

毛泽东也说，各说各的好。但他对章文晋起草的对案不太满意，说是“发言权不大”。周恩来又让熊向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了改写。

这样，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十分新奇。在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10月24日晚，新一轮会谈开始了。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我方起草的公报草案。基辛格听后大吃一惊，他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种谈判方式。

基辛格说：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时，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说到这里，周恩来建议休息一会，并意味深长地对基辛格等人说：“你们不妨对我们的草案再考虑一下。”

周恩来很有信心。基辛格作为一个外交家和谈判高手，他如果有诚意，就一定会理解和明白中方草案的妙处。

果然，基辛格领着他的助手们经过了一番紧急磋商后，豁然开朗。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复会后，基辛格立即告诉周恩来，美方同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基辛格又提出，中方草案中的“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过于僵硬”，有些文字火药味太浓，特别是其中有两句“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会令美国极为难堪。为此，基辛格建议删掉那两句话，美国在阐明自己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对等地删掉两句话作为交换。

周恩来表示：我们不是在做交易，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须改得叫我同意，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

周恩来这种从大处着眼而不斤斤计较的外交风度使基辛格很受感动。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给他看……企图在谈判中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然而，就在整个会谈差不多快要结束时，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使会谈出现了又一次裂痕。

周恩来一开始就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反复表示：美国不能背弃“老朋友”，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

周恩来冷峻地说：“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及两党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口气缓了缓：“既然中美关系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改变一些关系嘛。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善于引导航船迎着浪潮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怎能迎接新时代呢？”

会谈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基辛格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对基辛格的这一“发明”表示赞同。但是，美方坚持要强调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观点，且不明确表示从台湾全部撤走美国军事力量的时间。对此，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但可以留待尼克松访华时再探讨。

正当周恩来与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就台湾问题进行激烈争论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

于是，历史的选择又在周恩来和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大玩笑。

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么？”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博士，我看不见得吧？”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吃惊得怔了好一会，接着是一丝苦笑。

洛德在一旁慨叹道：“周恩来太厉害了，他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还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说：“你没听说啊？我在香港工作时，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的心情有点沉重，他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尼克松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中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尼克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当年拍摄的实况录像确实显示：身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两人走出机舱门后，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和他夫人两人走下。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两人的手紧紧握住在一起。

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拍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人才获准走出机舱。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这样的记述：“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陪尼克松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中不乏寓意。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

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10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

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尼克松坦率地说：“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对基辛格博士说的那样，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站立致祝酒词：“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答周恩来的祝酒词。饶有趣味的是，尼克松在致词结尾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愉快地碰杯。他们的杯子里装的是醇馥幽郁的茅台酒。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是尼克松最爱听的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特意指示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这首曲子。这又是周恩来过人的细密之处。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尼克松听到《美丽的阿美利加》，非常激动。他对周恩来说：“这是我1969年为我的（总统）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

周恩来举杯示意：“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尼克松更加兴奋地笑了。

随后，周恩来走下主宾席，到每一桌宴席上同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逐一敬酒。在场的美国人和太平洋彼岸的电视观众，都对此深为感动。

回到主宾席，周恩来指了指摆放在桌子上的画着可爱的熊猫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太好了！”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给了美国早晨的新闻节目。这下，周恩来送熊猫就成了这一天美国大多数人和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地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当然，在中国方面，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尼克松向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但是，尼克松又认为：有些地区，如果美国退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被苏联钻空子。针对尼克松的“真空”论，周恩来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6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印度支那问题也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从印支撤军。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持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周恩来耐心对尼克松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如果越迟就越被动，而且也不会使战争得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周恩来还几次以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都撤走了，是“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

周恩来针对美国想要中国对印度支那各国抗美救国斗争施加压力的想法，重申：中国一贯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

在苏、美两国军备竞赛问题上，周恩来对尼克松也直言相劝：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大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周恩来得心应手地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不由得使尼克松感到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感叹说：“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

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中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尼克松表示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

对尼克松的上述承诺，周恩来比较满意。但是，尼克松又强调政治方面有困难，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还不能丢弃台湾。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时间不多了。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的话也不全是大话。他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的确，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对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满意和愉快。这除了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外，还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给他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回味。在这短暂而紧张的7天中，中国给尼克松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尼克松自己回忆说：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可望其项背。”如果说，仅讲品格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系列追忆和评说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尼克松为何下此断语。尼克松说：“我同



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 15 个小时，此外一起吃午饭，赴宴会，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自若。“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 73 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求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词，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 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和自信的反映。”

尼克松还断言道：“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尼克松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观众十分惊奇这位东方大国的总理施了什么“法术”，不然，高做的美国总统怎会甘愿为其脱衣拂尘？！

其实，周恩来不懂“法术”，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人格与品性的魅力。

## 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访华，决意“达不成协议不回去”。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气呵成如闪电

### “尼克松冲击波”

50 年代中期，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尽管鸠山一郎有意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由于日本外受美国的压力、内受执政党亲美反华路线的制约，鸠山内阁对周恩来的建议未能作出积极的响应。这一等，就是 16 年。当 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以首相身份来访的第一人，不是鸠山一郎，而换成了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成为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首相，

由此也成为与周恩来感情深厚的朋友。

1971年7月16日，当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美联合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被“尼克松冲击波”搞得晕头转向。受打击最惨的，莫过于日本政府及执政的自民党了。日本政府长期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即使有阁僚愿意与中国友好，但在美国和台湾等问题上，不敢越过雷池，结果，美国在日本佐藤内阁积极制造“两个中国”的关键时刻，却来了一个漂亮的“越顶外交”，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显然嘲弄了日本政府及其外务省，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原先对美国一片忠心的日本自民党政府，在遭到“愚弄”后，感到后悔莫及。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川万太郎曾这样说过：“由于‘尼克松冲击’，日本领导层辨别方向的神经已完全麻木，脱离常规，乃至反复作出拙劣的举动，受到中国的冷眼。”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跨越海洋的握手。尼克松把在北京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日本的政局，也由此被“改变”。

6月，佐藤内阁在摇摇欲坠中声言要辞职。围绕自民党总裁选举，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四人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田中和太平是多年政友，个人关系亦十分密切，两人事先达成协议，支持得票多的一方。田中在竞争中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太平决意全力协助他，这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上态度都是积极而明确的。

7月5日，田中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当选总裁，次日，又在国会上被指名为日本新一任首相。7月7日，田中内阁组成，大平任外相。当天，田中角荣发表早已酝酿好的首相谈话，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尽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形势下，努力地推进和平外交。”外相大平正芳也表示：“为实现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有必要在某个时期访华。”

对田中内阁的这一态度，周恩来反应神速，9日晚，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致辞中谈及新成立的田中内阁，说：“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任期末满就宣布下台。7日成立的田中内阁明确表示在外交方面要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这一讲话，对田中角荣实现自己的宏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还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的7月3日，周恩来派肖向前出任新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7月11日又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以上海歌舞团团长的身份访日。不久，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访日。陈抗还向孙平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我之所以讲田中内阁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说过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论能否谈拢，现在都正是时候。你们要准确地掌握信息。孙平化已经在平地上建起万丈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前进。

## 邀请田中首相访华

田中角荣以“决断与实行”作为政治信条，他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点。这些，得到在野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日本国内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越发高涨的气氛中，田中也在积极寻找两国政府之间直接交换意见的渠道。首先替田中探路的是前社会党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

佐佐木更三在访华前，会见了田中角荣。他问田中：“在复交三原则中，如何处理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您打算怎么办呢？”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田中同意佐佐木把这一态度如实转达周恩来总理。7月16日至19日，佐佐木更三受田中角荣委托，到北京拜见周恩来。佐佐木更三向周恩来转达田中首相要求日中建交的决心和种种打算。当佐佐木说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说：

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

佐佐木没想到周总理如此体谅田中本人和田中内阁。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请佐佐木回国后跟在野党和友好人士谈一谈：如果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的；他们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的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结交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我们一向尊重首先和我们友好的人。佐佐木又一次体会到了周恩来“饮水不忘掘井人”的一贯作风。

佐佐木是信任田中的，他向周恩来“保证”说：

“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

周恩来以邀请的口吻说：“那么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吧。”

佐佐木立刻补充一句：“那是最好不过的，希望务必邀请。”

“如果田中首相来北京，欢迎。”在北京的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的话，周恩来早就说过。对田中角荣，当然是欢迎的。

谈到田中角荣访华时的待遇，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佐佐木：

“田中首相访华时的待遇，和尼克松总统一样。你说绕道香港不方便，所以，田中首相来的时候，就请直飞北京。”

直航北京的意见，又一次解决了田中的难题。佐佐木回国后，向田中如实地作了汇报，田中对此非常满意，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时机已经成熟。”在田中内阁成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作出这样准确的判断，不能不说田中角荣具有非凡的决断能力。

7月21日，周恩来指示仍在日本的孙平化：上海歌舞团将于8月16日乘日航和全日空两个航空公司的专机直飞上海。这一安排，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实际上是为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直航北京作一次预演。

为探明中国方面在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等方面的态度，田中角荣又委托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面见周恩来。

7月27日，竹入义胜在与田中首相密谈后，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昼夜兼程地赶到北京。当天下午，周恩来就和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竹入义胜。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竹入说明了中方与田中在一个具

体问题上的分歧：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竹入解释：“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

周恩来接着说：

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

竹入说：我们也是作这样解释。

周恩来还是放心不下地说：

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

接着，周恩来简述了中国历史上有关正统和偏安的政治演变。最后说：

“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

竹入表示：“我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竹入在京期间，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提出了中方的建交方案，竹入作了详细的记录，他后来披露了自己的心情：“写着写着，感到吃惊，手都发抖，心想复交可以实现了，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

在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中，中方既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充分考虑到日方的立场，对日方的意见给予了关照。

8月初，竹人回到日本后，向田中、大平作了详细汇报。田中角荣看着后来流传日本政界的“竹入笔记”，不由得喜形于色，感慨他说：“周总理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大平正芳也对竹入连声说：“辛苦了，谢谢。”随后，拿着“竹入笔记”奔向外务省。

### 田中叹服：“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进入1972年8月份以后，中日双方都似乎预见到了邦交正常化的确切日子，都在加紧工作。8月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再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传达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次日，中国迅速作出反应，由外长姬鹏飞公开宣布：“周恩来总理邀请田中首相访华，欢迎就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8月15日，田中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会见孙平化、肖向前，表示接受周总理邀请，将于9月下旬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商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为了9月份的历史性会见，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9月9日，古井喜实受友太正芳的委托，携带日本政府根据“竹入笔记”的基本方针起草的联合声明方案，抵达北京，与中方进行最后的调整。

日方方案对结束战争状态和三原则问题大意是这样的：

(1) 关于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与中国结束战争状态，已在日台条约中解决，无须再重复，而由中方再次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方予以确认。

(2) 关于三原则问题。日本方案在正文中表示：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此立场表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日方方案正文中对废除日台条约没有表述，对台湾归属这一重要问题，更是一句也没有涉及。9月12日，古井喜实在会见周恩来时递交了日本案。9月20日午夜0时15分至凌晨2时1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发表意见。周恩来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写入联合声明。他说：“我们认为，这次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表示结束战争状态。古井先生，你认为不是这样吧？”他明确地告诉古井：“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自联合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但在措辞上，周恩来又灵活对待，不使田中内阁难堪。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周恩来要求日本方案中写上“遵循波茨坦公告”的条文。

经过讨论，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在联合声明中增加前言，写入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等内容。

周恩来以既坚持原则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又采取灵活策略的做法，实现了对田中内阁“将有所照顾，不使日本政府为难”的承诺。对此，田中角荣这样评价：“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离田中访华越来越近。9月18日，周恩来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接见了以日本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访华代表团。这个团肩负着先遣队的使命，为田中首相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打前站。周恩来说：

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由民主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你们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祸害。今天恰巧是9月18日，41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现在，两国握手，这是历史性的转折。新时代已经到来，应当继续前进。

尽管小坂代表团中既有赞成邦交正常化的，也有反对邦交正常化的，但周恩来这番话，使他们全都站起来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当众赞扬了田中，说：“田中首相很善于搞统一战线。我想，他不仅具有在国内搞统一战线的能力，也有在亚洲搞统一战线的能力。”

小坂幽默地回答说：“我要原原本本地把您的话转告给田中首相。不过，今天记者也在场，电波会把您的话传输到日本的……”

周恩来也笑着说：“小坂先生也可以用电话转告嘛。”

很快，电波传到日本，田中角荣惊叹周恩来对自己如此的褒誉！一周以后，田中首相踏上了直航北京的专机。

田中派的一个议员说，他从未见过田中如此紧张地登上飞机。他说田中的想法是：“中国在亚洲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的大国。日本政府必须要打开一个窗口，使自己想说的话能够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但谈判对手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就非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活着的期间进行不可。”

首脑会晤，“求大同，存小异”

1972年9月25日上午，周恩来带病前往北京机场，迎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当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总理紧紧地握手时，军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这歌声是欢快的、高昂的。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田中角荣一行的主要官员。随后，在安徽厅和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一次限制性会谈。会谈主要在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之间进行，而一些具体细节，则由两位外长再行斟酌。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为田中角荣一行设宴，并发表了意义深远的祝酒词：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对此，田中首相相应地作了答词，说：“我深信，即使我们在立场、意见方面存在小异，但只要日中双方达到大同，按照互谅互让的精神，消除意见分歧，是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是，田中的答词中却有一处明显不妥，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何止是“麻烦”？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词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立场坚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解释道：“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田中诚恳的态度，周恩来是欢迎和赞赏的。9月26日、27日、28日，周恩来又与田中首相进行了三次限制性会谈。双方除了共同点以外，分歧也是明显的，但是，用参加会谈的日本方面二阶堂官房长官的话来说，“两国首脑以惊人的坦率进行了讨论”。

9月26日，在钓鱼台宾馆举行的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周恩来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中日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要建交，如同大平外

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集团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无法解决。那样，蒋介石就变成“正统”，而我们却成为“非法”了。这次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来北京，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

在整个谈判中，太平正芳为田中角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来华之前，田中就把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大平外相；大平也说过：“我和田中首相是同心同德的挚友。”

来华之后，田中相比之下显得悠闲一些，他常在钓鱼台国宾馆里作汉诗，还向身边人说：“有大平君在办，就没问题。如果达不成协议，还可以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不达成一致意见，就不回去。”后来周恩来也曾这样评价大平正芳：

“为人诚实，不说假话，虽不善口才，但内秀博学。他一心一意辅佐田中，可谓有大平才有田中，有大平才能恢复中日邦交。”

会谈到了9月27日下午。双方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 周恩来手书“言必信，行必果”

这天晚上，田中角荣突然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田中万分惊喜，能与毛泽东会面，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幽默地对田中等人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田中：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众笑）

大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指田中）你有病，请他去治。（众笑）

田中：这次周总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田中：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就不满意啊。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这是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

田中称赞廖承志在日本很有影响。毛泽东请廖承志当翻译，并问：你是

日本生的吧？

廖承志：是。

毛泽东：如果你们要，把他带回去嘛！（众笑）

……

一阵阵的笑语欢声，从毛泽东的住处传出来。两国领导人的愉快的会谈，表明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等访华代表团时，就曾期望和预言：“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问要做的东西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

以“以民促官”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终于结出了硕果，两国领导人当然非常高兴。这香槟酒，虽然鸠山一郎和重光葵没有喝成，但田中角荣和太平正芳却赶上了。周恩来知道田中喜欢喝中国的茅台酒，便在毛泽东的住处吩咐服务人员上茅台，以中国的国酒代替香槟，体现“中国特色”。他还告诉田中：这茅台酒是高度酒，放在碟子里，用火柴一点，可以燃烧起来。田中也有他的招数，他不仅学会了喝茅台，而且喜欢喝中国绿茶，因此他说：“喝了茅台再喝绿茶，就中和了。”几天以来，周恩来得知不喜欢吃西餐而只吃日本菜的田中角荣，对中国菜很称道，并顿顿吃得很开心。周恩来对田中又多了一份亲近感。他端起酒杯，提议宾主一饮而尽。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了最后一次限制性会谈。就日本如何处理日台关系问题，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方法，他说：

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

“言必信，行必果”，语出《论语·子路》。子贡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士”，孔子回答了三种人，“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其中之一。周恩来借此期望田中角荣做一个说话算数，行动坚决的人。说完，周恩来还走到桌前，用毛笔亲笔写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送给田中。

9月29日上午，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升起，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都沐浴在晨光里。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中，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并排坐在摆着中日两国国旗的条形桌边。中外记者都在拍摄着这一历史性的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恩来、姬鹏飞与田中、大平互致问候，然后各自从砚盒中取出毛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然后交换了文本，握手祝贺。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即“开罗宣言之条款必将实施”）；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签字仪式结束后，太平正芳根据田中角荣的指示及其向周恩来的承诺，立即在民族文化宫大厅设立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宣称：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紧接着，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和大平等人乘专机前往上海访问。原先以为“达不成协议就不回去”的田中角荣，这时却异常的安详，在飞机座位上便打起了呼噜来，一直睡到上海，他把与周恩来交谈的任务又交给了大平外相。

到达上海后，周恩来陪同田中一行参观了上海的马桥人民公社等地。田中着急回国向自民党汇报他的访华成果，因此第二天一早便从虹桥机场登上了回国的专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田中内阁成立到完成田中访华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从7月7日田中声明到9月29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建交联合声明，只用了82天。这是国际政坛上闪电般的速度，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家中少见的英才。对他，周恩来是钦佩的。

## 周恩来的遗憾

田中的专机远去了，但是周恩来却期待着再一次与他会面。在这次会谈中，田中曾邀请周恩来访问日本。当时周恩来问田中：

“上野公园的精养轩还在否？樱花是否像旧时一样年年盛开？”

周恩来颇有旧地重游之念。然而，这年5月，他就已经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本来就日理万机的他，更要加快自己的工作节奏，超负荷地工作，与病魔争朝夕。再加上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危难中，国内的事情无法脱身。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重游日本。值得庆幸的是，中日建交后，周恩来与田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挂念却日益加深。

1973年4月，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廖承志受周恩来的派遣，将率中日友协代表团出访日本。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谈话快结束时，他突然问：“田中首相送来的樱花树长势怎样？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廖承志同志见到田中首相时应该当面汇报。”廖承志深深体会到了周恩来那细密的作风和对田中首相细腻的感情，他当即派两位同志驱车到栽种樱花树的几处公园察看，并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廖承志到了日本以后，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向田中首相汇报了樱花树的长势情况，并从随身携带的小本中把几枚压平了的樱叶送给田中首相。田中接过樱叶，激动不已，他深感周恩来是那样的重友情。仔细端详了一番后，他又叮嘱秘书要妥为保存这几枚珍贵的樱叶。

这年6月27日，为进一步打破少数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中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对此，日本外交部向我国有关方面提出抗议。但田中首相是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的，因为他在北京时周恩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很快，田中在日本众议院答辩时为中国做了解释。

周恩来迅速获知此事。6月30日，他在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时，对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说：

“希望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说，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在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问我国时，我同他们谈到了我们的核武器是自卫的，决不首先使用。他一直相信我这个话。日本是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正如田中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

周恩来这番话，小川平四郎大使转告给了田中首相。田中了解，中国有几亿人，核试验的尘埃如果有害的话，首先他们自己先受害，他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

中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但周恩来总是说服田中等人，要从大局出发。他曾对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说：“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中日和平友好是大局，台湾是小局。不要因为台湾这个小局妨碍大局的前进。小局要服从大局，不能大局服从小局。要名正言顺。”1973年10月10日凌晨2时，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对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日本朋友说：“一个人做事果断的话，总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我钦佩你们首相、外相在恢复中日邦交问题上的果断。道路是不平坦的，总是曲折的。”这些话，充分地理解了田中的处境，同时也是为田中鼓劲。他还说：“最近还有七十几个议员跑到台湾去，当然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两国政治关系常常是有曲折的。我们基本上从去年建交以后结束了半个世纪的不正常状态，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前途是扭不回去了。”

为了使中日关系的前途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周恩来在病中仍然煞费苦心工作。他晚年接见的来宾中，以日本朋友为最多。他病中最挂记的，是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他曾多次说过，“在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我想去日本看看。”然而，自从1974年6月他住进医院后，不可能出访外国了。

1974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川崎秀二等日本朋友时，川崎提出，希望周总理访问日本。周恩来为难他说：

“现在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欠的帐太多了。所以我跟人家说我出不去了。我东边不能超过日本、朝鲜，西边不能超过巴基斯坦、阿富汗，南边不能超过越南、缅甸，北边不去了。再往西、往南、往东走还有很多国家我都欠帐。”

这就是说，他哪儿也去不成了，病魔对他是无情的。

这年12月5日，他在医院里会见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时，又一次表明对日本的眷恋，说，“50年前，我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日本回国的。”池田趁机再次邀请：“欢迎您于樱花盛开时再次访日。”周恩来遗憾地说：“虽有这样的愿望，但恐怕难以实现了。”

## 二十五、解放干部批极左

### 果断机智地处理林彪事件

建国以来特大的武装叛乱阴谋，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为何不打林彪的飞机？周恩来说：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两年前刚被党的九大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被新党章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因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败露，私调飞机，仓皇出逃叛国。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难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 林彪铤而走险

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林彪恼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他还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彪不思改悔，决意铤而走险，妄图用武力进行篡党夺权。

1971年8月，毛泽东坐专列外出南巡。林彪集团磨刀霍霍，阴谋刺杀毛泽东于南巡途中。9月8日，林彪下达了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林立果亲往“督战”，曾先后六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行动方案。但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觉察到林彪一伙的活动后，命令专列风驰电掣，一路不停，于9月12日下午安全返回了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林彪、林立果、叶群等顿时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林立果捶胸顿足，嚎陶大哭；林彪面如死灰，两眼发直。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12日晚，北戴河联峰山96号楼，林彪住地，灯火通明的一片忙乱被一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10点钟刚过，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领着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来找负责林彪住地警卫工作的8341部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姜大队长，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指林彪），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失去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同姜作寿来到楼外的一片小树林里，急切地说。“你说的这些可靠吗？”姜作寿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我该怎么办呀？”姜作寿又问了林立衡一些情况，联想到今天晚上的一些反常情况，顿感事关重大，立即用电话向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作了报告。张耀祠立即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报告。汪东兴又立即报告周恩来。

### 周恩来的机警

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周恩来正在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林彪

集团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也都在座。

10时3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中央警卫局来电话，有重要情况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地方——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我是周恩来。”

话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据林立衡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叛逃，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点，目的地是广州。……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上从北京同时起飞。”

周恩来大吃一惊。

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林彪及其一伙有预谋地搞“突然袭击”，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比较“客气”，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这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目的是给林彪一个台阶下。据此，难以推断林彪会走到叛逃这一步啊！

然而，报告林彪要叛逃的恰恰是林彪的女儿。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

林彪要叛逃，这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许多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周恩来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在情况不明的危急关头，要求在瞬间片刻对一件如此复杂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素质的全面检测。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作出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作出的惟一的正确决断。

随后，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没有，绝对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又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夜航试飞是胡萍欺骗周恩来的谎言。

周恩来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 96 号——林彪的别墅里，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 11 点 22 分，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

“总理啊，林彪同志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

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

周恩来：“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没有，林彪同志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本意是想来迷惑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却为周恩来证实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阴谋。”周恩来放下电话后，立即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周恩来的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这架飞机封锁起来。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时，将周恩来的命令篡改为：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口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据李作鹏后来交待说：周恩来当时还指示他：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周恩来）去电话。

周恩来还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 林彪仓皇出逃

周恩来封锁 256 号专机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他们一片惊恐，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有人向中央作了报告，他们的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林彪、叶群、林立果本来安排 13 日晨携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飞往广州。但为掩盖真相，林彪却故意说：明早 6 点去大连，并让人打电话问房子准备好了没有。

就在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之后，周恩来下令封锁飞机不久，晚 11 点 40 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急忙到林彪那里，叶先进去同林说了几句话后，再让李进去。林对李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叶群说：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叶群出

来催李快点调车，越快越好。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李打电话通知部队，林立果将电话按住说：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李还听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晚 11 点 50 分左右，林彪对公务员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司机杨振刚随即将车开来。刘沛丰先上车，林立果随后坐在第二排。叶群上车后，林彪连帽子、大衣都没带最后上车，他俩坐在第三排。李文普上车后坐在第一排司机旁。将近午夜 12 点，汽车离开 96 楼，李文普在车上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了。这时，李才醒悟：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去苏联。

汽车下山经过 58 楼时，路边有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司机就按喇叭加速冲过 58 楼。过了挡车线约 100 米，李文普突然喊停车；随即跳下车。车里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其左臂。李也向汽车前门还击一枪。挡车的警卫部队战士见车停了便追了过去，也对汽车打了两枪，只见车门未关好就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13 日零点 22 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没等客梯开来，便顺着驾驶舱放下的吊梯一个个爬了上去。机组人员还没上齐，舱门未关好，飞机就急促起动、滑行，于零时 32 分起飞。

林彪等是 11 点 50 分离开北戴河住地的。11 点 45 分，8341 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 7 个人乘吉普车先一点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高速轿车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办法阻止起飞，而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林彪的汽车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 部队按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 8 辆车 70 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领追林的车。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他们将未来得及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和程洪珍等人交机场看管。将林彪、叶群未带上飞机的东西带回北戴河，听候中央处理。

## 果断、机智的处置

几乎在林彪座机起飞的同时，周恩来陆续接到了林彪强行起飞的报告。

从 12 日晚 10 点 30 分到 13 日零点 32 分，仅仅两个小时的功夫。在此期间，周恩来一直没有惊动毛泽东。他知道，年近 80 岁的毛泽东在 12 日傍晚才回到中南海，一路劳累，需要休息。但是，没想到事态的发展竟是如此之快，到了非报告毛泽东不可的时候了。周恩来果断地下达命令：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派杨德中（8341 部队政委）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随后，周恩来驱车直奔中南海游泳池。

中南海游泳池，周恩来向身穿睡袍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凝神沉思。

军委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零点 46 分，航向 310 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现在飞机时速 550 公里，高度 3000 米。方向正北。”

空军指挥室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为了最后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还用无线电亲自向 256 号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喊话，但潘不回话。周恩来又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 256 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传到 256 号飞机的机舱里，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13 日凌晨 1 点 10 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1 时 55 分，256 号飞机在中蒙边界 414 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又过了一会，256 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林彪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周恩来断然下达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回到人民大会堂，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作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毛泽东也被从中南海接到人民大会堂，所有政治局委员一律在大会堂集体办公。随后，周恩来又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打电话，既含蓄又清楚地通报林彪叛逃情况：“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北逃叛国了，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9 月 14 日下午 2 点，连续忙碌了 50 多个小时未合眼的周恩来刚刚睡下，便接到了外交部送来的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报告：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 13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林彪座机（当时我驻蒙使馆也不知道），但是，周恩来已猜到十有八九了。他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随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消息。

### 保持国内政治稳定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失，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进行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挺而走险，挑起暴乱。

9 月 14 日下午，周恩来接到我驻蒙使馆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将报告用 3 号铅字打印 18 份，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

内，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周恩来亲自启封；今天驻蒙使馆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9月14日，我驻蒙使馆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路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站长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该边防站站长把这一消息逐级上报到军区。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将这个边防站站长隔离起来，并限令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9月20日，我驻蒙使馆奉国内指示派使馆二秘孙一先送林彪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孙一先的汇报时，看到只来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我回来！”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一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刊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于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继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举国上下发出了阵阵欢呼。

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林彪叛逃情况。散会后，周恩来到大会堂南门准备上车。参加会议的许多人还等在那里不走。他们看着周恩来满脸倦容，都眼含热泪，纷纷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总理，有你在，这是人民之大幸。”这不仅仅是民主党派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心声。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林彪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对他的信任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林彪集团权力的措施，警惕发生不测事件，但未曾料到林彪竟会采取那种极端卑劣手段。直到9月12日夜林彪飞机起飞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当时林彪地位是处于周恩来之上的“二把手”，而黄、吴、李、邱尽管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但仍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处置



林彪叛逃事件各项措施确实是正确的、机智的。

周恩来在林彪的飞机起飞前，相机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转来的林立衡电话报告后，他一方面令8341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方面打电话找吴法宪、李作鹏查问是否有飞机出山海关机场。查明这架飞机是私自飞出去后，便令其立即飞回，为防止意外特规定不许带任何人回来。接到叶群谎称没调飞机后，周恩来下令封锁这架飞机，同时通知有关部门，林彪要走就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这些措施都是周恩来职权范围内的事，如能落实是可以防止林彪逃跑的。

在毛泽东住处下达全国禁航令，控制全国局势。9月12日晚12时，周恩来陆续接到林彪乘车强行去机场，开枪打伤警卫秘书，飞机强行起飞等情况报告后，认为事态已很严重，必须亲自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行前将杨德中、李德生派往西郊机场和空军司令部，都是必要的有效的措施。在林彪的飞机飞越国境时，在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全国下达了禁航令，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这样就可以避免再有飞机出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京危害中央。林彪逃到国外后，很可能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司令员通报情况，使全军处于必要的紧急战备状态。这样直接控制了全国局势。

林彪要越境时，毛泽东、周恩来不采取拦截措施，是正确的。“让他去吧！”也表明毛泽东有宽阔的胸怀。林彪自行出逃走向毁灭，完全是咎由自取。

“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毛泽东确实是想挽救林彪的。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比较严厉地批评了林彪一伙人，但目的还是想挽救他们。他明确说：对这些人还是教育的方针，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有错误不要紧，允许改正错误，回北京以后，还要找他们谈谈。毛泽东还说：如果林彪承认错误，还可以当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安排下，几乎一枪没放，一滴血没流，就粉碎了建国以来特大的武装叛乱阴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 关键时刻批极左

关键时刻，毛泽东把重权交给了周恩来，政治局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周恩来高举利剑，在干部、经济、文教等方面大纠“左”。两种力量来回大较量

### 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之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

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夺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健康力量愈显势单力薄。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沉着、机敏、果断的领导指挥才干，更令人钦佩不已，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即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断。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为便于进行全面考察，有必要将这一斗争过程向前延伸，增加“九·一三”前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内容。这样，全部斗争共由“先声”、“展开”、“深入”、“继续”和“尾声”五个阶段所组成。

## 斗争的先声

林彪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67年，他就表示反对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更加明显：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建国20年来成绩是“主要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百思不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者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动力，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

1970年7月，他亲自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

的通知，指明张是革命干部，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和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同年10月，他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肯定了王诤的革命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不仅是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江青集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领导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1970年9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同年11月，周恩来又连续就外语教学发表谈话，要求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提倡多练、苦练的基本功，强调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197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

1971年初，在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经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四五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在经周恩来批示下发的对外宣传的大量文件中，比较突出地揭露了不实事求是、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据此，中联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深入批判“极左的反动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以改变对外宣传工作的不适应状况。

7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17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体育、卫生、科技等部门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

一再肯定这些战线解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给予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领导权，从批判陈伯达入手，使林彪集团日趋暴露，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 斗争的展开

1971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2年“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职责、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反，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根据他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改进。“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

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1971年12月，在进一步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好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守所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进而使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许多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以挽回损失。如这一年11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毛泽东此举无疑是在向全国发出信号：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都是好的，都应一律解放、平反。这一信号，也正是周恩来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亟待看到的。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10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于是，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在这篇社论中，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之后，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1972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力量。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联系这些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一伙严重破坏的事实，反复强调：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

彪放纵起来的；他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以上，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对此，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年初，张春桥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的举动，正表明江青集团嗅觉极其灵敏。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围绕坚持与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

## 斗争的深入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此前，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经历了5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来说，思想认识中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这是因为，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的东西，肯定并恢复为林彪一伙破坏的许多合理、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又要求人们从指导思想上去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继续批判“文化大革命”前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必然在人们头脑中造成混乱，使得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使人们无所适从。

例如，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中，许多部门提出要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认为既要反对“生产第一”、“业务挂帅”，又要批判空头政治和技术无用；既要反对“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又要批判“撒手不管”的无政府主义；强调要反对把革命和生产、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等等。这些认识，在林彪事件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在极左思潮仍然存在，其恶劣影响亟待肃清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说是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而使反倾向斗争失去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局限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了要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随后，周恩来又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8月初，针对林彪一伙在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思想混乱，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同时，根据他的指示，外交部开了以批判无政府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外事会议，周恩来亲自到会作报告，再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还会犯错误”，“如果在对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以上周恩来关于内政外交的一系列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

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此，他从启发人们的思想认识入手，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进而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提到在北大传达了总理讲话后，广大教师都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多数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该信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心理状态。这些，也正是周恩来所指出的“障碍”所在，因而从一个方面表明在教育、科技界“批透”极左思潮，解决人们思想认识的极端重要性。

7月23日，周恩来在就周培源的来信写给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的批语中提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之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作出修改、讨论、上报的指示，督促尽快加以落实。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公开表明了这一时期周恩来所致力于肃清教育、科技界极左思潮的强烈愿望，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在教育、科技界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指示，努力扫除思想障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之际，《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多次讲话精神，组织了一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于10月14日发表。

以上周恩来从教育、科技界和舆论宣传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极左思潮的事实，充分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

斗争引向深入并坚持到底的决心。这就必然地要引起江青集团的激烈反抗。如果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里，江青集团对周恩来领导的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斗争还仅仅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他们则是集中力量开始向党和人民实行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甚至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的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几篇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一伙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这些文章后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回潮抬头。”江青更是画龙点睛地说：“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与此同时，江青一伙还一再查问这些文章的“背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这一年11月间，《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两期登载批驳龙岩等的文章，江青集团借机在《人民日报》社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由此逐步控制了原由周恩来领导的《人民日报》。这样，在坚持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开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同年11月底，双方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彼此“摊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批判和肃清，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即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他一方面诡称“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另一方面又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对报告的批语中更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这里，江青一伙故意避开问题的要害，即林彪集团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他们侈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意在把“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一伙分开，以免深入批林会牵连他们这另一伙“极左派”，进而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演出了这场掩耳盗铃、以进为退的把戏。

应当说，周恩来与张春桥、江青对外事会议报告所作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批示，标志着自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是1972年前后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 斗争的继续

当斗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出于对江青集团大反“右倾回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一系列做法的不满，于12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



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王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促使由毛泽东出面，对前述正在激烈交锋的两种不同意见进行最后裁决的作用。当然，王本人也希望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作为在指导思想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是不可能站到周恩来一方的。12月17日，他在对张、姚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认为王若水信中的观点不对，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回避了林彪集团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仅是用其覆灭前的某些集中表现及其覆灭的最终结果，去抽象地概括这个集团一贯行为的特点和内容，因而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当然，这也是毛泽东不愿从根本上推翻自己“左”的理论和实践，担心批极左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自“九·一三”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整个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早就对周恩来心怀不满的江青一伙，这时更是有恃无恐，开始公开向周恩来发难。此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等词。1973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更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在运动中，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这样，就等于给江青集团在批林中免受牵连上了“保险”，为其实现后来的进一步反扑开了“绿灯”。

毛泽东的最后裁定虽然使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这一文件的起草和讨论，表明了周恩来实事求是、坚持在经济工作中继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努力消除其破坏性后果的果敢精神。在文件讨论过程中，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惟有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等人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提出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在同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外事干部学

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是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研究了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批准同意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自然，这在后来引起毛泽东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的不满。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周恩来这一光明磊落之举，使在场的外国专家们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即毛泽东否定批极左意见的次日，周恩来就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同时，对当时“大闹怀仁堂”一事解释为“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者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意在说明事实真相，以保护谭。此外，周恩来还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则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借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继续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批所谓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等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力不从心。

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其间，对周恩来进行极其露骨的诬蔑、中伤。为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的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危难之秋举“邓公”

危难之秋举“邓公”，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邓小平重返政治局，周恩来住进了三五医院

## 权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落入于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溢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

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

周恩来以最快的速度激动地要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

追悼会上，里穿睡袍、外罩大衣的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指出，不能把邓小平的问题搞成敌我矛盾。他说：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将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

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情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会上，经过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锋，终于在3月10日通过了这一决定。会后，周恩来立即写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及国务院副总理的情况，同时提出：由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出来工作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6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招待会结束后，世界各国记者都匆匆奔向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

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启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 把邓小平请回政治局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猜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复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份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了这一重大决定。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

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在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一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种种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去，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一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亲自到首都机场为邓小平送行。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而是凝聚着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深情厚意以及为扩大邓小平在国际国内影响的良苦用心。

按照医生的要求，病重的周恩来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为了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为了提防江青一伙趁邓小平出国期间在国内搞鬼，周恩来坚持不住进医院。他有时白天工作，晚上治疗；有时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办法来

维持工作。直到邓小平参加联大会议归来后，才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

## “解放”175位将军

毛泽东拍案而起：怎么打倒了这么多干部？周恩来组织突破，175位将军被“解放”

风云变幻的北京，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 选定突破口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无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3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



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他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 巧妙的解决方式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帐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

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越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 要害之处见分晓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例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出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纳，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

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 1973 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著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怎么办？”李德生问。“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他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满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果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也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现在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 175 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滚滚而过的“春雷”

十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国专家工作被“左”得七零八落。周恩来重新拨正外专工作的航向。1973年3月8日那滚滚而过的一声“春雷”，连同周恩来的名字一起，深深镶嵌在外国专家的生命里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以横扫一切之势席卷中国大地时，它殃及到的并不仅仅是炎黄子孙。

在中国，尤其在首都北京，居住着许多来自五大洲的外国专家。他们肤色不同，语言和种族各异，却怀着同样的心愿：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建国后的十多年里，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这支专家队伍的规模和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50年代中苏合作鼎盛时期，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之多。到“文革”前夕，居住在北京的各国专家，总数为几百人。

这个人数算不上庞大的群体中，有许多专家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爱泼斯坦、路易·艾黎、马海德、柯鲁克夫妇、汉斯·米勒……他们几十年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在黄土地上度过了大半生。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国籍。还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外国专家，受我国文化、经济部门或大专院校的聘请，根据协议在受聘单位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知外国专家的特殊作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是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恩来便亲自过问外专工作，于1954年确立了以外国专家为主体的外专工作体系，制定了一系列外专工作方针政策。同年，经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在北京西北郊建起了一座绿树掩映、规模宏伟的园林式宾馆。它以接待外国专家为主，取名为友谊宾馆。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与外交家，周恩来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地给外国专家以准确评价。1960年，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突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即使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周恩来仍然从大局出发，将苏联当局和外国专家区别开来，亲自出席苏联专家的送别宴会，并发表祝酒词，肯定了苏联专家的历史作用，相信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长存。

可是，“文革”风暴一经刮起，周恩来再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十几年精心建立起来的外专工作体系被冲得七零八落，各级外专部门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外国专家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理解”，便被裹挟进“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这种混乱状态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期……

### 拨正外国专家工作的方向

1970年8月，与中国政治密切相连的庐山又一次风云变幻，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发起“突然袭击”，迫不及待地企图“抢班夺权”。

毛泽东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周恩来的有力辅佐下，扼制了林、陈集团的嚣张气焰，使极左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极左思潮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抓紧这短暂的有利时机，为拨正共和国航船做些切实的工作。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冒着初冬凛冽的寒风，出席了有高校负责同志参加的外语教改座谈会。

周总理听取了高校同志的汇报，他特别关心在华外籍教师的处境。当他听说许多外籍教师在学校里处于被闲置和隔离状态，中国师生不敢和他们讲话，更不敢交往，实际是“靠边站”时，周恩来指出：同外国朋友的来往如何改进，是时候了，该提到日程上了。他指示要把这作为一个问题，同外交部研究一下，尽快解决。

十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又一次谈到了在华外国专家问题。他分析说，现在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外交人员、国际组织和侨民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华社、广播局、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高等院校工作的外国专家，要专门研究如何对他们做工作。对外国人要一分为二，不要因为个别人有问题就“一个老鼠坏一锅粥”，连《参考消息》也不让他们看，连外国语也不敢讲了。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督促下，外国专家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左”的桎梏却难以在人们的头脑中消除。1971年5月31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就外事工作的各种错误倾向，发表了长篇讲话。

周恩来说，要警惕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首先是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外宾问题。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我们当作客人欢迎，可是对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反而不理人家，比一比，我们怎么能够不做自我批评？

周恩来举了许多具体的事例，其中一个英国老太太的命运，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

她叫露丝·史密斯，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史密斯早年就信仰共产主义，曾参与创建了英国共产党。1962年，史密斯已经71岁了，她不顾年高体弱，离别亲人来到中国。史密斯先在外文局工作，后被新华社聘为英语专家，她博学多才，熟谙新闻业务，与中国同事和睦相处，勤恳工作。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文革”开始后，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巨变，史密斯发现自己被置于一座冰窖中。昔日亲密无间的中国同事，眼中失去了热情和温柔，代之以冷漠和敌意。再没有人理睬她，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迫于无奈，史密斯提出了回国的请求。她含着眼泪说：“虽然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后不能说中国的坏话。”办好手续，中国同志送她到机场。临别时，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周恩来介绍了史密斯的情况，动情地说，她回去后，确实是说中国的好话。这样一个英国同志，我们是对她不住的……

周恩来这次讲话以后，我国有关部门了解到史密斯回英国后的情况。她回到伦敦后，由于英共的分化，原来的同志变成了敌人，她感到孤单和凄凉。史密斯感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更加怀念在中国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1971年，正逢史密斯80大寿。她生日这天，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带着生日蛋糕来看望她，并且邀请她再次到中国工作。史密斯高兴极了，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她刚踏上中国土地，就感动得哭起来。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专家，实践了她献身中英友好事业的誓言，1985年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对黄土地怀着眷恋之情的外国专家，远不止史密斯一人——

彷徨中他想起了周恩来……

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早在1939年9月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延安，那时他才24岁。当他伸出双手和毛泽东紧紧相握时，他的命运从此与中国革命联结在一起。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医学专家随军转战，足迹遍及华北、东北各个战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根据他的请求，有关部门批准他加入中国国籍，他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文革”动乱开始的时候，米勒正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

一夜之间，党委和院领导成了“走资派”，医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性格耿直的米勒不肯随波逐流，被“造反派”怀恨在心，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厄运株连到米勒的子女。他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一件件不愉快事件使米勒下了决心：“我已经是‘狗不理’了，我在中国成了多余的人，你们让我回德国去吧！”

积水潭医院主管外事的干部很理解米勒的心情，他力劝米勒留下来，并建议，如果有实际困难，可以写信给周总理。

这个建议打动了米勒，他一向崇敬和信任周恩来。在给总理的信中，他诉说了目前的处境和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并请求批准他回德国去。

米勒的信送到总理办公桌上，周恩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个外国血统的共产党员对中国的热爱，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恢复正确的外专工作方向迫在眉睫。

这一时期，反映其他外国专家境况的通报也纷纷汇集到国务院。周恩来决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

1973年2月2日，周恩来阅读了外国专家局的第六期《专家工作简报》。其中反映了对外国专家放任自流，以致出现不健康倾向的事例。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他在简报上批示，责成外交部、新华社、外文局、广播局、北京市委、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组成调查小组，分别找外国专家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情况，向自己直接汇报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北京市委派林桐参加调查小组，并具体解决米勒的问题。此后，林桐担任了总理联络员，曾三十余次去米勒家做工作。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米勒终于放弃了回德国的请求，决心把余生贡献给中国的卫生事业。

但是，就在外专工作逐步恢复并开始走上正轨时，周恩来忽然得到外专局被撤销的消息。

“外国专家局你们不要，我要”

1973年3月4日晚，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里灯火通明，外交部、中联部及一些涉外单位的负责人共31人被召集到这里。

10时整，周恩来出现在会场。他说，今天到会的都是负责外事的干部，主要讨论外国专家工作问题。

总理首先询问外专局撤销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关同志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自“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局一直由外

交部代管。由于业务并不十分对口，专家问题又比较难办，当时的外交部感觉是一个负担。1973年初，外交部向国务院打了报告，决定撤销外国专家局，成立专家小组，由外交部领事司管理。这份报告未曾送交总理，但已由国务院退回外交部，预备实施。

周恩来批评说，国务院的一个局，我总理不知道，怎么就给撤销了？我在1月31日的《专家工作简报》上发现专家工作有问题，还在2月2日要有关单位改进。可是，我一面去向专家承认错误，你们一面却甩手不管，撂挑子。外专局，你们不要，我要。周恩来强调了外国专家工作的特点，他说，外国专家不是侨民，不宜划归领事司管，怎么能把专家工作和护照签证搞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外交部核心小组再讨论一下，通不过，再找我。

周恩来就外专工作中几个有共性的问题，谈了处理原则。外国专家要求参加政治活动，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加于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专家，要享有中共党员的一切政治待遇。

接着，周恩来询问与会各单位的外专工作情况，逐一作指示。有人汇报说，英国专家劳埃德对跳“忠字舞”，搞早请示、晚汇报一套做法看不惯，给学校提了意见而被斗，并被解聘回国。结果造成神经失常，在英国找不到职业。总理立即表态说，这是我们的错误。应该把人接回来，向他赔礼道歉，有病我们要负责给治好。

在听取北京大学汇报时，周恩来对美国教师叶文茜一家处境表示非常关心。这一天上午，周恩来刚在一份报告中作了批示，报告的内容就是关于叶文茜参加教改的情况。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从叶文茜本人到她子女，其中果然存在意想不到的麻烦。

叶文茜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市人。当她还是姑娘的时候，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叶渚沛，并且嫁给了他。而1950年叶文茜随丈夫来到北京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叶文茜上大学时专攻文学，还喜欢戏剧和诗歌。到中国后，她被北大聘为英语系教师。

叶渚沛是位才能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把家庭和三个孩子都交给了不通汉语的叶文茜。

这样，叶文茜有了外籍教师和中国家属两种身份，她的肩上也挑起了专家工作和家庭主妇两副担子。

辛苦和劳累算不了什么，使叶文茜难受的是她成了有关管理部门都可以管又都不管的边缘人物。由于她嫁给了中国人，她不是纯粹的“外国专家”，一些为外国专家组织的参观、游览等活动都没她的份；由于她长着一副洋面孔，中国人谁也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同胞。

她像寓言中那只倒霉的蝙蝠，兽类说它像鸟，鸟类说它是兽，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十年动乱开始后，这种情况更甚。“里通外国”和“特务”的双重怀疑，使人们都不敢和她讲话。1971年叶渚沛去世后，叶文茜的日子更艰难。

灾难还传给了下一代。由于遗传基因的组合，叶家子女面貌上具有异邦人特征，这使他们被打入了“另册”。中学毕业后，当兵或上大学这样的美事想也不敢想，能在小厂里当个壮工，已经很知足了。

大儿子叶良侠已经30多岁，在工厂劳动中与一个女工建立了感情，两个人相爱了。这正常的恋爱却引起轩然大波。工厂的领导不愿属下发生“涉外婚姻”，坚决反对。女方的父母把“不争气”的女儿骂够了，又强迫她离开

工厂，送到河南乡村里躲藏起来……

听到这些情况，周恩来浓眉紧皱，他激动地说，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叶良侠是中国的孩子，不能因为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他指示北大外事处周俊业副处长，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尽快把那个女孩子找回来。可以多做女孩子家长和工厂的工作，如果有顾虑，就说是我讲的。

总理最后说，今年三八节就要着重抓外国专家工作，到时把所有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请来，我们得承认错误，这样才能主动。

### 滚滚而过的春雷

1973年3月8日，人民大会堂三楼宴会厅里人声鼎沸，中联部、外交部和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茶会，往年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外专口也照例举行庆祝集会，但是只邀请外国专家夫人和外国女专家参加。今年三八妇女节却格外隆重，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专家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全部被邀请出席。

周恩来、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江青和王洪文、姚文元也参加了会议。

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严峻。林彪集团虽然已“折就沉沙”，被赶出历史舞台，但是，“四人帮”却正在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暗是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勇气，向江青等人推行的极左路线勇敢宣战，维护了正确的国际主义原则。

外国专家看到周恩来总理亲临茶会，不禁为之欢呼雀跃。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江青等人冷眼旁观的不和谐气氛。

会议开始，周恩来发表了长篇讲话。他首先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对党的政策，包括外专政策的破坏和干扰，介绍了批林的情况。接着，周恩来对“文革”给专家们造成的痛苦和不幸，逐个赔礼道歉。

他谈到露丝·史密斯的遭遇，再次向她表示歉意。史密斯就坐在总理身边，她严峻的脸上凝聚着理解和感动。

周恩来对受到不公正待遇、已经离开中国的劳埃德、雷克夫妇等专家的现状表示关心，欢迎他们再一次来中国，以弥补我们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过失。

周恩来向被诬陷入狱，刚获得自由不久的柯鲁克、爱泼斯坦、丘茉莉、夏庇若等专家赔礼道歉，并内疚地说，让你们受苦了……

当周恩来一个个向专家们表示歉意时，大厅里安静极了。专家们想不到他们尊敬的中国总理这样坦诚，这样勇于承担责任，这样痛痛快快地自我批评。

周恩来满怀敬意，指着安详地坐在身边的女革命家蔡畅说，蔡畅同志是我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她经常同外国朋友交往，结下了深厚友谊。蔡畅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许多专家听着，思索着，眼里饱含着泪水。一些女专家或专家的妻子们，不时掏出手绢，擦去流出的眼泪。在讲话的最后，周恩来充满豪情地说，今后我们一视同仁，像一家人一样地生活，好不好？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节日，我们来个男女革命朋友一道解放！

周恩来的讲话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他又端起酒杯，挨桌去

敬酒，同每一张桌子旁的外国专家及家属碰杯，祝贺节日愉快。

米勒全家也出席了茶会，周恩来握着米勒的手说，我非常高兴你继续留在中国，把这些年的不愉快，统统忘掉了吧！米勒十分激动地说，请总理放心，我早已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周恩来见到在外文局工作的日本专家添田修平，首先用日语向他问候，添田连忙用中国话问总理好。周恩来轻轻抚摸着他5岁的幼子武人的脸颊，称赞说，多么可爱的孩子！小武人腼腆地不知说什么好。旁边巴西专家的孩子星海却丝毫不怩，提议用茅台酒和总理干杯，引起周恩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在叶文茜一家的桌子边，周恩来指着魁梧英俊的青年问，这就是你的大孩子吧？叶良侠向总理问好，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周恩来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已经让下边帮助你解决，来，为你的主活美满、全家幸福，干一杯！全家人感动地喝了这杯盛满深情的酒。

当周恩来等领导人走到专家们面前，逐桌敬酒和谈话时，江青始终面色铁青、沉默地坐在主宾席上，不和任何人交谈。

那天在会上，专家们注意到周恩来的健康欠佳，只是爽朗的笑声和精明的举止掩盖了这一点。很久以后才知道，从前一年开始，不治之症已经在侵蚀总理的躯体，他正在用有限的生命作拨乱反正的最后搏击。

对于在北京的外国专家来说，1973年3月8日同周恩来这个伟大的名字一起，深深镶嵌在他们的生命里。不论过去了多久，人们都不会忘记周恩来总理1973年三八妇女节的讲话；不会忘记乌云密布的天空中，滚滚而过的那一声春雷……

## 二十六、最后斗争谱辉煌

### 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

江青大闹政治局，王洪文长沙告阴状，皆为他们的组阁梦。病重中的周恩来煞费苦心细斟酌，长沙决策定乾坤，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

####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明朗、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人为主”和“先发制人”。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却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于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惟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洪文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已来的。几

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 病房成了办公室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作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 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 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

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时间已不到一个月了。

### 周恩来抱病赴长沙

已拖延十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作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作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



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当天，周恩来和同住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树欲静而风不止。“四人帮”频频发难，“经验主义”、“投降派”的“棍子”对准周恩来、邓小平横扫。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奋力一搏，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1974年底“长沙决策”之后，重病中的周恩来便把希望寄托在复出后的邓小平身上。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邓小平已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父亲复出后，在他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被‘文革’的飓风横扫得满目疮痍的零落景象。

“父亲被打倒过一次了，而他没有因此而存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机立断，运用毛主席赋予他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室中的周恩来，将生命的最后光华，化作无形的巨大能量，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斗争，谱写了1975——这艰难而辉煌的一页。

## 欣慰与希望

1975年1月10日晚，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正在这里举行。

刚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瘦而双目炯炯有神。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通过全会各项议程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

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总理了。此时此刻，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迟迟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是：“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对于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然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不过是周恩来在进入1975年后抱病参加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当中的头一个会议。

1月13日晚8时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场——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又再次响起周恩来总理坚定、清晰的江浙口音：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

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 2800 多名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份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不足 5000 字的报告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而这一号召，报告人 10 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了，今天，他不过是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热爱自己总理的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但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上述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在 1 月 17 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宣布了根据中共中央提议、由本次会议任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在总理周恩来后面的副总理当中，出现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一批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名字。这标志着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新的国务院任命公布后，一直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人们，才真正感到了安慰和希望。

2 月 1 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 12 位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

“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来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其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

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 12 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

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新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他还像过去那样，讲话没有“客套”，单刀直入：

“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风格凌厉的讲话，成为这一年他领导的各项工作的起点，是打响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就在邓小平发出全面整顿信号不久，全国上下却掀起了一场与整顿不相协调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各种舆论工具的宣传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比比皆是，不绝于耳。一时间，学习“理论”似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决定一切的“中心”。

然而，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却偏置舆论宣传于不顾，在各种场合里，他大讲特讲的则是另一种“大事”，另一个“中心”。

3月5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周总理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里的几段“开场白”，其中心就是一句话：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之所以在国民经济中首先抓铁路运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铁路系统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难”。1966年冬，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就因制造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而一举成名。之后，在“全面内战”的几年里，一些重点铁路枢纽和路段一直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后来虽然采取了军事管制、军队护路等办法，但也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当时派性肆虐，一有风吹草动，一些造反派便在铁路作乱。1974年“批林批孔”以后，一些造反派重操“旧业”，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地铁路交通严重堵塞，直接影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重要干线的畅通。至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直线下跌，仅达到4.3万车，与实际需要相差1.2万车，而铁路上的各种事故更是惊人，1974年内共发生行车事故755件，是“文革”前1964年的8倍多！

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一语中的，斩钉截铁：“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到会一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顾虑，他指出：“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

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听到这些痛快淋漓、坚定有力的话语，到会许多同志不禁想起当年周总理痛斥派性、制止武斗，号召广大铁路职工抓生产、抓业务，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一次次教诲。现在，虽然周总理病重住在医院，而实际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仍在继续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大家的心里感到有“底”了。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四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同邓小平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注。他向纪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

## 政治局会上的交锋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其成员包括：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军权在握，这正是“四人帮”担心之所在。

3月1日，身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张春桥，在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宣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个人意见”表示，四届人大提出的那个“很宏伟的目标”，“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搞不清楚”，仍然会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

曲地引用毛泽东 1959 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许多场合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一批工人讲话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又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来的一份强调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据此，毛泽东要求将此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几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卑劣行径。尤其对反“经验主义”问题，邓小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他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等人既惶恐不安，更怀恨在心。王洪文为此致信毛泽东，诬蔑说：政治局会上的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把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讲出来，目的是要翻过去的案。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通过和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也了解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将这些问题及个人意见汇报给毛泽东。

5月3日晚，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到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的。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齐，周恩来也抱病从305医院赶到会场。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看景物仍感模糊，但他思维依然敏锐，谈吐不减当年。他在讲话中一开始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当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随即，毛泽东加重语气，打着手势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这是毛泽东继1974年多次批评江青一伙

以后，又一次指出“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问题。

在毛泽东讲话时，江青倚仗她的特殊身份，未作一句检讨，并不时在会上插话，引起毛泽东的不快。他面色严峻、一句一顿地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道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支吾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做了一个翻来覆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正式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又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发表异议说，周总理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毫不退让，以张春桥3月1日在总政讲话和三四月间军内各单位对张讲话的反映的事实，回击张春桥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狡辩。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面前，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再作长篇发言，对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攻击、诋毁周恩来的做法逐一揭露，连发质问。邓小平以坚决的口吻说道：对这些问题，应当讲清楚，“不讲明白，没有好处”。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而江青等人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事后，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指“四人帮”）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指邓）、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

### 春雷滚滚撼大地

自中央政治局会后，受到批评的江青一伙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人们注意到，“文革”中一向不放掉抛头露面机会的江青，在一连几个月里，几乎再没有公开露过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变得不那么盛气凌人、神气活现了。一时间，“江青挨中央批评”的消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从6月初起，在医院的周恩来却频频会见外国来宾。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常有邓小平、李先念、廖承志等。

6月7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女儿时，兴致勃勃地告诉客人：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包办了，这就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

党的作风》的讲话，阐述他不久前提出的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指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8月18日，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整顿企业管理秩序和恢复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9月15日，邓小平出席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提出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意见。9月底至10月初，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从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里，全面整顿的“排炮”犹如阵阵春雷，震撼祖国大地。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通过传达、学习邓小平的讲话，都油然而生一种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畅快感觉。

一直在周恩来、邓小平指导下进行教育系统整顿的周荣鑫，根据周恩来、邓小平对整顿教育工作的意见，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严词批驳了长期以来“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此，周荣鑫并非不知所冒“风险”，但他却无所畏惧：“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好搞形而上学的人的，他们肯定会要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的讲话，表达了领导整顿工作的一批老干部的心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经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1975年9月7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他向来自东欧的客人们坦然且又肯定地道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一语时，在座的来宾都惊愕不已。随即，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外宣布：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 最后的支持和鼓励



对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在过去若干年之后，邓小平仍记忆犹新，并多次向国内外人士谈起。其中，也包括他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

1983 年 7 月，邓小平回忆说：“1975 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 365 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邓小平还讲过：当时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87 年 10 月，在谈到改革问题时，邓小平又提出：“说到改革，其实在 1974 年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 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 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起三落’。1976 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 年到 1975 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邓小平“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这便是邓小平所讲他当时第三次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伺机反扑的“四人帮”一伙已经开始向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周恩来发难了。

这一年 8 月中旬，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评论，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对此，“四人帮”一伙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借毛泽东的评论大做文章。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

在“四人帮”操纵下，从 8 月底开始，全国各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宣扬评论《水浒》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几个月来一直“消沉”的江青，这时也亲自出马，在一些公开场合大谈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并一再强调“要联系实际”。她甚至露骨地宣称：“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借以发泄对前不久中央政治局批评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的不满。其间，毛泽东曾痛斥江青的一些言论，并制止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江青等人散布的批所谓“现代宋江”、“现代投降派”的论调，邓小平早有警觉。他在许多场合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说明：毛主席评论《水浒》并无所指，不要牵强附会，“听到风就是雨”。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正密切注视党内这场突如其来的尖锐斗争。8 月中、下旬，他抱病连续同邓小平、李先念等作单独长谈，了解“四人帮”一伙的动向。

9 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 月下旬，由于病情恶化，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准备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

9 月 20 日下午 2 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响彻寂静的手术室内外。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怔住了。他们迅速交换着眼色，心上就像是压着一块石头……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邓小平、李先念，鄙视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张春桥，彼此会意地点了点头。

死神，又一次悄悄从周恩来身边溜走。但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了。对此，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正在领导各条战线全面整顿斗争的邓小平，此时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再走出病房，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啊。

一个月以后，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这一天，守候在手术室外面的仍然是上次的几个人：邓小平、李先念、张春桥……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又示意让担架车停下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立即跨步上前，靠近担架车，俯身问候周总理。

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早已伸过来的双手，字字千钧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的话语，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高度评价。

## 二十七、魂归大地情未了

### 在最后的日子里

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政治家在生命岁月的最后一年零六个月的心路历程。他生前的最后几句话竟是关心别人。他是带着太多的牵挂走的

周恩来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是在医院度过的。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竭尽全力地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持着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终于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还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周恩来。他们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利用各种场合，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1974年四五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

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但是，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自己内心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而已经有可能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又怎能不急切地寻找机会表达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呢？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5

月7日，周恩来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就是这样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忘我地工作着，而且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那么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时，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

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 1974 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 月 20 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 10 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了过去。

12 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 20 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 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 月 7 日晚 11 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时 57 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 骨灰撒向江河大海

生也为人民，死也为人民。邓颖超完成周恩来生前托她的一件大事。共和国总理的骨灰撒向江河大海

1976 年 1 月 12 日晚，周恩来逝世的第四天，北京东郊机场：一架普通的安—2 飞机呜咽着划破漆黑的夜。飞机上载着周恩来的骨灰和负责把骨灰撒向江河大海的张树迎和高振普。

后来，高振普曾撰文详细地叙述了播撒周恩来骨灰的前后过程：

1976 年 1 月 8 日 9 时 57 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1976 年 1 月 12 日，邓大姐把张树迎同志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叫你们二人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嗓子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感情，安慰我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大冷，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

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他说了一下，周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民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大姐的话不多，但语言深刻，它包含了到目前我仍然认识不到的道理。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二人一块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1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指定张树迎和我参加执行这个任务。

晚7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打开骨灰盒，邓颖超同志双手抚摸着骨灰，她的手在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地哭了。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表现出大姐的坚强决心，豪迈的语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蒋管区，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岁月里，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西长安街、西单、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离开了大会堂，背向着群众，向东开去。

晚8时许，到达坐落在北京城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安—2型飞机，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最后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怎么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孔、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您的身教言传，更坚定我为党、为人民做工作的决心。您说我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送我下连队当兵，向战士们学习。多少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坐一架飞机，我多么想再看到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

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飞机飞越密云水库，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不怕寒冷，完成这最后使命。

总理，您安息吧！1月8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那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用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看哪！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女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挥泪捶胸，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你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的天空、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您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光辉的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的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16日上午9时，我和张树迎同志去西花厅向大姐汇报。大姐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大姐，大姐张开双臂把我们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两眼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三个人抱得更紧。

大姐这几天，不！这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您承担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您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您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您日夜操劳，您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您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您的多少心血啊！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您想得更细、更周到，您也亲自为总理擦汗、喂饭，每天守在病床前。谁也不知道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您花白的头上又增添了白发，明亮的双眼又挂上条条血丝。



## 后记

自从周恩来辞世以来，大量回忆、记述和研究周恩来生平业绩的文章、书籍面世，表达了人们对生前从来不愿宣传自己的周恩来的深深怀念。我们从近年来发表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的有关周恩来一生的文章中精选出许多精彩、感人的内容，加上新近撰写的一些段落，编成这本 100 余万字的书，为的是进一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并使人们对周恩来的一生有一个较为完整、清晰和生动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向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献上的一份心意。

本书所选的内容，涵盖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一生的各个历史时期，有的是老同志的回忆，有的是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记述，有的是专门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的纪实佳作。为统一体例、避免重复，并力图在有限的篇幅里包容最大的信息量，我们在遵从原意的基础上对原稿作了一些删节和编辑加工，并努力对某些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作了订正，还为大部分文章重新拟了标题。

在本书编选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的大力帮助、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研究员、李海文研究员、安建设副研究员审阅了全部书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廖心文、熊华源、纪晓华等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很大地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编辑一本百万余言的书，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工程，尤其它反映的又是周恩来这样一位影响中国和世界的世纪伟人，因此，书中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并谅解。

编者

## 附注

### 淮安少年 大鸾翔宇 (1898—1924)

1. 童年 (杨明伟、杨宗丽)
2. 东北三年 (摘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怀思《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
3. 求学南开 (摘自怀思、杨明伟等文)
4. 东渡日本 (摘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梶谷善久《留学日本时的周恩来》等)
5.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 (摘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金凤《邓颖超传》)
6. 旅欧认主义 (摘自杨明伟、李跃梅等文)

### 艰苦卓绝 投身革命 (1924—1935)

7. 在黄埔军官学校 (摘自力平、成元功、金凤等文)
8. 主政东江 (摘自曾庆榴、杨明伟等文)
9.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摘自力平、阮波等文)
10. 领导南昌起义 (摘自力平、郑理、杨明伟等文)
11. 出席中共六大 (摘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金凤《邓颖超传》等)
12. 整顿各地党组织 (摘自廖永武、金冲及等文)
13.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摘自力平等文)
14. 在白色恐怖中 (摘自穆欣、林浓等文)
15. 伍豪事件真相 (摘自周恩来文集编辑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真相》等文)
16. 在中央苏区 (黄少群：《周恩来在中央苏区》)
17. 长征途中 (摘自魏国禄、杨明伟等文)

### 团结抗战 功在民族 (1936—1945)

18. 肤施秘密会少帅 (摘自窦嘉绪《历史性的会见》)
19.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史恒《民族曙光》)
20. 战斗在谈判第一线 (摘自李海文《五次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21. 营救西路军 (摘自董汉河《周恩来营救西路军》)
22. 劳山遇险 (摘自赵桂来《劳山枪声——周恩来劳山遇险纪实》)
23. 推动阎锡山抗战 (摘自赵晋《周恩来三晤阎锡山》、赵桂来《周恩来太原突围纪实》)
24. 投身武汉抗日洪流中 (摘自廖心文《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活动侧记》)
25. 呕心沥血新四军 (摘自石仲泉《周恩来与新四军》)

26. 延河坠马（摘自成元功《延河坠马——周恩来断臂事故纪实》）
27. 冲破皖南事变的黑暗（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28. 战斗在虎穴龙潭（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29. 只身勇赴“鸿门宴”（李海文文）

### 致力和平 重写春秋 (1945——1949)

30. 重庆谈判（摘自童小鹏、解力夫等文）
31. 周马会谈（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在1946年》）
32. 上海：周恩来将军官邸（于士、许真：《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33. 重庆：痛悼冼星海（余尚清：《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领导的一次音乐会》）
34. 秦岭遇险（何谦：《今天一定要到达》）
35. 宣化店解围与黄河复堤（摘自何谦、王化云文）
36. 南京：两次见记者（摘自《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钱小柏：《毕生难忘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等文）
37. 转战陕北（摘自童小鹏、力平等文）
38. 解放战争第二年（摘自童小鹏、阎长林文）
39. 伟大的战略决战（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40. 米高扬来华（杨宗丽：《米高扬的三次中国之行》）
41. 谈判桌上的较量（摘自解力夫《解放战争史话》等）
42. 筹备新政协（摘自童小鹏、刘昂、岚叟、李丁等文）

### 意气风发 高歌奋进 (1949——1957)

43. 出任“内阁总理”（摘自熊华源《周恩来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纪实》、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
44. 抗美援朝临危受命（摘自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等）
45. 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凌云文）
46.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摘自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
47. 治理水患除害兴利（摘自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
48. 中南海打“老虎”（摘自尹家民《毛泽东、周恩来中南海打“老虎”》）
49. 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摘自段子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
50. 精心绘制第一幅建设蓝图（熊华源文）
51. 提出四个现代化（摘自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
52. 知识分子的春天（摘自熊华源《周恩来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53. 在冒进和反冒进中（熊华源文）
54. 苦闷的1958年（摘自熊华源《周恩来在苦闷的一九五八》）
55. 为祖国统一开路（摘自廖心文《周恩来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

针》)

56. 心系香港(摘自廖心文《周恩来与香港》、徐彬《97 香港回归风云》)
57. 组建外交部(摘自王俊彦、南山文)
58. 首次出访苏联(熊华源文)
59. 叱咤风云日内瓦(熊华源文)
60. 用艺术架起友谊的金桥(摘自熊华源《周恩来为 梁山伯与祝英台取别名》、向黎《两位杰出人物的一次会见》)
61. 求同存异万隆城(摘自熊华源《周恩来与万隆会议》)
62. 不避艰险万隆行(摘自成元功《万隆之行——周恩来不避艰险参加亚非会议纪实》)
63. 外交大师与反共头子的较量(摘自赵兴燕《失之交臂, 马戟言语相较量》、王炳南《中美会议九年回顾》)
64. 创造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摘自廖心文《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与中缅边界谈判》)

### 曲折行进 华夏辉煌

(1958——1965)

65.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66. 特赦战犯促“月圆”(摘自王庆祥、廖心文等文)
67. 从化读书(杨明伟文)
68. 邯郸调查(摘自邹爱国、武延文等文)
69. 阜成门遇险(摘自成元功等文)
70. 新侨会议上的争论(杨明伟文)
71. 三次到大庆(摘自康世恩、宋振明文)
72. 接到班禅“七万言书”的前前后后(杨明伟文)
73. 与戴高乐密使富尔商谈中法建交(陈扬勇文)
74. 首访非洲十国(杨明伟文)
75. 原子能事业的主帅(杨明伟文)
76.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陈扬勇文)
77. 最后一次访苏(余湛文)
78. 带领中国民航专机首次国际远航(杨明伟文)

### 动乱岁月 砥柱中流

(1966——1976)

79. 艰难之中抓生产(摘自陈扬勇《周恩来与林彪、江青集团搞乱国民经济斗争纪实》)
80. 挽救交通大动脉(摘自陈扬勇《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铁路交通》)
81. 托起中华民族航空梦(陈扬勇文)
82. 动乱中抓核工业(摘自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刘柏罗《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83.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力平《开国

总理周恩来》等)

84. 舍身保陈毅(摘自白水《“文革”中的周恩来与陈毅》)

85. “我没能保住他啊!”(摘自史鉴《“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薛明《周恩来与贺龙》)

86. 党、政、军负责人的避风港(摘自宋任穷、谭启龙、刘俊秀、杨易辰等人的回忆文章)

87. 保护民主人士(摘自廖心文《一张特殊的保护名单》及金城、任荣、余湛邦、郭翼青等的回忆文章)

88. 面对红卫兵运动的狂潮(摘自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做的不懈努力》)

89. 二月抗争中的特殊作用(摘自纪希晨《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安建设《周恩来与二月抗争》)

90. 在“七·二”事件前后(摘自高振普《“七·二”事件中的周恩来》、陈再道《武汉“七·二”始末》)

91. 敲掉江青的“车”“马”“炮”(北溟文)

92. 忍辱负重斗群贼(摘自穆欣《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次斗争》)

93. 面对江青刺来的暗剑(摘自南云《一把刺向周恩来的暗剑》)

94. 身边工作人员的遭遇(摘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95. 领导中苏边界谈判(摘自南山《周恩来与柯西金》、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

96. 瞩目世界的握手(摘自陈扬勇《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

97. 致力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摘自杨明伟《周恩来与田中角荣握手》)

98. 果断机智地处理林彪事件(摘自南云《林豆豆的密报传来之后》、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

99. 关键时刻批极左(摘自安建设《周恩来与1972年前后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100. 危难之秋举“邓公”(摘自陈扬勇《危难之秋举“邓公”——“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

101. “解放”175位将军(摘自谢国明《175位将军“解放”始末》)

102. 滚滚而过的“春雷”(摘自高岩、漆露《滚滚而过的春雷——记周恩来对在华外国专家的关怀》)

103. 挫败“四人帮”的组阁梦(摘自安建设《长沙决策》)

104. 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摘自安建设《最后的斗争》)

105. 在最后的日子里(摘自高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

106. 骨灰撒向江河大海(摘自高振普《最后的使命》)

